

玉環文史資料



19

(綜合性史料)

封面说明：

封面照片，是城关西城路中段一角，原名西青街，全长不足千米，清雍正特开志就有记载：“西青街，在永清门外(西门)居民贩鲜聚市于此”。从清、民国以及解放以后，几百年来，玉环县城就只有这么一条老街，赖此生息。近百年来，老街曾多次遭受火灾，新建民居，与老街原貌变化不大，仍是那狭狭仄仄的。这条老街即将被新的建城区所替代，旧貌将荡然无存，为使后人能知老街旧貌，特剪其一角，留此存照。

玉环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综合性史料)

玉环县珠港东城路6号
317600. 电话: 221090⁽²⁵⁷⁶²⁾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二年九月

政协玉环县五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汉节

委 员 (按姓氏笔划)

张一芳 林 曦 林云新 林楚香

徐君义 戴搏节

特邀委员 (按姓氏笔划)

支超明 张 谨 阮存寅 金新寿

郑义亮 傅世扬

文史编辑部

办电 宅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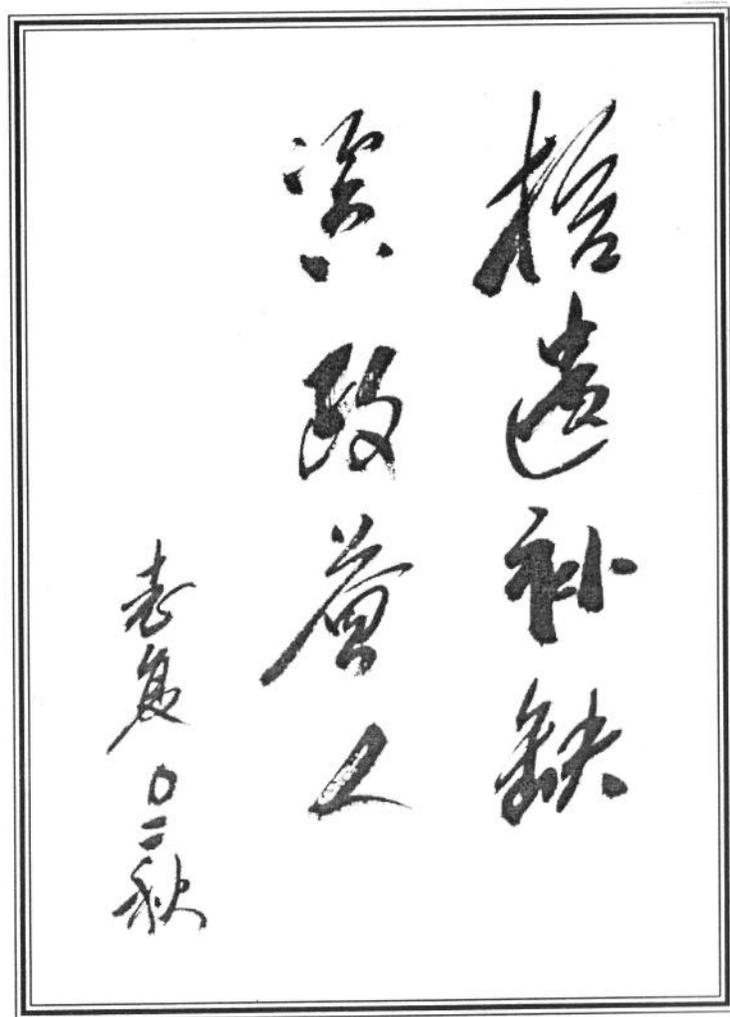
编 审 颜志复 7221049 7221030

总 编 戴汉节 7411108

副总编 王志统 7221090 7222385

责 编 朱仁巴 7221090 7225301

(本县区号为 0576)



玉环县政协主席颜志复题词

前言

玉环文史资料19辑，是与18辑同时出版，这一辑是在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时编辑就绪的，以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本辑栏目编排，沿用过去栏目名称有：《人物春秋》、《革命风云录》、《抗战纪事》、《工商史话》、《榴屿纵横》、《风景名胜》、《国外见闻》、《故乡颂》、《文史天地》等9个栏目。有61篇文章，约14万字，内容广泛，史料丰富，千姿百态，包罗万象，胜过以往任何一辑综合性史料，起到补史之缺、修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对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服务社会，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玉环文史资料出版以来，承社会各界关心垂爱，大力支持，源源不断的赐予各类稿件，使玉环文史资料有米下锅，按时出版，期间不少作者来稿，内容、文笔均属上乘，史料性、现实性、可读性俱佳，就是因为这些文章与当时出版内容不对口，或其他原因，一时未被采用，月积年累，计有80余篇，20余万字，长期被尘封在“冷宫”中，有负作者一片苦心，编者也深感不安，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文史资料也要与时俱进，多出书，出好书，以满足社会各界对精神食粮的需求，经文史委员会研究决定，在原计划18辑（古树与名木）专辑外，再增出一辑综合性史料，以容纳这部稿件，而了文债。

本辑内容最多的是人物，共有22位，都是值得尊敬、值得同情、值得学习的人物，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有统战对象也有社会贤达，有专家学者，也有只有一技之长的普通百姓，这些人物，都

敬献政协玉环县文史资料编委会全体同志

深切感谢您们在文坛辛勤耕耘
为桑梓人民办大業實事

留有余
不尽之
榴史瑰宝
以贻后代子孙

寄籍宁波情系故里玉环人

林宏燕 书于宁波北仑中一学

留有余
不尽之
榴史瑰宝
以贻后代子孙

书法林宏燕

不同程度的对党对人民作出过贡献，今天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一方面是表彰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启迪后人学习他们那种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这些人中大部份已作古，有的是早期病故，有的是最近几年离开人世的，他们都见不到自己作品的问世，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革命风云录》中，周丕振（今年9月1日病故）同志所作的《解放玉环纪实》一文，是为玉环解放五十周年而作，玉环解放过去虽有记载，却甚少如此全面、周详的记述，真正起到补史之缺、修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是一篇记述玉环解放既准确又全面的范本。

玉环解放时，原“县长”毛止熙被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去虽有提到，却没有专题记载，盛世樵同志亲历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他所作的《毛止熙被俘被释经过》一文，弥足珍贵。

陈展同志所写的《1950年11月20日，玉环军民歼敌记》一文也是比任何一篇类似的史料都详细、具体、周到，有存史价值。

《风景名胜》栏目中的几篇文章，有的是旧闻，有些是新作，都有拾史之余、补史之缺的作用。

《国外见闻》栏目中的三篇文章，都是作者涉身所在国，写出了亲历、亲见、亲闻的异国风情，既使读者丰富了知识，又扩大了视野。

《故乡颂》的三位作者，都以极大的激情讴歌了自己的故乡，郑志平、方贵川二人所作的《我县城市化建设走笔》一文，不愧是玉环城建的大手笔，熠熠生辉，令人鼓舞。

1993年林素菊同志为本刊写的《玉环旧事》一文，有一万多字，因篇幅关系，在第八辑中刊出部份后，受到读者好评，留下几节，现予续刊，以飨读者。

1995年，张素菊同志有幸在北京参加世界第4次妇女大会，这是玉环籍人士的荣誉，也是值得珍存的历史资料，她的文章收到

时，本刊连续出专辑，没有机会刊用，今特补辑，虽明日黄花，但仍可让读者分享她的这一份荣誉与喜悦。

今年是香港回归五周年，香港玉环籍人士林素芳女士为本刊寄来《回归五年话香港》，她以普通市民的心态，写出了与众不同的感受，文内有不少内地人鲜知的情节，值得一读。

其他栏目也都各有特色、各具风采，形神兼备、雅俗共赏，读者一定喜欢。

本辑有些历史史料、因年代久远、一时无法查证，成为独家之言，难免有出入，诚望识者予以匡正。

本辑承政协主席颜志复题词，宁波玉环籍高级中教退休教师林宏燕惠赐墨宝，以及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限于水平，舛误和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识者不吝教正。

责编

二〇〇二年九月

玉环文史资料

目 录

(十九辑)

前言

人物春秋

- 玉环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的传奇人生 / 朱仁巴 (1)
- 我的剪纸在前苏联 / 韩 伟 (7)
- 艰难求学路 / 林素菊 (12)
- 相聚在北京
- (原)市妇联主任张素菊谈世妇会见闻 / 陈群星 (17)
- 我这一生 / 刘 嶙 (21)
- 回归五年话香港 / 林素芳 (23)
- 怀念朱树森同志 / 胡义夫 (27)
- 缅怀陈道生同志 / 安 邦 (33)
- 缅怀陈竑同志 / 厉冲芳 林沂 任忠 (37)
- 回忆林超同志 / 周叔康 (40)
- 民法学家李由义简历及其著述 / 朱仁巴 (45)
- 庄忠庆生平事略 / 庄奇炎 (47)
- 我这坎坷的一生 / 曹云凤 (55)
- 怀念张鸿玉先生 / 方季川 (60)
- 花山旧事 / 鹄红 (63)
- 追忆潘俊士先生 / 阮存寅 (67)

- 热心教育的陈楚材先生 / 王詠樵 (74)
 热心公益的耿思赞 / 张炳文 (76)
 田岙拳师“寿老本” / 章人才口述 戴搏节执笔 (79)
 和头厨师陈仁进 / 张炳文 (81)
 大章点点滴滴 / 陈隧雄 (84)
 我是怎样投考黄埔军校的 / 陈青寿 (87)

革命风云录

- 解放玉环纪实 / 周丕振 (95)
 毛止熙被俘被释经过 / 盛世樵 (103)
 追忆 1950. 11. 20 玉环县城歼敌记 / 陈展 (106)
 楚门闹米荒始末 / 周行 (112)
 记解放战争时期亲历学生运动几个片段 / 陈继源 (120)
 走上革命之路 / 林素菊 (133)
 忆仙临黄边区青训班 / 傅世扬 (136)

抗战纪事

- 日寇侵占楚门外塘见闻 / 胡德钊 (138)
 桐丽乡民众抗战纪事 / 张悟新 (144)

工商史话

- 芦岙吴泰元酱酒坊 / 肖善志 (148)
 坎门王万顺绸缎棉布商店 / 肖善志 (150)
 楚门同和南货店 / 张炳文 (153)

榴屿纵横

- 玉环县展复二百周年纪念碑建立始末 / 郭辑中 (155)
 玉环的黄埔军校学生 / 项荣平 (156)

- 玉环残余政府简介 / 应万里 (159)
 渔岙婚俗 / 林素菊 (163)
 朱自清和林铎 (与) 董运铎 / 董服官 (167)
 玉环董毛两派斗争种种 / 蔡蔚文 (170)
 记港北党内二次支毛会议 / 王詠樵 (173)
 毛止熙其人其事 / 朱仁巴整理 (175)
 清港玉陞桥建桥始末 / 林兆佩 (182)
 柏树台门与郑氏家属的传说 / 郑东恩 (184)
 楚门观音堂剪影 / 唐小友 (186)

风景名胜

- 此处景致不寻常 / 仙居 郭金勇 (191)
 造访江岩岛 / 台州日报记者 孙敏瑛 (193)
 一峰耸峙丫髻美 / 方贵川 (194)
 丫髻山上吕祖殿 / 王詠樵 (197)
 大坦里散记 / 陈隧雄 (201)
 漩门亭记 / 谢良福 (203)
 话说龙潭寺 / 唐小友 (205)

国外见闻

- 赴朝鲜考察教育观感 / 舒长春 (209)
 旅法、德琐记 / 林冬善 (213)
 我在中国驻裴济大使馆的日子里 / 王岩柳 (219)

故乡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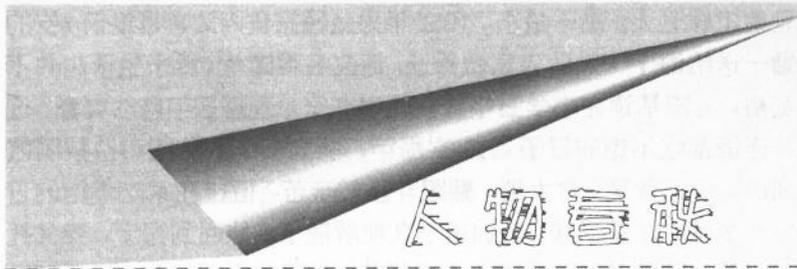
- 我县城市化建设走笔 / 郑志平 方贵川 (226)
 沧海桑田苔山村 / 谢良福 (234)
 水乡恋 / 黄玉生 (240)

文史天地

耕耘文史十七年 / 朱仁巴 (243)

台州倭患概述 / 林作民 (250)

《纪效新书》成书在台州初探 / 陈一芳 (255)



玉环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 的 传奇人生

● 朱仁巴

引 之

浙江歌舞剧院笛子演奏家蒋国基，他创制了三人抬着吹的竹制巨笛，惊震了中外笛迷，在乐器制作史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成为一块闪光的里程碑。蒋国基，祖籍玉环，他的传奇人生，定为邑人所乐闻。

童年受苦难

蒋国基，1949年10月1日生于杭州。父亲陈复宣，原住本县城关西溪村，在西青老街开一片百货商店，十分红火。抗日战争爆发后，玉环岛孤悬海外，受敌船封锁，舶来品进不来，加以法币惨跌和苛捐杂税盘剥，陈复宣的百货店，经不起折腾。没有几年，商店倒闭，陈复宣外出谋生，弃商从政，在杭州谋得一职，以糊其口。

解放以后，陈复宣一家九口，生活维艰，蒋国基原名陈勤一，

兄弟姐妹五人，勤一最小。1952年为减轻家负，父亲将年仅4岁的勤一送给海宁一姓蒋人家做养子，遂改名蒋国基。蒋家生活也并不宽裕，蒋国基读完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在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过着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11岁那年，蒋国基考入杭州市杂技团艺训班，每天劈叉、拿大顶、翻跟斗虽然辛苦，但比在家吃不饱的日子好多了。好景不常，艺训班不久便解散了。他回到海宁，养父托人引荐，到海宁皮影戏剧团去当学徒，学习皮影戏操作，只要有饭吃，有地方睡觉，他就心满意足了。

蒋国基长大以后，他想一个人总要有一点真本领，将来才好立足社会，但他对皮影戏操作不感兴趣，倒对团里郁师傅吹的笛子却很欢喜，可郁师傅不肯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人，怕夺了自己的饭碗。蒋国基一赌气，就自己去买了根笛子，一有空就吹起来，他不仅学笛子，也学其他乐器，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他吹拉弹唱都会来一手。有一次吹笛子的郁师傅病倒了，笛子没人吹，蒋国基竟把郁师傅的全部曲子都吹下来。

“文革”开始，皮影剧团解散了，蒋国基随部份人员来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县里成立毛泽东思想文宣队，蒋国基有一技之长，便调进文宣队。队里演样板戏《红灯记》，蒋国基唱李玉和。凡前后场缺什么角色，蒋国基样样拿得起，成为队里的一名多面手。其时文宣队中一位女队员相中了蒋国基，便把女儿许给了他，蒋国基做了上门女婿。

“牛棚”拜名师

蒋国基对样板戏不感兴趣，他爱好的还是笛子，总觉得自己无师自通的几招，难以登堂入室，不能成大器。他听说杭州有一位江南笛王叫赵松庭，想拜他为师。1972年他从海宁跑到杭州，谁知赵松庭还关在“牛棚”中改造，赵松庭没有想到此刻还有人到“牛

棚”来拜师，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怕牵连这位求知心切的年轻人，便一口回绝了。蒋国基并不灰心，却赖着不走，抢着替赵老师干粗活、重活，赵松庭被感动了，终于在“牛棚”中收下了这个徒弟。此后，赵老师细心给他传授笛艺，并要他苦练基本功，蒋国基总算在“牛棚”中进入笛子“大门”。

精心创巨笛

1976年，蒋国基进入浙江歌舞剧院，作为一名笛子演奏员。对巨笛的创制，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那是1995年元宵节，蒋国基用12厘米的骨笛吹奏，浙江歌舞剧院院长黄大同说：今年吹微笛，明年吹巨笛。当时也是无意脱口而出，并无具体计划。蒋国基听后在心里激起一股炽热的火焰。他觉得，既称巨笛，一定不是一个人演奏，他设计了一种三人抬着或搁在架上演奏的笛子，一人吹，二人按孔（每人管三个孔）的巨形竹笛。他查资料，访名师；找艺匠，选竹材，经过一年奔波努力，一支长3.15米，直径5.5厘米的巨笛终于制成。笛身有12个自然节，为防裂又用细铅丝扎了13道箍，髹以红漆，要三人抬着吹，可吹低音的G调，并能演奏各种曲调，蒋国基成功了。

登台亮巨笛

1996年元宵节音乐晚会，蒋国基创制的巨笛首次登台亮相，通过荧屏，把巨笛吹奏图像和笛声，传送到千家万户。上海吉尼斯大全总部派专人来杭州录制；远在台湾的笛迷，也携摄像机来拍摄这前所未有的奇迹，带回宝岛和海外，让华夏子孙开开眼界。国内《艺术科技》杂志首次报道了这个奇迹，并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支巨笛。

1997年中央电视台和上海东方台联合举办的吉尼斯元宵晚会，

蒋国基再次用这支巨笛演奏了民歌《小放牛》，引起了轰动。蒋国基并不以此满足，还不断探索巨笛的演奏技法，以期产生更大的效果。

日本传笛艺

1997年5月14日，日本笛子协会寻根问祖访问团来到杭州，蒋国基在黄龙洞天伦饭店，用巨笛、口笛、骨笛、柳笛、曲笛、弯管笛等多种笛子，向日本客人演奏了各种曲子，并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笛史、笛艺、笛技，引起了日本笛迷们的无比兴趣和高度赞扬。日本客人也回奏了日本曲子《樱花》，蒋国基第一次发现客人用的笛子，只有吹孔，没有膜空。72岁的日本访问团团团长石松安次先生说：我们来中国寻根问祖，学习笛子的演奏方法，就是为了让中国笛子在日本更好地保留中国的传统风格，永远传承下去。

1999年蒋国基应邀去日本传授笛艺，他用巨笛演奏了《姑苏行》，引起日本笛界的轰动，他们竖起大拇指夸赞蒋国基是真正的笛王。后来蒋国基在答谢宴会上说，我不是笛王，我们的祖先、老师才是真正的笛王。

献艺江主席

最使蒋国基欢欣鼓舞的是国家主席江泽民二次观赏了他的演奏会，第一次是1998年在北京元宵节联欢晚会上，蒋国基用三人抬的巨笛演奏了《南泥湾》，江主席开始跟着南泥湾的调子哼，后问这种笛子是什么时候有，在旁的老艺术家王昆也说从未见到这种巨笛，江主席说你是老艺术家都没见过，可见是新鲜事物。演出结束，江主席会见了蒋国基，并询问了巨笛的制作过程和演奏技法。

第二次是2000年5月在杭州，浙江歌舞剧院受命到杭州西子宾馆演出，江主席观看了演出，蒋国基与陈忠康用刚研制成功的双



1998年北京元宵节晚会江主席悄悄走上舞台观看蒋国基吹奏巨笛（右二为蒋国基）

人笛吹奏了《吟哦调》，引起了江主席的极大兴趣。接着蒋国基又用排笛演奏了《荫中鸟》，一曲吹毕，江主席热烈鼓掌。在欢快的气氛中，蒋国基抬上三人巨笛，请江主席试试，江主席说这个我吹不了，我还是吹一般的笛子。他一边说一边拿出随身带来的竹笛，吹了一曲《梅花三弄》，吹得韵味十足，非常娴熟，接着他又吹一曲《洪湖水浪打浪》，笛声泻出了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赢得了全场阵阵掌声。江主席不仅会吹笛子，还会弹钢琴，拉二胡，蒋国



2000年5月11日，江泽民主席观赏了蒋国基的演奏，兴奋之余，自己也上台用笛子演奏了一曲《梅花三弄》

基有幸与江主席同台演奏，感到无比荣幸，一股暖流顿时流淌了他的心田。

名声满中外

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就夙志立下了宏愿，并为之不懈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不怕失败与挫折，总会成功的。蒋国基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终于到达成功的彼岸，登上笛子的艺术殿堂，成为中外闻名的笛子演奏家。

蒋国基崭露头角是在1976年，他参加北京市举办的全国独唱独奏会，一曲《水乡船歌》，蜚声乐坛。此后20年中，他在国内各种音乐比赛中连连获奖，先后赴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并出版了《蒋国基笛子选曲》和《笛子入门教材》等著作；海内外唱片公司为蒋国基录制了专辑和多张CD片；同年又被香港演艺学校聘为兼职教授和院外考官；2001年3月号《人民传记》介绍了他的演艺生涯。

一个只有初小三年级程度的蒋国基，通过刻苦自学，终于成为蜚声中外的笛子演奏家。他不仅是我玉环儿女的骄傲，也是启迪后人学习的楷模。

附：

蒋国基，原名陈勤一，他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如今下落情况：

大哥 陈中一，原北京市交通学校副教授（退休）

二哥 陈志一 在杭州工作已退休

姐 陈平一 在上海市工作（退休）

三哥 陈行一 嘉兴市博物馆副馆长

四哥 陈心一 工人，因公亡故

陈勤一父母早亡，其二叔陈六书，在北京司法部任公证组长（离休），三叔，陈伊言，丽水市工商局（离休）。

我的剪纸在前苏联

韩伟

1956年12月号《苏联》画报戴文发表了 my 的剪纸作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今回忆这一艺术创作的过程，就历历如昨。

我自1953年开始于教学之余发表剪纸和木刻作品，当时虽然也一直作画、写诗，但一般不投稿。至1955年，已经在《北京日报》、《农民画报》等报刊发表了剪纸近百幅和在《井冈山画报》发表木刻十幅，同时于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石姑岭》和《两颗丁香花》单行本剪纸画册。

1956年初，我在玉环城南小学（当时环海小学）教书时看到画家司徒乔之女司徒圆所写的长诗《银色的道路》后，为其清丽洒脱的诗风所感，我将之删改节编成37幅画稿的题材，自编自画，绘剪成剪纸一卷，随后发表在《苏联》画报上的就是其中的7幅。《银色的道路》是说一位叫小兰子的姑娘，于正月半沿着月光下的银色道路登上了月球，会见了月娘娘（《苏联》画报译之为“嫦娥”），并在月球里辛勤地挑水种出了麦子，用云彩织出了绸缎之后，再满载收获乘着月娘娘赠给的马车回到地球上的爸爸妈妈身边。内容可能和当时学校里的“劳动教育”有关吧！画面上配合了如下的许多妍丽诗句：

绿色的小村庄，有一个静静的小池塘，在绿波旁边的石头上，坐着个穿红戴绿的小姑娘。正月半时夜深了，鸡儿不叫，狗儿不咬，鱼儿不拨水，村子静悄悄，小兰子沿着银色的道路奔向前，她又惊愕又喜欢，越走越高越跑越远。低头看，银波荡漾光闪闪，抬头看，琼楼玉殿在天边。小兰子穿过一座大花园，来到了月娘娘的水晶宫

殿。月娘娘说“漂亮的花儿数牡丹，美丽的姑娘要能干”。小兰子天黑就睡觉，不等云雀来叫就起床，她种地织布忙又忙。樱桃红了，小兰子三袋麦子有了，枫叶红了，小兰子三丈绸子有了。云雀飞来唱支歌，小兰子跳了一个丰收舞。月娘娘告诉小兰子：“最漂亮的花儿是牡丹，最美丽的姑娘是小兰”。小兰子坐着月娘娘的马车，离开了月亮，驰骋在银色的道路上，回到了故乡。

1956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双方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交流，中学里开的俄文课，特别是文化单位的阅览室里，首先陈列的就是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开本大，印刷好，并且标明是以十五种文字发行五十多个国家的。正在1956年的春夏之交，当时居于太空科技领先地位的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这一新闻报道震惊了整个世界，举世的科学家都在谈论、研讨人造卫星在军事、科研、通讯、文化上的意义，各国特别是美、英等发达国家都以巨大投资在太空科技上展开了竞争和赶、超，并且一转话题，纷纷谈论着征服月球和火星……。这时，我的《银色的道路》刚好脱稿，眼看国内外报刊所无不刊登的太空新闻，内容从更新科技到神话故事，当时的稿源是铺天盖地的。那时，我作为一位不谙科学的教师和普通美术工作者，我萌发了一个炽热的想法并且立即付诸于实施：配上文稿，把《银色的道路》邮寄往莫斯科的《苏联》画报。

这年10月，我收到了《苏联》画报的复信，打开信封后竟是连字母也不识一个，既然目不识丁，要此信何用？就随手投进了字纸篓中。可是过了几天，思想反而愈加复杂了，想想这封信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此稀里糊涂不理睬，久而久之更想把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弄个清楚？我又重新检出这封信并送到中学里央求俄文老师告知其中的奥妙，最后方才弄清了这么一回事：敬爱的中国画家韩伟同志！我们《苏联》画报编辑部荣幸地收到了您寄来的稿件，故事令人神往，画面精彩绝伦。因为画报篇幅所限，我们将于“12

月号”撰文刊登您的其中七幅作品，其余悬挂在编辑部四周的墙壁上。末尾是总编辑的签字。至1957年春，从莫斯科寄给我中、俄文二册《苏联》画报，其中第十页纵贯全栏，由编辑部介绍“中国画家韩伟用黑纸巧妙剪成的嫦娥故事”云云！转瞬之间几十年过去了，我历经沧桑，中文《苏联》已失，今仅留俄文剪报一份。

当时我是教师，业余时间有限，我搞美术创作纯属出于热爱，虽然不是“悬梁刺股”，但是这几年确实经常于一天忙碌之后，晚上方才握笔作画，每至寝食俱忘，寒冬只知手足的僵冷，不觉间已至午夜二时方才入睡，以至几度身体不支而患病卧床！对于剪纸艺术的“奥秘”，几年的探求曾感而吟诗曰：史著窗花始汉唐，刚柔相济自文章，持刀胸有剪刀味，握笔莫将纸字忘！定稿行刀见胆略，粗豪纤细费思量，个中毫发定生死，漫道雕虫纸一张！

说实在的，《银色的道路》的发表，无论是从内容上和过程上来说，这原本都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投稿过程，可就是在当时五年之后的1961年，中苏论战，关系恶化，国内到处在“深挖洞、广积粮”、“打倒苏修”的同时到处饥饿，而“阶级斗争”却反而愈演愈烈了，作为一位小学教师和普通艺术家，“韩伟和苏修”竟然也成了我下放农村的“罪行之一”，所在单位同时“封杀”了我的投稿作业权。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就更是“罪该万死”非得“斗倒斗臭、踏上一脚”不可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十年的检讨，被迫“大肆攻击自己”，真是：“检讨等身比画多，剪纸原稿尽烧毁！”

事情总有好的和坏的两方面同时存在，也就在《苏联》刊登了我的作品以后，国内各报来函说“地图上找不到玉环”却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搞剪纸的画家”，至1961年被通报“停稿”时止，从地方级到国家级的报刊上和各地的国家出版社中我发表了剪纸、木刻四百多幅和共出版了十本小画册，其中的《银色的道路》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包括发表在“文汇报”上的12幅“羊城晚报”

(当时的全国副刊“旗报”)上40多幅作品和《东海》等刊物的封面。而且稿费也高。直至1959年《苏联》画报还转寄给我许多读者来信,第一次是一位在中国青岛的苏联专家,他竟然写得一手好汉字,他把信寄到莫斯科“绕道”转发给我的,他要求在休假时来拜访我,交个朋友,探讨艺术与人生!第二次转来三封信,一是一位搞油画的专业画家,另一封是西伯利亚的一位学校的教美术的女教师,他(她)们写的歪歪斜斜的汉字,却也看得清楚,要求交流经验,满纸仰慕之情。而第三封却是俄文“大草”,不知所云!更不敢送译!全部烧毁了!最后第三次转来的一束信函,我来不及细看全部付之一炬!对于这些互通情感的信件,也许现在的人不理解为何烧毁?但是当时我是“过江的泥菩萨”,为了免遭意外的麻烦,非得如此不可!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岂能同日而语。

1961年我一家下放农村,投稿不准,生计无着,摸田时蚂蟥尽往我这“落后份子”的腿上咬,脚肿得如水桶!当时听说剪纸还可以卖,我刻了一些工农兵稿样寄往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订货,第一次竟然订到了一百元,我教妻子儿女刻纸生产、发货汇来汇款。我硬起心肠将家中所养的一头猪卖了作路费上北京,一路订货,在家持续生产剪纸出售。第二年,我应聘到坎门镇“东方红美工室”去办了剪纸厂,所设计的“革命样板戏”、“三忠于”剪纸居然在南北各地走俏,接着楚门也搞起剪纸,各自产销。直至1974年,玉环县二轻局将龙岩、楚门、坎门三家剪纸厂合并为县办的大集体企业“玉环县工艺美术厂”,走上规模生产。

我从农村被调到玉环工艺厂搞设计工作,在这家一百多名正式工的厂里我当了七年的临时工,直至1978年方始转为正式工人。这一阶段我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些剪纸文稿,如《中国对外贸易》上的“中国南北剪纸的艺术特色”及《浙江画报》上的“丝网版画金线刻纸脸谱”、《浙江工艺美术》上的“中国名胜创新”等。文革后期的工艺厂里,几个痞子乘着“运动”大搞批斗审查,他们为了提

高自己,非得把我这位老师傅作为主攻对象不可,所以我就成了厂里的唯一靶子;多灾多难的人生使我怀疑:喜欢画画是不是属于“不安分”?我如果专心教书,即使不当校长也还是一位好老师啊!我一直不清楚我一生几十年如一日为之拼搏的到底属于坏事呢?还是好事?只有说的说了,姑妄听之吧!

1978年,玉环工艺厂收到寄自美国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信,是洽谈业务的,当时我是臭老九的临时工,无权过问,以后听说这封信由县里逐级上交到省里而不知所终了。至于此信是因为《银色的道路》或者是我于《中国对外贸易》撰文上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在玉环时正值参加“玉环县文联”的第一届选举,我这“内定本无职”的会员竟然成了得票最多者之一,立马兼任了玉环县美协的理事长,为了感谢玉环文艺界的厚爱和信任,我计划了主编《剪纸拾英》画报以酬所托,我去信请求书坛泰斗沙孟海、陈叔亮二位老先生书写报头题词,当时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面子,免费寄到。筹备之中,我的工作调到温岭,所以试刊号是由“玉环、温岭二县文联”合出的,进口铜版纸红黑套印,效果甚佳。当时因为文艺界朋友经常提到《苏联》画报的事,所以我在试刊号上也重新编文印上

了银色的道路中的这位“小兰姑娘”,赢得了南北各地同行的称道。

我从温岭下放时带的是画笔和刻刀,平反复职回温岭时也带的是画笔和刻刀,只不过却是满头白发了!



艰难求学路

林素菊

我小学毕业后，由于当时玉环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所以当年和翌年我虽两次去温州参加中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头一年被温属六县联立中学录取，入学几个月，因病中途休学；第二年被温州师范录取，入温师简易部求学，至1944年夏毕业（四年制）。回顾这一时期，深感身处偏僻海岛，又值抗日时期，一个小学生继续升学求知的不易。

首先是交通的困难。除了港北楚门一带的学生多半去临海、黄岩就读外，港南城里的多半去乐清宗文中学，坎门一带大多去温州，都要渡江过海。我小时去温州，是到坎门搭乘上海到温州的轮船，用小舢板引渡到轮船上，虽有不便，但几个小时也就到了温州。抗日战争爆发后，海面常有日舰游弋，轮船停驶，玉环去温州要绕道乐清，从西青码头趁航船到乐清华墩洞，再走几十里路到乐清县城宿夜，次日搭县城内河轮到馆头，再改搭江轮到温州，十足要两天整。航船候潮开驶，时间每日有变，迟潮当天赶不到乐清县城，早潮家里得半夜起身，打着灯笼出门，翻过西青岭，走过西青岙，几十里路程，迟了怕航船开走白跑一趟，早到船埠候潮，没有路廊，没有坐凳，也没有一垛挡风的墙，雨天、冷天受苦不轻。1939年我入联中，初一年级设在分部，远在离温州城几十里外的头陀寺，到了温州还要住旅馆，第三天再搭永瑞内河轮或雇小船到温瑞交界处的帆游上岸，步行几里才到学校。1940年我改进温师，温师设在平阳郑楼，更远一点，乘永瑞河轮一直到终点瑞安县城，吃过午饭，渡过飞云江，还有几十里路要雇小船或步行才到学校。还有更艰难的路程，那就是1942年秋，日寇骚扰温瑞沿海，温师迁去泰

顺莒江，从瑞安县城到泰顺，要趁飞云江里的“蚱蜢船”，下游随潮水涨落行舟。中、上游为溪滩，水深平缓处，靠船工拉纤前进，遇滩靠船工下水扛抬着船只上滩。瑞安至泰顺百丈口，有数不清的滩头，上行要三天整，我们在不到百丈口的江口地方上岸，再有几十里山路才到莒江，从出家门到进校门，最顺利也要六天整，有时在瑞安还要停留等候船只。莒江是个穷乡僻壤，师生八百余人，租用庙宇和民房，居住分散，供应困难，学校规定对学生只供饭不供菜，菜金发给各人自理。于是开学时，除被铺行李外还要带足一个学期的蔬菜，不仅带酱肉、炊虾、鱼鲞之类干货，还带用罐装的腐乳、海蜇、咸蛋、鱼生等咸货，沉重之极，路途又远，一路雇请挑力（要二人），伤透脑筋，这样一直坚持了几个学期，真是旷古未闻。

其次是学习条件极差。我在温师后两年，正值抗战最后阶段，上海、杭州等城市都已沦陷，温州、瑞安也常受敌侵犯，搬到文成、泰顺一带农村的大、中学校有好几所，我们把庙宇当教室，农民住房当宿舍与自修室，睡竹片钉成的格子铺，吃学校大厨房挑来的糙米饭，不够吃，争先恐后，饭桶光了为止，蔬菜就以家乡带来的干、咸货省着点吃，偶而向村民好话说上一担（人多菜少）买几株青菜，借房东灶头炒炒，付给一点柴火费。不仅用膳，就是洗脸热水，限于条件，早上每人也只能由值日生分给一瓢。学习课本也发生了问题，都用的是泰顺土产“花占纸”油印的讲义，印刷模糊，阅读费力，加上自修室无窗，门外又有宽阔的廊沿，坐在门边的同学还有一些光亮，坐在里头的白天也似黄昏，夜晚既无电灯，也无汽灯，连煤油灯都谈不上，一个小小浅浅的灯盏碟，放在竹制的架子上，一碟菜油，三、五根灯芯，分向三个方向点燃，一张长方形的自修桌，两盏菜油灯照着八个莘莘学子，捧着花花的油印讲义读、写、演算。

第三，是日寇的不断骚扰。平阳郑楼位于飞云江南岸，日本

飞机轰炸瑞安县城和飞云江轮渡，近在咫尺，日本侵略军还要登陆骚扰，因此，我们日夜处在警戒状态之中，一有空袭警报，就要离开课堂、自修室疏散隐蔽，早晨起床号声一响，我们就要迅速把被褥捆扎成铺盖，放在空床板上，随时准备挑运。一天安然过去，晚上睡时再拆开，不厌其烦，天天如此。1941年4月19日凌晨，一声紧急集合哨声，我们慌忙起床扎铺盖后集队，老师报告说日军在几里外的沙园登陆，马上撤离学校。于是一队接一队迅速出发，晓风袭人颇有寒意，一些带着呢毯的男同学，将毯子对摺用绳子穿好，系在项下当作披风御寒。我睡眠惺忪，边走边禁不住瞌睡，直到撞到前面同学的后背才警醒。全校师生昼伏夜行，向文成方向撤退，白天为防敌机袭击，疏散隐蔽，三、五结伴自找处所，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时值马铃薯、蚕豆收获，我们向农户买了煮熟充饥。夜晚边行军边打瞌睡，饿了，就把学校分给各人带的食米抓一把嚼嚼。路上，我们遇见过不战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看见过敌机轮番狂炸瑞安城和轰炸扫射文成大 这个小小的山城，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经过多日行军，双脚都打了水泡，终于到达大岙镇，休整了两天，学校宣布就地解散，发给路费，各自设法回乡。我那时还是简易部一年级学生，年龄不足十四岁，家乡路远迢迢，温州、瑞安一带城市都为日寇占领，怎么办？幸得还有李炳章、朱仁麟两位同乡同学，他们已约好与乐清籍同学结伴同行，于是我跟了他们，又开始新的长途跋涉。黎明，太阳还未升起，我们就离开大岙攀登高山，山高岭长路陡，走到中午到达山顶，经过百丈瀑，下午下山，一路森林茂密，不见天日，走得腰酸腿痛，天黑才到山脚的岭根村，这里已是青田辖境了。据说，我们这一天翻过的山，是“上山三十里，山顶三十里，下山三十里”。当晚在岭根农家借宿。次日沿江向青田县城而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进入县城，一片关门闭户冷落凄清的景象。我们找了一所学校住宿，教室里的课桌并拢权当眠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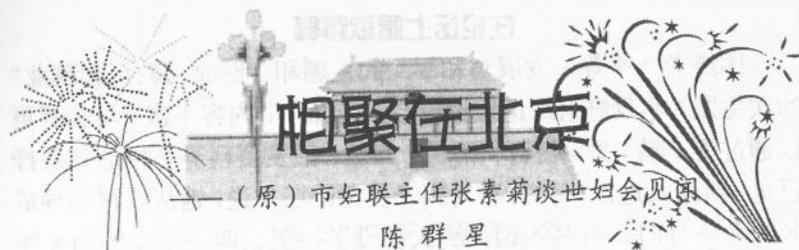
也没有什么盖的，有的同学离开郑楼时虽然带出较多的衣物，但一路上用以向农民换取食物充饥或不胜负荷甩掉，到青田时也就没有什么了。离开青田县进入永嘉县境，经过中塘、上塘，遇到一家嫁女的人家，我们女同学帮他们用红线缝订新娘嫁被，他们高兴了，就在厅堂摊开篾簾，招待我们睡觉。从永嘉楠溪一带的一个渡口过到江东，就是乐清西乡县境，行经白象、柳市，绕过县城向东乡而去，到了离华墩洞十数里的蒲歧镇，就只剩下我们玉环三人了，一打听，才知由于日本军舰深入乐清湾内海，来往玉环西青码道与华墩洞的航船已停开多时，我们身无分文，进退两难，陷入困境，万般无奈，只好去找这一、二年随父亲往来蒲歧镇，投过宿、吃过饭的一家客栈老板娘，幸得她仗义，不仅不要我们房饭钱，还设法高价雇妥一艘小舢板，趁日舰驶出了乐清湾的时机，专程中夜偷渡乐清湾送我们回玉环。小船在玉环苦竹岙附近一个不知名的乱石岩停靠，我们从东海之滨的平阳郑楼经瑞安、文成、青田、永嘉、乐清等县农村，流浪半个月，终于回到了玉环，上岸后喜孜孜寻路回家。那年我家已迁居西青街，到家一瞧，糟了，“铁将军”把门，全家都逃难下乡了。时已黄昏，同学都各自走了，我单身一人飞也似的向黄泥坎而去，翻过岭天就暗了，心中又惊、又怕，无奈只好硬起头皮摸黑，走过荒凉的溪滩，上了地边的山坎，好不容易才到了外婆家，见了妈妈不禁痛哭流涕，大家说妈妈也为我寝食不安，思念不已。

1942年夏，考虑到家乡常受日寇骚扰，时有沦陷的危险，我不愿做“顺民”，就申请暑假留校。不久，时局一天天吃紧，7月11日，日寇又登陆了，学校决定搬迁，我就和部分留校同学一起，随学校老师离别了郑楼，经过几日舟中生活，到了泰顺莒江住下。

抗战八年，逃难不计其数，在学校里主要是“四·一九”、“七·一一”，两次终生难忘。寒暑假在玉环，随着家人也多次逃难，半夜里北门山头警钟响了，打滚起身拎起大小衣包就上山，大年初二

漫天大雪，大清早踏雪仓惶出走，逃过渔岙，逃过三合潭，逃过黄泥坎。到了乡下还是忧心忡忡。一有风吹草动，再往山坑角落里逃躲，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敌机丢炸弹，我家天井落过一弹，楼上楼下木门、木窗震飞不知去向。日寇进城挨家搜抄，刺刀捅破我家蚊帐，枪托捣毁木器家具，日寇侵略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旧社会重男轻女，都说女儿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读什么书，升什么学？”。在那封建意识十分浓重的旧社会，生在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海岛，处在日寇侵华漫天烽火战乱时期，我家经济条件并不好，我作为一个女孩子，能够坚持读完四年简师课程，在当时是比较少的，这不能不感谢父母对教育的重视，对我的支持和培养。



金秋时节，首都北京阳光明媚，彩旗飘扬。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来宾和中国各界人士云聚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从北京城到郊县怀柔，群芳毕至，嘉宾如云。台州市妇联主任张素菊和海门制药厂副厂长杨彩琴作为“世妇会”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的参与者参加了这次大会。9月15日下午，当北京“世妇会”刚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之时，记者采访了刚结束非政府组织论坛回到台州的张素菊。她怀着对大会的热烈喜悦，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86个帐篷会议室

参加这次世妇会的有1.7万余人，而参加在怀柔的非政府组织论坛有3万余人，设有161个会场，室内会议室不够用，就搭起了86个大帐篷。在怀柔，一个个巨大的帐篷造型不一，圆的、方的、多面型的、封闭的、开了窗开了门的、全开放只有一个顶的，均用钢架和色彩丰富的篷布建成，像一个个巨型蘑菇，蔚为壮观。最大的国际帐篷比篮球场还要大。就是在这些会议室里，3万余中外参与者要讨论3000多个论题，举行2000个活动。除86个帐篷会议室，还建有202个小帐篷，专供各国展卖、展读、联络用。作为帐篷会议室的配套，还设有展览商务中心、新闻工作间、书展室、资料亭、磁卡电话等。各国参与者的工作生活十分方便。

在论坛上唱歌跳舞

围绕着“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主题和“健康、教育和就业”的次主题，非政府组织论坛讨论会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与会者可以通过说、唱、舞、游行、游说、展览、散发资料等各种形式各抒己见。新疆某地区一位行署女副专员在论坛上说，她从农村领导成长为乡领导时，有些人说，男人都没了，怎么叫一个女的当乡领导？这更促进了我的努力工作，后来又到处、到地区当领导。我这个女领导当定了。现在要当，以后还要当。她讲话后，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引吭高歌，边唱边跳起了新疆舞，全场与会者也跟着舞起来。

论坛形式多样，气氛异常热烈，但是对提问题的时间却限制严格。参与者的提问不得超过1分半钟。提问后，由主发言人或其他人解答。

羡慕中国妇女地位

论坛参与者有6位来自湖南省的女市长、女副市长，她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兴高采烈参与各场次的讨论。许多美国记者追着她们提问：你们当了市长，穿得这样美，你们带了保镖吗？女市长回答说：“没有什么保镖。”美国记者惊异非常，说：“如在美国，女人当市长是一定要带保镖的。”论坛的参与者对中国妇女的平等地位十分羡慕，赞扬真正起到半边天作用。

有许多记者是第一次来中国，在此以前，他们的印象以为中国妇女还是“小脚女人”，有的还以为中国还处于挂灯笼照明时代。

3000名志愿者

世妇会召开后，北京有3000多志愿者全力投入大会服务。他们来自北京的九所大学，活动在北京、怀柔两个会场，为与会者当信息员、技术员、驾驶员、翻译等。

在会场，在街头，各国与会者相遇需要语言交流，随地都会有志愿者为其翻译；要想到什么地方去，志愿者会明确指引地点、带路。许多外国与会者带儿携女来北京，志愿者为她们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外国孩子可以放心地在这里与中国阿姨一起生活、玩乐。

女能手的工艺品现做现卖

全国有100余名女能手操作者奔赴北京，在京北大世界摆开架势，当众进行传统工艺品制作表演。一幅绘画、一件刺绣迅即完成，令外宾赞叹不已。浙江也有4名女操作手进京，东阳的木雕、扎花，温州的发绣，安吉的竹编，她们制一件就被外宾抢着买走。安吉姑娘当场做的竹珠背心令人倾倒，外宾一买下，随即穿到身上，喜欢之情溢于言表。

收集了八大捆资料

围绕世妇会“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主题和“健康、教育和就业”的次主题，各国与会者都携带大量资料在会上分发，有的挂到会场上，有的赠送，有的就请资料亭的志愿者代发。来自世界各国妇女姐妹的心声十分受人欢迎，与会者争相采集交流资料。张素菊带了3000多份“中国台州妇女”的资料，在会上分发完后，自己却收集了更多的国内外资料，打成包，竟有8大捆，随身带不动，只好送邮局寄回。

拍下了5卷彩照

美丽的首都和红花绿柳的怀柔吸引了中外贵宾，与会者纷纷端起照相机、摄像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镜头。

张素菊也端起相机，西班牙姑娘的街头演出，五彩缤纷的会议帐篷，志愿者的工作场景，外国参与者携儿带女的情景等都摄入了她的镜头。外国与会者手举“中国人民，我们衷心感谢”的场面也

成了她的宝贵镜头。会议期间，张素菊竟拍了5卷彩照。

在北京，张素菊有幸与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瓌相遇，别人也为她们抓拍了宝贵镜头。一次，张素菊在国际会议中心与安徽省一位相识的妇女干部相遇，她们欢乐的情形被中央电视台记者发现，立即进行现场电视采访。这些欢乐的镜头都被张素菊保留下来，她要作为永远的留念。

“到浙江再见！”

一天，一位参加世妇会的外国政府代表副代言人从北京赶到怀柔，当与张素菊交谈时，张素菊问她以前是否来过中国。回答说30年前来过。又问去过浙江去过杭州否。回答说不知道有个浙江，也不知道有个杭州。张素菊告知她：浙江是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欢迎她来杭州、来台州。客人非常高兴，双方互送了小纪念品。“到浙江再见！”两人依依惜别。

张素菊感慨地说，在世妇会上与世界妇女欢聚一堂，大家广泛交流，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使我们了解了世界，中国离世界更近了，世界离中国也更近了。

原载台州日报 1995.9.17

我这一生

刘 嶙

1931年农历七月初三，我出生于玉环县陈屿镇双峰村。兄弟4人，刘崢、刘嵘、欲团，我排行第四。从1937年7月至1949年5月，从小学到高中一切平平。只有1947—1949年，我在温州瓯海中学读书时，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活动，加入永嘉县地下党组织的外围组织，并成为负责人之一，参加组织领导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和迎接配合温州市和平解放。温州解放后，我被派在军管会文教部工作，1949年7月，我参加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被编入总队8团第10中队，经过六个月预科班学习，被评为一等进步学员，转入本科政治系学习，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提前毕业，分配到上海华东防空部队探照灯团，负责筹建工作。1950年9月，在防空探照灯421团接受苏联专家培训，10月被任命为421团2营5连一排跟踪站站长，12月调任雷达站站长。1951年调任该团一排副排长，因领导军训有方获三等功一次，1952年8月任该团一排正排长。

1953年1月任探照灯421团2营营部通讯参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54年担任该团作战训练股股长，司令部勤务主任，我先后荣立三等功二次，通令嘉奖一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一次。

1959年12月，因积劳成疾，转业到上海民航工作，担任政治和行政工作，在担任民航102厂特种设备车间专职党支部书记时，在没有主任的情况下领导全体职工夺得思想和公务双丰收，被民航

系统和上海市评为先进集体，并在解放日报和民航杂志登报表扬。在担任宣传科长期间，成为上海民航系统的宣传先进单位，我个人为上海文汇、电视台、科技杂志、民航报、香港大公报等七报二台一刊撰写稿件500多篇。被评为党报优秀通讯员。在担任厂工会主席期间，由于群众宣传和福利工作取得明显成绩，所属职工食堂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民航总局的先进单位，同时领导兴办农副业，每年每人领到8只鸡，20斤蛋，及其他副产品的实惠、明显地改善了职工生活，有力地配合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上级好评和群众的爱戴。1991年赴美探亲、观光一年，我在美国广泛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受到美国朋友的好评，因此接受美国精泰技集团公办、艾普国际培训学院驻中国的代表，1991年底光荣离休，因为家属都在美国，我上海、美国不定时的两边跑，如家乡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尽量支持。

我这一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与我的二哥刘嵘、三哥欲团相比，我和他二人相差太远了，我一生平平，没有作过什么重大贡献，只是把一生工作经过向家乡父老回报而已。

回归五年 话香港

香港 林素芳

1997年7月1日，香港在特大暴雨中回归祖国，在交接仪式升降旗时，英军以极疲塌的情绪荡来荡去，慢吞吞的荡到旗杆下待命，之后，我人民解放军以威武雄壮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甩臂齐胸，英姿焕发，正步到位，这是多么熟悉的步伐啊！我心中一阵激动，英国与解放军的形象，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五年前这一感动人心的一幕，犹在眼前，至今难忘，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已经度过了五年。

香港特首董建华，出身豪商，是一个船王之子，素无从政经验，但凭着他的身世，人缘和社会关系，以及有利台湾的统一，被各方认可，五年前被推上特区首长的宝座。

董建华首先遇到的是彭定康预伏的“行政精英”班子的挑战。

末代港督彭定康，是一位“首相”级的政客，他在英国首相竞选落败下被派到香港，取代英国政府视为是“亲中”的前任港督卫立信，彭定康卸任时，像英国以前从世界各殖民地撤退时一样，不仅给特区政府留下许多难题，还留下许多由英国政府精心培养的行政人员，把持着特区政府要害部门，掌握着特区政府的实权。把特首和他的办公室架空。

董建华临危受命，肩负起实践一国两制的重大使命，他的一班智囊团，与那些由“行伍出身”，经“实践”升级，再由港英政府筛选而留任的“行政精英”当然无法较量，经多次明争暗斗，特首人员总是落败告终。

董建华也曾化巨资从国外请来一批“专才”“精英”充当顾问，这些精英来港以后，高俸厚禄，在香港免费旅游一番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无发展前途”，瞎说一通，一事无成。

特首认为特区政府只有心向中央，紧紧依靠中央，认真贯彻“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然后才是“两制”才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依靠中央的大力支持，克服了“老班子”设置的种种障碍，经二三年的较量，终于击败了对手，掌握了实权，保持了香港大局的稳定，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董建华时运不济，一上任就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山雨袭来，香港的楼市狂跌，股市崩落，社会上出现一批“负资产者”又因经济结构转型，百业萧条，失业倍增，经济一蹶不振，董建华面临如此困境，后来得到中央大力支持，缓解了困境。

董建华非常勤政，但由于缺乏从政经验，他和他的班底，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不够老到，招致社会非议，如对胡文虎女儿胡仙实行“免诉”，他认为如起诉会引起许多人失业，这个“免诉”的理由太牵强，引起舆论哗然，又如为李嘉诚的儿子建设“数码港”开绿灯，但李的儿子将“数码港”变成“地产港”因利益不均沾，引起其他地产商的不满。东南亚各国为缓解金融危机，提倡高官减薪，与民共渡难关，香港金管局头头年薪950万港元，董建华也倡议香港高官减薪，遭到高官的反对，他们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公务员待遇不能低于1997年，还认为高薪还能养廉。（编者按：最近又传已实施高官减薪）又如香港发生鸡“流感”，全港杀鸡，政府给鸡农赔钱，引发炒楼、炒股、投机失败也要政府赔钱，一时社会上纷纷扬扬，民怨四起，特区政府受到种种责难，阻力重重，步履艰难，搞得董建华眉毛、头发一片白，居港权的官司，打了五年，“终审法庭”和“政务司”仍各执一词，“挑动群众斗群众”董建华只好求助中央人大解释“基本法”。市民对董建华的评价，说他是一个好人，但特区首长不仅是好人还要是一个

能人，他们恨铁不成钢。

五年来，批评特首的人比以前是多了许多。董建华认为，这也是反映了香港人在当家作主对政府的期望值比较高，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多批评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经常检讨自己，也有时批评是一种胡闹，我只好一笑了之。

以前港英政府，是英国式的福利政府，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夫人，就是靠给全民以牛奶起家，这种福利政府，后任的也一定要比前任给的福利多，才能坐稳，有好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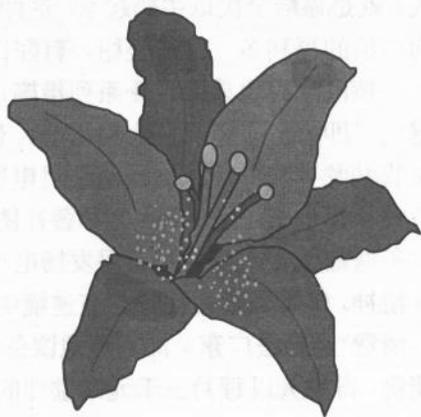
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舒缓民困，去年政府对公共屋屯（即公房）免收一个月租金，有一半香港人受惠，电力公司免收九龙、新界全部居民两个月电费，每户220元，今年政府又免收一年水费，每户800元，各社团还给老人分米，中秋送月饼，端午送粽子，政府号召市民发扬电视剧《狮子山下》中人物的奋斗精神，传媒号召市民如何在逆境中求生，政党要求市民不要“北上消费”（指去广东、深圳等地饮茶、吃饭、旅游、购物）要留港消费，青年人以每月三千元八堂课的学费学习普通话、上海话，自我增值，准备应征内地企业来港招聘的职位，以达到北上发展的目的。

董建华五年治港政绩如何，各界褒贬不一，民主党人还指责香港的自治性被削弱了。最近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有一番简短的评述，他说“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实施是成功的，同时还驳斥了香港自治性被削弱的论断，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并预言该地区经济将更加繁荣。这番话言简意赅，评述客观公正。

董建华在万花缭乱中，紧紧抓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这个强大武器，紧紧依靠中央的大力支持，克服了社会上泛起的阵阵恶浪，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和肯定，终于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二届特首，再任五年。

董建华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时，以“高官责任制”令全体官员

直接向特首负责，使特首有绝对权威办事，市民希望特首建立和澳门那样的“强势政府”令香港积极打造翻身仗，把下降了的世界排名再攀高，希望在明天。



怀念朱树森同志

◎ 胡义夫



左为朱树森，中为吕平，
右为姚扬徽
1941年摄于环山小学

朱树森同志，是我县入党较早的一位老同志。据1993年出版的《中共玉环组织史》记载：

“1939年10月，中共玉环县委会成立，杨炎宾为书记，吕平、潘徽宏、柯爱菊、王道根、朱树森为委员，青运负责人先陈能和后朱树森。1941年2—12，中共玉城中心支部成立，吕平为港南特派员兼支部书记。1942.1—1943.12，朱树森为玉城中心支部书记。”（见组织史19—23页）

1942年4月，朱树森奉命筹建“玉环县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也叫临时义务工作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后不幸患肺结核，经常咯血，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终年28岁。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今后我们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死了炊事员，战士，只要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今年是朱树森同志病逝55周岁，让我回忆一下他短暂的一生，以表悼念。

朱树森（原名瑞森），1919年生于城关茶堂街，父亲朱显树，家有几亩薄田，并在西青街三官堂边开设朱协顺礼记南货店，生活小康，有瑞德、瑞元、树森三兄弟，树森排行第三，从小深受父母宠爱。

朱树森在小学时期，和陈能和、董南才、陈增佳等同班同学，

受级任教师董仲升先生教诲，思想上得到启蒙，朱树森在校读书时学习认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树森14岁小学毕业，因当地没有中学，后和陈能和、董南才等跟董仲升先生举办的补习班，学习英、语、算，思想进一步得到启蒙，打下了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树森不甘寂寞，投身到社会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4月，树森考取玉环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不久政工队被县长方引之无端解散，树森不是平阳回来面目不“红”，经组织决定留在重组的政工队中，同年他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党领导下，他参加了“城战团”抗日剧团演出活动。

1938年冬，朱树森闻得新四军在安徽屯溪开办抗日军政大学，有大专班，也有初中班，有学军事，也有学政治的，经组织同意他和潘微宏（党员）、邱招明、王善富（群众）四人一起，由董仲升先生介绍到温岭一个秘密联络点，拿了一封介绍信，经过艰苦跋涉，到达屯溪。由于介绍信是私人开的，不是组织正式介绍，办事处同志不肯收留，他们磨破嘴皮都不管用，他们去找先期到达那里的董南才和陈增佳，又说都到前线去了。在屯溪住了一个多月，也和新四军战士一起过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生活，后来军部有便车去温州，便把他们送回来。

1942年4月，朱树森奉命筹建“玉环县战时青年临时工作队”（简称临工队）朱树森任队长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这是他人生最亮丽的一页，据《中共玉环简史》（初稿）记载：

“1942年春，日军为了配合中原战场，打通粤汉路，在华东发动浙赣战役，浙赣路全线沦入敌手，4月，日军再次在坎门登陆，劫掠物资烧毁坎门小学校舍，5月30日（编者按，应是28日），敌500余（应是100多人）进犯县城，县城第一次沦陷，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撤到楚门，原县衙挂上县政府港南办事处的牌子，由民

政科长（郭顺梅）留守，整个玉环岛处于无政府状态。”

“为了发动热忱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吕平召集中共城区中心支部成员，商议组织青年抗日救亡团体事宜，决定由环山小学教师共产党员朱树森出面组织公开合法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领导全县抗日救亡活动。”

“6月初（实际是五月初成立——编者），在县民教馆边成立，中共玉城中心支部的10余名党员为骨干，在共产党带动下，另有20余名进步青年参加‘临工队’工作，临工队员不为名不为利，怀着一股爱国的情，活跃在孤岛海角。使玉环岛上的抗日救亡活动，再掀高潮。”

“不久，在‘临工队’的联络、指导下，楚门由王詠樵出面，组织楚门青年战时服务队，坎门由刘章进出面组织坎门战时青年服务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思想。”

“8月，日军对玉环沿海骚扰趋于缓和，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相继迁回县城，为了争取青年、国民党在西门外三青团部筹建三青团玉环直属区队玉环县战时青年服务队（简称‘服务队’），一天，服务队长（陈朝臬）、突然跑到‘临工队’里拉人，要求‘临工队’的青年都去参加‘服务队’，被‘临工队’的共产党员断然拒绝，其他进步青年也不愿去‘服务队’。过了几天，‘服务队’队长带着2名干事，到‘临工队’找朱树森，声称奉县长命令，解散‘临工队’，所有队员由‘服务队’接收，朱树森和队员们听了非常气愤，坚决不答应。不久，民政科长亲自出面找朱树森谈话，要求‘临工队’服从县长决定，全部转入‘服务队’，并停止‘临工队’的经费和物资供应，‘临工队’被迫解散。”

“‘临工队’解散后，‘服务队’因没有青年参加，成为一个空壳子，队长一筹莫展，出于抗日宣传的政治目的和应付上司的政绩检查，一星期后，民政科长再次找朱树森，要求朱树森去负责‘服务队’的工作，朱树森将此事向吕平作了汇报，中共城区支部作了

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对于教育、经济、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的方针,党组织决定进入‘服务队’,掌握领导权,民政科长任命朱树森为三青团玉环直属区队附兼‘服务队’队长。‘临工队’的全班人马进入‘服务队’。”

临工队全班人马进入“服务队”后,在队长朱树森带领下,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活动得比“临工队”时期更起劲,更有声色,杨谟同志1983年1月15日在《玉环党史资料》6期对“服务队”的工作作了记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现节录如下:

第一,继续开展歌咏活动,教唱马可的《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进步歌曲,由于“服务队”队部地处西青街闹市,每晚教唱时,经常吸引大批听众,临街窗外围满了人,原来冷冷清清的“服务队”顿时热闹非常。

第二,继续出版油印刊物,刊物仍沿用《玉环青年》之名,把版面扩大成十六开本,篇幅略有增加,新版《玉环青年》发行了三期,内容方面重视了对走私、漏海、汉奸活动的抨击,以及欧战形势的介绍和分析。

第三,平定物价,主要评定粮食、猪肉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打击投机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服务队”经常出动到城关西青街、青南、陡门头、三合潭等地,平抑物价。(曾将西青街一不法商人戴高帽游行)

第四、整顿社会风气,禁止赌博。九月间,“服务队”根据群众举报,国民兵团某团附在西青街一家赌场聚赌,“服务队”员敢于摸老虎的屁股,闻风出动,这些赌徒早有闻知,把赌具收起,“服务队”员扑了个空。又一次,“服务队”由队长朱树森亲自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了下潘国民党政府机关职员们的赌场及赌具,并将这些赌徒押送警察局,警察局拒不受理,“服务队”员们别开生面的把这些赌徒押到府前坦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勒令他们跪下向烈士请罪,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此外,铲烟,也是“服务队”的一大杰作。当时敌船对玉环岛封锁,舶来品进不来,市上卷烟断挡,一些丧心病狂的官僚政客,自种烟叶、自制土烟,大发横财,“服务队”员们一夜之间,把种在东岙里和 岙里的烟叶,铲得一干二净,官僚政客们敢怒而不敢言,“服务队”员们又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1943—1945年间,朱树森任县民教馆馆长和环山小学校长时期,组织暑期回乡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简称暑工队)也做得比较出色,据林素菊同志回忆:

“1943年暑期,我从温州回家度假,参加民教馆召开的暑期回乡中学生座谈会,认识了馆长朱树森,顾长的个子,炯炯的目光,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活动能力,会后民教馆举办了成人夜校,建立了篮球队,歌咏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参加了设在西溪天后宫的夜校教课工作,也去环山小学参加歌咏活动。”

“1945年上半年,朱树森任环山小学校长,聘请了许多青年教师,校内气氛活跃,耳目一新,我也应聘在环山小学执教,遗憾的是日机不时空袭轰炸,学校被迫分散上课,后又短期停课,朱树森维持学校,四处奔波,备尝艰辛。1945年下半年以后,他患的肺结核病情严重,不时咯血,(那时肺结核无特效药,也算是绝症)不能工作,在家休养,我常去他家探视,闲谈,他家藏书甚多,我借过高尔基的《童年》《母亲》,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邓演达的《民生史观》以及《历史唯物论》等,交谈中他对目前国内外时事形势的分析和评述颇为精辟,介绍分析我所借的书籍,也很提纲挈领,还深入浅出的向我解释过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使我获益不浅,听人家说:玉环有一个时期青年学生抗日救亡开展得轰轰烈烈,是朱树森为首组织领导的,但他从不曾在我面前讲述过自己过去的经历和遭遇,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为人正直作风严谨,对革命有过贡献值得尊敬的人。(见玉环文史资料8辑林素菊所撰《玉

环旧事》一文。)

1944年，叶龄银同志（原玉环特派员）调走以后，朱树森长期未见上级党来人，玉环党已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

1945年下半年，朱树森因肺结核频频咯血，不能工作，辞去环山小学校长职，在家休养，深居简出。

其时，朱树森的父亲已亡故，南货店也闭歇，家中几亩薄田，难糊数口之家，生活捉襟见肘，朱树森失业在家，贫病交迫，加之恋爱受挫，工作淡出。

1944—1945年，杨谟同志二次到乐清找到邱清华同志，接回玉环党的关系，1945年7月，上级党任命杨谟同志为城区中心支部书记，朱仁禹，叶崇森为委员。自此，朱树森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1946年“五·四”青年节，环山小学操场在比赛篮球，朱树森原是“晨光”队的篮球队队长，又是篮球场上一员健将，如今他病魔缠身，动弹不得，逢此盛会，焉不心动，他慢步轻移，到达球场，二队激战正酣，树森站在球场一角观战，一个界外球滚到他的脚边，他俯下身去，双手捧起，用力掷去，掷不到十米远，虽过了一把瘾，却痛感力不从心，自叹不行，未等终场，就慢步回家。足见朱树森这时的体力衰竭到何等程度。

1947年秋，他咯血愈加厉害，红彤彤的鲜血，大口大口的吐出，却无药制止，他有气无力的躺在床上，眼前一片迷罔，政治上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内心空荡荡的，正在热恋中的对象，被女方家长所阻，难以接近，即使女方坚持，自己沉疴难起，也难以继，他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再是自己病入膏肓，医治无望，这三张网紧紧裹着树森的身心，他的精神支柱完全垮了。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他吐完最后一口血，渐渐的垂下眼皮，带着无奈又极不愿意的心情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

树森同志，你未竟的事业，后人已为你实现，你安息吧！



缅怀陈道生同志

☆ 安邦

校友陈道生，玉环坎门人，1926年生于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40年秋坎门小学毕业后，即以优异成绩被温州中学录取为公费生。1944年秋，日寇第三次占领温州，道生激于爱国热忱，在玉环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工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秋，经丁世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秋，抗战胜利，陈道生重返温中学习。这时，他比我低一个学期，虽不同班，但由于共同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我们时常在一起学习研讨革命理论，他那刻苦学习、认真思考、埋头苦干、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给我很深的印象。从此，我们成为亲密的同志和战友。1946年，他按照地下党指示，积极发动同学投入反侵略、肃奸、支援米风潮和反对张宝琛（专员）等进步学生运动和正义斗争。在米风潮斗争中，道生受永嘉学联派遣，进驻平柴委员会，组织与监督平柴工作，他废寝忘食，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平柴任务。帮助温州城区人民度过了青黄不接的难关。

1946年夏，学期结束时，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指示：学运工作要向纵深发展，加强理论学习，总结运动经验，广泛开展革命宣传，以进步学生为骨干，在各年级组织读书会活动，当时温中高中部有一个久负盛名的诚社读书会，它出版的ABC壁报，在历届全校壁报比赛中，屡获冠军，在同学中享有极高声望。我们研究，在该组织老成员蔡元龙、蔡元宇、胡克谷等同学毕业离校之际，动员一批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的同学参加该读书会，并将读书内容由

原来纯自然科学，增加了社会科学，诚社改组以后，曾希圣被选为社长，陈道生被推为ABC壁报主编。从此，该组织成为地下党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在曾希圣、陈道生的主持下，ABC壁报又一次获得全校冠军。

1947年初，陈道生由于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积极斗争，被选为温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永嘉学联主席，他领导学运工作成绩显著，表现十分出色。是年4月，他和谷钱国作为温州进步学生的代表，被中共浙南特委邀请去浙南游击区参观。4月3日，中共浙南特委为他俩举行欢迎茶话会，会上特委书记龙跃作了《温州学生运动总结及今后方针》的讲话，出席茶话会的还有胡景城、曾绍文、程美兴、郑伯永等领导。临别前，龙跃同志交代陈道生，回城后与国民党温州专员兼保安司令余森文联系的任务。当时余森文已与中共华东局取得联系。

当年，南京“5·20”血案发生后，特委派我秘密去温州城区组织与指导学运工作，我依靠学校、党小组和陈道生学联主席身份，有力的发动与领导了城区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并争取进步老师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支持，使温州学生运动汇入全国人民反蒋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了浙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与国民党温州专员正式建立了秘密统战关系，并派陈道生、王增荣两人正式担任浙南特委和余森文之间的联络员。他俩几次把余森文参加国民党省长兼保安司令沈鸿烈来温开“清剿”会议的机密情报，及时送到浙南特委，为特委制定反“清剿”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通过余森文有效的营救，保住了在狱中的钱启啟、余采莲等革命同志的生命。并使夏文俊、李乃仑等同志获得释放。

温州解放前夕，陈道生回到故乡，参加中共玉环县委的地方工作，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工运干事，支前渔工队长。文教科科员，1950年1月调任坎门镇镇长兼联防大队长。当时，我正率部进驻玉

环，我们终于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重逢，促膝长谈，高兴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

陈道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从事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深得人民的爱戴，曾被25军驻坎门某团授予三等功，和县先进工作者。

正当陈道生同志以满腔热忱投入革命工作时，不料横祸飞来，在镇反运动中，陈道生蒙受冤屈，他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被诬为包庇地富反，他领导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诬为替国民党效力，他以ABC壁报宣传革命理论被诬为托派活动。他为浙南特委和余森文做联络工作被诬为投敌，革命历史全被颠倒。1952年陈道生调温州专署农林科审查处理，在大同巷招待所一住就是二年，他帮招待所运米驮菜打扫卫生，比招待所职工还积极。1954年4月，温州专署在毫无确证情况下，遣送他到余杭农场劳动，名为生产自救，实则劳动改造。1955年转送杭州市莲花峰石料劳动。此间，他曾到浙江麻纺厂看我，当时他身穿破衣，面孔黝黑，容颜憔悴。我们整整谈了半天，他向我倾诉不幸遭遇和坎坷历程。当时我也处在被怀疑审查地位，但我二人都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谈到傍晚，我送他上公共汽车，依依而别。希望再次见面时错案能得到平反，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1956年他在石料场参加肃反，据说政历问题基本搞清，并参加了石料场工会，但奇怪是没有恢复他干部待遇，安排工作。同年他回到温州，在市文管会当临时工，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被解雇，回玉环原籍劳动。（内部掌握监督劳动）

1981年，我为温州市党史办公室整理温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史料，想到陈显雷、陈道生先后担任过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显雷由于不幸遭遇，英年早逝，而陈道生却情况不明。后来，我得知陈道生老家住址，立即去信查询。我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月，总算等到了“坎门陈斌”的回信，可是拆开一看，信头称呼我“安叔”

信尾具名“你的同学陈道生之子”，信中告诉我，他父亲陈道生1957年回乡，在坎门渔业大队监督劳动，成了家，有一子一女，为了糊口，他种田，打铁，什么活都干，有时还说书来弥补一点收入，1978年5月30日，他终于劳累过度含冤去世，至今沉冤未伸，上诉无门，一家生活无着。读了此信，我泪如雨下，悲痛万分，我立即将此情况向党史办主任李尔宽同志反映，请他把要求替陈道生平反昭雪的报告上报市领导。后由卢声亮、刘锡荣两位领导亲自顾问，几经曲折，终于在1984年9月温州市人民政府做出对陈道生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接着玉环县委组织部决定恢复陈道生同志的党籍。30余年的冤案和不公正待遇终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还其历史革命面貌。1984年10月，坎门镇召开了为陈道生平反昭雪的群众大会，市党史办副主任张兰生同志代表市人民政府，宣布平反昭雪的决定，我从杭州赶去参加，代表校友和战友介绍了陈道生同志的生平和革命事迹。会场内一片呜咽。会后群众自发组织扫墓，锣鼓声、鞭炮声响彻海岛上空，深深表达了故乡人民对这个渔家之子爱戴和哀悼之情，我和镇领导同志墓前瞻养后，又前往道生家中向他的妻儿慰问。只见一家挤在租来的一间十几平方米斗室之中，景象凄凉，令人心酸。

多年来，我的心时时牵挂着陈道生的家属，前几年有机会去玉环，曾去坎门看他们，欣喜地看到，他一家在改革开放后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儿女都已成家，都有称心的工作，还住进了新楼房，这一切可以告慰陈道生同志在天之灵。

本文作者系浙江工程学院副教授（离休）

缅怀 陈竑同志

※ 厉冲芳 林沂 任忠

陈竑同志是玉环县人。1928年生，抗战时他念初中，温州三次沦陷使他几度失学。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黑暗，曾义愤填膺地对姜立同学说：“要救国非投笔从戎不可！”1946年3月，他在温州瓯海中学参加进步青年组织——永嘉县民主青年联盟，和同班同学陈继源等举办《每周文摘》墙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年秋，他考入温州中学高中部，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之下，参加读书会和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7月他到浙南游击区，参加中共浙南特委举办的第二期青训班，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浙南特委决定建立永嘉城区学校党支部，由陈竑同志任书记。这年10月，永嘉城区区委书记冯增荣同志调任江北中心区委书记，城区党的工作由陈竑同志负责；1949年2月任城工委主任委员。

陈竑同志在负责城区地下党工作期间，善于针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把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先后建立了永嘉中学、瓯海中学党支部，在各中学组织秘密读书会，壮大了学校的进步力量。并且向游击区输送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有力地支援了浙南游击战争。1948年4月至5月底，他经过精心策划，由小教党支部、画家葛克俭提供画稿，在城区五马街先后两次张贴了大型的画刊，画刊的主题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民主、真内战的罪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内容为“民无食则反”的漫画。

1949年初，陈竑同志根据上级指示，把中心工作转到迎接温

州解放，做好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他通过温中等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董孔标、金家麟、洪震钢、陈宝璋等，调查了国民党在城区的军事布防情况，对国民党城防指挥部、海关、电报、邮政、银行、盐务、地政、税警、测量以及民食平糶会的有关人员进行教育争取工作，保护好单位的财产、档案和武器，并通过地下党员李启铃和进步教师胡显钦了解到国民党在东门码头一仓库等处储备一大批粮食，以等待接管。还策动国民党新兵营长等起义。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破坏，认真部署护厂护校工作，依靠和组织老工人保护电厂，使这座电厂在解放时能正常发电。

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后，陈竑同志任温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于在解放前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在接管的同时，陈竑同志还协助创办了新华书店和新华印刷厂。以后曾绍文同志任接管会主任，陈竑为委员，但接管工作仍由他和葛俊同志实际负责，使接管的单位迅速恢复工作，直接支援了浙南全境的解放，城市生产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人民生活安定。

接管工作结束后，陈竑同志调到温州市军管会政务部组织科兼市团工委的副主任，1950年6月调市总工会任文教部长，不久任市总工会副主席，1953年4月任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从此到1959年，陈竑同志大部分时间从事工会工作。

但是，在反右扩大化中，1958年这位全心全意为革命忘我工作而享有威信的陈竑同志，却以“反对党对工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等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工资由15级降至17级。

1959年4月陈竑同志被下放到市工科所实验厂任副厂长，一年后又调到市碳素厂任副厂长。他在逆境中没有丝毫怨言和牢骚，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试制碳素产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试制成功。1963年8月4日他被调到西山日用陶瓷厂任副厂长，他和工人一起劳动，刻苦钻研技术，终于在技术改造中建成了一条

40多米长的隧道窑和33米高的大烟囱。1965年他又帮助高压电瓷厂搞多孔窑取得成功，后在全国推广。在“文革”中，陈竑同志竟被非法关押、批斗、毒打，1967年4月晚上8时多，被人带到西山地砖厂后面山上残酷杀害，时仅40岁。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1979年4月16日，中共温州市委下达《关于撤销陈竑同志在整风反右期间处分的决定》，“恢复陈竑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身份”，使他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

陈竑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由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他坚持党性，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联系群众，勤奋学习，干一行钻一行。陈竑同志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温州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永远留在人间！

（厉冲方是原温州市出入境检疫局离休）

回忆

林超同志



林超夫妇 1948年6月21日摄于东北兴山

◇

周叔康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廿六日，林超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使我感到悲痛。林超同志是我认识比较早的同志之一。几十年来断断续续地与他相处、分开，再相处、再分离。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一起工作了一段较长时间。一九九二年十月我到北京时去看望过他。那时他早已患脑血栓后遗症，但头脑还清醒。多年的老同志又相见，大家都很高兴，并合影留念。想不到那次竟是最后一面了。

我和林超同志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国际电台的真如收发报台。上海国际电台属国民政府交通部国际电讯局管辖。该台从一九二九年起筹建，到一九三七年抗战时，已成为当时国内最现代化的国际通讯企业。与纽约、伦敦、柏林、巴黎、罗马、莫斯科、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世界上的二十四个城市有通讯联系。它的中央收发室和营业门市部设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现为上海电报局），收报台和发报台分别设在距上海十多公里的近郊刘行、真如两地。国外来的讯号从刘行收报台进入后直通中央室，中央室发出的电讯，也直通真如发报台发出。收发两台员工的任务是负责机器设备保持完好畅通。因此，工作质量要求极严、技术上对职工考核也极为严格。所以，大部分青年员工，进

取心强。由于真如、刘行两台地处农村交通不便，周围又无娱乐场所，每班工作之余，员工学习技术的空气很浓。少数进步青年还读社会科学书籍，参加进步活动。

国际电台随着通讯范围扩大，不断公开招考报务员、业务员、机务员与技工。我是一九三四年考入中央室当报务员的。林超同志大约是一九三六年前考入真如台当技工的。中央室和真如、刘行三个的地方的员工之间都有同学、同事、亲戚、同乡等关系，我曾随同学去过真如，见到过林超。不过当时并不认识也未注意，更未深谈。直到后来两人在延安党校相遇时，彼此感到面熟。经过回忆，才忆及在上海时曾有一面之缘。从此，感情上就深厚了。

国际电台中有一批经过大革命的老职工，在一九三三年前后，就有了中共党、团地下组织。一九三五年以后，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积极分子的人数也增加起来。中央室在租界里，收发报台在市郊农村，都属国民党控制力量薄弱区。所以，进步力量发展得快。当时参加党领导下的读书会、救国会和救亡运动活动的人数在中央室将近十分之一。真如、刘行两台的比例也差不多。估计林超同志就是在真如接受了进步的思想教育，而在抗战后奔赴延安的。另外，当时有个客观条件也可促成林超同志去延安。即日寇进犯上海后，国民政府交通部从上海调人去武汉、重庆、成都设国际台时，只调机务员和报务员。对业务员和技工则予以解散，叫他们自谋职业。许多青年员工不愿留在上海为日寇接管后的国际台当奴隶，纷纷去内地求职。许多进步青年则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去延安。至于林超经过那个渠道去的延安，因当时未曾细谈，也就不清楚了。

一九四〇年四月，我从重庆地下党调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编入四十五班。后来党校又有一个第五十班。这个班原是由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张浩同志把从大后方各地来延安的工人同志集中起来办的工人大队，属中央职工委员会领导。一九四〇年时张

浩同志病了，邓发同志是中央党校校长兼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这个工人大队就搬到中央党校编为第五十班。林超同志就在这个班里学习。我一九四一年三月被调到校部干部处工作后，就分工负责联系这个班的支部委员会和考察学员的历史和政治思想情况。那时就和在五十班学习的林超同志又相遇，并谈到了在上海真如相遇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央党校改组为高级党校，校长改由毛泽东同志担任。邓发同志专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五十班划回中央职工委员会领导。我也被调到中央职工委员会大后组任工运研究员。同时被委托仍负责联系五十班（后称职工班）支部和学员的学习活动，仍和林超同志相处在一个单位。不久，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中央职工委员会调了半数学员到工厂去。林超同志就下厂去了。他负责筹建火柴厂，并当了火柴厂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和厂长。从那以后，一直到离开延安，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日寇投降后，我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进入沈阳。到东北日报社负责建立和主持新闻台的工作，任新闻台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我们随东北局撤退到本溪、宫原。一九四六年二月（阴历二月初二晚上）撤出本溪去抚顺。二月底林超同志到抚顺新闻台报到。我们又相遇了，而且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林超同志到了不久，新华社总社吴文焘社长从延安带了一批同志到抚顺，筹建新华通讯社东北总分社，并准备把东北日报的新闻台慢慢接过去。在与吴文焘同志一起来的人中有甘正（原名甘维清）同志，是老报务员，也到了新闻台。这样就任命林超同志为机务主任，甘正为报务主任。为了扩充新闻通讯的技术力量，派他们两人去通化训练报务、机务人员。学生从东丰、西丰两县招收。刚到通化市不到两、三天，他们竟遭遇到一场险恶的战斗。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阴历二月初三）晚。日寇投降后集中在通化市的日本居留民近万人起来暴动。他们的目标是冲击通化的政府机关大院。我们的训练班就设在

大院中，所以也同样受到冲击。日本暴民手持木棍、菜刀，大叫大喊，不断攻击，形势十分紧急。我们训练班只有两支枪，和通化政府机关的人一起抵抗，大概坚持了几个小时。幸亏有我们的朝鲜籍部队李红光连闻讯赶到，把暴乱镇压下去了。过了几天我去通化看望了林、甘及学员们和暴乱现场。想像当时的情况确实十分危急。幸亏外墙较高也较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新闻台本部随东北日报社从海龙出发，二十五日抵达长春。我兼任长春广播电台军代表，接管了广播电台。同年五月为了准备东北日报社与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分工和对电台的移交具体事宜，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初，从通化把林超同志调回，代替我任广播电台的军代表。我专门组织新闻台划归新华社的交接工作。五月廿七日奉命撤出长春时，林超同志又遇了一次险。当时他在市郊的发播台，晚上才接到通知。时间十分仓促。在混乱中，只带领一个技术员，携带了一台手提的机器离开险境归队，情况非常危险。后来我们所乘火车过了松花江铁桥遭到美国飞机一路袭击，在陶赖昭北不远处，两个车头水箱被机关炮打穿，火车停驶，两位司机牺牲。我们新华社的工作人员下车，躲在车箱下的铁轨旁，幸未发生伤亡。一直熬到第二天清早，才由哈尔滨派车头来接我们到达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后不几天，东北日报社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彻底分开，同属东北局宣传部领导。我和林超同志所在的东北日报社的新闻台连人带机器全部调给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成立了电务科。我任科长，林超任副科长，甘正任电务主任。半个月后，东北局宣传部派我去佳木斯筹建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后方基地和东北人民广播电台。电务科的工作就由林超、甘正二同志负责。十一月两项筹建工作完成。我调到佳木斯市任市委常委分管工会工作。林超就任电务科长、甘正任机务主任。一九四七年六月卅日半夜甘正同志在工作中不幸触电身亡。我从佳木斯赶回哈尔滨参加了追悼会。又一次见

到了林超同志。其后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我调北京，才又与林超同志见过面。一九六二年后我调到上海后，就很少见面了。

回忆与林超同志的相识与相处，从青年到老年，悠悠岁月五十余载，往事历历在目。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是永不能忘的。我们永远怀念林超同志。

作者是上海市离休干部

民法学家李由义 简历及其著述

○ 朱仁巴

李由义，玉环坎门人，1922年出生，当代民法学家，1945年肄业于西南联大法律系。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历任助教，讲师、秘书等职，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1961年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任教，1964年到暨南大学任教，历任教师、副教授，1980年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国家宪法副主任，1984年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法学会第一届理事。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第一二两届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顾问，是当代著名的民法学家，曾参加1954年至1961年的刑法起草工作，及1980年至1984年的民法、刑法《军职罪》的起草工作。并讲授民法专题等课，1984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主持编写了《民法学教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继承法概论》（法制出版社1987年版）《民法学自学考试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书，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一书副主编，发表了《罪刑法定与类推》（法学研究1980年版）《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关于我国继承法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85年第4期）《我国民法物权体系初探》（北京大学报1987年第一期）《论建立我民法物权体系的必要性及意义》（《中国法学》1987年1期）《论国家所有权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关系》（民法经济法学年会论文选

集 1987 年)《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法学研究 1987 年第二期)等论文。

李由义教授,是当代著名民法学家,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他与我县高铭暄、尤俊意三人并称当代法学界的权威人士,享有极高的信誉,曾被辑入多种法学名人大辞典。

李由义教授不幸于 1990 年 1 月 15 日,在人民大学与硕士研究生谈话时,突患脑溢血病故在工作岗位上。终年 69 岁。

庄忠庆生平事略

● 庄奇炎

庄忠庆,谱名德忠,别名村逸。1923 年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坎门镇,有四兄弟、二姐妹。

1932 年就读于坎门中心小学,专心向学,孜孜不倦,勤学苦练,思想敏捷,接受能力快,学业成绩优良。特别在高小期间,仿学颜真卿字体,练就一手好书法,浑然端厚,雄劲有力,经常为乡人写过年对联,常作为低班同学习作的字帖。1938 年冬小学毕业。

由于日寇侵犯,在中学时期,他辗转在温州、乐清、温岭等地求学。1939 年 2 月考入宗文中学初中部,1941 年 1 月转入温属联中,1942 年 1 月改为永嘉中学,1942 年 8 月在永嘉中学初中部毕业。

1942 年 9 月考入永中高中部,1944 年 9 月因温州沦陷,转入温岭县中高中部(中途生病辍学一学期),1945 年 1 月转入搬在乐清的雁荡山的瓯海中学高中部,1945 年 9 月转入永嘉县立中学高中部,1945 年 12 月毕业。在校期间,曾任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校刊物编辑研究社副社长等职。

1946 年 1 月考入设在杭州的国立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1947 年 10 月毕业。

1947 年 11 月至 1948 年 1 月,返回玉环家乡,在玉环简师任教,1948 年 2 月至 1949 年 7 月任坎门中心小学校长,1949 年秋任玉环县立中学教导主任。1948 年间结婚,生有二子二女。

1951 年 9 月至 1952 年 2 月,因钱天起老师推荐赴山西省平原师范学院任教,为辅导员。1952 年 3 月至 1978 年 12 月经人介绍到

上海晓光中学、向明中学、红星中学任教。主教语文、历史、书法。曾任上海市书法协会秘书长。特别在书法教学方面备受国际友人好评。

1957年在上海向明中学任教期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11月30日在上海红星中学任教时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和工资待遇。1978年12月18日因患病，不治身逝，享年56岁。

他在中学读书阶段，正当国家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大专读书和回乡任教阶段，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二个重要历史时期，他受到进步老师钱天起、夏承焘、汪远涵的影响，特别深受党的教育，思想进步，满腔热情地组织和发动学生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和反蒋民主运动，发挥着骨干带头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深受党的教育，掩护党的活动。

丁世祥同志是玉环县地下党早期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和庄忠庆及叶木兴、吴爵渊、叶见颖等在坎门小学同班同学，他们学习认真，观点相同，关系要好，交往密契。丁常来坎门进行地下活动，抗日初期，庄忠庆等到温州等地中学读书，在寒暑假回乡，丁常来坎门和这些要好同学秘密聚会，谈论抗日形势，宣传抗日思想。1943年左右，丁曾几次携带党内宣传刊物给他们传阅，揭露国民党反共罪行。一次，丁召集庄、叶、吴等人开会，谈起游击区经济困难，需要募捐，庄和叶等当即回家拿了些钱带头捐献。庄在温读书期间，常买些进步书籍带回家。丁常向庄借阅，并带往游击区。如斯大林《论列宁主义》、《伊里奇（列宁）辩证法》等书，1945年抗日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丁即来坎门向他们宣传解放战争局势，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必须推翻蒋家王朝，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同学们深服丁的见解，更加激发学生们的反蒋爱国思想。他们的感情更为投契，行动更为团结。丁来坎常吃住庄家，有时也去叶、吴、叶等同学家。这些进步同学也用各种办法掩护丁的地下活动。

1949年夏，玉环解放，丁世祥任玉环县委书记兼县长。盘据在外海的国民党残部经常来坎登陆骚扰，残军悬赏80元银圆捉拿庄忠庆，但庄毫不畏惧地投入剿匪斗争。一次丁来坎在庄忠庆家里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诱敌投降和安定地方秩序，庄等向丁回报残军活动情况，并提出防务建议，密切配合解放部队，安定地方治安。丁经常听取并采纳他们的建议，搞好地方防务工作。

二、组织读书会，追求知识，探索真理。

庄忠庆在青年学生时代，求知欲望强烈，博览群书，看过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历史等各方面书籍，为数不少。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看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等著作，也看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学，如亚当斯密的《厚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著，看过艾思奇《大众哲学》，也看过何干之、任白戈、许涤新等政治经济学方面论著；在文学上，他看过鲁迅、邹韬奋、茅盾、巴金、郭沫若、沈从文、张天翼、曹禺、陶行知、蔡元培等人的作品。如《呐喊》、《彷徨》、《子夜》、《家》、《春》、《秋》、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的来源，有的是自己购买的，有的是向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有的是同学之间交流的，庄自己买的书，不下数百册，编号归档，便于寻找。

他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还组织读书会，带动同学学习。1939年间在乐清宗文中学，庄忠庆会同叶木兴、吴爵渊、叶见颖等发起组织“劳动读书会”。

1945年1月至7月，在乐清雁荡山灵岩寺瓯海中学读书时，组织“云雁读书会”，庄取其名，暗寓“雁从北方来”，象征着从北方的苏联传来马列主义。参加的人员有玉环籍的和乐清籍的二部分志趣相投的同学。玉环籍参加的有庄忠庆、叶木兴、李敏芳、张生、陈继沅、刘奕琴、庄成祥、刘子升等。均是学生中的骨干。他们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读书会中，庄忠庆主

讲过“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学习心得，联系时局，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言词有力，口才流利，博得同学们的赞扬。

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有一次学校当局无理增收学生的学米和学费，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云雁读书会”的带动下，全校学生群起抵制，终于取得斗争胜利。

1948年、1949年间，地下党在坎门进步同学和小学教职员中组织读书会，又称座谈会，有庄忠庆、李敏芳、叶木兴、董诚安、占恭文、陈道生、陈继沅、张藺生、庄成祥、郭翼民、刘子升、刘奕琴等参加，每周一次在占恭文家暗中进行活动。一次李敏芳（地下党支部书记）拿来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油印件，让大家阅读，并组织讨论，给大家教育至深。不少人受党的教育和实际锻炼，先后参加地下党和走进游击区。陈道生、张生、庄奇炎等同志受其影响，走向进步，先后担任温州市学联主要领导职务。

三、组织玉环旅温同乡同学会，团结同学，参加各种斗争。

1942年间，庄忠庆、叶木兴等对在温读书的学生发起组织玉环旅温同乡同学会，宗旨为“联络感情，增进知识”。推选庄忠庆为主席，叶木兴为副主席兼管经济股、李敏芳管文体股、董诚安管图书股，集体商量安排活动。制有会徽，以帆船和太阳为图案，意味着“同舟共济，驶向光明”。

在温读书期间，每学期召开一、二次茶话会，互通情况。假期回乡，举行春节聚餐，组织郊游，交换各类书籍，交谈读书心得，组织白浪球队，庄自兼队长，联络同学关系。

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反对地方的恶势力。1945年，坎门镇发生三件怪事：一是地下钱庄高利盘剥乡民；二是县渔会借贷款之机进行贪污舞弊；三是反动的一贯道作恶多端。同学会群起而攻之，开展三大斗争，震慑了邪气，扶植了正气。

有一次坎门三青团区分队长李德昌（后沦为汉奸），借募捐之

名，行贪污之实。庄忠庆、叶木兴等带领同学会同学登门声讨，声色俱厉，李等惊慌失措。抗战后期，他们组织开展锄奸运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喊“严惩汉奸卖国贼”，给坏人坏事以沉重的打击。

在抗日期间，他们出墙报，写文章，画漫画，庄爱国热情奔放，才华横溢，带头著文画画，揭露贪官污吏、投机奸商、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的行为，宣传抗日救国。他们还组织晨呼队，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出动三、四十人，在大街小巷，高呼抗日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声势浩大，震撼人心。

1948年5月，坎门发生大规模拖煤油箱闹米风潮事件，驻坎门国民党水警队拘捕了数名群众，游行群众非常愤怒，自行召开大会，推举尤光和、庄忠庆和刘章进为代表，到水警大队和县政府交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被迫放人。

1946年庄忠庆、吴爵渊、叶见颖等在乡创办一刊物，叫“枕戈”，意即“枕戈待旦”，寓杀敌报国的心情急切，一刻也不松懈之意。

通过斗争，教育了群众，不少中学生和员工纷纷加入同学会，队伍越来越扩大。如吴爵华、陈必祥、林文吾、庄奇炎、王心仁、王心良、王心坚、李雍容、李雍正、许约润、林文选、郑人俊、郭世琮、郭慧爱、高长涛、赵典惠、陈高峰、王明洪等先后加入。

四、支持新派（毛派），反对老派（董派）的斗争。

解放前玉环县有着董派（董运铎为首的老派）与毛派（毛止熙为首的新派）的派系斗争，也波及坎门小镇。当时参加董派的有杨克逊、牟子谦、潘作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四、五十岁以上的老牌绅士，思想倾向保守反动。久已把持地方势力。毛派是后起的，有林式民、郭世桢、李孙义等人为代表。思想倾向进步。他们之间争夺地方权利，矛盾十分尖锐。庄忠庆、李敏芳、叶木兴、吴爵渊、叶见颖等青年学生在地下党的指引下，利用矛盾，团结毛派（新派），

反对董派（老派）。

1947年10月庄忠庆在英大毕业回乡，受聘于玉环简易师范学校任职。1948年初，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董运铎兼任简师校长，借口庄思想左倾，将其解聘，庄很气愤，返回坎门。受到叶木兴、李敏芳等热烈欢迎，并乘机发动同学会的同学，不为老派所聘，使坎门小学老派校长池孟毅（系国民党员，属老派）因聘不足教员开不了课而被迫辞职。旋由李孙义（当时任镇长），推荐庄任坎门第一中心小学为校长，与第二中心小学统盘合作。同时李大力帮助坎门第一、二中心小学筹募经费，修建校舍。

为维持学校正常工作，庄和李敏芳等同学商量后，担任镇民代表会主席，通过修建校舍等方案，排除董派的作梗。

在学校中，庄完全支持教学上的进步活动。教唱“勇敢的中国学生军”、“古怪歌”、“生活指数要冻结”、“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等革命歌曲。语文课也选读“文萃”、“文汇”、“民主”、“展望”、“时代”等进步报刊上刊登的进步文章。庄忠庆、李敏芳、叶木兴等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庄忠庆还向学生作过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报告，称国民党为“刮民党”，揭露其反动的腐败的政治内幕。在学校楼梯边张挂“解放战争形势地图”，插红旗（代表人民解放军），拔黑旗（代表国民党部队），让学生们更了解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大大鼓舞了士气。

董派不甘失败，董派特务瞿晋玉曾扬言坎门小学有共产党活动，制造舆论，拟加害于学校的进步师生。进步的师生巧妙地利用地方派系斗争，来掩护学校的正常的进步的教学活动。配合家乡早日解放。

五、书写宣言，参与反暴行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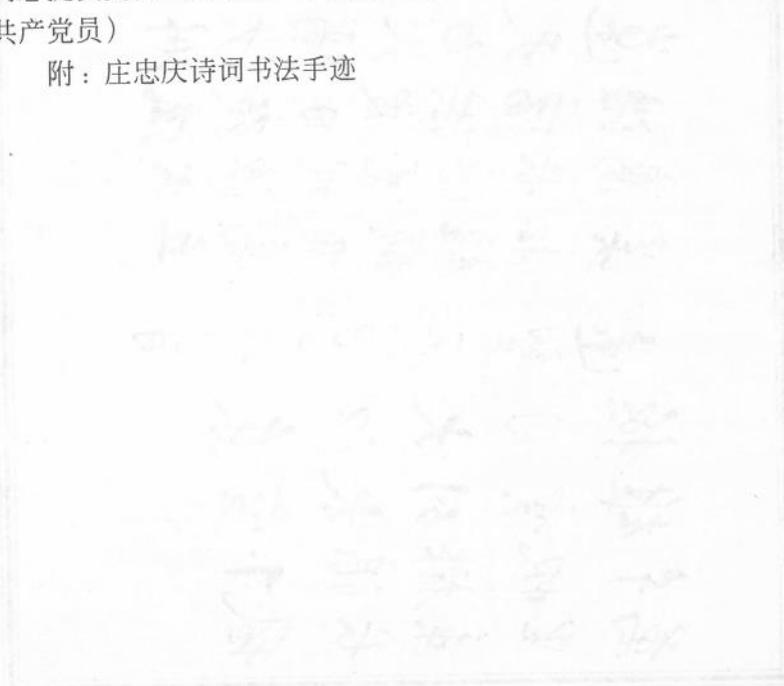
1947年，庄忠庆在杭州英大读书期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英大同学们推选为代表，负责与浙江大学等学校学生组织进行联系。积极参加示威游行，高喊“反内战，打倒四大家族”等口

号，散发“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传单。当美军强暴摧残北大女生事件发生后，他愤怒填膺，代表同学们起草了《为响应反抗美军暴行宣言》书，揭发了美军罪行，提出：严惩凶犯；驻华美军立即撤出中国；反对内战，建设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等四条要求。在学校反内战的辩论会上，庄发表自己见解，公然宣传“蒋介石才是土匪”，据理驳斥那些污陷“共产党是土匪”的反动言论。获得进步同学的拥戴。

总之，庄忠庆同志的一生在党的教育下，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在杭州、温州、玉环等地学生抗日救国、团结反蒋斗争中走在最前列，成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带头发动者和积极组织者。

（此稿系根据本人生前有关回忆资料和陈继沉、张生等知情同志提供资料整理而成，作者系温州市经济委员会县级离休干部、共产党员）

附：庄忠庆诗词书法手迹



送桂林到重慶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
至十六日晨

瀟江南望板州行
北抵安國走萬程
金沙西去奔流急
東升如日照山城

祖國 海疆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赴學途經長江舟見

連天白水隔沙洲
浩蕩洪波日夜流
島嶼長江竟現漁火
吳淞雄踞有高丘

遠望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

極目大江東
雄雲列太空
萬里帆樯浪下
長風下

我这坎坷的一生

曹云凤

1925年10月10日晚上，户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是庆祝辛亥革命胜利15周年双十节的夜晚，我出生在上海环龙路曹宅。

父亲曹仲渊，玉环坎门人，留学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学校，后获无线电博士。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大华无线电公司，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母亲杨静秋，也是坎门大家闺秀，是妇产科和小儿科医师。因她笃信佛教，虔诚礼佛，说产后要吃三年血盆素，才能报答娘恩，三年以后，母亲见荤就倒胃口呕吐，因营养不良，三十六岁就离开了人间。

我六岁时，父亲送我到郊区比徒小学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我每天从家中步行到学校，寒暑不辍，风雨无阻，我从不迟到早退，这是父亲对我有意培养，使我从小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从小欢喜看书，小学六年，我把小学生文库大半都看完，从此我的眼睛近视了。我年年品学兼优，得了不少奖状，父亲把这些奖状寄给家乡的爷爷，爷爷做了镜框挂在墙上，我暑假回乡看到，也十分高兴。

母亲去世后，父亲娶了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继母，初来时对我还好，后来继母生了自己的女儿，就不疼我了，我成了失去母爱的孤儿。

中学时期，父亲仍把我送到郊区晏摩女子中学住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长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小姐，能弹一手好钢琴，我生来就有一付好嗓子，父亲说我将来是一块教书的料，校长见我嗓子好，就把我编入唱诗班，每逢星期日，我们唱诗班的同

学都穿上小天使的服装到教堂唱赞美诗，学校还有几位中国教师给我们上课，学校并不重视语文教学，中学六年直到高中毕业，我的中文程度始终是囫囵吞枣，没有过关。高中毕业时还在教堂浸礼会受过洗礼，但我并不笃信耶稣。

父亲是喝过洋墨水的人，行外国矩规，儿女十八岁，就要脱离家庭自力更生，十八岁那年我考取上海大夏大学，父亲不承担我的学习费用，要我半工半读，幸好学校有五名免费生，我成绩好争到免费生的名额。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一度内迁贵州，抗战胜利后才迁回上海。

1950年，我大学毕业，我修的是教育心理学，毕业时戴方巾帽，并拍了照相，那时女孩子戴方巾帽的并不多见，那张戴方巾帽的照片，迟迟还挂在坎门我表姐家中。

大学四年，因家中是继母，无人疼我，我基本上不回家，校长师母很疼后，待我如亲女，我感激校长4年对我的免费栽培，也感激师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1949年，距我毕业还有一年，师母的表弟从美国来中国找对象，师母把我介绍给他，并说他表弟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任职，很有钱，说我嫁给他住洋房坐汽车生活优越，并培养我在美国深造，还安排我在上海李宗仁和郭德洁公馆和他见面。那人比我大十多岁，爱吃酒，我不想嫁给他，我推辞说，我还未毕业，等毕业后再考虑。他回去后，寄来美金、书籍，书中还夹着长统玻璃丝袜，那时是很时髦，并说等毕业后，再寄船票来，仍期许培养我深造。

1950年我毕业后，他果然从美国寄船票和美金来，要我马上到香港找一个朋友办理出国护照。这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开始，全国军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怎能没有民族气节嫁到美国去，我回复他我不能去美国，并希望他说服美国政府不要打中国，我们也许后会有期。从此我们音讯断绝。

抗美援朝开始后，全国都沸腾了，同学都有一股激情，要到东

北去参干，我当时摒弃了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跟随部份同学到沈阳参干，在那里当老师，住的是日本式小洋房，不到三个月又疏散到哈尔滨，1951年又回到沈阳。冬天的东北，天寒地冻，气温降至零下40度，松花江上的坚冰，汽车可以来回驶，南方人在这里生活很不习惯，上海方面同学来信要我们回上海工作，我从小受父亲培养，锻炼成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不怕吃苦既然来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夫人杨素芬包下一列火车把我们上海来的大学生送到北京工作，首先在俄文专科学校工作，那里有许多苏联人，我不懂俄文，后又调到业余学校当老师。教的是成人班，总之，领导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坚决服从组织，从不讨价还价。

我的爱人叫蒋云鹤，乐清人，是大夏大学同学，一起来东北参干，他是摄影记者，1952年我们在东北结婚，1953年一起来到北京，一下火车，王鹤寿部长就派小汽车，把我们接到住地，住地离上班的地方很远，上下班有面包车接送，来回都要经过中南海，虽然起早贪黑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生活很得愉快，也很充实。蒋云鹤很聪明，学习也很努力，一次单位考试他得了第一名，领导把他的试卷公之于众，我见了也分享了他的光荣。



这是曹云凤平反后，一家团聚欢庆时合影。居中（女）戴眼镜者是曹凤云女士。

在北京忙忙碌碌一直到1958年，整风反右开始，我并未说错话，做错事，却糊里糊涂的把我定为中右份子。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子女愈多愈光荣，我已有三个男孩，还想当光荣母亲，三个孩子白天送托儿所，晚上去接回，云鹤又在洛阳工作，

领导见我实在忙不过来，为了照顾我，停止了我的工作，要我带三个孩子去洛阳投奔云鹤。到洛阳我虽然没有工作了，云鹤一人收入养活一家五口，生活虽然艰苦，一家都在一起，倒也温馨，洛阳是古都，那里有许多名胜古迹，能生活在这种地方，也感到很荣幸。可是老天不作美，一场大水，把我家冲得一干二净，所有生活资料又得从头置办真是破屋更遇连夜雨，苦不堪言。

1964年我又随丈夫来到郑州，这年底我又生了一个小女孩，云鹤要负担一个六口之家，生活陷入困顿，我只好出去打临工，以弥补家中不足，经组织安排到鸡蛋厂做临时工，每天打鸡蛋，打好后送蛋糕厂做蛋糕。工作并不繁重，我要抚养四个小孩，又要上班，生活虽然辛苦，但一家能够温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个中右份子也免不了要受冲击，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战斗队里的革命小将勒令我去打扫卫生，扫大街，我一点都不怕，我会吃苦，这些工作都是我力所能及的，所以不管天寒地冻，不管三伏天暑，汗流浹背，我从不迟到早退，这样反锻炼了我的身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979年北京方面来了二位同志，平反了我的中右份子，给我办了退休手续，补发了我的工资，还能报销医药费，我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可是我已进入白发苍苍的花甲之年。

现在我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二个还是工程师，女儿在南非工作，今年春节准备回来探亲，不幸的是我的老伴于1986年11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使我备受丧偶的痛苦。

曹云凤写于1997年9月21日

编者旁白：

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给人以太多太多的沉思，曹云凤女士50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戴方巾帽，她放弃了留在条件优

越的上海工作，又拒绝嫁给美国富翁，却满腔热忱的到环境最艰苦的东北沈阳去参干，七、八年来从未好好分配她的工作，发挥他的专业特长。打了七、八年的临时工，1958年又稀里糊涂的把她打成了中右份子，终止了她的工作，从此她跌入人生的最低谷，蒙冤达二十多年，政治上受尽折磨，生活上备受煎熬，这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执行的偏差，但她对党没有半句怨言，逆来顺受，甚至叫她去打扫街道，她也愉快地接受，说劳动对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了减轻家负，她不得不出去打临工，组织上安排她到蛋糕厂打鸡蛋，把打好的鸡蛋送蛋糕厂做蛋糕，只要一家能温饱，不论分配她作什么工作，她都涕感不尽，在她的人生道路上遭受如此重大挫折，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她从不埋怨政府埋怨党，甘愿淡泊自守。1979年北京派人送来平反文件，落实政策，恢复干部待遇，还能报销医药费，她高兴得不得了。这时，他已年近花甲，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她参加郑州市直老干部夕阳红合唱团担任领唱，到北京中央电视2台演出，他兴致勃勃的学习书法、花鸟画，以陶冶性情，她习作古体诗，讴歌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发表在坎门诗刊上）他在家含饴弄孙，她的孙女张栎，高考成绩特优，本可去清华、北大，她却要报浙大，说浙大是自己的家乡，毕业后为自己的家乡服务。她得知家乡变化巨大，她决定回乡探亲，后因不慎跌交骨折而未成行。1998年9月27日因高血压心肌梗死病故，终年74岁。

曹女士的一生，没有任过一个像样的职务，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辉煌业绩，一生除了坎坷还是坎坷，可是她那颗爱国、忠党、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的。

上文原是为征集在外地玉环人专辑约她写来的，因无高职称而未刊用，今日重新发表她的遗作，可惜她已见不到了，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怀念张鸿玉先生

※ 方贵川

十多年前的五月，正是麦黄稻绿时，张鸿玉先生因病不治，驾鹤游西。张先生的匆匆逝去，久远地颤动了玉环书法界的同好诸友。时至今日，提及张先生，亦常有后辈晚生为之泫然。

我是在1986年以后在楚门熟悉张鸿玉先生的：张鸿玉先生不善言谈，看上去木讷而慈祥，红朴朴糙米色的脸庞上洋溢着长者之风，银光闪烁的缕缕白发挺拔在眉骨高耸的额上鬓畔，给人的感觉是足够的沧桑、恬静、坚定和刚毅。

张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他在当时是我县仅有的两位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之一，是我县文联的第一任书法协会会长，并出任过玉环县书法研习会会长之职。他的作品曾参加过华东地区佳作展出且获得好评，他的力作曾获得过全国楹联大奖赛二等奖，张先生写的字为天涯海角的玉环文化界赢得了荣耀。

张先生写得好字的名气大起来后，向他索字的人经常有，请他题匾写碑的人络绎不绝。只要是方便，张先生都会给予满足。至今，张先生家传的遗作不多，而流布在别人手中的作品数量却颇为可观。

张先生义务辅导过许多学生。他付出了汗水和心血，分享着学生的进步成果，他因此而笑口常开，好象这就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和最惬意的生活甜蜜。平时也只有张先生给学生上课时才听得见他的珠玉之音，见得到他的灿烂笑容。

春去秋来，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许多学生书艺大进，但他们都认为是张先生的教诲在策励着自己“技进于精、不敢懈怠”的。

朋友对我说，张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由于身体有病，张先生肄业回家，过上了“地肺山樵”的艰辛生活。不知是为了记住这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还是出于自谦自励，抑或是出于对生活磨砺的呐喊，张先生喜欢以玉环曾有“地肺山”古称的来由，给自己的作品落上“地肺山樵”一款。在我眼里，以此落款的张先生手书有一股浓冽的山野林泉之美和一种臻于“款、字、性”统一的和谐之美。

中途辍学的张先生靠去山后浦挑一担水挣一角钱的收入维持日子。天旱缺水，张先生的水桶挑进了筠岗，挑到了离楚门七八里以外的彭宅……生活的压力，使张先生成了一名道地的职业送水员。

好长一段时间后，张先生改换了一种生活行当，去菜市场购进猪肠内脏，精心加工后，挂上饭单，拎起肠摊及一刀一秤，陀罗般地流动于楚门十字街角和西门转角的面馆饭店之间。生意不好时，张先生还常常将摊位挪动那些人流如鲫的街头巷角。

张先生摆摊卖猪肠，有一股姜太公钓鱼似的耐心和忍气，他从不吆喝张罗，顾客喜欢随缘做些生意。我有幸品尝过张先生的手艺，一股纯正的猪肠味道，堪称菜中珍馐。

张先生练字很勤，听曾经是邻居的朋友介绍：张先生正常在吃饭后的片刻休闲时，用筷子蘸水在饭桌上写写画画，以筷子为笔在空中抽摹笔意、笔法的。我想，这大概便是张先生省钱省时又练笔墨的独特方式吧。这与千年前古人用芭蕉叶写字，在砖块上写字，更有了一番别样滋味。

张先生先学颜书，他的颜字功夫很深，我第一次去张先生家时，见他家阁楼的板壁上张挂着张先生的颜体正楷《朱子家训》四条屏。只觉得眼前一片敞亮，闪现出一道蓬筚生辉的慧光。这活脱脱似从碑上摩下的颜字竟会出现在这幢小阁楼里，我当时心中泛起的那股钦佩心潮至今仍见回澜微波。

我惊讶于张先生的笔底腕力，有如孩提时阅读《封神演义》似

的觉得不可思议。

及至近年，余暇宽富，我开始阅读了一些书法典籍，涂鸦了几行不成体统的白纸黑字，逐步接受了“书法造型是人间古今对话情感信息最为丰富的线条艺术”这一断语时，才感到张先生书作的源远流长，张先生笔底功夫的高深莫及。张先生学书先临颜真卿，下溯何绍基，上追郑文公。可谓上下千余年，纵横数万里。故阅读张先生的作品，点画之间张弛有度，翻卷着一股浓郁的魏晋遗风，线条之内蕴含弹力，充盈着潇散灵动的飘逸之气。初识张先生，其书风内敛蕴藉，富儒生气度，后见张先生，其书风明显改观，夺眼而来的是令人逸兴遄飞的收放自如和豪迈超拔。识者云：“书者，抒也”它唱响了张先生对人生晚景的挚爱心曲。

正当张鸿玉先生迈向挣脱传统书风茧缚，奋力追求更高造诣的台阶时，上苍不悯、不假人寿，让张先生在65岁华年时在玉环书坛上留下一座丰碑后，即匆匆谢世。

我想；像张先生这样一位人书俱佳的聪慧、贤达之士，即使在九天之上，他也不会辍笔停挥的。他的豁达厚德，他的诲人不倦的，他的人格书艺，就是到了天庭，也会站成一面旗帜的。

因此，我常常想到张鸿玉先生，想他在麦黄稻绿时……

编者按：

此文很好，起到拾史之余，补史之缺的作用。其不足之处是对张鸿玉先生的一生尚未写足。

花山旧事

邬红

我原名赵秀凤，1917年出生于楚门渔家，因负笈杭垣，遭国民党反动势力害迫，改名易姓亡命天涯，年华一角，落花身世。在断断续续三十年舌耕生涯中，有辛苦有欣慰，有羞愧有自豪。若问对学生有何深刻影响，还是温岭县中的三年。温中一度建校花山，石牛喘月，天马行云，九老梅花，书窗灯火，环境如画。我非大学士，更非国民党员，仗恩师保荐，于1945年一月进校，1948年1月离任。在职期间，历经“九一八”不抵抗——“双十二”兵谏——抗日烽火——内战枪声的重大历史事件，累积起来的分明爱憎，情不自禁地倾注在语文教学之中，拨动过学生的心扉，点燃过学生的心火。

反动派濒临绝境，自愿不暇，我趁虚刻印了毛主席《沁元春》词，作为补充教材，在课堂公开传授马克思唯物史观，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蒋中正《慈庵记》的虚伪本质。谁是今朝的风流人物，谁是中国命运的寄托者，学生心中有底。直到解放后数十年，没有外人知道我在语文教学中有这么“惊雷一课”。这充分体现师生之间，相互负责的同志情义。

不久，穷学生蔡玉友食物中毒身亡，语文课改为追悼课，写祭文，发通知，布置灵堂，人人动手，一夜呵成。开会那天，各班送来花圈挽联，挂满教室。哀乐声中，默哀礼毕，宣读祭文，哭声隐隐。高中代表林如，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指出蔡玉友不是死于牛肉病毒，而是死于社会制度，并说古代有“苛政猛于虎”的记载，数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善良人民被猛虎所吃，如今要吃到我们

这一代了……怎么办？会场上一片唏嘘。会后同学们抬着停在校外的蔡玉友棺木，安葬在花山墓地，至今依稀可辨。第二年春天，坟上长满青草，成了同学读禁书、谈志愿的好地方。死者有灵，可消孤寂。此后，同学家中每逢婚丧大事，主动相帮，亲如兄弟。

世无桃源，窗外有耳。我们开展课外阅读时间、地点、形式、灵活多变，各见神通。书刊中有《西行漫记》、《大众哲学》、《鲁迅杂文》、《生活周刊》，还有以我教师名义订来的文汇报等等。这些书刊有的来自亲友，有的借自佛门，有的通过关系，外地引进。初三学生，年轻单纯，一触进步，如鱼得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思想十分活跃。

我们密切注视风云变态，接应大城市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办起“花山风”班刊，设有时事短评、读书报告、街头巷尾、校园生活等栏目，漫画插图，引人入胜。高三林如、陈幽月，本刊叶谷秀，都是特约撰稿人。他们文锋犀利，深受读者欢迎。花山风发到全校，吹进方城（温岭别称）获得店员、工人的积极支持，改腊纸油印为石印，版面扩大，编排新颖，发行到黄岩、海临，奉还成本费的友谊之手从各方伸来，投稿的人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花山风团结起校内外的爱国朋友，花山风培养了同学的工作才干，花山风提高了同学们写作水平。花山风正想一展雄风，却被温岭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主编马洪荪吃了警棍，被父亲禁闭在家，作自我反省。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张雪风，自然罪责难逃。老校长架起黑框眼镜，拦路审问：“你每月接受共产党多少卢布津贴？眼下就是暑假，你还印这么大捆宣传资料，真够积极，不怕格杀？”他的话份量很重，我随手抽出几张油印品请他过目，原来是孔尚任桃花扇李香君致侯方城的骈体情书，吴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团圆曲。这个靠国民党吃饭的党棍，被我愚弄之后临阵却退了。新来的校长也不甘落后，请我到办公室，和颜悦色，对我开展降心攻势：“你是横湖酒星赵

立民的高足，与共产党没有组织关系，又何必自作春蚕！只要改变你们语文教学，在我任内，可以蝉联……”二个校长，异曲同工，强我就范。我出身渔家，受过迫害，赋正义感，爱国情操皆出天然，承担风险，决不后悔，为了学生安全度汛，来日方长，眼前给他一点不值钱的体面，也是抗争必要的策略。“谢谢你的开导，看我今后的实际吧。”我满怀自信起身走了。

寒假将尽，开学在即，我没有接到蝉联聘书，意识到黎明前的黑暗就要来临，要张月湘等人搬出宿舍，租居小泉村尼姑庵，万一风暴袭来，有个回旋余地。我自己留在温岭，无用武之地，饿着肚皮，盲目行动，危在旦夕，累及学生，如何交代，不若重卷书装，奔赴江西与林先生风雨同舟，图个暂时照应。

我人离温岭，心系花山。获悉原初三学生，未及黎明，纷纷离校，到乐清参加青训班；黎明号响，争先参军，人数之多为全校之最，我象看到他们背包挎袋，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大道，入党入团，茁壮成长，放心微笑。闻叶谷秀这个思想早熟的学生，在温州地委蒙受文字奇冤，百思不得一解，常常随带照片，打听他的下落。桐林学生应汝源，在解放温州时，因新兵团暴动，献出了火红生命，1975年返里，到烈士陵园行默哀礼。想起汝源投奔革命前夕，曾来花山告别的音容笑貌，特别那嵌在清秀眉毛下闪闪发光的双皮大眼，令人难忘！五十年代，月湘、冰冬因公来杭，握手言欢，惠风和畅，惟独不信我是党外人氏。我说，在艰难复杂的时期，党外人氏往往起到党人不能起的作用，遗憾的是至今还是依然故我，他日条件具备，还得请你们做入党介绍人呢。说得大家笑了。前年戴经诰从河北来杭，知我居红石板新村，匆匆来访，四十多年阔别，热泪盈眶。花山校舍虽荡然无存，但花山灯火犹在心头。谈到与陈治事三人携手过黄泥岭的情景，人象回到二十七八年龄段。经诰爱人是承德人，邀我到承德去旅游，参观清朝皇家的避暑山庄。我几时去他到北京接我。

三年温岭县中，如此而已。写成书面，非为自己梳妆打扮，只为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广得人心，如我这样自作多情的人，在全国比比皆是。我今七十六岁了，有人以我退休早，工资低，芥菜蒂头难以下咽，孰不知我家有诗书，胜黄金万贯，清茶淡饭有利消化，肠胃健康，餐餐甘味。有人以我小子出国，孤守杭州冰雪严寒，老境凄凉，却不知我胸有春天，万紫千红，花开不败。何况庭前绿阴，门上新枝。持告乡亲：我的晚年，无限欢乐。

一九九二年四月 雪风于杭州红石新村

编者按：

该文写得激情澎湃，楚楚动人，某些人事、经盛世樵同志核实，原在《在外地玉环人》专辑用，当时因无高级职称而拉下，现重新发表，以飨读者，可惜张雪风先生已作古未能见及此文发表。

追忆 潘俊士先生

◎ 阮存寅

潘俊士先生，原名潘秀，字士能，自号仙游子。一八八九年一月生于环山西门书香门庭潘世佐家，至一九七四年八月去世，在世八十五年。俊士先生天资聪颖，性格清朗，喜好整洁，讲究卫生成癖。生有两男两女，长男潘鸿龄，是中统特务，解放后被镇压；次子潘徽宏，中共地下党员，在浙西被国民党迫害致死，二子均无后。长女霞仙嫁宁海陈某，次女梦仙嫁绍兴蒋某，蒋某定居玉环，子蒋克伟。解放初潘家领得一男，为养孙，即潘孝声。

纵观俊士先生平生，一度从事教育，后半生改行从医，以自己的医术解除百姓病痛，拯救过许多垂危的生命，曾经誉满全县，成为省级知名中医师。现在追述他的一生，意在从他的经历中，回顾一位老知识分子不平坦的一生和自强不息的风范，并给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启迪。

一、时世艰难，从教失业

清末民初，社会处在新旧交替的时候，一些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往往不随个人的想法为转移。俊士先生生在那种时代，显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他八岁入私塾，遵循科举传统，从《三字经》开始，至十九岁学完《四书》、《五经》止，经过了十一年的传统教育。由于科举制度已在他十六岁那年废止，而玉环的文化却还相当落后，因此私塾学业完成后，他即走上收徒执教私塾的道路。在二十一岁时与外马道陈氏完婚，家庭形



成，他才开始走向社会，到渔岙学堂教书育人。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文化风气发生了变化，科举传统的知识已不适应社会需要，为此，他于二十五岁时，到温州师范讲习所学习一年，接受新的知识。毕业回家后，一时却找不到可从事的职业，在亲戚的联系介绍下，他到芦岙，向秀才江德斋中医师学习医术。学了半年，他得到杭州私立中医专修学校招生的消息，遂于一九一五年六月考入杭州中医专修学校，接受正规医学的教育。

在杭州学习二年，他于一九一七年六月毕业回家。当时他对治病尚无信心，又因后垵小学需人，他即于七月赴任后垵小学校长兼教员，继续他的教学生涯，历时六年。如果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话，他将终生从事教育。但民国12年（1923年）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玉环发生了特大灾荒，百姓食不果腹，更无钱送子女上学读书，后垵小学只好停办，俊士先生再度失业回家。

二、弃教从医，名传城乡

虽然俊士先生在家教私塾时就有学习医书的业余爱好，且在失业时拜过老中医为师，又经过杭州私立中医专修学校学习，但他总没有将从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将从事教育放到第一位。当时学校因荒年停办，从事教育的思想受到现实无情的打击，他才重新认识社会和职业，最后决定弃教从医，以解除百姓疾苦为己任。

决定从医后，他再到楚门，拜年逾古稀的县立第二小学校长叶佩墩老中医为师，悉心学习临证医术，熟读《临证指南》、重新温习《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温病条辩》、《叶天士女科》等书，历时半年，医心大悟，深得老中医师临床经验，成为叶老贡生的入门弟子。

一九二四年，俊士先生三十五岁时，才到西青街陈健康药店坐堂行医，开始他后半生的生涯。不象现在医院有治疗病人的详细档案资料可以用来统计，现在我们已无法计算他解除过多少患者的病

痛，也不知他救过多少垂危的生命。在解放前，他在医治妇科疾病和温病方面已独有创见，建立了信誉。比如有次一妇人断经，虽然多方医治，总无效果，后找俊士先生医治，他也用传统的温经汤方剂，但根据患妇症状，倍用吴茱萸组方，患妇服后，不久即获健康。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省特派员、玉环县国民党书记长苏兆麟患温病，多处求医无效，后经俊士先生治疗，方获痊愈，遂使俊士先生在玉环出了大名。

三、涉入政治，几度失意

继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二六年十月，西溪林醒民从宁波潜回玉环，秘密发展国民党党员，成立国民党玉环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当时玉环还没有进步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国民党的到来，无疑给玉环革命带来了一点希望。潘俊士先生在朋友季介吾和江步岳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组织，积极参加党务活动。不久，林醒民潜往杭州，玉环国民党筹委会遭到省特派员张森“清党”，组织活动趋于停滞。

一九三七年十月，玉环国民党书记长苏兆麟，为报答为他治愈温病重症，就委任在西青街董饮和药店坐堂行医的潘俊士为直属区分部书记。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年底，俊士先生次子潘徽宏去平阳，参加中共闽浙边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

一九三八年春，坎门第一次被日寇攻击。八月，主张抗日的董仲升被选为环山镇镇长，潘俊士被选为副镇长。但由于董仲升被县自卫队总队薛某迫害，就职四个月即告辞职，潘俊士也因受牵连而被撤职。

四、亦商亦医，治病救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潘俊士被国民党政府撤职后，无心从医，和他的大儿子一起，在西门自家开设一“文具服务社”，专卖各种

文具、小学课本及杂志。但由于他的医术已有些名气，前往文具店求医的仍络绎不绝。

一九四〇年九月，楚门栈台、坎门钓舸一带霍乱流行，死亡相继。为解除患者疾苦，救死扶伤，俊士先生义无反顾地到坎门行医，不久，被县长以定邦委任为县救济院施医所主任。

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俊士先生由楚门陈愚亭先生介绍，加入玉环县中医师公会，并任常务理事三年。期间，他曾被推选为县参议员。

一九四三年，他的次子潘徽宏，不幸在潜县被捕。出狱后病死在浙西安吉。次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要地下党员陈能和、杨模、叶崇森三人的父亲替儿子找“铺保”。深有失子之痛的俊士积极为他们办“铺保”手续，从而使他们免受国民党迫害。

五、坐堂行医，岐黄日精

一九四四年底，日寇经常在沿海登陆骚扰。玉环形势趋紧。当时西青街王永和药店坐堂医师避乱回家，药店没有医师坐堂，难以与同行竞争。于是请俊士先生前去坐堂应诊，直至解放。“文具服务社”留为长子潘鸿龄经营。

俊士先生自三十五岁开始坐堂行医，至一九四五年五十六岁，已积累了二十余年的临床经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一九四六年玉环霍乱大流行，蔓延迅速，城南一地即死三百余人，一时棺材售罄，民心惶惶。县政府紧急设立施医所，再次聘请潘俊士为主任，另请医师十五名，逐日施治，由于治疗得力，疾病蔓延势头渐被控制，惶惶民心始归平静。

因医疗记录不完善，有关俊士先生救人危命的材料，现在已无从查找，但散传于民间的一些旧闻，尤能说明他的医技之高。比如西溪一病人患肠伤寒（温病之一），一时没有找医师治疗，延误至后期，出现了肠出血等垂危症状，才找俊士先生。他会诊后，认为还有治好的一丝可能，即以犀角地黄汤加减入治。不久患者获得痊

愈。又如一则轶闻，一次他晚上在朋友家打麻将，有一小选产妇家属深夜来要求出诊，俊士先生从城里坐轿到小选，已是次日凌晨。由于晚上打麻将过迟，再加上山路颠簸，他已很疲劳，在切脉时竟呼呼入睡，约一刻钟后始被婴儿哭声惊醒，经诊断产妇患的是产后严重血症病。俊士先生即用生化汤对症加减进行治疗，一剂已有效果，三剂即告痊愈。于是小选乡人传言：“俊士先生切脉非常仔细，用药如同神仙一样”。

六、创建诊所，屡获奖励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身为国民党员的潘俊士，也从担心受怕的生活中，看到了平安的希望，逐步摆脱了蒙在心头的一层阴影。特别是十月份，他以一名知名中医师的身份，出席了玉环县首届卫生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认真听取了中央的一些政策，深受鼓舞。会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积极联络几位中医师，带头组建环山联合诊所。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环山联合诊所成立，俊士先生被推选为主任。随后，环山联合诊所不断扩大，逐步发展成拥有环海、青马、沙鳧、芦浦等五个分所的联合体。联合诊所医带药，给患者看病治病带来了方便，为改变玉环人民缺医少药的面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玉环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兼中医师陈愚亭先生的推荐，俊士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六十九岁）调入县人民医院任中医师，直至去世。

自一九五二年组建联合诊所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余年里，俊士先生振作年老精神，积极投身人民的卫生事业。他经常下乡巡回医疗，给偏僻的乡村送医送药。因他工作积极，声誉较高，所以先后被选为县卫生协会副主任兼区卫生协会会长，第一、二、三届玉环县人民代表、第四届温岭县人大代表，先后十余次获得地、县卫生

系统先进工作者奖励。

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六月间，俊士先生感染肠炎，又因年老精亏，不能行走，在每日仅吃二分稀粥的情况下，还坚持为身患重病的学生处方治病，充分表达了一位老知识分子晚年“献身祖国，为社会主义医药事业而努力”，以“报谢党再造之洪恩”的内心思想。

七、总结经验，无私奉献

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崇洋迷外，对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很轻视，曾提出废止中医中药的议案。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我国中医药工作十分重视，先后颁发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等等指示，使新中国的中医药工作者深受鼓舞。

潘俊士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先后二次出席温州专区中医代表会议，并获得大会的奖励，深有感触。为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他先后带了十余名徒弟。虽然一些学徒后来改行从事其它职业，但坚持中医工作的阮护全、刘清顺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私带的黄道信等医师，都各有建树，现在玉环享有一定的声誉。这无疑与俊士先生当年言传身教，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的情况，是分不开的。

俊士先生的医学造诣以温病和妇科为擅长。他在临诊时，态度认真，待人和气，通过望闻问切，即可知病情轻重缓急，且对疾病发展和预后独有见解。如一次他看过陈愚亭先生自处的方剂后，即知其服后将发生高血压，不久果然如此。又如一次，龙岩某妇产后出血过多，经许多医生治疗了三个月还不见好转，被当时西医诊断为贫血型败血症。患妇通过龙岩亲戚介绍，来找俊士先生诊治。他以中医学说，认为是血不通经所致。因患者路途较远，来往不便，他即开了二张处方，前方五帖，后方十五帖。患妇依他的吩咐服药后，很快恢复健康。一个月后，其家属特意到俊士先生家表示感谢。

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将自己长期积累的一些经验方剂无私地贡

献出来。如用“复方丹皮苡米仁汤”治疗髂窝脓肿；“金铃子散加减”治疗肠套叠；“仙方活命饮加减”治疗阑尾炎；“归脾汤和人参养荣汤”治疗产妇败血症等等，均为临床独有创见的经验方剂，屡用屡效，深受病家赞誉。

鉴于他的高明医术，一九六三年，他被浙江省卫生厅列入省级名老中医师名单。

八、晚逢国乱，暗淡离世

俗话说：“国泰民安”。国家动乱，人民就无法安居乐业。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俊士先生的晚年深受磨难。和其它曾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老人一样，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时俊士先生年已八十，老病体弱，且患有严重的痔疮和脱肛病，但也不能幸免接受学习班的审查批斗，和参加医院的勤杂与洗瓶工作。每月只领二十元的生活费，处境非常艰难。

但作为一名老中医，他仍坚持为上门求医的患者看病处方，在病重后期，还躺在藤椅上为患者看病，自己无法处方，就由一名学徒抄写，直至最后。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潘俊士先生终于走完他八十五个春秋的波折旅程，暗淡离开人世。出殡那日，城关父老纷纷参加送丧行列，人数之多，为当时所罕见。这充分反映了一位老中医的实际荣誉，这种荣誉建立在人们心里，是永远磨灭不了的！

热心教育的陈楚材先生

☆ 王詠樵

我与陈楚材先生是忘年交，又同是有志办学的热心人，人都说陈老是富商巨贾，商场老手，但他捐资兴学的事迹却鲜为人知，现试举二三事。

陈楚材的父亲陈海东，也是经商起家，家境优裕，一次与洋人打交道因不懂洋文吃了大亏，请一个翻译要月薪500大洋，他告诫后辈，经商不能忽视教育事业，办好教育事业，也能促进商业发展，陈楚材先生秉承父训，立志在当地兴办学校。

1937年，陈楚材和韩约渔合资购置瑞平客货两用轮，航行沪、瓯，也货运至闽粤，颇有盈利，他鉴于楚门区镇没有一所像样的完全小学，他与陈愚亭先生着手创办玉环县私立东方小学，教育经费全部由瑞平轮盈利拨付，学校预算多少，拨付多少，校董由陈愚亭、陈楚材、耿舜钦、韩约渔、童听情、谢毓珊、徐惠楠等七人组成，公推陈愚亭先生为董事长，陈楚材先生自动乐助银园二千元，及购置《鲁迅全集》20册等书籍，充实校图书室。1939年开办第一学期聘请知名学者林任望先生为校长，教师大多是进步人士，私立东方小学当时被知识界盛赞有三最，教员质量最好，教育设备最全，学生政治思想最进步。这个学校就是后来所谓“红旗堡垒”的前身。

1944年，陈楚材先生又捐资西青马道30亩塘地作校产，把楚门大南门陈氏宗祠辟为校舍，创办了初级小学，为纪念其先父经商不忘办教育的遗训，将校定名为“海东小学”，1944年二月开办第一学期，校长张春莲同时成立校董会，由王詠樵、陈楚材、钱启敏、张春莲、王希贤等5人组成，王詠樵为董事长，初创时只设初一初

二两个班级，学生100余人。1946年春第二任校长是钱启敏，教师有冯韵萍、张梅娟、叶善龄、耿翔岗等地下党员，学校采取新型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志献身革命的人才。这所学校也就是楚门工商小学的前身，又是楚门镇中学的前身。饮水不忘掘井人，陈楚材热心办学、捐资兴学的精神，永远载入我县教育事业的光荣史册。

热心公益的耿思赞

▲ 张炳文

耿思赞字雨庭，皈依法名了一，别号虎山居隐。武举耿璨东之长孙，世居楚门镇筠岗村。九岁慈父见背，二弟思勉六岁，幼弟思安三龄。赞幼时聪颖勤学，深得祖父钟爱，其父叔及同辈中除四叔父武秀才外，无一服蓝衫者，唯思赞弱冠即入潘，出入士林，耿氏一枝之秀。辛亥革命胜利废止科举，青云之志随敛。侍母至孝，其仲季所不及，深得母氏感动，相依共灶至终。

思赞膝下众多，其攀亲均择俭朴厚实之家与之联姻，举办嫁娶绝无铺张浪费，起推行节约的示范作用。持家之道以勤俭务实为主。四房儿媳，祖孙二十余人，团结、宁静、安守本份，各就正业，无一染有不良习惯成为纨绔子弟者，显见治理有道，才得齐家。

思赞遵母教勤读不怠，对易经颇费钻研，诗词尤所擅长。童听情先生为首的壶天诗社，思赞为座上常家之一，陈大肇诗友常对人谈及了一的诗词，便翘起大拇指示意。年五十左右，信仰佛教，常独居虎山之华清宫研究佛学，文章诗词增浓佛学意识。

由于正心、修身、齐家，而对治事亦形公正无私，为民间民事二件纠纷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诉请调理，思赞则不辞辛劳，反复地摆平道理，说明是非，分头规劝，在双方认识觉悟后平息了结，免却涉讼，恢复团结互谅目的，忙于调解、废寝忘食为常事，被誉为当代鲁仲连。

思赞生平最为出色是管理公产。民初本县殷富江氏自动乐助稻谷若干石，存储一处，命名义仓，于青黄不济时开仓贷放给贫苦农民济食，俟夏收登场后归仓，增收百分之五的实物利息，逐年夏至

后出货，秋后归回，贷者虽有利息负担，然前后稻谷的价格相差悬殊，较诸借钱柴谷或典物取值买粮，还是义仓借谷方便合算。思赞精心管理，逐年积累达千石。密溪、龙岩有某某两得知义仓储存自小而大，顿萌觊觎，诬思赞管理不公，要求清账取代，思赞自思劳而无功，本来不图有功，倒被猜疑，遂将历年账册一并移交明志，由该俩接管，并改设于龙岩某处。未及两年该仓全部稻谷均化为乌有，义仓之名与千石之粟同归于尽。究竟何故？小头出借未予收回，大头饱入私囊，谁贪污？不言而喻。

清港玉陞桥众有店屋几十间，均出租与经营商业者使用。该地自大桥东端起直至里街止两侧店屋除小部份是私人所有，余皆属桥众公产，对当地商业市面起有一定作用，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日由桥众出资招聘梨园演出。收入房屋租费供修理房屋外，还储备供修桥使用，1930年前曾大修一次，由海门（现椒江）技术经验兼优的技师承修，支费银圆三千条。思赞被公举管理该桥众公产，不负众望认真负责管理长达几十年。能博得群众信任，决非朝夕，须久经考验才能得乎众望。

《福佑社》是楚门城隍庙众公业的代名词。该庙产只有座落东街平房几间和庙前后的水稻田几亩。庙里的灯彩、銮驾、桌凳等诸实物可不少，庙众公物必须有人管理。思赞正心，治事能手称者，非其莫属，又被推为管理者。1932年秋该《福佑社》购置三星牌汽灯一批，专供城隍庙农历九月十四日会市（现称物资交流会）演戏照明使用。专物专用，任何机关或个人一律不予借用，恰巧在会市结束收拾灯彩的当天，有当地某家办婚事需要较多照明灯具，通过收据整理人员暗下借供多盏，次日送还，时有两只皮壳（即玻璃灯罩）略有破裂，被思赞得知，即对该经手人员批评，并令借灯人赔偿。事极微，值尤低，但思赞坚持公物不许出借的原则，令人倍增敬仰他的负责精神。

浙江省长张载阳及玉环县长谢迎绩、张玉麟均曾赠以“热心公

益”、“诗礼传家”、“邹鲁遗风”、“一脚善士”等匾额多块。

思赞生于1879年，歿于1937年，享年五十有八，子逝而慈母尚在。弥留之顷，仍喃喃自语：“儿不孝，未尽子职，母氏宽宥。”

思赞的一生，建树不多，贡献亦乏，但其正心、修身、齐家、治事的表现久炙人口，凡现年八十者，可能多少尚留有印象。



田岙寿老本遗照摄于1979年，时年90岁。

田岙拳师 “寿老本”

★ 章人才口述 戴搏节执笔

“寿老本”这个大名，在玉环大地上，尤其在港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其真名实姓除其族人外则鲜为人知；究其因他是武术名师，兼有医治外伤的高超技术，并有恤贫济困助人为乐的高尚医德，经他治疗的患者无不称颂他是民间的扶贫好医生，这“寿老本”的称谓是对他老人家的尊崇。久而久之连他的真实名讳就被人淡忘了。他的真名叫章仁兴，兹将其从师学艺，授徒行医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记述如下，以供后人学习这位不平凡的好拳师好名医怎样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无私奉献的精神。

章仁兴，家住本县楚门镇石角村。生于清光绪庚寅年（1889）二月，卒于己未年（1979）五月，享年90岁，民初（青年时代）从师瑞安金家山名拳师谢堂南学艺，因他勤奋苦练，很受谢师器重；但练武之道首在武德，更要有忍耐宽容之性，所以一般老师一时不会把技艺倾囊相授，因此在他学成回乡之时谢老师尚留有绝技未传，而谢老师总觉得仁兴本以人可教；为了要彻底观其行，察其性就亲临他家住上年余继续授艺；随时考核他的为人品德，并经常提出一些摸棱两可或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言词来刺激他，但仁兴都能够以做人的道德观点予以解答，令谢老师非常满意。最后才得到谢老师授于看家的绝招。这也就奠定仁兴数十年授徒行医中能有高超技艺的基础。

田岙是名闻温台的武术之乡，这与“寿老本”分不开的。每当

晨鸡初唱之时，总有一些苦练功夫的身影，农耕间歇的田间地头，更能见到授徒讲解或切磋技艺的情景。所以他毕生传授出数十名弟子中在田岙楚门一带都颇有名望，都能继承他的衣钵为一批批伤患者解除苦痛。他的武术造诣在温台大地上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如：1930年代楚门晒谷坦的名拳师对垒；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上的耍大刀表演；平阳瑞安等地庙会上的武术表演，尤其在瑞安他家四世同堂的表演，更博得业内人士的喝彩。因此使田岙争得了武术之乡的美誉。

“寿老本”的医术医德更是名噪一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旧中国民不聊生之时，百姓缺医少药而步入死亡之途的人难以数计；而遭伤残苦痛者绝大部份是劳苦大众，他总是以治病救人之心予以施救，最难能可贵的对一批病贫交迫的患者，非但予以治疗，赤贫者还资助生活费用。难怪在他的石角老宅的大厅上还高悬着1926年数十群众合献的“仁心济世”的大匾额，这金光熠熠的四个大字是“寿老本”数十年行医事迹的写照。

在旧社会同行克妒是相当普遍的，虽然“寿老本”艺高德美，人所共赞，而在另类人中总会觉得有碍其生财之道而加以抨击。“寿老本”行医中收费低廉，更有送医送药的义举，更影响了他们生财之道，见到“寿老本”家就医者门庭若市而自家门前冷落的反差，更迁怒于“寿老本”而不自省。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之事实令人发指！所好“寿老本”有容人之量不予计较，只在自身的武术医术上下功夫，并派出其子外出深造达三载之久，归来后本着章氏家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行事，才把这些歪风邪气压下去。解放后社会风气好转，同时“寿老本”年事已高，居家重在教育后辈子孙能继任家风为伤患之人排忧解难，直至90高龄才离人世。

2002年10月1日

和头厨师 陈仁进

● 张炳文

陈仁进，又名和头，后以和头厨馆独享盛名。楚门镇人，城市贫民，十四岁拜本地名厨池老司为师学习烹饪。池老司经营菜馆，主要业务还是应邀登门办理婚丧筵席。陈仁进聪明，灵活、机动善变，远胜众徒，故得师傅精心传授，从学数月深得师傅青睐。未待满师，烹饪之技，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尔后，池师傅年老体衰，城乡群众登门邀请办理筵席，都指派高正陈仁进前往掌勺，别的学徒为助手。陈仁进有一特长，对于筵席应需主副料的数量掌握准确，绝无浪费；而且对主家家庭情况，分档论次，丰俭适度，主家满意。“好厨师”之美称不胫而走，享誉漩港南北。池老司谢世后，遗下的业务都由仁进“继承”取代，一直红上六十个年头，也是红了一生岁月。

仁进的一生给人家办婚事喜酒、祖、父、子、孙连办四代的蛮有几家。从前普遍早婚，譬如十七岁结婚，过五十年后，他的孙子长大也可结婚了。笔者在1933年成室时是请陈仁进主厨，他自豪地介绍说：“大约35年前，你祖父娶南门叶氏时，我还是学徒，跟师傅办理酒席，18年前你父亲娶山里毛氏时是我主勺，今天为你办喜酒，远则再过20年后，肯定会给你儿子办酒，到那时，我才70岁。”同时，他还历述为楚门城乡经办过三代婚宴的不下数十家。可是以后我的子女婚嫁都在60年代，情况改变，用不着这位大厨师了。

从前，许多家庭办第一场婚事主妇大都年仅30多岁经验缺乏，繁琐事务一概不懂，甚至对伏马、走脚分发红包多少也心中无数。

陈仁进既是厨师又是“顾问”，主家遇上疑难，“顾问”逐一指导，妥善处理。尤其是丧家烹饪，俗例更属繁多，仁进无不一一指导。

往昔本县每年农历二月初十、二月十五、二月廿二、三月廿八、九月十四、花岩浦、清港、玉城、楚门等地分别举行庙会演戏6至10夜，邻县乐清、温岭及黄岩、温州的摊贩云集、销售小商品及农具。陈仁进按时前往各地设店供应菜食。消费者得知和头厨馆在此开店相互转告前往小酌者络绎不绝，其营业额总几倍于别的同行。

1943年间，密溪乡山里村毛氏昆仲为其两代先人的遗柩入土，典礼隆重，酒席逾百桌，分午晚两次，邀陈仁进主勺，他适于前两天已许诺他处，同一日期无法分身，毛氏只得改邀卢某主厨。卢某本是名厨师，经营菜馆多年，烹饪技术高明，花样善变，形式美观。但其擅长办三五席小规模酒宴，一次烹煮50席则非拿手。那天许多宾客觉得盘盘色味总感并不尽如人意。主家透露说：卢某搞得挺卖力，但是蛮紊乱、掌握欠准，不足与过剩俱有，浪费亦所难免。

陈仁进办大场酒出菜时，厨房高悬300支汽灯三两盏、三眼大灶同时举火，室内温度可想而知。他则卸却上衣，只挂一只肚兜，毕肖“葭萌关夜战马超”的张翼德。在操作最紧张时，他更是精神抖擞，喉咙响亮，音调悦耳，助手和端盘人员个人心怡色悦，干劲倍增。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冬季，当时国民党的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考察漩门港，下榻于南塘头谢宅，当地官绅设宴招待，亦由陈仁进掌勺，客人认为菜肴味美色雅，深感满意。酒席过半，提出要见见炊事师傅表示谢意。陈仁进应邀进前，身穿布衣，腰系围裙，敦厚朴实，虽年逾六十而矫健犹如壮岁。客人与他握手，对其烹饪技术大加赞扬。

陈仁进做菜的特点，大似他本人的性格，纯朴厚实。他做的菜肴色朴素，味纯厚，无轻浮不实之感。如果按目前强调色香的标准，

那么陈仁进一定被降级做第三、四等助手的角度了。

陈仁进制作“荸荠丸”“烧卖”的技术堪称一绝。笔者曾一次在旁看他做烧卖，做好80只不到20分钟，真快！每只的上口沿有不规则的花边略呈白色，既好看又好吃。

仁进晚年，虔信佛教，给人办理筵席避免杀生，利用素食替代鸡鸭，精工细作，深博主客赞赏。一段时间，社会崇尚素食，和头师傅又风靡一时。

解放后，社会改观，提倡节约，一度婚丧事宜，崇尚简朴，很少请客宴会，陈仁进无用武之地，改营炒货、糖果、石莲糊等小贩行业。1972年间无疾而终，享年89岁。子四，长子是集体商业成员，余皆人民教师，各有贡献。

人生事业或技艺得能成功并具有一定知名度，其功底与天赋是基础，忠诚老实，谦虚谨慎也是重要因素。陈仁进学徒时期，聪明机动，灵活善变，是他天赋的智慧；自立门庭后对主家精打细算，力避浪费乃真正的立业之本。斯人已逝，其行则堪为后人借鉴。

大聋点点滴滴

※ 陈隧雄

《玉环文史资料》第二辑刊出了朱仁巴同志所撰的《大聋先生事略》。我读了后，回忆起民国后期，大聋至楚门常在我家吃睡，与家父有一定交往。虽有五十年左右了，但大聋的有些所作所为至今我还忘不了。

一、衣衫褴褛

大聋一年到头衣衫褴褛，到了冬季还抖抖擞擞过日子。每当天气转凉，他即穿上“光棍棉袍”。里面穿着一件不象白不象灰的粗布衫，外面穿上一件褪了色的粗布黑棉袍，棉袍外再也没有单袍了。人们称这是“光棍棉袍”。

天气大冷了，他别无衣服可加，只是头上戴一顶旧纱帽；脖子上围一条布满洞眼的纱质围巾；两只裤脚口各系上一条布条；套一双手指露在外面的手套。这是过冬的“全副武装”。时间长了，围巾和衣襟上沾满一片片疙瘩汁，散发出一股臭气。有人称他“穷秀才”，也有人称他“烂落秀才”。（注：这里的“秀才”，是群众对有高度文化的人的称呼。）

二、无脚眼镜

大聋不但耳聋和口齿不清，眼也较早老花。他看书戴上一副老花眼镜。这副眼镜只有一只脚，另一只脚是用粗线一头系在镜架上，还有一头结一个圈套在耳朵上。后来他的眼镜另一只脚也不见了，也系上粗线圈。有一次我对他说：“你的眼镜也可换一副了。”但他说这副眼镜好，放在衣袋里方便，戴起牢固。却不说没钱另买一副。这副没脚眼镜不知伴随他多少年。

三、笔无竿

大聋在我家里，若有人请他写字画画，都是用我家的笔和墨。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一天，大聋来到我读书的学校——温岭县授智中学（即今温岭县新河中学）。那时楚门人在那里读书的较多，经我们宣传，就有老师和同学请他画画写字。我们为他磨好墨，他从长衫衣袋里摸出一只火柴盒，从盒里倒出一个毛笔头。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废弃了的笔头，那知他用三个手指撮着笔头，蘸来墨水，在宣纸上就挥洒起来。在场观看的人都很希奇：“用没有笔竿的笔也能写出这样龙飞凤舞的字！”他画画也用这没竿的笔，但比写字更奇。如他画竹时，当画到粗壮的竹竿，又从火柴盒里倒出第二个笔头，手撮两个并排的笔头，或竖或侧地往纸上画。这样画出的竹竿两侧墨色深中间浅，倒反加强了立体感。画岩石等粗条块也用两个笔头。画竹枝和竹叶，又用一个笔头了。他忽时用一个笔头，忽时用二个笔头，大家越看越入神。以后据他自己说，到外县去都带无笔竿的笔，携带方便。

四、幅幅不同

我只有十几岁的有一年，他到楚门卖春联。他在楚门颇有名气，男女老小都想买他的字和画，当然买的人多，围观的人也很多。他没有对联书，只要写好一幅后，有时边思索边揉揉冻僵了的手，接着又写出另一幅了；有时擦一擦鼻涕水后又写出一幅了。一幅一幅的整整写了半天，共写了一百多幅，幅幅内容都不同，围观者交口称赞，说他很有“肚才”。

五、“大聋”似少聋

我们和大聋谈话，好象他不是聋人，一般都能“听”懂你的话，较顺利的谈下去。如果有时发现他“听”不懂的样子，只要在他手掌上写一、二个或几个这句话开头的字，他就接着讲下去了，不需要你把整句话写完。我们时常怀疑他一定不是“大聋”，可能有些能听到的。有一次，一个邻居拿了一只铜面盆，偷偷地在他背后猛

击一下，他全不在乎。又敲了几下，他仍无动静，可见他真的“大聋”了。他与你谈话时都有一个窍门：他注视着你的口型的变化，及表情姿态和手势，就明白你说的内容了。有时如果你突变话题，他就困难了，要写几个字来启发。

六、“烂好人”

大聋能诗、善画、又擅长书法，理应发财了，起码也要过上温饱的生活。但他在民国期间，却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那时，大部分民不聊生，目不识丁，大聋的诗文书画也很少有人问津了。大聋也有一个脾气：对自己的字画不珍惜，对报酬毫不计较。只要有人备好纸墨叫他写字画画，若不遇上特别烦恼时，他都应允。不论叫他在什么地方动几笔。他也从不推辞。如眠床壁上、衣橱门上、木箱上、煤油箱上、纸扇上，甚至在蒲扇上写几个画几笔也有求必应。不论他写了多少或画了多少，不给钱也可以，只给他几个铜板或一碗面吃也可以。即使有几家富户特邀他去作书画，一般只是招待便饭吧了。所以有人赞他是“烂好人”。

有时大聋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得流到邻近的外县去。他在外地挣了一些钱，即高高兴兴地回来，逢人咿咿哑哑夸自己挣了钱。若遇上求乞的，他会大脚大手的施舍给人。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没吃的日子又轮到他自己了。

我是怎样投考黄埔军校的

陈青寿

（一）旧社会印象

1、童年家史：（一）沽酒无钱。我是一九一三年二月出生在玉环后垵贫苦农家。五岁慈母亡故，还有三岁妹妹全靠双目失明的祖母扶养，父亲除租种城里王晓卿家二亩塘田外，还兼晒盐，我小时曾跟父亲“扫灰边”，祖父是清朝监生，性刚不理家事。每晚我祖母给他准备必不可少的半斤多老酒。一天，因一时拮据，沽酒无钱，祖母命我父亲到一家姓魏的小店暂赊半斤，店主酒已打好，我父亲请他暂记一笔，另日送来，店主就把酒倒回，父亲拿着空酒壶回来，同祖母在灶房伤心流泪，我祖父从外面回来见此情景，追问何因？我父亲不得不直言相告，我祖父亦感伤心落泪，即自发誓，今后永不饮酒，从此积极帮助家里干活，还到山上开垦荒地，并说：“人面难求，土面好求”。（二）典当嫁妆冒霜推虾蚬。（1911）年我父亲的堂姐夫要来我家“拜头年”，按旧俗礼尚要办一桌酒席招待，还要“见面钱”和回礼，却之不恭，受之无力，家徒壁立，告贷无门，只好把我母亲的嫁妆（衣裳）拿去典当，当铺开在城里，东门玄 庙边，是於公远绅士开的。若走大路去当衣裳，熟人相遇，未免丢脸，于是绕道前山头下东岙里进东门到当铺，当的钱还感不足开支，又在大年初一的浓霜厚水的早晨落海“推虾蚬”卖了些钱才把新姐夫“拜头年”应酬过去。后来父亲常以此教育我。

2、盐关压榨：（一）后垵大众在后垵南面海涂上围垦一条晒盐塘我父亲也晒盐。盐关设在盐场头（盐灶前）盐关一个主任姓金，

黄岩人，几个盐警一个山东人，名秦中兴，一个姓张本县三合潭人。盐民晒的盐全部送盐关，盐价低得盐民无法生活。若谁卖私盐被截住，盐没收还罚款，大部分盐民和我父亲都罚过款。盐民食用盐，只准放在卤杓内带回几斤，家里不准存盐，如被查到，没收加罚款。盐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二）黑眼和锄砸老张。一九一六年正月初八，盐警老张在盐场头杜寿保家“赌牌九”与黑眼和争吵起来，老张回去拿来一把尖刀要杀害黑眼和，黑眼和逃跑，老张紧追，逃到汪先福茅蓬前正巧一把锄头在那里，黑眼和情急就随手拿起锄头，当老张逼近，他用锄头向老张腰部横砸一下，老张就被打倒。那时没有医院可送，地方人用迷信“谢伤神”。当夜老张一命呜呼。命案发生，报官验尸，凶手黑眼和畏罪潜逃披山，他的兄弟王蒙庆也逃至深浦被捕入狱。盐关诬为“盐民暴动”追究主使者。经全体盐民申诉辩驳。此案是老张“赌牌九”持刀行凶，瞎眼和被迫自卫失手伤人。凶犯在逃，无词可质。盐民对死者善后葬恤自当助资。受牵累的，仅黑眼和兄弟王蒙庆坐了几牢。官司无形中不了了之。（三）翻盐坦改水田。盐民受盐关的管束和压榨太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盐民自动起来要翻掉盐坦，绝不再晒盐，许多盐民自己带头把盐坦掘得七零八落，坚决表示不晒盐。当时县知事多次传讯盐民，要盐民把盐坦、修复继续晒盐。他们申辩盐塘是自己围垦起来，盐关没有对盐民做过一件好事，对待盐民如奴隶，表示坚决不晒盐。把盐坦翻掉。以后，盐关也撤销了。翻掉的盐坦，后来改种水稻，即今“新发塘”。

3、地头蛇、青帮头一丘之貉。我父亲从盐坦翻后，转向海涂养蛭，做起收购泥螺香螺乌蚶生意。祖父戒酒后积极帮助家里干活，我也会讨小海捉涂货，从而家里手头稍宽，并买了一亩田。我八岁父亲续弦，九岁祖父病故。一九二七年春，父亲去车首台黄沙滩做代客买卖鱼柴生意，向郑阿来家租来在沙滩头北沙脚单门出入的茅蓬二间，后因我后母亦来黄沙滩住，就在门口放出一间。

我父亲是道地农民，不懂当时社会规矩，“未吃地头水，先拜地头主（鬼）”的奥秘，因而惹怒了地头主（鬼）李庆连、李康甫等，来我家找麻烦，说我父亲侵占公地，擅自盖房，限期全部拆除归公。我父亲只得好言相求，不允。我后母主张打官司，我感有财有势便可欺人的世道，受屈辱不如去拼个死活。一个住在黄沙滩开小店的程顺登，小水埠人（他也是受欺凌的人）暗对我父亲说：“投靠青帮或可得到帮助”。我父亲即去城里拜在青帮头子陈英瑞门下。固然不几天陈英瑞王保寿坐轿来我家，邀集有关人士商议，要我家办一桌酒席请客，送“金花红烛”向他们赔礼道歉，还要放鞭炮使当地人知道这事。每年交纳十元租金，还有每月的保卫团捐和学堂捐。我家接受照办才算息事，当时社会、豪绅官吏，一丘之貉。

4、上海滩见闻：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我家在后垵养蛭，十六岁起每年春间都到上海卖鲜蛭，都是搭花岩浦靠埠的“瑞平”轮或坎门靠埠的“利泰”轮船。上海果然是繁华世界。在繁繁的中国国土上，有外国租界，洋人在那里横行霸道。其中贫富贵贱的生活有天渊之别，富的高楼大厦花天酒地，“朱门酒肉臭”。贫的露宿街头，沿街乞讨，“路有冻死骨”。年轻姑娘深夜拉客，绝非她们本意，是由生活压迫受骗堕入青楼，谁愿沾污清白，辱没祖先。腐朽的社会难辞其咎。所谓上“天堂”下“地狱”，在上海滩就能看到“天堂”“地狱”。上海兆丰公园牌告“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英国销售我国“高亭”（“高亭”与“狗听”谐音）留声机唱片，画着一头狗在喇叭下昂首听唱（那时留声机上装有喇叭）。外国佬欺人太甚，真是岂有此理。恨洋人横行，愤社会不公。

（二）求学不遂

一九一七年春后垵办起“岭东初级小学”校舍借用后垵庙，王保寿任校长兼教师，入学儿童不多，我仅五岁也去凑数，第二年由城里潘俊士来接任。一九二〇年秋后垵庙作教室的两廊被台风打倒

而停课。我跟几个同学到王秀才济川先生家读《大学》、《中庸》，后来又到大坑王家祠堂跟徐子黎先生读《幼学琼林》，我想到城里环山小学读书，父亲不许。一次礁头人赵碎魁对我父亲说：“给儿子读书到中学毕业，用的钱，可买十亩田，家有十亩好田比一个中学生好。”我求学是无望了，只好在家自学。

（三）壮丁训练

1、读书未遂，蹉跎岁月。一九三五年春玉环办壮丁训练队，我花蛟乡乡长王勋臣要选送二名壮丁，番长李哲风伯要我去，我正因读书无望，当兵有志，慨然答应，训练队队长潘继勋，对壮丁的管教，除了拿“纪律”当尚方宝剑压人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分队长姓王，是县长卢云深东阳老乡，一个姓刘是义乌人，一个是县督察长的公子陈芳，永嘉人。县长卢云深对壮丁上课讲“好儿要当兵”，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董运铎对我们讲《鸦片战争》训练不严，星期日回家，课余可上街，准许吃私菜。

2、壮丁有一定伙食费，老是吃腌菜，从未改善生活，也不公布伙食帐目，大家对此有意见，商量要我代表全队，向潘队长要求公布伙食帐，目的想今后蔬菜好些，我一天上午收操回来，到潘队长房里请他公布一下伙食帐，他不作声，我就回来，快到午饭时，他吹哨集合全队在院内。指名要我站出来，说壮丁向队长算帐这还有什么纪律，部队里只有绝对服从，谁故违犯就要受罚。他又把“纪律”“服从”尚方宝剑拿来吓人，大家同我一样不敢作声，由他训斥够了，说一声“以后不得再犯”收场。我认为，自己没错，也不埋怨谁。

（四）应征当兵

1、壮丁训练队近结束时，玉环要征送五名壮丁到杭州。训练队里已决定我和坎门胡孟卿陈连福，山脚下王克美，还有一个不在壮丁队城里人黄伯奇，由防芳分队长带我们赴杭，一九三五年四月底一天下午动身到坎门，陈连福开小差。第二天搭“利泰”小轮到

温州，翌晨搭汽车经清江渡时因涨大水折返温州，第二天搭“永川”轮船经海门转乘汽车开杭州，当晚抵杭住南星桥旅社，翌日陈芳送我们到杭州海潮寺接收部队报到，经体格检查我与黄伯奇合格接收，余二人不合格随陈芳回家。

2、海潮寺殿宇深幽，院落宽大，一晚深夜大家在沉睡中突然惊醒起来大喊大叫，好象临阵冲杀一样，连排长闻声进来，只听一声宏亮的“立正”口令大家就肃立不动，随即安静下来。为何突然大喊大叫，大家都是莫名其妙，翌日连长告诉我们说这是“发营风”只要有人大声喊“立正”口令，就会安静下来。

3、在海潮寺新兵人数征齐后，即开往南京。六月底一天傍晚，全营官兵在杭州城站上火车，翌晨经上海当晚到南京下关，随即下车列队行军进城，开到训练设备齐全的小营营房，略事整理后，即举行新兵入伍典礼，并往中山陵园谒陵，开始正式训练，要求极严，每天从早上四点半起床除午休二小时外直到晚上九时就寝都很紧张，尤其每天不同术科，要改换几次不同服装和星期日内务检查，最感麻烦，器械操要求更严，跌坏碰伤是常事。每星期上三次英文课，读的是《模范读本》。不放假也不准请假。

4、在南京新兵训练结束后即整装开赴四川，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全营官兵到下关码头登轮逆江而上，经汉口换船，续开重庆，抵渝后，稍事休息，即作旅次行军，经浮备、关璧山、隆昌、内江、简阳等县进成都东门到西校场，与团部、第三营、装甲车排、军乐队、通讯排，住在一起，第二营驻成都北门外凤凰山，守卫飞机场。新兵训练时，我们都是二等兵，月饷八元，到成都后都升一等兵月饷十元。特务团全体官兵全是浙江人，团长是少将，营长是中校，连长是少校。服装有黄呢军服、呢大衣、中统皮鞋，还发棉军服球衣纱衫。穿着优于其他兵种。

5、委员长蒋介石，我们是称他先生。我们到成都不久，他就来检阅，我们为先生来检阅忙了几天，那天一早全团官兵全副武

装列队等候，当他车临大门外时，军乐队奏三番迎接，全体官兵肃立，他下车后团长向他敬礼，报告全团应到检阅官兵人数和实到人数，随即开始阅兵，他经过各连时频频举手答礼。阅兵式毕，他登上检阅台，即开始分列式，各连以连纵队向检阅台前行进，将通过检阅台时即“向右看”“正步走”，通过检阅台后改换齐步行进，每连通过他面前时他都举手回礼。如此一连接一连向检阅台通过。分列式毕，训话，他首先表扬全团官兵体格强健，精神饱满步伐整齐，并说特务团入川使命，要求严守纪律，加强训练。训话毕团长陪他在营房里巡视一周，然后登车回去。军乐队亦奏三番欢送。全团官兵受犒赏士兵每人三元。

6、玉环人在特务团除我与黄伯奇外还有去年（1934年）征来的楚门陈世友黄善培坎门陈成春周奇璋，我们共六人。万里他乡遇故知，格外亲热，并摄影留念。我同黄伯奇编在重机关枪连，我是射击手。

7、机关枪连有几个浦江人班长吴鹏飞丁惠斋，对班里弟兄极苛刻，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有人被他们打伤，黄伯奇也几次遭打暗对我流泪，被打的原因是集合迟到或操练动作过慢或做错了，班长这样横行，连长也不教育。有几人暗里商量，联名控告，我同班一个青田人夏秉忱写了一张控告状，连我在内有廿人签名，要我把控告状送给营长。我真不知天高地厚，不加思索，在午休时间跑到营部，营长竺培基奉化人，是蒋介石的亲戚，他问我“啥事？”我把控告状恭敬地给他，就回来。证料控告状原件转回连部，当晚连长就全连集合在课堂内按控告状签名的人逐个点名出列，并即宣布：“越级上告，严重违犯军纪，按陆军惩罚条例，为首陈鹤鸣（陈青寿）重责二十大板，其余各责十大板”，执刑的是一个班长，我两手掌被打得发紫发肿，好几天手指不能屈伸，其余各人各打十板后连长还说：“为首本该关禁闭，姑念平时尚好，二十板算了。顺便再提一下，一次我因做公共勤务，不能按时上操，值星官丁兆华排

长（浦江人），不声不响打我一记耳光，我深受委屈，恨军队野蛮专制，毫无情理，世界上事太不公正了！”

8、从委员长检阅后，团部开始办起旨在保送中央军校的“补习班”。由励志社主持，各连选送几人去补习，连我在内共二十八人，每天上午收操后与晚饭后上两次课，印发讲义，着重数理化英文。我既有志从军应该争取考中央军校，古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读书，该尽可能效法。一次夏季午休时间，我到菜园地边读《开明读本》第二册，不知道团长石祖德（诸暨人）从我背后过来。把我的书拿去，问我“为什么不午睡”，我说“要考中央军校”。他又问我姓名年龄籍贯，把书还我就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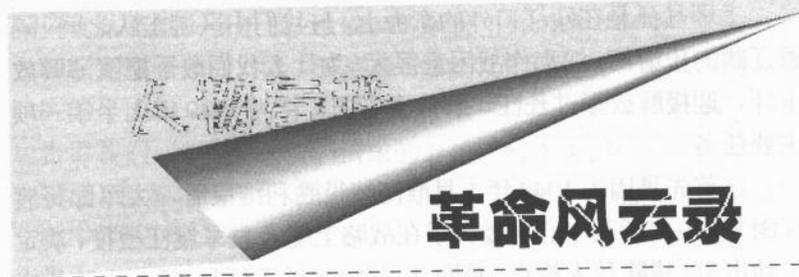
9、到成都后三个月都升上等兵月饷十二元，再过三个月我升下士月饷十四元。一九三七年元旦过后，连里十二个下士中，要考一名中士副班长。我自信很有把握，其他参加考试的人也认为笃定是我，结果宣布是我同班的林鸿春，丽水人，升中士副班长，我很不服气，闷在心里感到惭愧，但我对操课不误外，补习益发努力。大约过一个月后，潘焕生排长要我到他房里谈话说：“团里今年准备保送你考中央军校十四期，中士班长该让给别人”。经他指明，我的忧虑打消了，专心补习。

（五）保送中央军校

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补习班举行结训考试，考试及格的考卷，就当作考中央军校十四期初试录取卷，考试结果二十八人共录取连我在内二十人，七月一日由团部中校军需主任容宇送我们去南京（初试及格）报到。行前团长亲自点名并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我们从成都搭汽车到重庆，转乘民生公司轮船到汉口，在汉口候船二日，搭招商局轮船到南京下关，抵京后，住在大光路特务团留守处，一切报考手续统由容宇主任办理，并即领到复试证。凡初试录取的考生，发给复试证。凭复试证，招生委员会供给膳宿。正将开始复试，卢沟桥事件爆发，敌机侵入南京轰炸，学校

当局即决定迁往武汉，初试录取考生凭复试证到下关码头登轮开汉江，抵汉口后暂住新桥口营房，旋迁武昌左旗营房，并即举行复试，我们二十人中录取连我在内十八人。复试共录取一千三百三十三人。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入学报到，十月十日举行开学典礼，开始入伍生训练。

步入军校，在人生道路上开始我新的征途。



解放玉环纪实

★ 周丕振

编者按：

解放玉环，是玉环历史上的一件头等大事，过去虽有记载，不是内容简单，就是记述不全，缺少全面详尽的记载，原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周丕振同志，亲自率部解放了玉环，为纪念玉环解放五十周年，他亲撰了《渡海解放玉环，迎接大军过江》一文，全面而周详的论述了解放玉环整个战斗的全过程，起到了补史之缺、修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为后人提供了既准确又全面的范本。特录之以飨邑人。（周丕振同志已于2002年9月1日病故，本刊深表哀痛。）

1949年4月6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跨海作战，夜渡乐清湾，一举攻克玉环县城，活捉县长毛止熙，继而解放了除洞头岛（当时属玉环县）外的玉环全境。从此，玉环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长江以南的广袤土地，都还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象玉环这样渡海作战，全境得到解放，在长江以南是少有的。

玉环县孤悬在瓯江口外的东海上,与我们山区游击队之间,隔着辽阔的乐清湾,渡海作战困难很大。为什么我们敢于把渡海解放玉环,迎接解放军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作为1949年上半年一项主要任务。

这首先是因为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大军即将渡江南下。中共括苍中心县委为了在战略上配合大军渡江战役,决定主动出击,拔除敌人据点,将瓯江以北(包括玉环县)括苍山脉的广大游击区连成一片,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其次是抗日战争后期,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清剿”时,郑梅欣曾率领海上大队,在乐清湾诸岛屿,在玉环党组织的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下,创建了比较巩固的海上游击根据地,部队活动范围已逐渐向玉环扩展,成为我们到这个地区作战的可靠依托。第三,玉环县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他们不但在农村普遍建立党支部,而且在城镇、学校也发展一定数量的党的组织,同时还将党的力量打入敌人内部,有效地掌握敌人内部情况。自1948年下半年起,玉环区委曾多次获得敌人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第四,敌军军事力量也发生了新变化,已成我强敌弱之势。加之三月份,我括苍支队接连打了许多胜仗,解放了乐清虹桥、大荆两大镇,横扫温岭的大溪、琛山、潘郎的守敌和地主武装,解放了瓯北重镇枫林,士气很高,求战心切。我部队中,玉环籍指战员不少,大多是战斗骨干,在本地作战,人地皆熟,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再说玉环县是一个孤悬的海岛,敌人接应困难。于是,我们就作了渡海解放玉环作战部署。

可是4月3日,部队从枫林移到永乐黄边的中堡村时,浙南地委突然来了电报,令括苍支队部组建一个大队,随带武器上调地委。这时如果抽调走了一个大队,渡海解放玉环的部署,暂时就难以实现了。经过郑重考虑,支队即发电报请示地委,并告知在地委参加会议的括苍中心县委书记、支队政委邱清华,要求地委批准上

调部队宽缓一个星期,以便实现解放玉环的战斗计划。渡海作战仍按原定部署未变。第二天清晨,部队从中堡出发,到达乐清白溪地区的环山村。这时,郑梅欣已带着第三中队等候在环山村了。当他告诉我们,地委同意我们请求的复电已经下来时,大家的情绪更为高涨。接着我们便把来自永乐山区,不习惯于航海的战士,调集到海岸埠头,作上船下船和海上作战的演习,为这次战斗做必要的准备。

4月6日上午,支队部在环山村召开战前军事会议。政治处主任郑梅欣、玉环区委书记丁世祥和挺进大队及直属各中队的干部参加。开会不久,玉环港南分区委书记盛世樵带着向导陈伊言、陈宏钱、许高登、李升高等也到了。我们再一次核对了敌人的布防情况。令人高兴的是,玉环地下党同志将敌人4月上半月的军事口令也全给搞来了,这更使我们部队袭击敌人成功的把握大大地增加了。

经查明,玉环县城守敌,有县自卫第二中队,还有警察局一个分队及小股刑警队和警卫队,共200来人。县长毛止熙用部分兵力守卫县政府大门,他的警卫队即是保镖别动队,守在自己卧室旁边;另派1个分队驻在县府近处的城隍庙。城外的雷公庙、教场岭头、东门和西青岭头等地,都驻有1个分队或1个班。北门山头的那个碉堡,安着1挺重机枪,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县城。县城的两翼,东南20华里的坎门镇,驻着1个自卫中队,东北30华里的楚门镇,驻着1个自卫中队和盐警大队两个中队。

4月6日下午4时,部队按支队部的原作战计划行动,登船出发。白溪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给部队以有力的支援。全地区23个村支部带领民兵、农联会、妇联会和儿童队等成员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支前队伍。在很短时间里,他们调集了30多只木帆船,船上配备的都是热情拥护革命的老水手、几名党员和民兵。同时,派出民兵,分头向虹桥和大荆两个方向作警戒,防止走漏消息。临行前,妇联会的姐妹,抬来一箩箩、一筐筐的饼团、麦饼和鸡蛋,热情地

往战士的怀里、袋里塞，这对战士们是很大的鼓舞。部队分坐的31只木帆船，是从白溪的宅前埠、石件头和陡门头3处扬帆出发的。木帆船队列整齐，威严壮观，乘风破浪，全速前进。当船队行到毛埕岛附近，因时间还早，为避免过早被敌人发觉，停下休息，捱至天黑。夜10时许，船队到达玉环岛西滩村，正值落潮，船队在埠头外的海涂上搁浅。战士们毫不犹豫地脱鞋卷裤，涉涂登陆。部队上岸后在附近小水沟里洗脚穿鞋，即刻继续行军。登陆点附近的小塘村，有地下党的交通站，地下党员叶世桃等同志主动热情接应，将我部队带至分路处，并发动群众慰问船工和船上民兵。过小塘，部队按原定计划，分西、中、东3路，由向导和玉环籍同志引路，按各自的行军线路进发。

中路部队到了东青岭北面的岭脚，切断县城通往楚门镇的电话线后，稍事休息。在东青岭的路廊里，我和郑梅欣、丁世祥同志再一次研究了这次战斗的打法。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战斗的重点是突破县府活捉毛止熙。这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一解决，其它守敌就不难解决。据此，我们临时调整了部署。取消了原来解决坎门守敌的决定，改派第四中队作为支队的预备队，只向坎门警戒，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同时，支队部加强对仇心光、潘田波两支突击队的指挥，主攻县府大院，前后夹击，以实现我们的指导思想：击其首脑，乱其部署，活捉敌县长，解放玉环全境。

按照部署，由支队部直接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五中队各一部和两个突击队，集中一起行动。到达东青岭头，我们坐在石阶上，等待月亮下山。然后派盛世樵引路，带四中副中队长张永南等5人走下山岭，解决天灯下的敌哨兵。他们走不多远，就听到那边哨兵喊：“哪一个？”盛世樵沉着答：“刑警队！”对方又喊：“口令！”盛世樵接着答：“筹备！回令？”却不见对方的回答。张永南早已一阵风似地冲到哨兵的面前，用木壳枪顶住了他的胸膛。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我当兵才7天，回令也忘掉了。”

摸掉天灯下岗哨之后，部队就疾速地冲向县政府，发起猛烈的攻击。顿时，“哒哒哒”“轰轰轰”的枪炮声大作，在全城上空震荡。第一中队中队长仇心光 and 第一分队分队长陈贤本带领的一中突击队，由文工队长邱昭宏带路，冲到县政府的西后门。门还紧紧地关着。突击队扛来一把大石杵，捣开了门，先是一排手榴弹，继而用机枪狠狠扫射。那毛止熙的保镖队，多数是土匪出身，凶狠强悍，这时也经不起挨打。突击队急忙冲向毛止熙卧室，却不见毛止熙踪迹，他的小老婆趴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潘田波指挥的第五中队突击队，也已进入县政府内，向敌人营房射击，一阵猛烈的机枪和几颗手榴弹过去，敌人四处乱窜。这时前后两支突击队在县政府大院会合了，我们部队继续向前搜索，走到前面右侧平房宿舍，只见从县政府前门和后门退下来的敌兵，都已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有站的，有坐的，也有斜靠着，神色慌张。其中一个俘虏穿着一套旧军装，把帽子压向前额，低垂着脑袋不肯抬起头来。担任向导的邱昭宏走来，一把掀掉那俘虏的帽子，禁不住大喊起来：“毛止熙，毛止熙捉住了！”这时，郑梅欣、丁世祥和我都已到了旁边，把毛止熙唤回他原来的办公室谈话。县府内的战斗，已全面结束。三中潘巨妹部在围攻县府附近的城隍庙驻敌。陈贤本等率队支援，城隍庙守敌也很快被歼灭。

由挺进大队教导员万文达率领的第二中队、第九中队，在静悄悄地登上西青岭头后，兵分两路。

一路由二中政指叶崇森率领1个加强分队，九中中队长金寿松、政指应圣源率领1个加强分队，绕过西青岭脚大树下的哨兵，进入了埋伏地点，等待总攻命令，分别攻歼雷公庙守敌和天后宫警察局，攻打县政府的枪声一响，叶崇森部即直插雷公庙，打了一阵，不见有人，冲进庙内一看，见一分队的敌兵，都战战兢兢地躲在泥菩萨的下面；应圣源部插入与雷公庙只有百米之距的天后宫敌警察局。敌警察部长，企图开枪顽抗，我部战士扔进几颗手榴弹，一阵

冲锋，他们抵挡不住，也就投降了。

另一路，由九中第一分队长蒋康星率一班人，绕道到教场岭头，他们包围了馒头山的碉堡，扫了一阵机枪，即喊话劝降，不一会，守敌竖起了白旗向我投降。

五中政指吴圣朴率领的五中另一部，从冷水潭上山，插向东门城下，埋伏在附近草籽地里。当中路部队枪响后，即兵分二路，一路向东城楼岗亭发起攻击，入城后继而攻下火神庙和自卫第二中队队部；另一路包围东门破城额碉堡。守在碉堡内的那些士兵，听到毛止熙已被活捉，自知大势已去，个个弃枪投降。

天已蒙蒙发亮，第三中队中队长阮禾秀和政指李杰华率领的三中一部，仍在围攻北门山头的大碉堡。守敌非常顽固，凭借地形优势，不肯投降，重机枪不绝地吐着火舌。毛止熙写了手令，派士兵去劝降，也被机枪封锁，未能进去，三中战士怒火中烧。老班长胡传林举枪对准重机枪枪眼射击，终于一颗子弹把重机枪给打哑了。战士们乘势冲锋，堡内敌人才被迫撑出白旗投降。

4月7日早晨7时，玉环城内战斗全部胜利结束，我们当即进一步考虑如何解决坎门和楚门两处的守敌。

坎门守敌自卫中队长张永榜是毛止熙的亲信。于是我们派玉环籍同志颜志才、邓逊复、刘子升3人，带着俘虏和毛止熙的亲笔招降手令至坎门镇，促张永榜投诚。张永榜先有犹豫，后经统战人士林式民先生向他说明形势，晓以利害以后，他才于下午率领全体官兵，倒背枪支，撑着白旗，来到县城缴枪投诚。

楚门方面，当县城战斗一结束，我们即派俞金江、张永南率四中第一分队奔袭。当日下午，他们在楚门大山头与先期抵达楚门负责警戒任务的三中郑维通、金康等分队以及玉环区委谢劳等同志会合，接应整个部队过渡漩门港。8日早上，支队部和所属部队从三眼陡门向楚门发起攻击。驻守楚门的玉环自卫第一中队长王小歪，一听到风声，已在7日晚率队向温岭县境逃走了。四中队长黄乐平

带部队到楚门外塘盐警大队驻地，不料该队竟向我部射击，经我们喊话后，他们才打开一家地主大台门投诚缴械。吴坚朴带队到另一处盐警驻地，室内空无一人，他派战士把盐警大队长的私人财物保护起来。盐警大队长的老婆回来，见自己房内的私人财物完整无缺，很受感动，劝夫投诚。盐警大队长也即来投降了，还主动把投入河内的大捆武器捞起，缴交部队。

至此，渡海解放玉环县的战斗全面胜利结束，计俘敌县长以下官兵4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汤姆冲锋枪1支，长短枪310多支，手榴弹230多枚，子弹12000多发，电台3部，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当晚，支队文工队在楚门镇演戏庆祝。4月10日，部队返回乐清根据地。一面进行总结评比，一面从各中队抽调12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潘田波任大队长，阮禾秀为教导员，由郑梅欣带领开赴地委。

渡海解放玉环县的战斗，全部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实现。一支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县城，解放玉环全境，这一胜利是鼓舞人心的。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特地为此传令嘉奖。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玉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难创业，今天的玉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面对着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拥



挤的车辆，富裕了的乡亲，连我这个50年前的老兵，也认不出它的旧貌，恍若置身于一个完全崭新的城市，祝愿玉环人民迈出更大的步伐，跨入更加繁荣昌盛的新世纪！



毛止熙被俘被释经过

☆ 盛世樵

1949年4月7日，我人民解放军括苍游击支队一举解放了玉环，活捉了毛止熙，现将被俘被释经过记述于下。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首先在县府打响，并迅速俘虏了县长毛止熙。但此时，还有一些据点尚在剧烈战斗中。距县府东侧几十米的城隍庙，敌人在顽抗，我们几位战士爬上庙的屋顶架起机关枪向伏在戏台两侧的敌人猛力扫射，这时支队部派俘虏兵送去了毛止熙投降手令，这股顽军终于在我强大火力和政治压力下缴枪投降。

我军吴兴朴部，配合进攻县府攻入东门，城楼上哨亭里的哨兵回了几枪后即逃走，一部分敌兵在东门火神庙亦乱放一阵挑枪逃向城内，驻在救济院的敌中队部丢弃了一部分武器也向城内逃去。唯有东门碉堡里的敌人顽固地向我还击。后来押来毛止熙向他们喊话，这部分敌人听到“命令”，也就投降了。

这时候天还未亮，全城所有据点先后被我吃掉，唯有北门山头碉堡守敌一个班尚在顽抗，凭藉着全县仅有的一挺重机枪疯狂扫我军的阵地，我军在阮禾秀、李杰华的领导下继续进攻并保存了进攻力量。当时，周支队长、郑梅欣、丁世祥三位领导同志正在继续审问毛止熙，我正站在旁边听审，只见周支队长命令毛止熙，要他“下令”叫山上的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又见毛止熙应声：好的、好的。即提笔写了一张命令北门山头碉堡里的敌人投降的手令。派一名俘虏兵去劝降，也被机枪封锁，未能进堡，当时这名士兵从山上回来报告，说自己到了碉堡附近喊叫：“毛县长有令，要你们投降”，“他们听见了，但说要毛县长亲自去下令”。在招降过程中，敌人居

高临下，从山头向县府射来几梭子枪弹，表示继续顽抗，并向我军阵地上继续疯狂地扫射。在阵地上的我军十分愤怒，老班长胡传林举起步枪乘天朦朦亮对准重机枪眼打去，终于一颗子弹打进了重机枪枪口，重机枪再也吐不出子弹，我军乘势发动冲锋，敌人被迫举白旗投降。

凌晨六时，全城解放后，支队部领导认真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估计驻坎门敌第三自卫中队的动向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海上逃走，二是率部投诚。遂再令毛止熙“命令”部下投诚，毛止熙并不犹豫，再次执笔写了“命令”，“命令”写在名片背面：

命令

着该中队全部枪械缴交周司令 此令

张永榜中队长

毛止熙 (盖章)

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

整个招降投诚的实际过程是：毛止熙派了两个亲信随同我军派人前去招降。我军指定坎门籍的同志执行任务，他们是：玉环区武工组组长颜志才和刘子升、邓逊复等三位同志，不带枪支步行二十华里至坎门，为了探听张永榜此时的态度，颜志才先要俘虏兵送“命令”送进渔会大院交给张永榜，颜志才先在数百米距离的地方观察动静，只见士兵举枪实弹走出营房，一部分进入许家山头碉堡，一部分在渔会大院外警戒。为了防止有逃走之变异，顺利解决投诚问题，颜志才迅即通过地下党统战对象，坎门著名士绅林式民先生，请他邀请动员张永榜投诚。在林先生的劝导和分析形势并针对张永榜的思想指出“逃到海上也不是个办法，迟早会被消灭的”、

“只有投诚，才有出路”、“按毛县长命令办”等劝导。张永榜这才下定决心，率领部队进城缴械投诚。

我军根据毛止熙在这次战斗被俘虏后的表现和我军俘虏政策，遂于五月份，释放了毛止熙。

追记 1950年 11.20 玉环县城歼敌记

□ 陈展

(一)

1950年6月25日,美军侵犯北朝鲜,在北朝鲜政权临危和我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抗击美帝的侵略。

当时的联合国,在美帝操纵下,反诬我国的伟大壮举为侵略行为,借以制造国际舆论混淆视听。

其时败退到台湾岛的蒋家王朝,不甘心失败,以为时机已到,随纠集其残存在大陆沿海岛屿的兵力,经常向我沿海乡镇袭扰,妄图毁我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而实现其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

我玉环岛县,地处浙江东南,是温台门户,地域重要,距县城40海里的披山岛,驻有蒋记嫡系胡宗南残部(其重兵驻扎大陈岛)吕谓祥的国民党杂牌军。显然,胡宗南把披山作为进攻温台的桥头堡,而吕谓祥却把袭取玉环县城作为主攻点。因此,他在披山开了一片政治商店,美其名“玉环县政府”,顽县长丁毓秀,顽副县长林金狗。他们收罗了一批从玉环、温岭各地逃亡下去的地主、恶霸、流氓麇集一起,经常对我县乡村城镇进行骚扰。吕谓祥自以为在1950年3月,袭击了楚门,抢去了物资;6月,袭击坎门镇;7月,又骚扰洞头岛讨得便宜,洋洋自得,遂把贼眼盯在玉环县城,于是派遣多批暗探,窃取我军事情报;并派舰艇在海面游弋,察探我兵力部署,蠢蠢欲动。

当时我县的兵力部署。因海岸线长,而且兵力有限,难以处处设防;同时坎门、楚门两大集镇都临海,敌军随处可以登陆。为此,我县领导机关的决定:一定要保住两大重镇,才能固守县城。遂采

取三条措施:(1)向驻黄岩的21军求援;(2)加强对沿海敌情的侦察;(3)加强两镇及海岸要道的防守,定要歼敌于外围。

按此设防计划,21军61师183团二营驻栈头、楚门等要地,由副营长陈洪亮率领的该营五连及一个炮排驻坎门镇,我县大队由大队长彭家法及副政委俞金江率领第三中队(中队长林一心)及一中一个分队,协同二十一军二营重点防守坎门;第一中队由中队长吴应良率领二个分队驻守桐林乡水桶岙,以备阻击灵门、石坞进犯之敌;第二中队由中队长庄法周率两个分队驻守上朝阳,待歼从鲜迭登陆之敌;该中队的副中队长林诗宝率第二分队两个班驻守县城,并派半班驻北门山头碉堡,余驻西门外雷公庙,县公安队由队长鲍启高率领驻县公安局。

(二)

敌首吕谓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探明了我方的军情。他钻了我布防的漏洞,尤其发现县城兵力的薄弱,正合其意,即纠集残军乘机偷袭。

11月19日(即农历十月初十日)夜,吕谓祥率千余兵卒,用三艘军舰、十多艘快艇、上百只渔船向玉环进犯。半夜,分别在芦浦的分水山、鲜迭的螺丝礁和连屿的新门港登陆。他们占领深浦岭头以阻击楚门解放军的增援;从螺丝礁上来的敌兵数百人向朝阳高山攻击,在与我二中队接触后甩开我军抢占了坎门后山,以牵制我坎门兵力;其主力从连屿登陆的三百余人直插县城,妄毁我新生人民政权;他在海面并以军舰助威,封锁瓯江口,以狙击温州增援部队,又用于佯攻与接应。

敌在连屿登陆的三百多人,是由敌大队长施克林亲率的。他登陆时发誓在拂晓前夺下玉环县城,为反攻大陆“立大功”。施原是环山镇打石仓人,解放前横行乡里,玉环解放时他畏罪抛下妻女逃到披山,此时他巴不得早到县夺与妻女团聚。

从连屿到县城只有三十华里，若走直径虽山路难行，约三小时可到，不到天明，定能围住县城。可是施克林在火车口村抓来一青年农民陈生阳带路，生阳看到这班凶神般的黑衣部队，心里猜定是敌军。他在威逼之下只得听其调遣，但他暗中盘算，不走吃水窟，过十八弯。改绕五洞桥，上龙潭坑，爬三合潭背，向猫狸播山头进发。此条路线山高岭峻、路窄坑多、道弯脚滑，异常难走，他们在山上转来转去，跌跌撞撞，待到猫狸播山头天已经大亮。

家住枫树坑山头的共产党员许高登，他早起开门一看，只见对面山上成排成排的敌兵来势汹汹，知道情况不好，他顾不得个人安危，急抄小路跑到二中队报告，此时敌兵已向县城开枪。于是副中队长林诗宝一面派战士向县委丁世祥书记报告，一面率领战士抢占县府后山北门山头制高点。

这天(11月20日)早晨，县级机关干部刚吃了早饭，二中战士喘着气向丁书记报告：“发现大批敌兵从猫狸播山头向县城进攻”其时丁书记即令县府干部快带文件印章向北门山头撤出。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立即做好撤退准备，接着就带领部份干部跟在公安队战士后面随丁书记一同上北门山头。我们到北门山头已经7点多钟，其时敌人另一路从西青岭方向斜插过来，枪炮向北门山头发射，战斗越来越烈，不一会，碉堡被敌炮击坍，战士冲出碉堡，在战壕里坚持战斗，终于击退敌人两次进攻。

在这紧要关头，丁书记立即派出干部去沙罉及城南乡政府，电告楚门、坎门驻军增援，又派人去青马要玉城区中队参战，又指挥机关干部向瑶岙山头转移，并命我们带短枪的人断后，另召林诗宝、泮志光具体布置战斗任务。

我们到瑶岙山头已8点多钟，北门山头正在激战，这时城关、坎门、古城等地不时传来枪炮声。

坚持在北山山头的二中队战士战斗艰苦，一面对付西青岭方向进攻之敌，又对付从西门城脚上来之敌，到10时左右，我战士有

伤亡。此时，坎门前来增援一个班，由一中队陈永源分队长带领从东岙里上山配合作战。北门山头的战斗，持续时间较长，多次击退敌人的冲锋。后来丁书记根据战况，先后写了两道手令交孙昌送给林诗宝，要他们鼓励士气，坚守北门山头阵地，等待援军；如弹药将尽撤退到峦岩山头，向县委机关靠拢。

峦岩山头地势险要，山高崖悬。西崖脚是龟山村，东崖脚为犁头嘴村，北崖脚沙岙村，南岭与瑶岙山之间有马鞍形险谷，仅有小路可通。下午时分县机关干部都退到峦岩山头，约在1时，农民为我们烧蕃茹充饥。后传来北门山头已被敌兵占领，我们部队也撤退到峦岩山南岭山岗防守。

两时左右，深浦岭头方向有枪声，公安局长郑云卿派鲍启高带战士向北面警戒。3时左右，我们只见沙湾大樟树岭门有大批敌兵西逃，机关有长枪的同志即向其射击，敌人见有阻击，即匍匐行进，向青马普竹方向逃窜。这批敌人是从深浦岭头溃退下来的。

深浦岭和谢家山头的敌兵溃逃，原是被楚门驻军渡港攻打败退。那天驻楚门搞土改试点的中共温州地委书记邱清华和我县副县长黄乐平，他得到县城被敌兵占领的消息，心急如火燎，与县城及温州通电无结果，即去向驻军求援。解放军二营龙教导员要他们先了解敌情。上午10时，得到民兵回报：深浦渡口已被敌人封锁。此时龙教导员同地方政府领导会商后，即命令二营四连及机炮连一个排紧急出发，先在大斗门港出兵，但到港面即被守在深浦岭敌兵的火力阻压，后改从没水塘小港开船，船到箬笠礁，潮水已退，船无法靠岸，在这情况下，解放军战士不顾一切，个个下涂涉水，鞋袜均陷泥，上岸后光着脚板奔跑。到大塘岩岙口，在谢家山头的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凶猛，我军有伤亡，但解放军英勇善战，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用炮弹对准敌机枪阵地轰击，终于把机枪手击毙，敌阵地顿时混乱，狼狈溃逃。

解放军追到后湾街，因战士赤足追敌，影响战斗力，只好作短

暂休整。下午4时左右，在峦岩山头的丁书记接到沙鳙乡干部的报告，说龙教导员和黄副县长请他去龟山会商进城歼敌。丁书记下山前曾告诉我们：在县城枪声远去时，机关干部可绕东岙里回城。丁书记走后不久，北门山头的敌兵已被我二中队打退。机关干部大都从东岙里回城，我同部份同志从北门山头回城。此时已近傍晚，见有县大队战士在执勤警戒，有的在安抚伤员，他们告诉我：占据北门山头的敌兵在西逃时，被从九子岙上来的解放军截击，敌兵慌张地从城墙脚滚下山去。

北门山头夺回后，县大队同公安队大部份战士跟踪追击。公安队长鲍启高追到城西洞桥头外，不幸中弹牺牲。解放军追到城西，对敌猛攻，施克林部急向三合潭、鲜迭方向逃命，在南山脚和西门外躺着七、八具敌尸，有个肚肠外流躺在地上的敌兵在大喊救命。

我回到机关，办公室已被敌兵捣得一塌糊涂，宿舍的衣被都抢走。其实，施克林带领的三百多人除留数十人占据高地外，一路占领了东门城头，又一路向北门山头进击，后被我军击退回城。施克林亲自带领一批敌兵砸开监狱放走犯人，一面在城内抢劫食物和布匹，他又溜到洞桥头自己的布店同老婆相聚。当解放军追到城里，他才率敌兵逃窜。

驻守在坎门镇的21军二营副营长陈洪亮，19日带一个排驾机帆船送团参谋长去石塘视察回来，经栈头查看六连驻防情况。20日一早便驶返坎门，刚到冲担屿海面，即遭到在鸡山洋面敌艇前来阻击，对战了数阵，才到达西台上埠。登上西台山，又遇上敌兵阻截，经过激战，冲垮敌人的阻挠，中午才回到营房。上午，解放军已同县大队三连与占领龙虎山的敌兵激战多时，可是久持不下。在对敌作战时，坎门军民表现英勇，少年林森火壮烈牺牲。此时陈洪亮副营长回到营部后，果断地作出战斗部署，组织战斗力量，集中溜弹炮向山上敌阵地轰击，掩护主力部队从后山突袭夺取制高点，一攻成功，敌阵地终于被摧，敌兵向里岙、鲜迭遁逃，我军乘胜追歼。

我军追击中，在坎门民兵的密切配合下，沿途击毙和俘获敌兵无数。里黄南山村陈香珠老大娘施巧计与敌周旋，终使民兵俘敌兵三人，缴获机枪步枪数支。

楚门、坎门解放军追到古城头会合，五连战士一直追到鲜迭，部份敌兵被俘，大部逃入停在海面的舰艇。

(三)

21日晚上，我军和民兵把坎门、里岙、玉城等地俘虏来的一百多敌兵押解到县城，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当晚，从黄岩来了一位21军首长，会同我县党、政、军领导，共商处决上岛骚扰的九名敌军官，其中包括一名所谓“玉环县政府军事科长”。23日，在环山广场进行公审，审后即解至南山脚下枪决，大快人心！

后来，21军首长在楚门召开此次参战的军事干部会议，会中赞扬了玉环军民同心协力、英勇歼敌的革命精神，还表彰了一批战斗英模，其中包括我县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林诗宝荣立二等功。

楚门闹米荒始末

★ 周行

1946年，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楚门地主和粮商，屯粮居奇，广大贫民拿钱买不到大米、地瓜丝，人心异常恐慌。当时，浙东青年救国会楚门工作委员会，经过几次商讨，最后决定沿街“拖油箱”开展反饥饿斗争。

会议上作出了三条要求：这三条要求是：

1、确定发起反饥饿斗争，成事靠大家，要求大家敢于斗争，坚持斗争，有理有节，一直斗到逼使地主启仓、粮商开门平糶粮食为止，决不见危而退，决不见利变心。

2、开展拖油箱游行示威，高呼口号，以示对屯粮居奇的地主、粮商的愤怒与抗议。然而，我们是拿钱买粮，不是抢粮，不白拿地主、粮商一粒米、商铺一点物；不得伤害任何人。

3、听从统一指挥，按照统一部署行动，不能各行其是。只有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才能最后取胜。

宣布后，群情十分激动，有的认为逼使地主，粮商平糶粮食在望而兴高采烈；有的义愤填膺地喊出了“严办屯粮居奇的地主、奸商”的口号。

随之，召集了会员会议，作了分工活动的布置。

就在当日组织起“拖油箱”反饥饿的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有老年人、青壮年人，还有儿童参加，拖着十来只油箱，往返于楚门十字街、南塘头、南门、北门、小竹岗等大街小巷，乒乒乓乓的油箱声中，响亮地喊出“地主、粮商必须立即开仓平糶粮食”！“要求政府立即查封地主、粮商屯积居奇的粮食！”“打

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真是干柴遇烈火，一触即起，经历三天时间，反饥饿斗争的队伍，从五十多人开始迅速发展到近三千人，波及清港镇、外塘乡、商店罢市，学校罢课，惊动了楚门镇、清港镇、外塘乡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走私商，也惊动了县长姚莲生，率领两个分队从县城来到楚门，并调遣驻扎在楚门镇海寺伪自卫队（中队长张铁生）立即出动，三兵一岗，持枪严待，分布在十字街、南塘头等处的各个路口和路中心，并派出两个武装班，荷枪实弹，分别来回于大街小巷流动监视，意图施加暴力，拘禁周仁驹，驱散反饥饿斗争的游行群众，压平事态。

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楚门的浙东青年救国会，连夜召集会议，分析了主客观情况，慎重地几经研讨，以抓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一主要环节，充分调动和发挥近三千群众这一强大队伍的优势，及群情正处于高涨的时机，终于大胆地、策略地作出新的斗争任务要求和力量调整的部署。要求当晚分头布置就绪，第二天八时半前分四路同时展开斗争。

一路：持续“拖油箱”游行示威。确定集散处在西山后和南门头城脚下的空地上，以四百人组成三个中队游行示威队伍。在几条主要街道上交叉往返循环地拖油箱，高呼反饥饿斗争口号。油箱增加十几只，口号喊得更响亮有力，显示反饥饿斗争的群众力量在不断壮大。在游行示威中，要求三个中队紧密联络，互相接应，不得分散。游行队伍走到伪自卫队的岗哨和流动班哨士兵的前面，就叫喊“当兵的兄弟们，我们都是穷苦人！”“你家买到了粮食吗？”争取当兵人，把游行示威进行下去。

二路：示威。请愿兼施，拦住伪县长姚莲生于渡口。确定集散地在南塘头以南的大路上，以五、六百人组成五个中队。排列在从楚门的南塘头到渡口的一里多路的道路上；又以二、三百人组成二人中队，密密层层地站在渡头停靠埠的一块空地间，并在二、三百

人中挑出白发苍苍的老公公、老奶奶和赤贫少年儿童二十来人排列在最前头，将已写好的一份要求伪政府立即责令屯粮居奇的地主、粮商开仓平粜粮食的“呈子”拿在一位年过七旬、手携小孙子的老奶奶手里。

姚莲生所率领的“官员”和“卫队”乘渡船从对岸快靠近渡头埠头时，群众们摇动小红旗，齐声高呼口号，声震山谷，激动人心。当姚莲生一登上岸来，列队在前面的二十来位老人和少年儿童立即包围过去，那位老奶奶有理有节地用双手把“呈子”递交给他，要他立即展阅表态。姚莲生展阅“呈子”时，虽力装镇定，但紧张的神色毕露。在他点头示意说了“我这番来，就是为解决粮食平粜事来的”话后，群众退出路来，让他们朝楚门方向走去。

姚莲生从玉环县出发是坐着大轿来的，前拥后护，威风凛凛。在登上渡头埠后，也倒有几分“自知之明”，交待勤务兵，把轿子打发掉，夹在随员和土后中行走着。

从渡头到南塘头一路上排列着五、六百示威群众，走在姚莲生一伙“官员”和“卫队”的前前后后还有撤离渡头返回集散地的二、三百群众，这近千示威群众彼伏此起地高呼着“要把反饥饿斗争斗到底”……等口号，展示了群众的声势与威力，贫民、农民有力量，伪县长及其跟随的“官员”、“卫队”们的威风，在两千多只人民大众眼睛的怒视下消失了，匆促地走向楚门。当他们脚步一跨进楚门——南塘头城门时，“迎接”他们的不是“三兵一岗”的伪兵们，而又是拖油箱高呼口号，这里一、二百、那里一、二百人的反饥饿斗争的群众队伍。姚莲生有点呆了，默默而若有所思地走入了楚门镇公所的门卡。

三路：大震声威。直指地主家，逼使地主拿出粮食平粜。确定集散地小南门晒谷场，以五百多人之众，其中有相当人数是赤贫的老人和少年儿童，组成二队，各队为二百五十来人，浩浩

荡荡行进，分别进入谢毓珊、徐惠南、赵季磊、耿寅谷、耿舜钦、“三官堂四”、“大缸片”……等地主老爷的家。每到达一户地主家门前或跨进大门时，就雷鸣似地高呼口号，大震声威，并由已指定的各队三个带头人出面与地主交涉，要求地主老爷跟群众见面表态。如遇有回避见面或含糊其态的，群众就振臂高呼，日夜坚持不离去。

这些地主老爷们在“众怒难犯”这一情况下，均表示愿意开仓拿出三十担、四十担、五十担谷子平粜。唯有恶霸地主谢毓珊认为伪县长姚莲生是他儿子的同学，有恃无恐，竟面对群众出言不逊，说出了“荒年抢饭吃，熟年难见人”辱伤群众的话，莫大地激怒了数百群众。立即引起数人高喊，众人接应：“把谢毓珊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下子够使他惊慌失措了，脸色苍白，唇齿在颤动，混身在发抖。已在数百群众包围圈中，想溜也溜不了。最后，战战兢兢地张口说了：“我……我认错了，愿……愿开仓拿出五十担谷子平粜。”

四路：拦阻粮食出运，强行起岸平粜。在黄昏时刻，有居民数人前来报信，说有二艘大帆船泊靠在陡门头王威冒（外塘乡乡长）家门口，装上了粮食候潮出运，并说有一个班（十几人）的自卫队士兵守卫着。经核实后，立即行动：就先组织大于自卫队士兵四倍的体壮力强的群众五十多人，由三个浙东青年救国会会员带领前往陡门头，日夜轮番巡视监督，不让粮船出港，并迅捷准备增援力量以应变。待明天上午各路全面出动后，凭借浩大声势，采取果敢行动。

第二天一早，确定集散地在楚门小学操场上，再以二百来人组成二队，在上述三路出发同时，带着运粮工具直奔陡门头，面对一姓余的带班分队长质问，要他为老百姓饥饿想一想，立即把船上大米（麻袋装）赶上岸来，平粜给等米下锅的饥饿居民。这姓余的说：“这是温州专署要的大米，我等是受派遣来此看守

的。”

“胡说八道，温州专署用得着到这里来搞这么点大米吗？明明是你们包庇走私！”怒吼之声，慑住了这十几个士兵，姓余的分队长看群情急怒，人众势猛，被迫张嘴了，向船老大和船员说：“把船上粮食全部起上岸来。”经过清点核对，在反饥饿斗争群众中组成了十几个运粮小队，用竹杠、扁担、小板车……等工具，把约有一百多袋大米运进楚门关庙镇公所，请镇长和有关人员一起点收，用于平粜，姓余的分队长拿着一张大米数量收条和十几名士兵夹着枪枝没精打采地走了。

反饥饿斗争坚持了四天后的次日上午九时许，镇长李植人来到周仁驹家，找上周说：“姚县长要跟你会晤，在镇公所相候，你意如何？”周事前已有思想准备，略加思考后说：“好嘛，下午二时半到。”

“李镇长，你是一镇之长，楚门镇贫民买不到米和茹丝，有些已饿了二、三天了，你的责任不轻呢！”周仁驹接着对李说了几句。

“我责无旁贷，要出大力，也要把家中谷子拿出来平粜。”镇长李植人表了态点点头走了。

镇长走后，周仁驹即通知在楚门的浙东青年救国会会员二十来人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与会人员经反复讨论，分析了三种可能：

1、对周仁驹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停止反饥饿斗争活动，否则予以拘禁，转用武力驱散游行示威群众；

2、被逼于反饥饿斗争的群众队伍越来越大。火焰越来越高，不好压服，有可能表态责令地主开仓，粮店开门平粜粮食；

3、通过既兵也礼的手段，试探周的言态如何，而后酌情取舍。会议最后定下：以针对第一种“可能”作出了对策：

确定周守林、颜钦尧、徐雪涵三人在家坐镇，统一策划调度，情况如发生剧变，立即转移地点，持续斗争下去。

指定由潘升监、颜化通、郑显元、苏杏生、周行、张小松等立

即分别前往各个点领出二路近千群众集中在原集散地。到二时半，周仁驹走进镇公所时，即分开二条路线走向镇公所大门外，形成一种半圆形包围之势，高喊口号。如一小时后，周尚未出来，说明已遭受拘禁，那再把一、三两路群众队伍全部调动过来，把镇公所团团围起来，紧缩包围圈，互相接应，高呼口号。自卫队士兵真敢于鸣枪驱散，那只好破门越墙，一拥而入。进去任务是抓住三个人：姚莲生、李植人、谢毓珊，营救周仁驹。他们放了周，我们就放了他们三人。

指定黄昌芳、孙早仁、孙早正、卢宝水、苏福顺等十多名会员做通讯联络工作。

二时半到了，周仁驹只身前往镇公所。镇公所门前站立两个班持枪的自卫队士兵。周仁驹走进镇公所大门，走进会议室时，姚莲生正中坐着，两边站着两个手拿驳壳枪的卫兵，虎视眈眈，两边坐着他的几个随员和李植人、谢振泰、耿舜钦、赵季磊、谢毓珊、耿寅谷、徐惠南等十多人，姚莲生见周仁驹进去后，持礼兵兼施的态度对周说：“你是周先生，久闻大名，请坐！”

“县长叫李镇长要我来跟你会晤，有何见教，请直言。”周说，“你煽动无知民众闹什么米荒，搞得全镇罢市、罢课，居民不得安宁，政府是不允许的。”姚莲生以威胁之言，双眼盯住周说。

“用不着我来煽动。民以食为天，在座的各位一天没饭吃行吗？地主屯粮居奇，奸商聚粮走私，几千户民众买不到口粮，困于饥饿。被逼上‘梁山’。我家无隔宿之粮。也是被逼上‘梁山’中的一个。”

“你是为首者，那就得请你来负责收场。”

“收场不难，可非我之力所能及，责任不在我。你有权力收场，责任是在作为‘父母官’的你身上。”

这时，镇公所门外的“要求政府立即责令地主启仓，粮商开门平粜粮食！”、“严惩屯粮居奇的地主、奸商！”、“打倒土豪劣

绅！”……等口号声有节奏地怒吼着。

“我来收场，你说得倒轻松！”姚莲生似乎很生气，又似乎在装腔作势。

“只要你下道手令，责令地主，粮商立即启仓平价卖粮，事态不就平息了吗？这，在你来说，又有何难？不然，确也难望收场呢！”

“收场不了，要唯你是问的。”姚莲生在咄咄逼人。

“把反饥饿斗争进行到底！”等等口号又彼伏此起彼伏地响彻着镇公所周围。

“收场不了，你要唯我是问。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周接着又说：“饿死不如打死，你不下令平价卖粮，千万饥民的反饥饿斗争，我看是收场不了的。”

陪坐在那里的十几个楚门的知名人士和土豪劣绅，可能是心里有点紧张，或各怀鬼胎，不想当面“得罪”周仁驹，没有一个张口讲话。在会场沉默的片刻间，周仁驹同志站了起来说：“姚县长，我告辞了。”姚莲生和其他所有人没有吭声。周仁驹走出镇公所会议室，走出镇公所大门，投身到群众队伍中去。在群众队伍中又雷鸣似地响起了反饥饿斗争的口号，气昂昂地朝向几条大街游行示威过去，回到集散地。

随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一、二两路群众队伍，继续坚持拖油箱游行示威和直指地主家找地主说理斗争的活动。

镇公所派人给周仁驹送来一个口头通知：“姚县长面谕：以李镇长为主，有群众代表、有守法粮商和镇公所人员参加组成一个平糶委员会，负责进行有关平糶粮食事宜。明天开始在关庙平糶。请你们选派群众代表三至五人参加。”楚门浙东青年救国会经商议，派出潘升监、郑显元、颜化通、苏杏生等四人参加。粮食平糶工作了半个月后转入正常，由粮店出售。

这场经历七个昼夜群策群力的反饥饿斗争，声势浩大，秩序

井然，不畏强暴，不避艰险，斗有节，争有理，心一条，行一致，终于逼使姚莲生下了手令，逼使地主启仓、粮商开门平价出售粮食而告成。万众欢呼声遍及楚、清两镇，给人们留下了深远的记忆。

本文作者省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离休)

记 解放战争时期亲历的 学生民主运动几个片段

▲ 陈继源

青年学生最纯洁，也是热爱正义追求真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青年学生同全国人民一样，盼望着一个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出现。可是事与愿违，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动派倒行逆施，进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血腥镇压，挑动内战，加上物价暴涨，使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一线光明变黑暗，理想成幻想。怎么办，人人在思考、探索。历史的发展，正义是动力，真理是灯塔。代表正义与真理的中国共产党，引导着广大青年学生，向反动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开辟了解放战争在国统区内的第二条战线，直至革命战争的胜利。

海岛明灯

我的家乡在玉环县坎门镇，濒临东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就有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他们大多是小学教师，通过各种渠道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还在读小学，经常听老师讲时事，反对日本侵华，汉奸卖国，还讲过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此外，经常组织晨呼队，唱抗日歌曲，喊抗日口号，演抗日小话剧，出墙报反对汉奸卖国贼，现在回想起来，还非常激动人心。在解放战争时期，利用寒暑假，办补习班，组织一些社会科学读书会，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进步书刊，如“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还有土改、整风文献等。有些进步书刊还藏在关帝庙戏台下的空棺材内。还对照进步思想的要求，开生活检讨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给家乡的大多数青少年学生打下了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在解放战争中，家乡的学生到温州各中学读书，绝大多数表现很进步，很多都成了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如温中的陈道生、李一芳、庄成祥、庄奇炎，永中的张兰生、周邦光、瓯中的郭昌裕、李雍容、建中的陈必祥、庄世英等等。我在瓯中、平中、永中都读过书，也积极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后面要写到的永中学运的“红星核心领导小组的最初的三个成员，殷奕同（鲜送人）张兰生和我（都是玉环人）。”

现在回忆少年、青年时代，家乡的党组织，正如海岛明灯，照耀着我们前进的航向。

游击区是明朗的天

“六二”学运后，我利用暑假，经家乡地下党支部介绍，到括苍游击区参加第一期青训班学习，这期青训班有四十多人，女的十多人，编为一个独立班，男的有三个班。学员大部来自玉环县，还有乐清、永加、温岭、黄岩等县。当时从坎门出来的有：叶见颖、陈必祥、姜恩华（当时叫姜秀英）、苏静雯、吴爵华、陈一金（参加武工队）和我共七人。约在七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们分头出发，我和恩华到乌沙头由加寿接送，大家在西潭东北海岸堤寮集中下船，在船上碰到玉环县地下党负责人丁世祥、林建勋两同志，他俩是我小学同学，曾知他们早期参加革命，常使我敬仰想念。这次碰到非常高兴。

青训班设在乐清泽基附近的一个高山坑地上，附近有一条溪流坑，没有居民，群众和游击队同志在此搭了五间颇大的茅竹房，即是我们的营地。青训班的学习活动有：政治课、军训、时事讨论、

群众工作、放哨，每人还写一份自传。晚饭前后在自辟的操场上打球、唱革命歌曲。还有常听电台同志传播当天收到的解放战争进展的消息。青训班开始是与乐清中心县委总部合在一起的，后来有分有合。我八月十九日日记记着：“今晚开欢送整风班结束游艺会”。整风班是与总部在一起的，也说明在此以前，青训班与总部也是在一起的。八月廿日日记又记着：“今晨第一节是上军训课，操练正浓，一声口令，大家把东西整装集合”，三分钟后，一百多人集中在操场上，周团长（丕振）带笑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准备转移，敌人来了，离我们很近”。我们离开宿营地不久，即听到敌人的枪声，接着又听侦察的同志讲，敌人拉了一批老百姓上山（有群众在我们不会开枪）并数了营房内有三、四百枚竹钉，以为游击队有三、四百人枪。敌人害怕了，立即烧掉营房逃回白区。从此，青训班与总部时分时合，并在各山村之间流动，边学习边做群众工作。

为了解放事业，使我们集中在一起的小知识青年，在短时间就建立了珍贵的革命友谊，新老、上下、左右关系非常融洽，新尊老、老爱青，思想非常纯洁，没有官气、暮气和私利。那种充满朝气活力、探索真理的气氛，是革命青年理想的新天地。有几件事，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我们坎门同行们快到目的地时，在蓝天下山顶岭头上，钱启敏同志与好几个同志高声拍掌欢迎，使大家觉得很温暖。在青训班第一次听到叫我们“同志”，觉得又陌生又亲切，深受鼓舞。青训班的文化生活总是充满歌声、笑声和球声。在晚饭后，叶龄银同志常找我散步谈心，值得一提，现在碰到，还喜欢谈论社会科学和政治。一次行军中，周丕振同志向我讲，他也是联中学生（即永中前身）还讲了上饶集中营的故事。我们驻地被敌人破坏后就经常流动，白天行军烈日晒，夜间行军常摔跤，又常遇雷雨袭击。晚上睡破庙，宿山洞。吃得也非常艰苦，大家精神焕发，用“苦”来锻炼革命意志。大家思想都

较纯洁，当时参加革命，没有什么人会想到以后要享乐当官。大家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种一心为人民的动机和目的，在今天新的环境下，应重新树立发扬光大。

我参加青训班是家乡地下党支部事先安排好的，利用暑假参加学习，开学后即回校开展学运和地下工作。因此，在八月下旬后，我即随武工队向朴头方向转移，八月廿六日日记写着：“离别终于向我招手了，别神降临在依依不舍的情绪间。”“全体要各自向目的地出发了。我和宋同志（郑梅欣、大队长）罗同志（中队长）等十人出发。”我和邱同志（邱清华，化名何明，中心县委书记）警卫队等亲热握别，尤其是邱同志的手重握着，笑着脸说“祝你回去发财”。这是对我回白区开展革命工作的希望，给我无限鼓舞。我八月廿六日与青训班分开，途经五亩田，荆竹山头、野鸡田、白溪、朴头、朴床。最后回到坎门是八月卅一日的深夜，也是一个皎洁的月夜。在游击区青训班历时一个半月，这是愉快、艰苦、进步，一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的难忘的时光。

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共产党的游击区，这是两个天地，前者充满黑暗和恐怖，后者洋溢光明和自由。光明必战胜黑暗，这是历史必然性。

红星小组与建党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学后，我回到永中读书，带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开学初，我和殷奕同、张兰生商议，建立了领导永中学运的三人核心小组，不久，又增加了朱棣、吴震尧共五人，定名为红星核心小组。开始，有城区地下党负责人冯增荣同志来联系领导，约十月份后，改由陈雄同志接替。红星小组，实际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温州地委有

结论),它在永中打开了学运的新局面。当时我和殷奕同住在县后巷民宅,张兰生住在蝉街亲戚家三楼,因周围少干扰,很多活动都在张处进行。红星小组成员先后都入了党。在一九四八年上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春日,在五马街一条巷内我的住处(同住的还有张兰生、张岩标、谢作均是党员)建立了支部,不久又改选了一次,均由陈雄同志来主持。此后,还有同班女同学朱彩霞、朱佩佩、沈灼灼参加了红星小组。她们主要负责开展女生的工作。可以说,从四七年下学期至四八年上学期,是永中学运的高潮。四八年下学期以后,因多种原因,支部处于分解活动,有的互相间没有接触,分头与陈雄同志联系。我也独负一面开展工作,直至四九年初重返游击区。

两年来的主要成就

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永中学运的活动和成果,都是在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取得的。从一个学校的角度看,值得一提的有如下成就:

(一)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在学校中,谁掌握学生自治会,谁就有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主动权。当时国民党、三青团在学生中已是很臭,不是进步同学的对手。而托派尚有不少影响,因此,焦点是与托派的斗争。

关于托派的问题,从现在看,应该分清是非的,可以分清是非的是理论问题。当时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存在根本分歧。托派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一步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条针锋相对的理论路线,是争取学生区分是非的关键,谁同意那种观点,谁就是那一派。真理在我方,我们通过出墙报,组织读书会等多种方式,

争取到同学的大多数。有些认识模糊的同学,经过学习,也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

得到广大同学的支持、拥护,学生自治会的竞选就对我们非常有利,从一九四七年到解放时,每届学治会的领导权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从历届的代表会主席和常务理事的名单看,就可以说明。

一九四七年上一学期代表会主席沈大同,常务理事张兰生,下一学期,代表会主席周镇中,常务理事朱棧、张子言。

一九四八年上一学期,代表会主席陈仁杰,常务理事黄公略,下一学期,代表会主席洪作宏,常务理事朱棧、周邦光。

一九四九年上一学期,代表会主席金茂圻,常务理事李声涛、严文钦。

此外,学治会的学术部及各种研究会、剧团、乐团等基本上都掌握在进步同学手里。

我们掌握了学治会,就能以合法的方式,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组织进步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

(二)成功地发动一次反顽固的学潮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永中发生了一次反对顽固校长、训导主任的学潮。导火线是学校当局对毕业班几个同学因军训不及格不准毕业。加上平时独断专行,压制学运,开除学生。广大学生愤怒了,罢课罢考发生了,到处是标语、壁报和控诉。六月九日,永中护校运动委员会发表了一封致永中学生家长的信,揭发“叶校长压制学运,排斥教师,去年一年就开除学生七、八十人”,大胆提出撤换校长的要求。原来打算斗争矛头是先指向陈训导主任,因他采取两面派和特务的手段压制学运。但学潮一开始,校长跳出来首当其冲。在迫使校长下台后,黄公略同学在墙报上写了一篇檄文,声讨训导主任的罪行。这时,很多学生反映已感疲惫,托派利用学潮拖长时间来暴露党员和进步同学。党支部研

究，学潮目的基本达到，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适可而止。打倒校长后，学潮就告一段落。这次学潮，斗争坚决，团结力量大，既保护了进步同学，又取得了胜利，秩序井然，没有发生打人和捣毁公物事件。教师反映：没有见过纪律这样良好的学潮。在学潮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陈雄同志和永嘉县委的指导和支

（三）发展、团结、教育进步同学的几种方式

我们活动的方式是将公开的和秘密的相结合，合法的与非法的相结合。公开的、合法的主要是通过学治会的各种活动作为桥梁，与同学增进友谊。如开展乐团、剧团、各种研究会、学术讲座，出校刊、壁报等形式。秘密的和半秘密的，主要是组织各种类型的读书会，传阅秘密的资料，讨论共产主义思想。

永中导报：这是学治会的刊物。一九四八年两个学期各出了三期，共出六期。四月十六日是创刊号，十二月十三日是休刊号。每期都有八、九个版面，篇幅是比较大的。上半年那学期，我是学治会学术部长兼导报社社长，后一学期转入搞编辑。导报每一期稿件都要经训导主任的检查、压制，都要经过尖锐的斗争才得刊出。如五月一日的第二期有一篇“于子三图书馆记”（于是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四七年十月廿九日被国民党杀害，引起全省、全国的抗暴运动。）就被强制删去，我就在导报上用大字标出“训导主任充当检查老爷”给予揭露。休刊也是被迫的，在休刊号上就登出“时局紧”、“失踪多”、“战局图折”等揭示国民党统治临近灭亡和解放战争进展的内容。从现在看，永中导报内容是比较健康、进步。我手头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导报和一部份稿底。

墙报：当时全校高、初中各班级都有级刊。我所在的班级就有数种墙报。级刊有“铁马”，另外还有部分进步同学搞的“世纪新兵”，还有每个同学写一篇文章汇编成册的“同窗之友”。此外，我和周姬昌、滕耀均三人出了二期“东山光”（意“东方红”），

第二期还有照片，有的标题还看的很清楚，如“一切决定于人民”、“成功属于团结”、“论物件”等，主要是揭露黑暗，向往光明。

读书会：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读书会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在永中，除少数是属托派组织以外，大多数是进步同学和党的外围组织。进步的读书会，主要是由红星核心小组成员与有关班级的进步同学联络，并由进步同学带动一般同学组织起来。从我的日记中看，我参加过同班的由黄公略、张传鏊、沙震东、蔡洪松、林显荣、周兆元等同学组成的读书会，与赵乐鼎、泮秀千等同学经常接触深谈，以后他们都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我还参加过低年級的由张桂生、叶庆云、郑纪堂、董明等同学组成的读书会。读书会一般传阅可公开发行的进步报刊，文艺、政治、理论等书籍，给大家启发很大。印象难忘的是“大众哲学”。更深的一层是传阅从游击区送出来的小册子，浙南周报，毛泽东同志著作等。“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使很多同学倾向共产党，走向革命的道路。

此外，我们还鼓励同学去订阅免费的进步刊物。如向苏联大使馆索要“新闻类编”。为混淆视线，也向美国大使馆索要资料。前者被视为珍宝，后者被当作草纸使用。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一部份“新闻类编”。关于订阅“新闻类编”问题，还有一个训导主任搞鬼把戏的插曲。开始，“新闻类编”都是邮寄至传达室，同学自动去取，后来训导主任出了个鬼点子，叫都送到训导处。因订阅时有的同学用真名，也有不少同学有顾虑用化名。训导主任为了控制就宣布一条，要取刊物的都要告知真名。我当时是用真名的，训导主任对我讲“那些用化名的是共产党，你用真名不是”。实际相反，我当时已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了。

我们通过这些宣传、组织活动，争取、壮大、团结了大多数同学，而原来进步的，因社会关系等原因而脱离了进步队伍的也有

之，这是很个别的。

在此值得一书的是，我所在的班级，在永中成了学运的中坚力量和基地。红星核心小组八名成员，我班就有六名。全班同学非常团结、进步，这是很突出的。如从47年上半年这学期看，我班同学还有四十多人，到49年解放前（毕业班）只剩下十多人了。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了。这在学运中是少见的。

最后还要讲一件事，四八年是钱启敏同志被捕关在温州，陈道生、王增荣、张兰生和我都做了大量营救和保护工作。

迎接解放

一九四八年底，陈雄同志写信征求我意见，要我到游击区去工作。当时我引用一进步杂志一文的一句话：“不是投机者应马上行动起来”以此话作了回答。并于春节后约一九四九年的二月份离家，在瓯海中学操场上，随一位地下交通员到永加县委机关。记得是在一个傍晚，陈雄同志在屯桥黄牛山的山岭上迎接我。当时在一起活动的还有厉春芳同志。此外，我又被派回做地下交通、联络工作，来往于游击区与城区之间，一直至四月底温州解放前夕。记得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开展学运和建党工作

我到游击区后，在城区的学运中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关于建立各校学生自治会的一个计划方案，在城区一个进步同学家里丢失，他家长辈是国民党城防司令部的成员，怕计划落到敌人之手，对我们开展学运有危险。因此，我又重新回城区，与温中、永中、瓯中、建中、高商、工校等学校地下党员或先进同学联系，改变原来计划，在学生自治会的选举中，进步同学不再出面，把中间靠近我们的进步同学推到学治会的各个负责岗位上，这是我第一次赴城的任务。此后就经常往返。实践结果，我们的意图大部实现。这为

温州学生迎接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九年初前后，各校很多党员到游击区去了，有的学校没有党组织的活动，急待重建。我又帮助建立了永中和瓯中两个党支部。在永中，留下党员有刘晔和朱菲菲二人。在三月五日，我带洪作宏一起到黄牛山，有陈雄、春芳、作宏和我四人一起商议永中学治会问题和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会问题，并由陈雄和我介绍作宏入党。第二天回到城区后，我又介绍何志纲、黄玉香二人入党，并建立了支部，由洪任支部书记。在瓯中，留下党员有张良权，后发展了倪新攀，我又介绍了王俊入党，成立了支部，由张任支部书记。另外，又通过各校支部或进步骨干，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活动。

（二）带领青年学生去游击区

当时经我带入或介绍进游击区的，记得有朱彩霞、林荣、姜翩翩、王珍侠、黄荣波、周邦光等。有一次县委机关开干部会，我带领龙狮画室金恕子同志去拍照，后又送他下船回城。

三月八、九、十三日，我和朱彩霞、林荣三人由地下交通带路赴永嘉县委机关，在越入一个深山幽谷，正是夕阳西斜，一条石桥下溪水湍流。我说这真是一片世外桃源，彩霞讲：不，这宛如梁山泊的一幅想像画。我又说：今天我们是“古怪歌”里唱的“秀才做了强盗”。

根据我的日记，我们从城区到永嘉县委机关，经过的陆路路线有：黄牛山——上戍——渡头——羊林——风林岙——戍浦——郑船——丁埠头——白卡岭——枯竹岗——麻竹岭——洞泉——五同泉——儿地洋——石山——鸟泉——林垵——下岗楼——万叶（地名据读音写的）水路路线都是从朔门或西郊码头下船，到上戍、藤桥上岸进入。

（三）购买药品布匹、运送枪枝弹药等

我经常进城，陈雄多次交给我金银首饰，到城里托亲友换成

货币(周姬昌代换过),通过卫生系统的地下工作人员,购买药物纱布等,另由江上交通运入游击区。另外,也运送过一批枪枝,子弹和旅行收音机。在接近解放时,约在四月的中、下旬,运输过一批印刷铅子。我的这些活动,姜立同志家是一个中心联络站和据点。

记得运输印刷铅子的工作量很大,也很危险。当时组织了部分地下党的印刷工人和西门码头的运输工人(名字都记不起了),在夜间将铅子沿河运到西郊码头再挑下江船。大家统一口径,如碰到生人问,就说是运盐。那晚进行的很顺利。铅子运到游击区后,温州已快解放,没有用上。

(四)收集情报、策动起义、散发传单

布置城区地下党员、进步人士,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了解国民党的军事、布防、政治、财政、文教等各方面的情报,收集起来,经过多种渠道送入游击区。

记得进步同学肖善棣,有一表兄在国民党部队任营长。上级交给我任务,与肖商议策划他表兄起义,加上其它方面的工作,起义取得成功。另外,偶然碰到一个同学的朋友在国民党内工作,我未经请示,盲目策划此人顺应时势,带动国民党军官起义,谈了一夜,此人是野心很大的政客,未有成功,我向陈雄同志汇报后,受到批评。

我进城时,经常将游击区印的宣传品、传单带入,通过各校支部党员,投入邮筒寄发给国民党的党、政、军、工、商、学各部门,有的从门缝投入地方绅士、知名人士家中。有几次是我和作宏写好信封分头去投寄。当时宣传品的内容有: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态势,“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国民党代表去北平和谈的情况,“南京惨案”。“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的新闻等等。这些传单的散发,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使人民得到鼓励,看到胜利在即的前景。

(五)其它方面工作

抄写新华社的记录新闻。在城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进步同学家中如有收音机的,就叫他们记录新华社的新闻,抄在拷贝纸上,带入县委机关。此事记得叫姜立、周姬昌同志搞过。

在城区与电厂、印刷、运输、卫生、小教等部门的地下人员都有过接触,现记得有林荣澄、周月蝉等同志,可惜其它的因长期没接触,想不起来了。

当时我在城区住过或联络过的地方还有:洪作宏、肖善棣、王更尧、周姬昌等同志处。

开花结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温州全城解放。七日黎明,我是随浙南游击队进城,亲眼看到永中和各校贴出欢迎游击纵队的标语,觉得非常亲切和高兴。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解放战争时期的温州学生运动,发展是正常的成功的。不仅解放前有上百知识青年去游击区参加革命,就是解放初期,也有四百多青年学生和部分工人积极分子、职员和社会青年参军、参政。进城时,我在浙南游击纵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当时成立了一个革命青年入伍委员会,办了两期青训班。负责青训班工作的是陈宣崇和周申生同志,我负责审查组并和朱棣同志各任一个中队的中队长。现在还存有原始名册和统计数字。进入两期青训班学习的有:温中56人、永中42人、瓯中57人、高商29人、工校32人、简师7人、温师18人、建华12人,其它(指职工、社会青年)115人,独立队(指妇女,来自各校和社会)99人,合计467人。这些人经过短期学习,少则数天、多则半个月都分配到部队和接管部门去工作。此外,还有未经青训班而直接参加工作的还不少。总之,学运的一大成果是给浙南游击区、人民军队、新政权输送了上千名青年知识分子。

中国青年学生是具有爱国、民主、进步、革命优良传统的。尽管历史发展是复杂的、曲折的，但进步必定战胜反动；真理必定战胜谬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这是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实践证明：过去的革命时代和今天的建设时代，都是属于朝气蓬勃的求进步的青年。

本文作者系温州市党校教研室主任(离休)

通讯处：温州市鼓楼街15号

宅电：0577—88233187

走上革命之路

林素菊

1947年春，我踏雪离开玉环去了温州。到温州后，由于开学在即，城区各小学人事已定，我和同来的林崇汉只好权且到七都乡中心栖身。每逢周末坐船回城，与朋友们相聚，在林秀英的主持下，议论时事形势，学习社会发展史、哲学、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油印本)。由于读书会和温中女同学读书会联合过，还认识了温中学运骨干陈道生、谷钱国等。五、六月，刘金松、林秀英先后“上山”，由我负责读书会，林介绍地下党员施巨欣和我联系，又带我会见特委派出搞学生运动的安邦，和特委驻上海联络站的吴文达。后来施巨欣又带领城区区委书记冯增荣来我家。他们不时对我教育鼓励，向我介绍特委机关情况，使我对浙南党有了初步认识。特别难忘的是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两次由增荣同志陪来我家，他纵论国内外形势，他说：“魏德迈使华，表示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濒临崩溃阶段，美国需要调查一下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决定他的对策。但是美国还是要援华的，在军事上可能性也很大。不过这顶多只能延缓蒋的崩溃而决不能挽救蒋的崩溃”。他说：“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表示和平欺骗的手法已不能继续，必须转到更残酷的军事统治，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它死亡的临近”。讲到我党的反攻，他说：“反攻期是长的，因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切不同于欧美或苏联，革命的重点在农村，农村决定城市，而农村的改变是迟缓的，因此反攻的前途也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个革命者，要能在受到挫折时不消沉，在挫折中锻炼才更坚强”。他的透彻分析，使我深受教育。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些团聚青年和党内外转递信件报刊的工作。

47年8月12日清晨，朱启文来告诉我，昨天午夜，夏文俊（温州大专学生联谊会骨干，浙大学生）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赵宗镫等数人。13日增荣同志也来告诉我，因读书会与夏相识，他再三叫我不住在家中。15日朱再来，心情沉重地告诉我，夏被刑讯多次，还用电刑，今晨四点已押去文成“绥靖处”，他决定立即离温，留下杭州联络地址给我，临行嘱我焚毁日记及往来信件。几天里，我也作了一些应变准备，多方了解有关讯息，原来夏等被捕是因8月8日瑞安高楼飞云江边，发生了我党同志与敌遭遇，平阳县委组织部长洪汝兰挺身掩护同志壮烈牺牲，新同志一本记有学运骨干姓名地址的笔记本被敌截去。所以城区区委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特委也派孙明津同志进城传达发事原因和处置办法。19日中午，冯增荣同志来征求我对“走”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说明天就走。时间紧迫，我急忙从朔门到南门与几位朋友作了交代，进一步清理了书刊信件，捡了一些衣物，夜里候父母就寝，留了一条告别，就偷偷出了家门。在郑梦兰家，我又给外地朋友写了几封信（包括朱仁禹，他刚由邱招宏带来一信，问我要否到括苍去）。躺下后，与我多年知交同学梦兰话别，千言万语依依难舍，相约胜利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以后她去了东北解放区，随军南下湖南，在湘西病故，使我终生刻骨铭心怀念。

20日清早，冯增荣同志来领我，我们拉开距离，随他穿街走巷到了西郊，他把我交给老交通员季则尧。阿尧同志招呼我下了停泊在瓯江上的一只小船。等了一会，冯又带来几个青年，其中有我认识的孙明津、关策，另外还有陈雄、卢声亮、沈大同，我们目送冯增荣离去，在这白色恐怖的危城中，他还镇定地来来往往，忙于营救被捕者，疏散、撤退有关人员，置自己安危于不顾。人齐后，船儿就顺潮向瓯江上游驶去，我们都坐在舱内，阿尧同志都坐在船尾老大身边，一边警戒各方，一边与老大娓娓交谈，深入浅出地讲

解革命道理。下午船泊一荒僻芦丛边，待天黑才上岸步行。走不多路，就有地方同志来接，领大家去休息吃饭。饭后增加了两个武工队同志，护送我们赶路。就这样我们一共走了四天半，有时三人一组，有时集合一起，有时夜晚，有时白天，有时涉水过溪，有时翻山越岭，有时平川大路，有时羊肠小道，行行复行行，沿途歇脚处的群众都很热情，懂得共产党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党，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抽丁、反征粮斗争。一路耳闻目睹，使我既惊奇、又兴奋。第五天攀登那最难走的五里山岭，当我气喘吁吁登上山顶，在三叉路口遇见两个孩子，他们问清我的来处后，扬手指示去路，我奇怪而高兴，心想：近了。果然“牧童遥指杏花村”，绕过一段小路，就到了目的地——浙南特委机关。

本文曾刊2002年8月出版《浙南火炬》3期

忆 仙临黄边区青训班

◆ 傅世扬

1949年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军发布渡江令，蒋家王朝风雨飘摇，面临覆灭，浙南地下党根据即将解放全国的大好形势，指示所属组织，抓紧举办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培训干部，以便迎接全国解放，接管县城。“仙临黄边区青训班”因此诞生。

“青训班”始办于仙居县上张，我们七十多名来自仙居、临海、黄岩三县的知识青年集中培训。可是不到一个星期，边区区委领导获悉情报：浙保四团和仙居当地反动武装有可能向我们进犯，县城和上张相距仅三、四十华里，危险性很大，领导当机立断，毅然决定“青训班”迅速转移。某日大清早，我们离开上张，向括苍山腹地道济黄山一带开拔，山道弯弯，峰峦纵横，经过一整天的行程，才到达永加县属的张溪，这里是一处背靠大山，树木葱茏，面向坑谷，涧水淙淙的安全地带，是战争年代难得的一处好地方。“青训班”办在一户逃亡地主的大宅内，客厅作课堂，没有课桌凳，大家席地而坐，课本不足只好用油印本，虽然时间有限，不能系统地钻研马列经典著作，只而阅读了《土地法大纲》、《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基础理论知识，输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食粮。伙食一天三餐，早晚稀、中午干，仅有小量的糙米掺杂大量的地瓜丝、土豆等。菜蔬纯属“山珍”没有海味，更无肉类，无非是菜干笋干之类。衣着杂乱无章，称得上“杂牌军”，都穿自身带来的，脚上穿的是三个鼻子的布草鞋，也是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夜晚睡觉，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男女之别，除二十来个女同志分开睡觉外，所有男同志都挤在一间大地板上，身上覆盖单薄，虽然是春天来临，然而山乡春寒料峭，下半夜每个人都卷宿着身子，互相靠拢取

暖，集体睡觉的一阵阵鼾声和输班换岗的叫唤声，大家非但不受干扰，反而感到有一种安全感和亲切感。此外，培训期间，边区区委负责人蔡熙同志还经常提醒大家，他日进城，一定要步伐整齐，歌声嘹亮，还要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演出。因此，我们在训练期间，还穿插排练各类文娱节目，大唱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有秧歌舞，街头剧，期待解放进城，掌管人民江山，总之，生活是艰苦的，精神是愉快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个个豪情满怀，当时有个顺口溜：生活供给制，几角另用费，别看土八路，胸中有大计。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日子过得飞快，富有革命意义的“青训班”，距今已五十多个春秋了。解放后仙居划入浙东军管，我们当时在仙居活动的边区警卫队和“青训班”全部人员，划到温州地委分配工作，1949年10月，我又从温州地委工作队调到玉环县，一直在这个海岛县，潮涨朝落，潮水轰鸣，但浪涛冲刷不了我对“仙临黄边区‘青训班’”那段生活的记忆，当年的艰辛，对照今天的欢乐，使我深深懂得建国不易，创业艰难，我对社会主义共和国爱得那样深，其道理就在于此。

革命风云录

抗战纪事

日寇侵占楚门外塘见闻

※ 胡德钊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楚门两次遭受日寇侵。第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古历十一月十六日，为时一天。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古历三月中旬至下旬，为时十多天。使我楚门外塘等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终因我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不得不在劫掠后惶惶逃窜。并将我当时所见所闻，略述于下：

(一)

一九四四年古历十一月十五日夜，有人传说，日军已在沙散塘登陆，向楚门方向进犯。一传十，十传百，使人们十分惊慌，我即去前排扬府庙临时小学探视。这所临时小学是由北监盐场所办的私立盐工子弟小学，因时局不靖，经费困难而停办。我为了不使儿童失学，商请知友赵灵筠、陈水照、老师陈少川等负责接办。经费向地方筹集。工资微薄，生活艰苦。但他们热心教育，不计报酬，都能安心教学。因系临时性质，所以名为临时小学。我到了校里，见校长陈少川，教导主任陈水照（即书钊）两人还在校中。大家决定，暂时避一避。出了校门，刚到路上，即听直塘头一阵急促的枪声，

不久就停止了。我们以为没有大事，就回校。我回家时，闻邻居胡珍觉胡德利胡天寿胡万金四人到温岭街赶市，在司头岭头被日寇抓住，到清港休息时，乘机逃回。才知此时日寇已进入楚门了。翌日早晨，我到直塘头昨夜枪响的地方察看。见路旁有场警尸体五具，原来是昨夜场警从楚门退到此地遭遇日寇而被击毙的。两边草地里乱散着许多行李皮箱衣物等，皮箱均被刺刀戳破。

堂弟胡如金在这次逃难时，也遇到日寇。他说：十一月十五夜，闻日军在沙散塘登陆，向楚门进犯。即带妻子和耿秉清共五人，拟赴田马避难。但三眼陡门城门紧闭，征得徐品三中队长允许，才得出城。到了夏洪施地方，忽闻外塘直塘头响了一阵枪声，知道日兵已近。就嘱妻子们缓走，自己跑步前行。原想比日军先一步越过三角眼，免得相遇。谁知日寇分兵从蒲田门口向小塘而来，正相遭遇。当即被四五个日兵捉住。所带钞票，都被搜去。到三角眼时挣脱敌手，跑进人家小街，渡江逃回。他的妻子和子女也在三角眼被捉，带了一段路后，乘机脱身，潜伏路边稻草棚下约半小时，等日军过尽了，才起身回来。耿秉清被抓到三角陡门跳水洒过北门港回小筠岗。防守城门的徐品三部则在日寇未到时开了几枪向东门头退出。日寇进城后住了一天抢了许多物资就退去，此是楚门第一次沦陷。

(二)

日寇第二次侵占楚门，护航队李庆祥率队反击时受伤。一九四五年古历十一月中旬（约在十九或二十日）的一天早晨，忽有外塘南部的许多人拖儿带女向北而逃。据说日本兵已进入楚门，有的向外塘进犯。接连又有难民逃过，并说：日本人已来了。于是逃难的更多，原来日寇果已侵入楚门，又分兵控制大陡门，驻兵王鸿宝家，向北占据没水塘王钦洪王钦德两家炮台。占据这些地方后，并未再向北犯。但我外塘已小半陷落。此时正值春耕插稻季节，大家心里都很焦急，迫切盼望我军速来驱逐日寇出境。第二天

听说有护航队反攻楚门消息，到廿一日护航队果然来了，人们都很高兴，纷纷上高山观战。我也站在椿山头山嘴头看，只见护航队自清港向楚门进发，人数约一百多。到了椿山头，炮兵留在山脚高地上架炮，其余部队继续朝三角眼夏洪施方向前进。炮兵架好炮，侧量好距离，就一连向楚门三眼陡门日兵防地开了三炮。接着夏洪施那边响着密集机枪声，约十分钟后，枪声又稀疏了。不久，从前方抬回伤兵很多（约十多个担架），中队长李庆祥也不幸受伤。他在担架上，看见车辅（当时的玉环绅士）说：“车先生，我不行了，我的家事，托你照顾”。车辅点点头，随后部队也陆续向清港撤退。

（三）

日寇进犯外塘，自卫队阻击失利，毛止熙率队接防。自护航队反击受挫后，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幸有温岭自卫队和北监场警队驻守外塘，布防于新陡门朝东庙、朝东屋一带，人心稍定。三月廿六日（一说廿四）早晨，我正从家里走到后排乡公所时，忽听新陡门方向有紧密的枪炮声连续不绝。不多时，见自卫队十多名，自吴家向沈家退走。他们伏在塘脚，边退边打。后面则枪声更急，由吴家的屋隙树隙中已隐约可见日寇追击影子，这时刚巧有前排人疏散物资的小船经过。船上人叫我快下船，我急忙跳下，乘到清港山嘴头上岸。只见我军都从同善塘塘脚纷纷向清港撤退。他们大都拖泥带水，更加艰苦。但行走还是从容不迫，形象并不显得十分慌张。有的还边走边说话：“某某被敌人紧追，猛从高坎上跳下，不知脱险否？”有人问：“前方怎样了？”答：“炮火很猛烈啊！”就在这时，毛止熙率领士兵约二十名跑步而来。到了桥南街近山嘴的地方站定，他向士兵讲了几句话，最后两两句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听到没有？”齐声答：“听到！”毛止熙一挥手，兵士即跑过小桥，散伏于塘脚，同时枪口瞄向前方，毛止熙自己到山上张寿民（护航中队长）指挥所里指挥。当时我站的小山嘴前面就是小桥。他们进

出，我都看得很清楚。事隔四十年了，这些情景，犹历历在目。这次战争，我军民死伤数十名。北监场长王广瀛的卫士张武臣被击死在沈家，外塘乡户籍干事王子涵也是这次被日寇戳死在同善塘的豆地里。自此，我外塘已全部陷落，人民逃避一空，只有偏僻村落，尚有少数老人，看守家园。据目击者说：是日，日军先攻新陡门，以耕牛，水车作掩蔽，进行偷袭，待我防兵发觉，敌人已近在咫尺。双方仅隔一陡门，互相对射。后来，我见一哨兵因多时不闻枪声，误认敌人已去，伸首一看，即被潜伏在陡门边的敌兵击中，其他守兵见了，惊怕而逃，于是行动全线撤退。日寇尾追袭击，以致伤亡惨重。

（四）

日寇抢劫外塘下新塘小陡门的食盐

日寇侵占楚门，除杀害人民，强奸妇女外，劫掠我公私财物，不可胜计，外塘仓储食盐，也遭抢劫。自三月廿六日我军阻击受挫撤退后，外塘已全部沦陷。三月廿七日起，他们就恣意抢劫下新塘和小陡门仓储的食盐。抢至第二天（约廿八日）我正从乡公所回家，在路上，看见走在我前面的有二十多名护航队战士，由指导员张仁坤率领，披着伪装向直塘前进。到了直塘边，一队埋伏在胡家前门的矮墙下，一队则在直塘路北原林冬夫的茅屋基上架起迫击炮，等我从小路到自家后门时听得炮声二响。放炮后不久，我军就退回清港。后闻此两炮，炮弹落在离盐仓不远盐坦中，使日寇和民夫惊慌失措，停止抢运多时。小陡门抢盐时，也曾有我护航队在桩山头以迫击炮轰击。

（五）

日寇逃窜前后情况

日寇一进楚门，就疯狂进行劫掠，最后几天抢得特别厉害。古历三月底（约三十日）的一天下午，我从自家门前直塘路上远看楚门

南塘头，搬运东西，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比前几天更加频繁。听人说：日军有将逃走的迹象，到了傍晚，有几个大陡门来的人告诉我：驻在王钦洪王钦德两家的日军已撤去，又闻大陡门港里已准备许多船只。据此情况，我断定日寇今夜要逃走了，连忙起身向芳杜张岙走去，拟将这情况报告以定邦县长，请他派兵追击。时已暮色苍茫，家家闭户，我疾趋目的地。不料到了芳杜，问知以县长到东西岙去了。这时，将近午夜。我想：以县长不知住在谁家，难以寻到，即使寻到，部署兵力，为时已晚，踌躇一会，只得回首。在四山寂静，万籁无声中，悻悻而归。

第二天(四月一日)凌晨，听人说：日军已于昨夜全部撤走了。我就邀同副乡长吴云槎到日兵驻过的地方察看，先到横塘王钦德家，只见稻草纸屑饭菜等物，狼藉满地，粪便随处皆有，满屋臭气，令人作呕。出屋时，日已上山，在晨光闪烁下遥望东方夏洪施至三眼陡门路上，我军已整队入城。两人相视，不禁喜极而笑。再到大陡门王鸿宝家，见楼下满地散着衣被及铜锡器具，亦有银器自鸣钟一二件。厨房间门口还放着一头已捆好的毛猪，可见日寇逃窜时异常匆忙而惧怕。楼上有统铺多处，约可睡二三十人。西首楼上，有板架床铺三四位，床板上遗有妇女的布鞋一只，这是日寇糟蹋我妇女的明证。出了他家，再从南塘头到楚门，楚门我们没有详细去看，穿过大帝庙前小巷出三眼陡门。归途，见我乡镇居民，已纷纷相继归来，准备重整家园。

(六)

军民团结协同抗敌

1、组织担架队，救护伤病员。如李庆祥率队反攻楚门时，有几十具担架随军前进，及时运送伤员到后方医治，减少死亡，减轻伤员痛苦。

2、慰劳战士鼓励士气。在我军抗击日寇时，后方乡镇人民纷

纷发起慰劳，征集慰劳品输送前方慰劳士兵，鼓励士气。我外塘虽已沦陷，也千方百计征集慰劳品。承前排乡民林某(名字忘记，草名三老扁)慨允白猪一头，又募得少数现款，送交县政府，转送前线。

3、外塘王詠樵，徐都陈孟霖(即陈展)等志士组织战时服务队投入抗日工作。我经常看见他们(王、陈二位我一向认识，尚有多人不知其姓名)在外塘朝东庙一带前线慰问战士、探察敌情。

4、温岭自卫队驻防朝东屋，屋主郑福海一人尚留在家，班长劝他暂避他处，以免危险。郑某起身时，指给他们家里的咸肉、腌菜、米糕、菜油放置处所，叫弟兄们任意取食，不用客气。弟兄们都很感激，班长亲送郑福海过我军哨所而别。

5、温岭自卫队有三名战士防守直塘(直塘西端胡家前门)堂嫂王氏叔母郑氏两人留守家里，她俩见战士日夜辛劳防守，自动以鸡蛋炒糕送给战士吃。这是第二天我回家，她们也以糕待我时告知我的。

以上所述，是我在外塘一地关于抗战时见闻的一点零星回忆，录之以供参考。其他如以县长亲率部队在楚门东门之反攻，以及各地人民协助抗敌等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多。再如日寇杀人奸淫等暴行，更是罄竹难书。因个人见闻有限，或有所闻，亦语焉不详，我只得从略。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

桐丽乡民众抗战纪事

△ 张悟新

抗日战争时期，玉环县桐丽乡南山村有支民众自卫队，有40多人，乡长张成士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张子坦为教练。

南山西连安人、灵门，东连大园头、箬岙，南面与披山岛隔海相望。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村上时常遭到海盗袭击。为保一乡平安，南山村民众自发组织了这支队伍。他们自筹资金购买了步枪、套筒、“土快五”等武器装备。

张子坦生于1894年，是位抗日爱国人士，青年时期就读于温岭举人赵兰丞执教的太平中学堂，平素爱好习武、骑马、射击。民众自卫队成立后，他是当然的教练。1943年9月，日寇占领披山后，南山一带遭到日寇威胁，这支队伍担负起抗日保家乡的重任。

晒谷场上苦练乐

我家墙院风水墙外约有1000平方米的晒谷场，晒谷场北面、西面是村民的房子，南面、东面砌着矮墙，这里是民众自卫队现成的教练场。队员们风雨无阻，每天蒙蒙亮就在这里集合，排成四路纵队，在张子坦的口令下步伐整齐地操练。操练之后就是卧倒、爬起、举枪瞄准、刺刀拼杀……，夏日炎炎是这样，逆风猎猎也是这样。每当夜晚，月亮当空，也是他们练兵的好时机，这时，忙碌了一天的大人，趁着饭后闲暇，带着孩子到晒谷场上看练兵，我们这些小孩学着自卫队员雄壮喊声“杀呀！冲呀！”呐喊助威。

张子坦教练重于实践。他在晒谷场一角做了一个桐丽乡地形沙

盘，教练员们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自卫队有3个班，张孙达是其中的一个班长。有一次张子坦对班长进行沙盘考试，问张孙达，要是敌人从后门山上来，我们被包围了，你这个班怎么办？张孙达答，以一个组对付敌人主力，在敌人接近时，以手榴弹消灭他们，其他各组控制最高山顶，找准敌阵弱点狠狠地打，发挥地形优势，寸土不让。张子坦夸他答得好。

张子坦带兵上操场，总是喊“立正”，“为国保家乡”，大家齐喊后才“稍息”。散操时，也是齐声这样喊。队员们个个年轻力壮，腰缠子弹带，肩扛大枪，正步操练在晒谷场，十分威武。教练“一二一”的口令声，“为国保家乡”的雄壮喊声，响彻晒谷场，响彻南山的上空。南山成了桐丽乡的抗日基地。

疏散乡寨忙战备

自1944年冬日寇从乐清湾登陆，侵扰温岭县沙山，玉环县盐盘、下岸宫等地以后，南山民众自卫队对日寇百倍警惕。张子坦具体负责战备，他从各乡、村调集枪支弹药，扩大自卫队，加紧训练武装民众，从早上到晚上，晒谷场上冲杀声不断。在南山后门山的山顶、道口挖战壕，修土堡，许多队员早出晚归，中饭由家人送上山去。张子坦也经常和队员一起修筑工事，有时忙到深夜，家里人要为他们备饭。

1945年元旦之后，南山民众自卫队增设岗哨，一班守在山头麻人地方，一班宿在张孝忠横楼二间，日夜轮流值班巡逻，密切观察披山洋面的日寇动静。将近春节，巡逻队员不断报告披山洋面上日寇的炮艇、船只往来频繁，有时朝着后门山十八湾黄礁山头方向驶来，侦察我方情况。张成士、张子坦估计日本鬼子肯定要袭击南山。平时常来派饭的县保安队这时不知去向，只有这支民众自卫队时刻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日寇要打南山的风声越来越紧，民众自卫队决定在农历正月

20日左右疏散乡亲。南山村一时紧张起来，家家户户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大多陆续向岙环方向转移。我家因不满4岁的小妹和3岁的小弟拖累，迟迟没有起身。26日早晨，日寇来犯的风声很紧，左邻右舍都已走了，这时住在我家后面的表娘舅来把小弟抱走，一家人向岙环营田朋友家逃难，母亲、姐姐提着包裹，我牵着不满7岁的大妹，出门不远母亲发现小妹还丢在家里，姐姐赶紧从表娘舅手里接过小弟，表娘舅跑回家里把小妹抱来。小妹眼泪汪汪地哭喊着“妈妈！妈妈！”，母亲见着小妹哭成这样子，不觉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后门山上鏖战息

正月26日下午，我们在营田听到灵门枪声。不久就有人报道南山民众自卫队把日本鬼子打跑了。避难在外的乡亲们抽紧的心头轻松了。第二天(27日)早晨，又听到南山后门山上传来隆隆炮声和激烈的枪声。过半个多小时枪炮声渐止，接着传来了胜利的消息，也传来了张子佩阵亡的消息。下午，在外避难的乡亲纷纷回来。表娘舅又和张孙达一起来把小妹、小弟接回。

避难回来，我和村上的大人一样，先去村东看望阵亡的张子佩，又到山头看看战斗过的地方。29日上午，玉环县县长以定邦来给张子佩开追悼会，送葬时以定邦代表玉环县政府送的两幅挽幛打在队伍的前头，上题“抗日阵亡，永垂不朽”，“浩然正气，与天地同存”。送葬的队伍有一里多路长，从张家水井头至桑树下。追悼会激起了桐丽乡广大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张家“旗竿”旁的石条凳和水井头通常是人们闲聊的地方，自卫队员们常在这里讲这次战斗的情况。他们说26日下午日本鬼子在灵门被民众自卫队击溃，不甘心失败，趁夜里天黑从山头麻人地方偷渡登陆。27日天色未明，被一位村民发现，跑到村里报告，张子坦速率张孙达一班人马先冲到后门山山顶，进入战壕、土堡，正

面打击敌人；接着张成士率队上来，一个班从东面打；一个班从西面打，敌人有一个排多的兵力向我们发起冲锋，大家不怕死，待敌人接近时，一排排子弹齐向敌阵猛打，敌人死伤多人，乱了阵脚，退到山脚下。不久敌人重新组织力量，第二次发起冲锋，用小钢炮向我阵地轰击，山顶岩石被炮弹打得碎石四溅，张孝康被飞石打伤了小腿，张子佩被碎石击中头部牺牲了。队员们誓为张子佩报仇，子弹上膛，百发百中，又有好几个敌人被我们打死打伤，他们不敢再冲锋了，带着死伤的鬼子匆匆退了下去，上了2只舢板船向西逃去。

过了两个多月，在农历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日本鬼子又在灵门登陆，被南山民众自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仓惶登船逃回披山。

1945年春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8年抗战胜利在望。南山民众自卫队三战三捷，给桐丽乡的抗日史写上了光辉的一页。玉环县沙门镇小学副校长张子佩的孙子张孙华家有一块挽匾，是玉环县县长以定邦的亲笔题词，全文如下：

“张君子佩抗日阵亡纪念 忠勇可嘉 以定邦挽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吉旦。”这不仅给张子佩流芳百世，也是我们乡里的光荣。

2000年12月25日初稿

2001年10月12日修改



芦岙吴泰元酱酒坊

◇ 肖善志

吴太元酱酒坊，开设于玉环县芦岙乡（现芦浦镇）江家村，创业大约在1840年间，歇业在1930年间，迄今大约150年，是我县历史上最早的一家酱酒坊。

创业人吴正权，生于清道光二年岁次壬午年（公元1822年）三月十五日辰时，卒于清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年（公元1890年）十月十一日卯时。

继业人由其子吴成平，字于治，号恭人，别号云鹏。生于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年（公元1868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时，卒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三月份。

吴成平办企业讲究质量，除黄酒保持一定优质外，对元酱要用优质黄豆与二三年陈盐，日间晒太阳，夜间受露水，保持元酱质量；生产优质酱油，当时的“芦岙酱油”不但驰名县内，还远销乐清、温岭、黄岩等地，黄酒、元酱也同样销售县内外。

当时酱酒坊生产师傅与工人有三十多人，年产酱、酒各数十缸。后期师傅本乡红山村温招根，百丈村陈义记等人。酿酒、晒酱

保持优质，一靠师傅丰富经验与熟练技术，二靠芦岙四面环山，山青水秀，水质优良，因此生产优质黄酒、元酱、酱油；当时受到本县与邻县民众欢迎。

主要原料是糯米、黄豆、食盐等三种，分别向乐清、温州、本县外塘三地购入，都是雇用木帆卷底船运回。

歇业主要原因，碰上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大灾荒，糯米、黄豆歉收；原料缺乏，无法再生产以及其它原因延至1930年歇业。

坎门王万顺绸缎棉布商店

◇ 肖善志

王万顺绸缎棉布商店，闻名全县。主要是企业家王仙寿经营有方，勤俭办企业，信誉第一，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公平交易，和气生财，要想销路好，服务要周到。信守诺言，生意越做越活，数十年来，由小商贩成了一个中等企业家。

王仙寿原籍黄岩路桥乡，少年曾在坎门罗万丰布庄做学徒，熟悉棉布行业。

谋生开始，因限于资金，设摊出售丝线等小商品，妻室纺帆纱，织土布另售。艰苦创业。

在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筹集资金银洋400元，择定坎门前街与中市街之间，租用三间矮楼房为店面，独资开设王万顺布庄。开始兄弟三人经营、专营棉布。货源主要向温州布厂或温州洋货行批购。因讲信誉，部份赊销进货，运回销售，土布主要向路桥购进，经常半夜三更动身步行至温岭城关河头乘内河小船至路桥进货。有时由肩贩送货到店收购。

特别是他的服务态度好，顾客一进门，热情笑容接待。虽店面设在小巷深处，酒好不怕巷子深，也能吸引了广大顾客，寻找上门站满店堂。他还有一手绝技，义务为群众识别真假银洋与份量轻重，一敲声音辨别真假，二放手心掂量，稍轻一二分都能判断准确。这一绝技，子辈等想学也无法学成。他为人心地善良，遇上贫困户用到一、二元假银洋，暗将好的给他，假的留给自己报废。识别银洋不管生意最忙或吃饭时间，有求必应。每天上门小商米贩以及顾客，邻居等求着近百人。只要经过他的手，放在家里就放心了。这种无私援助精神，无人不称赞矮人先生(也有称王先生)真好。

扩大商品种类，丝绸类，直接向上海进货。店名改称王万顺绸缎棉布商店。以后子辈长大后，长子王廉宝增设百货柜台，是一间店面朝向中市街(现门牌中市街124号)与原后街三间店面联接直通，场地扩大，品种增多，营业旺盛。面临同行业挑战，采取薄利多销，直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高峰期年营业额达银洋十万元。

经营过程中，先后雇用了徐象棠等伙计三人。公元1924年(民国十三年)招收了陈廷甫为学徒，陈聪明能干忠实。三年学徒期满升为伙计。经常指定他去上海、温州等地进货；他能采购适销对路商品，满足了当地群众需要，他在店经营中，也能与王先生(师傅)同样热情，笑容接待顾客，介绍商品性能，代客挑选商品，估算用料，脑灵手快，口算超人，三位乘三位数，不用算盘，剪好布随口报价，赢得了广大顾客的好评，王先生有了得力助手，就将独生女王莲香许配给陈廷甫。

创业初期，兄弟三人共同经营，以后兄弟二人先后离去，另谋出路。子侄长大成人，长子王廉宝(现住温州)、次子王廉波、侄子王廉国等一家人都继承父辈经营棉布百货。

原租用四间矮楼房作店面，租金按月付清，如遇房东急用也可预支，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超过房租好几倍，也满足要求，从不怨言拒付，后来房主无力还钱，就把全部房产卖给了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船敌机经常炮轰滥炸坎门，生命财产垂危，人心惶惶，大部分商店关门逃生。该店也不例外，为了安全，大部份商品运往楚门年青眷属外逃。自己与年老伙计一二人守店。交通阻塞，进货困难，市面萧条，眼看日寇暴行，丧失经营信心，为了生命安全，也无意经营了。抗战期间商店似关非关，营业一落千丈，直至关闭。

以后王仙寿本人就不参与商业活动，安度晚年，直至解放后1972年秋间在坎门原居住地病故，享年八十岁。

八年抗战胜利后，长子王廉宝、次子王廉波、女婿陈廷甫等人

重振旗鼓，合伙改组成立——新万顺绸缎棉布商店，吸收陈崇尧、王崇法等人少量资金拼夥，共计集资约值银元壹万元，购置中市街新建三层楼房二间（现中百公司文具门市部）为店面，备足货源，开张营业，直至解放。

王廉波、陈廷甫为中百公司退休职工，在家欢度晚年。

楚门同和南货店

□ 张炳文

楚门西大街有片同和南货店，创于民国十二年（1923），新建石库门店房一幢，门楣上青石雕琢日招牌“同和”二字，系杭州名书法家杨学落题写的，苍劲丰润兼备，略知书法者无不驻足仰观，称赞不绝。该店系合资经营，投资者是当地几位殷实富户，如韩约渔、陈楚材、马庆甫、耿舜钦、赵季磊等人。固定资金银圆两万元，确称当时唯一资厚业大的大店。开业伊始，耿舜钦任经理，先后几十年。期中，全年营业额达20万元，店员伙计多达40余人，库仓、烛掬、店员伙计宿舍等大小房屋50多间，批发兼另售额的一半。温岭、黄岩、临海等地多家同行都向他进货。由于福建商船多艘常和他挂钩，桂圆、荔枝、笋干红白糖等土特产由该店代销或收购，价格合理，生意兴旺。

楚——沪交通运输班轮（新瑞平）（老瑞平），楚——温班轮（利泰）这三条轮船的船牌都挂在同和店墙上，各该船的大股东也就是约渔、楚材、庆甫、舜钦、季磊等，凡去上海、温州进货的，对运输方面当然优先有利，进货及时，周转迅速，薄利多销，招来四方顾客，独占全县中半个市场。

民国20年间（1931），舜钦不幸丧偶，家庭不称心事相继出现，思想消极，晨夕焚香顶礼，隐入佛门自称居士，同时辞去同和经理职务。经股东商定聘请（复兴盐厂）前经理椒江人丁汉卿接替遗缺，汉卿运筹能力有限及南货行业的经营经验缺乏，连续三年，年终结算、成绩大逊，丁自感有愧，提请辞退。后又改聘黄岩王明山接。王接管时，已是抗战军兴，交通梗阻，货源紧缺，王经理虽属商业宿将，经验丰富，然仍长材难展，用武无地。1941年夏，日机轰

炸楚门，同和部份房屋被毁，王的生命同归于尽。资方给以金几千元。据内部职工透露，王的经营作风，有嫌不符商业道德，做假掺水成为秘诀，如年尾出卖龙泉笋干，均于前日在每件笋干中倾入沸水两水杓。每逢清明、冬至或月半节日出售面粉，均于前夕用约长两尺的毛竹筒一个，通节留底，去内外的竹青竹白，注满生水，插入拆开包口的成包面粉中，隔宿竹筒里的生水尽渗入粉中，增加重量，牟取暴利，坑害消费者。又如版糖压碎充粉塘，粗砂白糖加工磨细充棉白糖提价出售。还有别的鬼把戏不一而足，他虽为资方谋利为目的，但作风不正，仍未得正派的资方所赞赏。

王死后，由叶尧 投资参股并出任经理。同时扩股增资，改组后称华珍，大公、源牲先后三易其名。抗战后期及胜利后的四年解放战争中，货源愈形短缺，通货膨胀益剧，营业金额逐增，而库存物资益减，甚至尽在店堂中，栈房里则空空一无所有，这是抗战遗留下以及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所造成的。至解放后 1954 年间公私合营时店里的资财是很有限了，职工也没几员了。

世事沧桑，倏忽七十年逝过，尚留石库门营业店房一幢的历史遗迹而已。



玉环县展复二百周年纪念碑建立始末

△ 郭辑中

有一年(约在二十年代后期)，郭云观病休回乡，正逢玉环县设治二百周年，追溯本县历史起源，感到有着深远的意义，特邀地方人士，共同发起树碑立传纪念，碑名为：“玉环县展复二百周年纪念碑。”并由郭云观亲自撰写玉环县沿革传记，洋洋数千言，关于玉环县历史沿革，叙述详尽，堪为后人继往开来借鉴，且具有参考史料价值，传记全文，勒在碑柱下端周围石屏上，由玉环县长谢西绩亲笔题书，纪念碑建筑在坎门钓舸岙岭山岗上，高耸岭表四乡俱瞻，海天相映，巍然壮观。

1959 年建造烈士陵园时，此碑与坎门郭源顺祖墓石料一起搬来用于建墓，这一重大历史文物从此泯灭无闻，十分惋惜。

玉环的黄埔军校学生

☆ 项荣平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它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为挽救当时处于危亡中的国民革命而创办的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开学，因创办时校址位于广州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

军校创立后，以贯彻孙中山“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亲爱精诚”为校训，其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

军校创办后，国共两党均派出重要干部到校任职讲学，孙中山亲任校总理，校长蒋中正，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戴季陶、周恩来、熊雄等。

军校教育吸取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改变国内外军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爱国革命的精神，使其自觉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成为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的革命军官，学制定为三年，后因各时期形势急需，学制适当缩短。

军校一二三期学生在校除完成军事政治课程外，并随军东征在东江猎德沙面，反抗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中牺牲有十七人载入黄埔史册。四期以后毕业学生，随军北伐以及抗日战争黄埔同学为革命战争保卫祖国前赴后继，发扬了黄埔革命精神。

1928年黄埔军校迁至南京，从六期一总队至1937年下半年十三期止，抗日战争爆发，军校分批内迁、十一期十二期十三期，分别于九江、武昌、铜梁毕业最后辗转移地到成都（我县陈鹤鸣、戴搏节、项锦均毕业于成都）至1949年底止，共办了二十三期，本校毕业人数五万余，连同各分校训练班（不包括战干团中训团）共计有二十三万人之多。

军校创办后全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响应。我县青年王祥麟先生，首先投奔黄埔三期与陈素农（任97军中将军长）、王耀武（三方面军中司令山东省主席）、宋瑞珂（六十六军中将军长）等同队入伍，从档案中查悉，王祥麟为浙江医学院毕业，调军校军医处任中尉医官，为澄清事实，笔者于黄埔同学录P41找到王先生时年22岁，后随军北伐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队后方医院院长至解放，是我县投放黄埔军校学生第一人。

从黄埔军校同学中，经过在同学会工作的笔者，在校同学协助下根据较实际的本校我县同学名单列后，初步落实了我县的黄埔学生在校的期别兵科的情况：

姓名	别名	在校期别兵科	在校时间	年龄	本县住址	同学录页数	备注
苏椿贵	鲁曼	六期一总队骑科	1928.4.23	27岁	坎门	281	死亡
陈炜	彤峰	六期一总队工科	1928.4.23	23岁	北岙	296	
周人俊	尚毅	六期一总队工科	1928.4.23	24岁	坎门	305	
李广育		六期二总队步科	1926.10	20岁	坎门陈天益转	330	死亡
余震东	雨辰	七期一总队工科	1928.12.18	23岁	三盘	362	
王维勤		七期一总队骑科	1928.12.18	22岁	坎门或后土交	357	
林式民		七期一总队骑科	1928.12.18	26岁	坎门镇	358	死亡
倪金廉		七期一总队骑科	1928.12.18	21岁	大麦屿	358	
翁奇珠		十期一总队骑科	1933.7.15	22岁	坎门	477	死亡
陈鹤鸣	庆寿	十四期二总队步科	1937.10	25岁	后土交	643	死亡
戴搏节	恕矩	十七期三总队步科	1940.6.12	20岁	楚门蒲田	963	
项锦	荣平	十八期一总队步科	1941.4.1	20岁	后土交	986	

1942年笔者在校时，有楚门胡载扬(已亡故)在十九期一总队入伍生队，中途辍学，先期同学王维勤、翁奇珠(已故)、李光育、余震东、陈鹤鸣(亡故)、戴搏节、项锦以及在黄埔系统各分校的同学有毛礼文、陈芳圃、陈孝钿(亡故)、陈昌明、王希尧(亡故)、刘毅、李数明、林光宇等学长，抗日战争时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日寇拼杀数千里，为时八年，逝者已矣，回首前尘历历在目，有的马革裹尸，血染沙场，尚在人世者唯戴搏节与笔者，如不搜罗记载，恐将在玉环历史中泯灭。

笔者资料来源，为本校黄埔军校同学录一至二十三期毕业的学生名单，本校高教班、校尉研究班、技术训练班、战术研究班、教导总队、各分校的学生总队，因无资料，无法汇编。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挽救中国危亡流血流汗，祖国人民是永远纪念他们，希望年老的黄埔同学本着孙中山先生的亲爱精诚的校训，发扬黄埔精神，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玉环残余“政府”简介

○ 应万里

1949年4月6日，玉环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部队是不甘心灭亡的。妄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夺回他们已失去的天堂。曾一度在海上游弋，行动诡秘，他们拼凑残兵败将，成立所谓“玉环县政府”，其内情却鲜为人知，近为收集新县志才在有关资料中发现，现整理如下。

正当我解放大军发起强渡长江天堑之际，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于1949年4月20日任命国民党海军温台巡防处长李丕绩兼任玉环县县长，组织“玉环县政府”。李当时39岁，山东蓬莱人，青岛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江防舰队司令部中校参谋长、海军温台巡防处中校处长。同年5月浙江各县先后解放，李丕绩随同一伙国民党残兵败将窜逃定海。5月15日李丕绩发出所谓“玉环县政府”第一道“命令”，拼凑一个叫“定海办公处”班子，派令县府主任秘书、军需官、书记、文书、译电员各一名，处员三名。6月22日向“浙江省民政厅”(驻定海)具领木质印信一颗，文曰“玉环县政府”，当日启用。6月26日“省政府”派令曹佛荪为所谓“玉环县政府”副县长。曹35岁，四川荣县人，大学文化，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毕业，曾任四川保安特务团中校指导员、海军军官学校教官。6月27日“玉环县政府”2号训令派定：县府秘书、第一科科长，作战、情报、特务三股股长各一名。同时筹组所谓“玉环民众自卫总队”，李丕绩自兼总队长，令陈文起为第一大队长。派令王秋圃为副总队长(延期中旬到职)，接着，训令陈文起：“一、本县府于6月30日随同海军温台巡防处先行出发，进驻海门，再伺机进入玉

环。二、该大队暂留定海编整，候另令行动。”

于是紧锣密鼓，搜集喽，扩充人马，约在七月间潜入玉环县及所属三盘区（即今洞头县）的洋面。一度时间海上妖风阵阵，恶浪滚滚，冒出了五花八门的黑旗，有所谓“玉环县政府”（驻北岙），“海军温台巡防处”（驻龙头），“乐清县政府”（驻楼寨），“永嘉县政府”（驻平头山），以叶金饶为“指挥官”的“浙南行署”，“玉、乐、永、瑞、平、泰六县民众自卫联防指挥部”（驻鹿西），还有以“省保安副司令”王云沛为“主任”的“浙南行署”统率其反革命部队，要在玉环洋面演出一番闹剧。

残余“玉环县政府”组织大致为：县府秘书、助理秘书；分设一、二、三科及交际科、税捐稽征所，派令科（所）长各一名；“县民众自卫总队”队部设：少校参谋（陈文起），及政治指导员、少尉书记、上尉参谋、上尉副官各一名；第一大队长王秋圃兼，副大队长杨志荣，下分一、二、三、四中队，分设中队长、指导员各一名；并以二、三、四中队指导员兼任东屏镇、三盘乡、南璞乡指导员，即把残军人员安插到乡镇公所中进行控制；同时组织乡镇自卫队，派令：坎门鸡山联防主任，坎门镇、鸡山、黄岙、元觉等乡自卫中队长。

李丕绩伙同其他残余组织，在我玉环洋面肆意骚扰，疯狂破坏，刺探我方军事政治情报，对群众造谣、胁迫，对我玉环县进行包围，炮击扰乱，偷袭进犯。由于我军固守要害防地，给予狠狠回击，敌军屡告败退。“指挥官”叶金饶向所谓“浙南行署主任”兼“绥靖军司令”王云沛报告称：“8月24日晨袭击坎门，未得手。我叶汉渡督察长负伤，阵亡2名，失踪官兵6名；敌方伤亡未详，俘获3名，缴步枪3支。”叶金饶又有报告称：“9月13日上午9时50分，分两路由龙湾、小迭登陆，搜索前进至朝阳，将共军前哨驱逐，占领朝阳背高地；敌约二百余人占老城头高地顽抗。因地势过高、仰攻不易，屡冲未遂。下午5时30分有敌小炮向左侧高山侧射我

阵地，炮弹亦落我阵地内；我弹药消耗殆尽，迫不得已转移阵地至小迭东北高山地带；旋见水警队已开回碇西；对岸洋面灯光满布，似有敌增援模样。至10时10分撤退鹿西。恳切望补充弹药为祷。”

查我玉环县人民政府9月17日敌情报告称：“伪省府浙南行署、绥靖军司令王云沛驱使其盘踞三盘诸岛之部下七、八百人，于9月13日分乘船舰40余艘，分四路登陆”。第一路“浙南行署”第五支队、特务团约三百人为主力，符号“仁爱”，在坎门钓舸岙登陆，宣称李丕绩此次返回玉环当县长，一面大掠坎门物资，一面直扑县城；半途被我退守在凤凰山、炮台山的县大队二中队等拦截击退。第二路叶金饶部约二百人在小迭登陆；第三路叶金饶亲率特务队近百人，由龙湾登陆；第四路约二百人由大麦屿登陆；均向玉环县城进犯，志在必得。我警备旅一连及炮排开赴古城头、仰天湖迎敌。双方发生遭遇战，战斗相持三、四小时，终于击退敌人。此外，有残军乘小汽船及机帆船各一只，企图在西青码道登陆策应，因潮水关系搁浅未成。另有汽船在洋面迂回游弋，敌舰不时向我城区发炮助威。我县县大队一中队坚守城防，扼守要地，待机应敌。

敌方于“九·一三”登陆败退后，情绪恐慌惊惧，于次日（14日）“副总队长”王秋圃及副大队长杨志荣奉命率所部分别突击检查“城区”北岙街，及对防区巡查警戒。为作垂死挣扎。李丕绩以其“海军温台巡防处长”名义，加紧联络美珍舰、海城炮艇扰乱沿海，对我炮击；同时通过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电催永嘉舰、信阳舰协防洞头，对我进行炮击；并要求台湾派飞机前来轰炸我方。据李丕绩10月4日发代电：（一）据美珍舰张舰长称：该舰9月30日下午炮击小岙港帆船和坎门港内一些帆船、设防工事和宿营地，遭共军重机枪还击。10月1日拂晓航向小迭，击毁港内帆船数十只；转至坎门轰击岸上目标，遭对方还击；续航至乐清华辍港，以炮火毁灭匿泊港内帆船数十只。共计约毁坏共军方面船只百余只，人口伤亡不下二百名。（二）据海城炮艇王艇长报称：本艇9月29日下午开

往瓯江北口将匿泊之帆船数十只，全部发炮击毁。

这股国民党残余军队困守海岛，粮食不继，弹药短缺，内心恐惧万状，但他们狗急跳墙，更以百倍的疯狂向我反扑。可是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铁拳打击之下，这些残渣余孽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据《浙南日报》1949年10月12日报道：我军扫荡浙南海上残军，解放洞头诸岛。我军于10月7日拂晓，跨海在北龙、凤凰山登陆，经一小时战斗，全歼守敌240名。8日夜12时许，继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同时向黄大岙、洞头、鹿西、大俞山发起攻击，9日清晨占领诸岛，全歼守敌，俘获710余名，活捉“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副司令”朱绍高。黄大岙另计毙敌支队长丁昌周、支队附翁碧如以下40名（共计歼敌约一千名）。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及汽艇四艘。详细战果，正在清查中。（又讯）：9日，当我军占领诸岛后，敌军曾派军舰三艘反扑，但经我炮轰后，仓惶窜去。

另据我玉环县人民政府9月26日报告称：“玉环奉命动员船只150只，为解放三盘诸岛作渡海准备。”又10月9日报告称：“三盘各岛均告解放，指挥官叶金饶亦已活捉，现大批俘虏集中关押坎门。”

至此，李丕绩之流妄图重返玉环，以对人民进行反动统治的罪恶迷梦彻底破灭，得到的是自绝于人民的可耻下场。



◎ 林素菊

渔岙北山住着我家的宗族，岙口郑家是我婶婶的娘家。小时，我多次随大人去渔岙吃过喜酒，做喜事人家，天井用软箬搭起雨棚，吹鼓手的在大门口吹吹打打，堂屋张灯结彩，门上、窗上、柱上都贴上大红喜联，什么“琴瑟和鸣”、“五谷丰登”、“举案齐眉”、“五世其昌”、“今朝喜结良缘，来年早生贵子”等等。旧时娶个媳妇要经过多道手续，先是媒人说合，把双方生辰八字请算命先生“合婚”，一切如意，才送聘礼“定亲”，纯粹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隔年把、几年，要结婚了，男方择定“黄道吉日”，要“送日子”到女方，自然少不了礼物和宴请。此后，双方紧张准备嫁娶，男方主要是房子、家具、副食品、钱钞，女方包括衣箱、衣柜、被褥帐枕、茶壶、锡壶、大小木盘、木桶，连马桶都不可少，都是十分麻烦的事。许多有女儿的人家，栽苧、剥麻、劈丝、捻线，逐年积累，织成细夏布，再经染色或漂白（农村染蓝色，城镇要漂白），制成帐子、大小布袋、粗细缝线（旧时家用缝线，全用粗细苧线，要准备一大袋）。姑娘赶绣枕头、帐前、肚兜、衣鞋，家里雇请工匠制作各种木器。有的嫁女要贴赔许多钱，女儿多的，都要嫁穷，所以常说女儿是“赔钱货”。第三步才是嫁娶成婚。我在渔岙吃喜酒，都是男方娶入，宾客盈门，喜气洋洋，热闹自不待说；而外婆家嫁出小姨妈时，气氛就大不一样，喜庆中不免透几分凄凉。小姨临上轿前向外婆拜别，双膝跪下，叫一声“母亲”就哽咽泣不成声，外婆两泪双流哭出声来。据说有的人还会边哭边唱，数数落落，把事先想好熟记在心音韵和谐的语句，一一道来，内容大抵借自然界四

时八节景物为喻，抒发感情，述母女之情，别离之苦，叮咛珍重等。小姨在厨房拜过外婆，又到堂前跪外公，然后由堂舅父扶上大红花轿，四个轿夫抬起轿并不径直往前走，却在天井中前进几步，倒退几步，进退三次才出了墙门。在花轿起轿并进退时，阶上有人从“月亮桶”中抓起“茶叶米”，往轿顶撒去，堂舅父则手挽轿杠，随轿前推后拖，似乎象征娘家不舍女儿和破除“邪气”，祝新娘一路平安之意。还有一件怪事：新娘梳妆毕，额上包好皱纱，戴凤冠时，先将凤冠放在马桶沿上比试一下，然后戴到新娘头上，据说这样就不会“晕冠”（珠冠戴久了，感到沉重、不适、头晕甚至恶心）。小姨的花轿一出墙门，外公外婆连忙关门闭户（说是免得“财气”被带走），坐在灶下唏嘘，屋里顷刻冷落起来。四个女儿都嫁出了，隔山隔岙的，剩下两老在穷乡僻壤相守度日，老无所依，确实有些凄凉。

至于那些聚亲人家，喜日上午发轿迎亲，傍晚时分花轿临门，百子炮仗响个不停，喜娘到轿前扶出新娘，用两个贴着红双喜的米筛，一左一右遮着她的头，扶她登堂入房，坐定在床沿。新娘头戴凤冠，身着短蟒，项围披肩，下系大红百褶绣花罗裙，脚穿红缎绣花鞋，一身穿戴就像京戏“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一般无二，手里还拿一把精巧的褶扇，柄上吊着红罗丝帕，四周缀满小珠下垂着。新房红烛高烧，一群群、一班班亲朋好友、姑娘、小伙都来看新娘，人进人出，摩肩接踵，室外吹吹打打，热闹非凡。“拜堂”时，新郎穿戴的却是长袍礼帽，身上斜佩一条红绸，在胸前结成一个花球，有的礼帽上插两根“金花”，就像京戏里状元挂在官帽上那样，与新娘的装扮并不“同步”。三跪九叩拜过天地，父母、夫妻对拜后，婚礼也就结束。晚宴时，厅堂里、廊沿上排开许多八仙桌，新娘坐的是首席，自始至终陪坐却不陪吃；新郎则忙着给各席上菜。一桌八人，大小盘碟八至十只，一般用酱肉、鳗鲞、炸虾之类，其中常有一盘烫芹菜，上撒白糖，吃时加点醋，以解油腻。碟子里是

“火棍糖”、芝麻花生片和柑桔等，孩子最爱吃。菜肴和炒盘也有十来道，大抵是鸡、鱼、肉、海参、炮胶、肉丸、鱼面等，炒盘为录豆粉丝和年糕，最后一碗甜汤，多半用白扁豆、莲子、红枣，宣告酒宴结束。接下去还上一大碗什锦汤菜，要再吃点饭的人可以继续坐着，到酒足饭饱为止。席上还兴“分配”，无论糖果和炸虾之类干燥食品，常由席中年长的人一分到各人面前，席终时客人就用手巾包起来拿走。宴罢，男人们都去打牌玩耍，妇女们三三两两说长道短，小伙子们就去闹新房。习俗“新娘三日无大小”，不论辈份长幼，年纪大小，人人都可向新娘开玩笑，农村闹房甚不文明，有的还动手动脚，新娘甚至被戏弄得哭起来。深夜“送洞房”，新房里摆上一桌酒宴，和新郎要好的“哥们”坐了一桌，新郎、新娘陪客劝酒，席散，天色将明，才能关门休息，有的淘气的小伙子，还要等新人倦极熟睡时，破门入室偷取衣物，索要红鸡蛋、香烟赎取。

次日，新娘换戴“龙额”（凤冠是满头珠翠，戴上后看不到头发；“龙额”只有前半，后半空着，只在发髻处悬有一块珠缀的发髻盖），穿上紧身缎袄的绣花裙，比头一天“轻装”不少。上午“端糖茶”是新娘“大进账”的时候，伴娘们一个端着托盘，上摆几个“焖碗”，内盛西洋参桂圆茶，多个“汤盏”，盛红糖红枣茶；一个手提两只茶壶，分装两种饮料，随时向碗盏中加添；一个拿着席子、红，屁股后再跟一串好耍的小伙和看热闹的孩子。新娘先拜见公婆，再一一拜会长辈亲戚，伴娘向新娘介绍称谓，新娘就喊一声再跪拜奉茶，客人取出事先备好的“见面钱”红包，放入托盘。平辈的一般送红糖茶，白吃居多。这样走遍各房，会遍亲朋戚友，接着去厨房拜灶神爷，有的还要新娘到灶头动动菜刀，灶下吹吹“火棍”，拜猪栏、牛栏，大概是因为新娘三日后要下厨房劳动，祝愿诸事顺利六畜兴旺吧。在跪拜过程中，有的顽皮小伙还偷偷红毡中夹放石子，老练的新娘都要亲手将铺好的红毡捡起抖上几抖才下跪。端糖

茶毕，日几近午，回房时又吃了闭门羹，喜闹的小伙早抢先进房门好房门，于是门里门外讨价还价，索要多少双红鸡蛋。那时女儿出嫁，都要准备很多煮熟染红的鸡蛋和肚兜、手巾，分送亲友和办喜事的“相帮客”。旧时老人、小孩都戴肚兜护腹，嫁妆肚兜制作比较精致，项下和两角都用绸缎绣花的贴片；手巾早时用手机自织的面巾、脚布，后用买的毛巾。宾客一般于次日午宴后辞归，也有少数到第三天才走的。几家娶亲户中，有一家礼仪特多，婚宴当晚，首席要举行“送位”入座，由一位“伴姑”，把贵客一一鞠躬礼仪地引入座位。送洞房时，新郎的好友先在厅堂坐好，一个接一个吟唱着洞房诗，吟毕然后鱼贯入洞房宴饮，这些朋友并非诗人，但吟起洞房诗来都高雅十分。

总之，旧社会男女婚姻不能自主，都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通过一系列繁缛的礼仪，把许多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女硬拴到了一起，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爱与不爱。由于世世代代是这样男婚女嫁，多数人也就不认了“命”，生男育女过起日子；但也有不少怨偶，吵闹、反目、分居、离异，造成终身痛苦，甚至酿成悲剧。

朱自清和林铎与董运铎

● 董服官

我国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和学者朱自清，与玉环的林铎（醒民、新民）、董运铎（叔振）二人，在几十年前，有一段情缘，他们除了是师生关系外，还有文学上与友谊上的关系。

事情得从一位名叫李芳的人说起。

李、林、董三人都是朱自清的学生。1920年朱自清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教国文，林醒民这时是一师本科（旧制师范是五年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三年级学生，朱自清教他所在班的国文。1921年夏，董运铎考入浙一师，和冯雪峰同班，朱自清是他们的国文教师。李芳（漱之）比董叔振早一年（是1920年）进一师，和湖畔诗人汪静之同班。李芳是平阳鳌江人，他的国文教师也是朱自清。

浙江一师学生当时文学写作的空气比较浓厚，学生中有“晨光社”文学团体，后来成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著名作家柔石（赵平复），就是成员之一。鲁迅在《柔石小传》中，就提到柔石是晨光社的成员。在晨光社的基础上，后来又成立了“湖畔诗社”，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都是社员。朱自清当时是晨光社的顾问，也是湖畔诗社的社员。李芳是否是晨光社成员，现难以查考。他从1921年开始写新诗，笔名无隅。1922年他却离开一师，转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去学西洋画。

1923年春，朱自清到温州浙江第十中学教书，李芳从平阳家乡来温州，将他写的一卷题为《梅花》的诗稿送给朱自清，请朱先生修改并代为介绍出版。

朱自清因事忙，对李芳(无隅)的诗稿，隔了好久，还未动手。到了这年8月间，李芳得了不知名的急病，一二天内便死在上海。那时朱自清并不知这个噩耗，正利用暑假在整理李芳的诗稿，到了次年即1924年2月，诗稿整理完毕，共删去24首，改了若干处，并于2月23日写了序。之后，到处托人找出版单位，可是到处碰壁。就这样，匆匆过了4年，直到1928年，才有上海开明书店同意出版。

在这4年中，林醒民一直关心李芳的诗集《梅花》的出版。朱自清在《梅花后记》中写着：“我在序里略略提到过林醒民君，他真是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刚改过的诗稿，端端正正地抄了一遍，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找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有一件事，朱自清可能记错了，他说林醒民去年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林铎与董运铎这两人的名字都带有一个“铎字”，又都是玉环人。朱自清很可能将两人混淆在一起，将董做的一些事，移到林的身上去了。

据我所知，林先生并没有去南洋，去南洋的是家叔董叔振。他是由家父仲开于1928年之前带他去南洋的。家叔在南洋曾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学校担任校长，1931年“9·18事变”后，因允许该校师生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而被英国殖民政府驱逐出境，途经

香港时，又被港英殖民当局无理扣留了两个月，并没收了所有财物，空手返回玉环。

在我祖母房内的一个书箱中，发现有十多封朱自清写给家叔的信。信封是旧式样，中间有红色框框，朱自清用小楷毛笔直行书写，格式如下：

玉环环山小学转
董叔振先生收(有时也写作董运铎先生)
朱自清寄
×月×日

字迹清秀端庄，看了后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那时不过只是个小学生，知道“朱自清”这个名字，可能是家中的书刊中，有作者朱自清的署名，我才知道朱自清是个作家。我大约是看过一封信，由于看不懂，就不再看其它几封，现在我对曾阅读过的那一封信的内容，竟然毫无印象。后来我进了中学，想再看看这批信，但那个藏书和信的箱子，已被移到一个阁楼上。我在一个暑假中曾上阁楼去看，只见书箱中的书被倾斜在地板上，杂乱堆放，阁楼又黑又脏又矮又闷气，点了蜡烛，但没有发现这批信。信的内容究竟讲些什么，因为没有实物，也不曾看过，当然很难肯定。但从朱自清的《<梅花>后记》中所记的一段话来看，很可能与李芳(无隅)的诗集有关。

这些信的失落，当然是个很大的损失。因为它不仅可以了解朱自清与董叔振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必然有助于了解与研究中国著名作家朱自清的文学活动。

既然朱自清有信给董叔振，也必须会有信给林醒民的。不知林先生的子女亲属崇汉、崇明等可曾看到朱自清写来的信！

本文作者已于1998年3月20日因患癌症亡故

玉环董、毛两派斗争种种

■ 蔡蔚文

毛止熙与董运铎，一个是温台护航队队长（地方实力派），一个是国民党玉环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前，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各自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形成两股封建势力，是旧社会政坛叱咤风云人物，互相角逐，各有千秋。群众习惯称为“毛派”、“董派”。当时楚门区各乡镇长，基本上都是属毛派控制，他们仰其鼻息，唯命是从，故毛止熙有“港北天盖”、“港北土皇帝”之称。

1946年6月，玉环县临时参议会奉令解散，重新选举参议员（每乡一名），7月1日要成立正式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是毛、董两派集中争夺的焦点。董运铎是今环城乡人，当时隶属环山镇，它是董的基本地盘，无人敢于染指，毛止熙指使好友姚绍虞参加区域选举，进行竞选，明目张胆与董派分庭抗礼，他运用各种手段，击败董运铎，运当选为环山镇参议员，毛派第一次在董的禁区内取得胜利。

毛止熙虽称“港北天盖”，但实际并不尽然，港北还有个清港乡乡长王旭初与董运铎有着微妙关系，王旭初常说，止熙是港北王，我是清港王，谁也吃不了谁。县参议员选举，董毛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港北的王旭初，倒向董边，港南的姚绍虞投向毛派，形成互有得失之势。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尚难逆料。

当时三盘区有三个乡属玉环县管辖，三青团头目朱仁暘手中掌握着三盘区三张选票，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看风驶舵，待价而沽，董派抢先一步，期许朱仁暘出任副议长，把三盘区三票收入囊中，毛派棋输一着，全县参议员人数董派占先，议长一席为董派得力干将吴起芳当选，朱仁暘副之，毛派败北，十分气馁。

1947年“国大”选举，毛派一定要卷土重来，拼死一搏，毛派推出留学比利时获政治外交硕士的胞弟毛光熙，董派推出黄埔三期的王祥麟，双方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仅资历超人，而且财力雄厚，毛派接受议长选举失败的教训，在清港首先软硬兼施攻下清港的王旭初，乘机涉足港南，拉拢倒戈将军朱仁暘、弃董投毛。还以轻机枪致赠地下党，求得地下党的支持。毛派三管齐下，志在必得，董派也不甘示弱，王祥麟借重地方党部的全力支持，多方开展强大攻势，双方势均力敌，难分彼此，剑拔弩张，已到达白热化的程度，毛止熙也不断扬言，如果毛光熙落选，王祥麟也别想活着当国大代表。

当时全国的选举形势也十分严峻，地方派系斗争十分激烈，有的还用武装介入，死了不少人，有的候选人抬棺到南京请愿，争不到国大代表，以死相殉，国民党最高当局有鉴于此，作出改竞选为竞圈的决定，对争议激烈的地区，国大代表由中央圈定，不由地方选举。毛光熙、王祥麟获此信息以后，争相赴南京活动，各人都有后台，看谁招数高，最后还是毛光熙棋高一筹，获得中央提名，王祥麟并不服气，这是强奸民意，他坚持地方民选。双方厉兵秣马，一场选举火拼，一触即发。

玉环县长王思本左右为难，既要贯彻中央旨意，又不能挑起地方事端，他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两全之计，他召开了一个有各界60多人参加的地方会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国大代表”任期六年，毛、王各任三年，前三年由毛光熙担任，后三年由王祥麟接任。各界人士也都认为这个办法是最佳选择，是双赢的办法，又照顾到双方的面子，毛方认为出任前三年可以接受，后三年的形势又有谁知，王方见大势已去，只得差强人意，勉强屈从，一场剑拔弩张的“国大选举”总算落下帷幕，王祥麟化去百两黄金，只落得个“三年候补”，只好自认悔气。

1948年毛派乘“国大”胜选之余威，毛止熙捞了个玉环县长

的宝座，以父母官的淫威坐镇玉环，董派人士纷纷走出，远走高飞，参议会议长吴起芳隐居不出，由坎门毛派人士林式民接充议长，副议长朱仁旻只捞了个民教馆长的小官，从此董派一蹶不振，毛派一统大港南北。

好景不常，玉环解放，毛止熙做了俘虏，从此毛派、董派的势力连根拔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记港北党内二次支毛会议

★ 王詠樵

1947年秋，蒋介石抛出假民主真独裁的招牌，大耍召开伪“国大”选举伪“总统”“还政于民”的闹剧，全国各县市都进行“国大”代表选举，玉环县竞选国大代表的是毛光熙和王祥麟。毛光熙楚门山里人，比利时鲁文大学政治外交硕士。有地方实力派势力支撑，王祥麟是黄埔三期生，有国民党地方党部为他作后盾，双方实力雄厚，旗鼓相当。毛光熙家兄毛止熙倾全力支持毛光熙当选，当时我受地下党指派担任外塘乡乡长。毛氏两兄弟两次来外塘乡向我打招呼，要我支持毛光熙，毛止熙还列席外塘乡乡民代表会（10个保，每保2人，共20人），毛止熙用茶点招待乡民代表。毛止熙在会上恳求乡民代表支持毛光熙，乡民代表一致表示同意，推荐毛光熙为玉环县国大代表候选人。

同年冬，国民党楚门区党部，召开楚门区8乡镇关于提名毛光熙为“国大”代表候选人的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楚门镇长李植人，清港乡长王旭初，芳杜乡长赵仁岳，桐丽乡长张诚仕，干江乡长应万春，密溪乡长罗亚，鸡山乡长王潇，以及外塘乡长是我，列席指导的有县长王思本，民政科林科长，地方绅士有陈愚亭、徐惠南、耿舜钦，会议由楚门区长罗以林主持，会前我得到地下党丁世祥、郑梅欣的指示，要我支持毛光熙。于是我在会上对毛光熙的资历为人推崇了一番，当时七个乡镇长先后附和没有人异议，会议一致胜利通过了推荐毛光熙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囊括了港北八乡镇的全部选票。

第二次是1947年10月9日（农历8月25日）上午，地点在我家由我组织，召开地下党和毛方关于国大代表选举交换条件座谈会，

地下党方面参加的有郑梅欣、郑少芳、胡云祥(当时尚未叛变)和我,毛方代表有毛止熙、毛礼联等人,当时的交换条件是地下党在港北八乡镇一致支持毛光熙,港南有部份乡镇支持。毛方的交换条件是赠送地下党一挺白郎宁轻机枪,谈判结束已11时,除毛止熙有事先走一步,其余代表都留在我家午餐,双方代表频频举杯祝贺这次谈判获得圆满成功,下午五时左右,毛止熙叫他的勤务兵黄永昌送来白郎宁轻机枪,但无颗粒子弹。大家深感毛止熙态度不诚对国民党还心存幻想。

毛止熙其人其事

※ 朱仁巴整理

毛止熙是解放前国民党玉环县末任县长,玉环解放时被俘。宽大释放后,重又参加特务组织,1950年在上海伏法,时年46岁。

毛止熙自称“港北王”知其名的人不少,知其详的人却不多。现根据郑梅欣、王泳樵、张仁坤、张炳文、蔡蔚文等人来稿,以及我自己所知道的,综合整理如下。

毛止熙,1904年出生于楚门密溪乡山里村。祖上是从温岭迁徙而来,当时同来的有毛叶陈三姓,后来叶陈二姓无声无息,唯独毛姓一家经几代人的努力靠经营山货发家致富,积聚良田千亩,成为楚门一方豪富。

毛止熙有兄弟三人,二弟光熙,三弟定年,有一妹名素英,三外张韩家,现与光熙都在台湾。

毛止熙幼年时期,父亲遭“海匪”绑架,勒索八千银园赎回,这八千银园当时不是少数目,要用好几个后生挑去,毛家人怎不锥心的痛。在毛止熙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要在山里立足,官府不怕,它鞭长莫及,陆上的、海上的各路“英雄”都要结交,方能自保。所以他以后的生涯中,结交“海上”,支持红十三军应保寿,联络“三五”(指浙南地下党)无不从这个潜在意识发酵。

1910年毛止熙六岁,毛父延聘城关秀才陈子英(大袭父亲)入舍家教。8—16岁,到楚门养正书院新旧学并读,颇有长进。1921年负笈杭州,入旧制宗文中学就读,后又去上海政法大学深造(二校均未毕业)。

1927年22岁,毛止熙到徐州,被北洋军阀任命为扩编师团长,因未成团返回楚门。

1929年24岁，毛止熙在家乡期间，不但联络“海上”，还大力支助陆上红十三军二团楚门游击大队大队长应保寿，被玉环县长张玉麟通缉，只身逃往上海，匿居在法租界。

同年闽变发生，毛止熙被任命为讨逆军总指挥部副官长，闽变平息后，毛止熙在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工作。

1937年抗战军兴，毛止熙被任命为浙江省别动大队大队长兼玉环县模范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驻花岩浦。因部队纪律松弛，侵扰地方，为害百姓，屡被百姓告发，再加毛止熙妄自尊大，藐视上峰，打电话给玉环县长方引之自称“老毛”，方引之大为不悦，旋以部队侵扰地方予以逮捕法办，部队被缴械，毛止熙押解金华入狱，后经多方疏通，出狱后在诸(暨)嵎(县)新(昌)宁(海)游击总队任军法官，驻乐清县城关白马寺。

1942年，省里决定收编温台沿海“土匪”成立温台外海护航总队，毛止熙应召协助收编工作，事成后毛止熙被任命为护航总队上校副总队长(总队长是外海水警察局长陈佑华兼，另一副总队长是温州戴复权，二人都不常驻办公)，毛止熙常驻办公，总队部设在温岭梅溪小明因寺。

1943年为加强对沿海护航部队军风纪教育，上峰决定成立护航教导队，由毛止熙出任上校队长，队部驻温岭街张老桥应家大当内。下辖三个中队，其中一个为机炮中队，教导队的士兵，虽来自地方招募，其军纪并没有比收编部队好多少，自身不正何以教人，教导队持续了一年时间，1944年上峰撤销教导队番号，改为护航第一大队，毛止熙仍任上校大队长。大队部仍驻张老桥应家大当，部队分驻在江夏沙山塘一线，担负着御敌守土的重任，兼负海上商旅护航工作。

毛止熙深知要在乐清湾海上护航，就必须取得浙南游击队海上部队的支持，毛止熙通过关系，和海上部队取得联系，并订有协议，凡海上有护航队护航的船只，海上部队不予干扰顺利放行，护航费

收入，有一定比例给海上部队(具体数目不详)。

1945年元旦(农历11月18日)，日寇一部在沙山塘登陆，企图进犯温岭县城，在东门山被护航一中队打退，敌向坞根方向窜去，捍卫了温岭县城免受蹂躏，受到温岭县政府表彰。

同年3月，上峰命令，毛止熙护航第一大队开赴虹桥，配合浙保四团征剿浙南游击队，毛部到达虹桥，即命他的儿子礼联(原来与浙南地下党有联系)，通知浙南游击队，说自己是奉命来的，决不放一枪，当晚因联络点撤离，毛礼联没有接上关系，毛止熙在虹桥只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借口江夏有敌情，便把部队开回江夏。

1945年3月19日，楚门第二次沦陷，毛止熙自动请缨，率部进驻清港保卫家乡，会同玉环自卫队、盐警队，还有驻温岭护航队一个中队，准备打一仗楚门反攻战，省里任命毛止熙为总指挥，毛止熙自持兵强力壮，楚门守敌不过百余人，大多是乌军，自己有人枪千余，且有迫击炮，重机枪配备，一旦发起反攻，敌便会闻风而逃，他骄傲轻敌，不听友军宜夜袭不宜白天进攻的劝告，定要在白天强行攻城。上午第一线部队进至夏洪施，被埋伏在北门城头的敌机枪疯狂扫射，护航一中队士兵阵亡七人，受伤多人，中队长李庆祥身负重伤，被战士背下火线。前线部队只好撤下来，楚门反攻战损兵折将，这一仗虽未打好，也给敌人以很大震慑，敌不敢在楚门久留，未几撤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台湾有一日本商船，满载白糖，从南北行，驶至坎门洋面，闻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商船不敢北上，就停泊在坎门洋面，被驻坎门护航部队截获，连人带船开至江夏待命，毛止熙命令白糖起岸，船舶放回，将押运的日本人扣押在张老桥部队。

过了几天，毛部奉命北开，毛止熙以潜逃格毙名枪杀了那个日本人，一船白糖全部照收，因乱世无人追究，他上下打点了一些，

大部份攫为己有，从而发了一笔小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留在台州境内的日军先后北撤，据可靠情报，敌一部200多人，从黄岩经临海徒步北撤，毛部奉命“跟踪追击、不脱离敌踪”，毛止熙率护航第一大队，上午从温峤出发，经黄岩院桥，当晚到达乌岩，吃过晚饭，连夜翻越小桐岩岭，山高路陡，又逢漂泼大雨、山路泥泞、部队冒雨前进，个个淋得如落汤鸡，直至拂晓，到达山顶扎营，在前沿有利地形布置阵地守株待敌。上午八时左右，从临海至大田路上，有10多名敌兵缓缓前行，前沿传令兵来请示要否打，参谋长郑汉昭说，这是敌人的尖兵班，随后必有大部队要来，打了尖兵班，要影响打后面的大部队，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面果然有二、三百人的大部队，士兵荷枪实弹，民伕肩挑背抗，马匹驮着大炮，逶迤前进，待至进入伏击圈，毛止熙命令狠狠的打，顿时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猛力发威，枪炮声隆隆，震撼山谷，敌闻声随即四散就地埋伏，我方打了一阵之后，敌人见我方的炮火距离很远，根本打不到他们的阵地，然后列队继续缓缓北行。等敌人过去以后，护航部队下山搜索，没有俘获一个敌人，缴获一支枪，只有一个民伕病倒在路边呻吟，毛止熙用无线电向上峰报告，小桐岩伏击战，打死打伤多少敌人，缴获多少枪支，邀功请赏。

最难原谅的还是部队在回程路上，到达每个村庄，士兵挨家挨户的进去翻箱倒笼，抢劫财物，老百姓怨声载道，敌人过境没有损失，反被自己的部队洗劫一空，毛止熙鞭长莫及，那里管得了这许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护航队奉命解散，毛止熙把部份枪支弹药（包括轻重机枪、步枪、木壳卡宾等足够一个连的装备）攫为己有，私藏在山里家中。自己到上海和韩约渔，毛光熙三人合伙购置航琛轮，从事航运商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止熙和浙南地下党的关系还是

比较正常的，隐蔽在楚门东方小学内的地下党组织，有时一些重要会议也曾放在山里毛家召开，因病的地下党同志到山里毛家治养，都得到毛止熙大老婆的热忱款待，原玉环特派员叶龄银同志至今还提起毛止熙大老婆对他的关顾之情。

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毛止熙倾全力支持其弟毛光熙当选，竞选对象是国民党全力支持的黄埔三期生王祥麟，毛止熙曾扬言，如果毛光熙落选，王祥麟也别想活着当“国大代表”，本辑《榴屿纵横》栏内蔡蔚文有文章记述“国大代表”选举情况。为了争取地下党支持毛光熙当选，毛止熙以白郎宁轻机枪送给浙南游击队。本辑《榴屿纵横》栏内王泳樵有文章记述这次送枪经过。

1947年毛光熙当选“国大代表”以后，毛止熙拿着国民党中央委员萧铮的介绍信，去杭州觐见浙江省主席陈仪，其时玉环县长王思本，在玉环的政绩不佳，连连出事，陈仪正想换马，苦无适当人选，此刻见毛止熙的到来，似有属意，但不知毛止熙是否有此能耐，能否担当此任？毛止熙在陈仪面前，大夸海口，说自己有多少枪支、地方势力又如何雄厚，玉环几个土“三五”，根本不在话下，毛止熙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得眉飞色舞，陈仪听了也十分欣赏。告别时毛止熙已走得很远，回头看时，陈仪还在门口目送。毛止熙十分得意，逢人便夸耀这次会见经过。不久省府公布，任命毛止熙为玉环县长。

毛光熙获知家兄出任玉环县长，十分惊怵，他认为本地人不宜在本地当县长，何况对手又是浙南地下党，但木已成舟，只好听之任之。也有人说，天都快亮了，还去当县长，岂不代人受过。毛止熙毫不在乎，还大大咧咧的说：“我当县长，井水不犯河水，等大军过江（指解放军打过长江）我打开城门，迎接‘三五’进城，不就万事大结了。”毛止熙也把这层意思，吹风给浙南地下党。

毛止熙的初衷，不能说就有坏心眼，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能遂人所愿，他的如意算盘一档也没有拨成功。毛止熙上任不久，陡门

头国民党死硬份子董景山被“三五”拖牛(绑架)走了,毛止熙火冒三丈,认为“三五”不仗义,给他的下马威也实在太难堪了,小不忍则乱大谋。毛止熙到山里老家搬武器,准备回敬“三五”,没料到浙南游击队在小竹岗岭头缴了毛止熙的枪,轻重武器全部照收,如果不是毛止熙和大老婆吵架,迟来一步,连他本人也乖乖的当了俘虏。枪被缴后,毛止熙气急败坏,赤膊上阵,明伙执仗的与地下党对着干,一面公告通缉丁世祥等人,一面拼凑了400多人的队伍,配备了精良武器,亲自率领到清港、芳杜、凡塘等地先后进行六次“围剿”,由于地下党有广大群众掩护,应变及时,回旋有方,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有一些无辜的革命群众和党员家属,被抓去关押、拷打,备受折磨,毛止熙的“清剿”计划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1949年4月6日玉环解放,俘虏了毛止熙,本辑《革命风云录》栏盛世樵同志有文章记述毛止熙被俘被释经过。这是毛止熙走向反面,与人民为敌,历史给他铸就的应有下场。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毛止熙连做梦都想当县长,他说当县长可以入县志,1994年出版的《玉环县志》,毛止熙作为反面人物,进入县志的座标。

1949年五月,毛止熙被宽大释放后,隐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多伦路余庆里6号私寓,终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深居简出。

同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市内一片欢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云霄,这与毛止熙格格不入,他不甘寂寞,与臭味相投的原北四川路警察分局局长邹某,一起跑到舟山(当时上海已解放,舟山未解放,却有客轮相通),找到邹的老上司舟山江防司令,苦诉自己的悲凄景况,“司令”安慰他二人说:共产党在上海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他已准备再添一艘从舟山至上海的客轮叫他二人到客轮上工作,主要是收集军事情报,毛止熙听了喜上眉梢,不顾自己是宽大释放,终于又再上贼船,继续与人民为敌。

邹毛二人的家眷都在上海,需要接到舟山来,邹某说自己的身份不便去上海,毛止熙是宽大释放,去上海无妨,毛止熙到达上海,邹妻正重病在床,不能行动,只好等待,一俟邹妻病体稍愈,即便束装,毛止熙在上海滞留了一段时间,不料有人告密,据说是内部有人反水,东窗事发,上海市公安局拘捕了毛止熙。

1950年10月,毛止熙在狱中传信给他的次子毛礼联,叫他设法营救,毛礼联在温州遇到玉环县委书记丁世祥,告以乃父关在上海市公安局,丁世祥同志闻讯就在温州借调四名武警,办好手续,直接去上海递解毛止熙回玉环原籍处理。4名武警到达上海,毛止熙已伏法,狱中在押有一名原国民党玉环县党部书记长董运铎,被4名武警解回。

毛止熙从此结束了年仅46岁的生命,给下代子孙留下并不光彩的下场。

清港玉陞桥建桥始末

△ 林北佩

清港玉陞桥始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为六墩七孔,按现存的桥墩跨径推算,当时桥长约70米,后在历次修建中,因两岸不断淤涨,桥长也随之缩短。1936年大桥修建,以钢筋混凝土作大梁,替换大木梁,减至四墩五孔。1983年国家补助二万余元重修,至翌年竣工,桥型由平板桥改为拱桥,并撤去石板铺面,代之以钢筋混凝土浇注。桥墩除西座为原物,加固利用外,其余都是现代结构,桥长32.2米,宽3.3米,镀锌钢管栏杆,当中有“玉陞桥”喷漆楷书。西隔二百米处为公路大桥,两桥相映,十分壮观。

玉陞桥初建时,桥墩用精选青石划块,经精雕细琢而成。取材严谨,基础扎实,百余年来屹立无恙。桥墩间距十米,桥梁用大杉木横架,桥面所铺石板,长宽一律并无差距;两边在板栏杆榫接,也无高低长短之差。工程之浩大,实为玉环建桥史之最。殊不知这一造福后人的大工程,竟出于两个苦行僧之手。

道光年间(1821—1850年),清港是乐清湾的一条可航水道。当时,帆船乘潮可以驶抵芳陡(清港上游)。两岸居民南北往来靠渡船,交通甚不方便。一天,有个僧人赶到渡口,但船已离岸。僧人央求船夫搭渡,船夫嫌他来迟,不予回船载渡。僧人发誓要在渡口造桥方便众生,宁愿自己苦行一生。从此,他奔走平阳、瑞安等地托钵募化。他每至一地,便坐山唸经,为地方祈福消灾,遇到酷暑严寒也不少懈。乡人深受感动,轮流送斋上山,并自发为造桥捐资。如此经历十年艰辛,积得一笔巨款存于当地豪绅家,没料被他一口吞没。僧人投诉无门,自知既不能实现夙愿,又有负各地施主,怨愤交加,便一病不起。

老僧死后,弟子继承师父未竟事业,继续为建桥劝募。获各地善男信女的资助积成巨款,又得小筠岗李善人独力用小龙王石板铺桥面。他吸收师父前功尽弃的教训,商求地方有声望的士绅出来主持造桥,成立了建桥董事会,代他筹办备料酬工等建桥事项。

咸丰三年大桥建成,后人为纪念老僧人建桥有功,以他的法名称为“玉陞桥”,并塑师徒石像于桥堍的土地祠中。

玉陞桥落成大典那天,玉环厅同知亲自去“开桥”(剪彩),恰逢有大红花轿过往,同知就让新娘“开桥”。新娘下轿,一边走,一边念:“新人开新桥,新桥万年牢。保得奴奴生贵子,老爷做官步步高。”观众听了拍手赞好,同知当即赏给花粉银。此事后人一直传为美谈。

大桥竣工后,尚有余资,曾置田地数十亩生息,并在桥北建店面二十余间租税,后称“玉陞桥众”,以备日后修桥之需。嗣后居民兴建店铺,街道逐渐形成,市容日趋繁荣。

光绪年间,大桥年久失修,桥众资金被人吞没,庙湾有个姓张的农民,把石像背到玉环厅告状。同知明白“玉陞桥众”首事管钱不管桥,便勒令首事限期修竣。那个姓张的农民也被后人传颂至今。

柏树台门与郑氏家属的传说

○ 郑东恩

凡到过芳杜柏台村的人，大概都知道由两株柏树枝叶相叠形成似台门的古老柏树，柏台村也由此得名。这两株柏树也怪，一株会开花却不会结籽，另一株不会开花反而会结籽。一九九八年八月玉环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它们列为重点保护文物，两株柏树四周有不锈钢护杆围成，供人参观欣赏。

说起两棵柏树，它与郑氏一门有着源远流长、唇齿相依的关系。

远在明洪武年初，泽国丹崖郑偃第十四代裔孙隆甫因游历至大雷山脚，见其地十里平川，土地肥沃，遂邀弟葱甫来此定居。时给一家刘姓做事，后娶童氏为妻，生三子，长子仁宽，次子仁信，三子仁惠，生息繁衍，田耕地作。

某日，有风水先生路经此地，给刘姓看风水。隆甫生性好客，厚待先生，并敬请他给自己找一块好地。先生见此人仁义宽厚，借给刘姓看风水时，给他选了块好地，嘱咐他日后须如此如此安葬，郑氏子孙日后可有一斛芝麻官波此各地，否则，子孙无名，更无出息。

约在永乐年末，隆甫溘然逝去，子孙按父训，挑吉日为父入葬，原本三跪一拜送殡，哪知时逢暴雨，便匆匆安葬了事。

不久，时逢大旱，楚门外塘到徐都一带地下冒黄水，百姓苦不堪言，一道士掐指神算，知道是隆甫与九支田郑氏坟墓作怪，就纠集了許多人，在一个黑灯瞎火的夜晚，摸到坟前，三下五除二，把墓冢扒个精光，将尸体拖到外塘抛向大海。

没过多久，天下甘霖，风调雨顺，百姓依旧过着田耕劳作，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而隆甫的宅院门外长出这二株奇怪的柏树来。

另一传说是刘姓一家自隆甫死后，断了香火，刘家主人临死前特意栽了二株柏树也想叫郑氏一门断子断孙。

翻开《郑氏家谱》，经过六百多年沧桑演变，郑氏一脉生生息息，迁徙散居，竟无一人成名成家，没有一个当大官，均是百姓人家。然而，这二株柏树却至今依旧傲然挺立，枝丰叶茂。

笔者年少时，听老人言，郑氏在清时曾出现地方名士，门前有二尊上马石凳下马石凳、六块石头，其中外进第二块石头为红色。家中客人络绎不绝。可惜这二尊上下马石凳在1958年修筑芳杜水库时拿出修水库了，四条石条拿去修侨铺路，至今不见踪影。

文革时期，笔者曾亲眼目睹这二株柏树受尽了磨难。那时茅柴价格不菲，有人竟砍枝入灶，儿童玩耍竟拿干柴在树下焚火取暖，古历八九月，山上茅柴成担成捆砍来以树为支架叠柴、储藏……

不论怎样，这二株柏树照样充满了生机，由于是奇树，惹得芳杜柏树台门出了名，郑氏一门也由此扬了名。

楚门观音堂 剪影

◇ 唐小友

楚门观音堂，座落于楚门镇东门外谷水村，北面紧靠谷水长河，南面是风景秀丽的龟山；东面是峰峦重迭的筠岗山，西面是美丽的湖心公园。把整个观音堂衬托得更加幽静清逸，港北的女僧和信众大多云集在此念经礼佛。

一、观音堂历史沿革

楚门观音堂，始建于清道光廿六年(1846)，女僧普振、弟子化芳、化宽三人合力募化建造。后僧尼增多，到了咸丰二年(1852)重建东面楼屋庆福堂，立碑申明师兄弟之间各立门户。

到了咸丰六年(1856)，在庆福堂的东边，又新建了一座四合一院式的广福堂。女僧应才、从芳分二户念经度日。从此，普福堂、广庆堂、广福堂三堂并列相连，共有屋宇五、六十间，占地面积约十几亩。统称为观音堂。

民国初年，女僧发展到10户41人。其生活来源主要靠帮工、纺纱、织布、种田、砍柴等维持。

解放初期，受破除迷信影响，大部分尼众还俗嫁人，部分殿堂亦被占用。只留得慧茂、慧性、夏妹、智琴等少数尼众坚持农禅并举。1980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先后逐步归还被占用殿堂房产，除广庆堂全部拆除外，其余房产全部得到落实归还。1982年，普福堂佛殿修葺一新，恢复正常的佛教活动。部分尼众重新回堂礼佛，且有一批青年女僧，皈依佛门，增添了观音堂的新鲜血液。

到了1992年，云集在观音堂进行佛事活动的信徒、信众越来越多，原来古老、矮小的殿堂，不适宜现代佛教活动了，由堂门当家大师尼慧茂牵头全堂尼众鼎力相助，参访温州妙果寺大雄宝殿形

式，重新拆除扩建。接着，两边厢房楼阁亦分别拆除修建。德高望重的英净师太她的亲属，从台湾汇来她个人养老生活费近十万元钱，全部捐赠建造观音堂的四间厢房、阁楼，按现代款式，全部装璜一新。现在的楚门观音堂，殿宇巍峨，琉璃瓦光芒四射，殿堂内金碧辉煌，佛像金光闪闪，甚是雄伟壮丽。

二、尼慧茂劳苦功高

提起当家尼慧茂大师，凡是玉环佛教界的信徒、信众，都认为是她使观音堂起死回生，她是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的功德无量之僧。

慧茂大师，出生于楚门镇外塘村，早在四岁时，就出家来到楚门观音堂，跟随师父学经兼做堂内杂务。到18岁时剃度受戒，皈依三宝。面对楚门街上的花花世界，慧茂自性清净无染就是戒；自性寂然不动就是定；自性观照无碍就是慧。可见慧茂大师戒、定、慧自性具全了，就能抵制一切形形色色的邪念、恶念。在她的模范言行影响下，楚门观音堂的一班尼众，戒律森严，信仰纯正，堂威越来越高，进堂烧香拜佛的信徒、信众越来越多。到了1985年10月5日，成立县首届佛教协会时，慧茂大师被推选首任会长。而后，又担任县政协委员。进入参政议政活动，成为爱国爱教的楷模。

慧茂大师热心佛教事业，日理佛教大小事务，早晚静心修持佛法，并帮助各寺庵及众生排忧解难，济贫救急，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深得道友、信众的赞扬。

楚门观音堂，号称集体丛林，实为分体子孙堂，堂中分为普福堂、广庆堂、广福堂，各自单独举行早晚课诵和佛事活动，而堂中的僧尼又单独分户自炊，人心不齐，时有矛盾纠纷，影响佛门声誉，慧茂大师面对这种局面，耐心细致地，不间断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在她的长期不断的工作下，终于使全堂僧众，比较协调地团结互敬了。

普福堂佛殿由于年久失修，处于危房状态，在慧茂大师的组织

带领下，将做佛事收入和四处募捐筹集到一大笔资金，进行大修建，确保了堂内僧众念经做佛事人身安全。

在第二次扩建普福堂大雄宝殿时，刚建造好殿堂梁柱，准备架榫结顶时，突然遭受强台风袭击，真是祸不单行，时值组织指挥基建的慧茂大师又身体发高烧，这可怎么了得，眼看新建的殿堂房柱就要毁于一旦，前功将弃尽的关键时刻，慧茂大师却奋不顾身，抱病亲临现场，指挥加固应急措施，在她的精心组织指挥下，台风虽强大，许多地方都遭受拔树倒屋之灾，普福堂梁柱墙壁，却安然无恙。

慧茂大师，始终坚持爱国爱教，一心扑在佛教事业上，为佛教事业孜孜不倦，鞠躬尽瘁，直至2000年7月圆寂。

慧茂大师圆寂后，由晚辈弟子见青、智源接任，佛教活动仍参照前辈在世时的形式，继续向前发扬光大，并将原来分堂立户的尼众，统一组织起来，统一按时上殿过堂，统一起居作息，统一实施佛事和法会活动。只发给念经津贴，一切牒款、乐助、佛事收入等全部归集体所有，认真贯彻以堂养堂的方针，逐步恢复和扩大殿堂设施，继承和发扬传统佛教文化。

三、观世音圣诞盛况

观音堂，顾名思义，就是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殿堂。据佛经记载，因为观音具有悲心，能让众生离苦得乐，故各观世音。在民间信仰影响非常大，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仍笃信不渝。

观音堂的圣诞，一年有三次大圣诞活动。即：二月十九日，是观世音的生辰；六月十九日，是观世音的成道之日；九月十九日，是观世音“涅（死亡）”之日。尤以六月十九日的圣诞最盛。

六月十九日这一天，全堂十三、四名尼众早晨3时30分钟，晨钟响后，随着维那敲磬三下，早课开始了，殿堂内的尼众，同口齐声，先念楞严咒、十小咒、偈颂等，约四十五分钟后，开始绕佛三圈、口宣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重复念到绕佛结束）。接着念诵：

南无皈依佛，南无皈依法，南无皈依僧……，在三皈依声中，早课结束。

八时正，壮严的大雄宝殿内，端坐着威严的尼众、优婆姨，在维那法师的领众指挥下，依次念诵《观音菩萨普门品》、《般若心经》、《大悲神咒》等经典。朗朗的经声中伴随着木鱼声声和磬声相间，节拍随经声，磬声指挥念经声，整个堂内，经声、磬声、木鱼声，响成一片，此时，还伴随着佛偈 音乐和配有录音机，甚是美妙动听，充分体现了古代佛教文化给信佛的人们一种无比喜悦的精神享受。

从六、七点钟开始，四面八方的香客信众向楚门观音堂走来，随着时间推移，香客信众越来越多，到了九、十点钟，是香客信众，聚集观音堂的高峰时刻，成群结队，鱼贯而进，霎时间，把整个观音堂的殿堂、天井，挤得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进来的香客信众，首先在佛祖、观音菩萨面前顶礼朝拜，先行五体投地朝拜礼，接着烧香、点燃蜡烛供佛，进入殿堂跟随念经，显得熟练合拍协调。人众从殿堂向走廊、天井延伸坐满了，有的附和高声朗念，有的轻轻默念，有的出去回家了，有的还在继续挤进，人来人往，犹如车水马龙。参与圣诞活动的香客信众，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年龄均在20—40岁之间，每人身上挎着一只黄色进香袋，显得整齐划一，而男性和老年人却寥寥无几。可见，新时代信佛者也逐步趋向年轻化、女性化、知识化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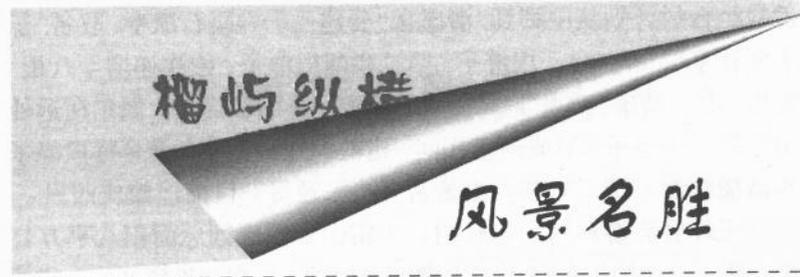
殿堂内随着三声磬声响后，由维那领众，开始绕佛，从主殿佛像前，经走廊、天井、绕回主殿三圈，口宣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重复不停地念着，敲着木鱼、敲着铜铃，声声相融合拍，前面是尼众，后面跟着长长的年轻女信众，边走边念边敲，甚是壮观。经佛后，在三皈依声中，上午念经结束。

中午，举行盛大素斋宴，从大雄宝殿到走廊及两边厢房，摆了二十几桌，每桌十人左右。每桌上的素斋都仿照荤菜式样制作，有

鱼、虾、鸡、鸭、猪、牛肉等等，形象逼真，显得活龙活现，色味极佳。充分体现了佛门的素斋，具有新时代的色彩。

下午，1时半至3时半，继续念经，形式与上午大致相同，人数逐渐减少。4至5点半钟，进入晚课仪式，形式与早课相同，经文内容却不同了，《弥陀经》、《大忏悔》、《大悲咒》等，有时还加做《放蒙山》佛事。

今年六月十九日的圣诞规模，还不及往年盛大，原因是信众流向未被批准的庙堂，这是宗教管理部门值得注意。



此处景致不寻常

※ 仙居 郭金勇

七月二十六日，炎炎夏季，烈日如火。我们观看了五千亩的世界名柚园，将建成中国最大最具有个性的江岩岛东方水国公园、大麦屿古老的石头渔村、投资四亿人民币将成为以欧美风格为主的灯塔观光渔村以及后沙海滨沙滩浴场后，去大雷山森林公园作一次“生态游”。

车子把我们玉环载到一个叫西坑的小村边。一下车，我们一行十人沿着一条据说是明清时期开拓出来的古道上山了。

约摸爬了二三公里，我们到了山顶，东面高耸着的是大雷山顶峰，这个景区的规划定位是健身休闲，森林生态。大雷山系玉环最高山峰，其东面脚下是石圻，立于山巅，可以东观日出，西看落日，登临此山当自有非凡气象。

我们沿着“横山岗”向西向下，不久便发现一座规模不大的庙宇，坐落在山坳里。近看原是一处道观，叫“清虚宫”。出清虚宫，刚在后山上见着的石亭即在身前。近观树木，翠绿欲滴，远眺山梁，绵亘不绝，山风徐来，倍感舒爽之类的描述则显太笨拙了。村人告

诉我柏台村计划从山脚到“清虚宫”要建三十六座石凉亭，取名“三十六计亭”。第一亭一根桩子，第二亭两根柱子，依次递增至八根、九根。在“清虚宫”附近将建成石亭群，以回廊连接。偶尔在远处山岩建几座亭子，形成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的景观效果。每只亭子均请楹联专家撰写对联，由著名书法家题写。目前已建成四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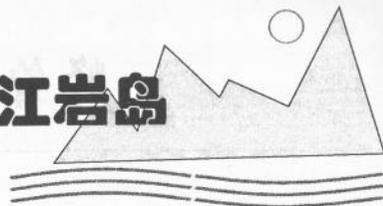
玉环县旅游局的同志介绍，大雷山景区规划总面积八平方公里，景区所在的柏台村正着手做细部规划，并欢迎投资开发。我们还了解到与三十六计亭配套的孙子殿规模较大，三座玻璃瓦盖顶的殿宇基本建成，亦是山村一景。古村落尚有千年古柏成对相依于老宅之间让人瞻仰。

呵，这个玉环最偏远的山村，出人意料地拥有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原载玉环报）

造访

江岩岛

◇ 台州日报记者 孙敏瑛



我们来到一个叫“外马道”的小码头，在那儿上了船。我们的船在青山绿水间悠悠前行。江岩岛便在眼前了，仰视能望见山顶。

岛周围非常寂静，当我们攀上一块高地，站在齐膝高的荒草里向远处眺望时，小岛西南面那些漂亮的石屋吸引了我们的视线。

我知道，那是原先岛上居民所建，那些居民因为交通及教育不便的缘故，都一户一户陆续迁到别处去了，只剩了那些空落落的屋子一幢一幢高高地矗立在那里，像旧世纪的城堡，又像童话里的宫殿。在后面，则是整片整片绵延不绝的亚热带混合林，有红松、松柏及许许多多的灌木丛，它们红的黄的绿的宽宽窄窄各不相同的枝叶交织在一起，错落有致地展现在那里，缤纷得像画。

那么美的林子里，现在到处歇息着一种有很大翅膀的岛——黑嘴鸥。它们就在树林里筑巢、憩息、繁育后代，将这一棵棵的树、一丛丛的树枝、一片片的叶子作了它们温馨的家，这里是它们欢乐的天地。无论在哪一季，无论站在岛上的哪个角落，常可以看见它们张着翅，在天空中优美的滑翔。

那片石屋正对着的下面，是一大片海滩，生长着芦苇及与芦苇非常相似的大米草，绿意蓬勃、生机盎然的，据说，那儿将会被填上沙，造一个人工的海滨浴场——我无法想像那将是一个怎样大的工程，那将花费多少的人力、物力，但我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因为，来时曾见一条环海大坝已横亘至海中央了……

我想，若干年后，我一定会再去好好看看，那时的江岩岛，也许该是另一番模样吧！

（原载玉环报）

一峰耸峙丫髻美

△ 方贵川

丫髻山突兀撑天，雄踞乐清湾入海处的漩门湾畔。据史书记载，早在清代，丫髻山就以它那丰厚的人文积淀和壮美的山光水色名闻遐迩。其顶端的“离峰红照”向为时人所重，位列“楚门八景”之首。

因此，攀登丫髻山，一睹“离峰红照”，也就成了我的未遂夙愿。

云梯般的小径从山后浦的民居间飘然升腾，陡峭如华山石级，只是两旁疯长的草木遮掩了原本的险峻气象，才使得攀缘者的步履稳健轻盈了许多。山腰处铺展的是曲径回环的羊肠山道，一侧的巨崖深谷和百尺峭壁间缭绕着丝丝寒气，直教人脚底打颤。

有道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一会，爬上两道山梁，转过三个山弯，登上了一溜覆盖山岗的裸岩。那裸岩宛如黄山光明顶一般巨石横陈，梯次铺展。岗峦处有一卧石，顶部可见三个光洁窟窿，形如圆桶，常年积水。传说仙人云游经此必在窟中濯足，故有“仙人脚桶”之谓。巨石东侧崖壁如削，重建了一栋仿石殿宇，于危崖叠石间颇见气势。殿内有一天然“仙人洞”，洞中置一古井，泉水自崖缝淙淙冒出，甘冽鲜美，常被提壶携罐的朝拜者奉为“仙水”。

山随岗转西去里许有一龙王坑，于清幽处藏有道教玉皇殿、吕祖殿、三清殿。据传，天下道教共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而丫髻山龙王坑则为道教的第七十一福地。其当年盛况，有古人江春梅在《大山头游记》里作过神描述：“殿北新建一殿，鸟革飞，珠帘画栋，益壮吕祖殿之观瞻者，玉皇楼也。登楼四望，千山万树，

眼界一空……几有岳阳大观气象万千之概焉！”惜乎岁月的沧桑抹去了往昔的风华，一座巍峨古殿不知毁于何时！好在众多道教信士们燕子垒窝般代复一代的执著经营，才让古殿的前庭后院、左堂右轩复又回荡起久违的晨钟暮鼓；才让那口“久晴不干、久雨不溢”的千年古井继续定格在丫髻山的臂弯里滋养后人；才让那周遭的樟古柏在瑞气氤氲中蓊郁成匝地浓荫。

我久久地沉浸在凭吊思古的翩翩感慨之中，感谢啁啾的山鸟和悠悠钟声牵回了我的不羁遐思……

攀登的脚步终于开始了向丫髻山主峰的最后冲刺——爬上一段陡峭的袖珍长城。它没有北京长城的雄奇、庄严，也没有临海长城的绵延、古雅。但有了这段长城的攀缘之旅后，多了一份“平步青云”的舒坦，添了一段跨越时空的豪迈。

待攀至近顶处时，见城垛一侧有一飞檐翘角的石亭，亭柱上赫然刻有原洛阳师范大学校长叶鹏教授撰写的联语：“头上青天远，人心愈净愈坦；脚下白云多，世路越走越宽。”此时，我忽然忆起了戴汉节先生书撰于丫髻山东麓山门前的另一佳联：“龟鹤无忧方益寿，山河大度自延年”。我想每一位攀登丫髻山的人们都会从这情景交融、思辨睿智的联语中获得启悟的。

“噫吁嚱，危乎高哉！”站在一峰独峙的丫髻山巅，空气是这般的甘甜清新，视野是那么的辽阔高远，心胸是如此的舒畅惬意，好一份“登高使人心旷”的壮美奋然入怀！我由衷地赞美大自然的造化神工：她像一位出色的丹青高手，在描画了“天下奇秀”的雁荡山后，又凝神运腕，斗折蛇行百余里，将雁荡余脉堆成了“奇峰高耸立，秀山白云端”（清人方铠咏丫髻山句）的丫髻山，并赋予了这座本不高大的山峦以君临一方的雄奇瑰美，从而赢得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的诗赋酬唱……

这可是雄视玉环港北半岛的第二高峰呀！举目四望：大鹿岛山色空濛，翠绿如茵；乐清湾渔舟唱晚，云鹤翔天；东海洋面波光云

影，银涛涌浪；西天一角，夕阳含山，落霞铺锦，直把丫髻山染成酡红一片。人都说，丫髻山常年云雾缭绕，望之如梳髻的美女亭亭玉立于云雾之中，煞是娇媚。而“独占光辉红到顶，朝阳照早夕阳迟”（清人叶佩衡咏丫髻山句）的万道霞光又给丫髻姑娘增添了三分羞涩，六分神韵，九分可爱！

我想，丫髻山比之于那些大山、名山，当然没有更多的显赫之处。但丫髻山真的很美，它美在迎日出、送落霞、观海涛，枕天风，一峰独特，俯视东海的阳刚和雄强。它美在富有“仙风道骨”的山魂海魄，美在跨越时空、感悟人生、神圣凝重、含蓄古典的人文情怀。它美在春天的山花烂漫，万紫千红；夏天的蓬勃茁壮、气象万千；秋天的辽阔高远、风月无边；冬天的丰神萧散、昂首云天。它美在云里雾里的袅娜朦胧；美在淡月星光下的玲珑静穆；美在丽日蓝天下、风霜雨雪中的端庄高贵。它美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可感可触，可圈可点……

于是，在攀登丫髻山之后，我分明领略到了那份勃郁的征服之美、空旷之美和遐思之美！

丫髻山上吕祖殿

○ 王詠樵

吕祖殿坐落在丫髻山上，创建于清光绪六年（1881），播下了道教种籽，原建有大殿三间，两厢平房各两间。创建人道号为坤道。原名邱圆鳌，由黄岩县大有宫分支来此，后续于公元一九一五年新建三清殿大殿一间，两侧楼屋二间，横阁楼屋各一间，为坤道常住，三清殿道坦内挖有桔井仙泉一口，水清如镜，水味醇甘，病家舀水带回煎药。视若仙水，在仙井的平台上，一九八二年由玉环县道教协会会长林辉所题的对联，上联是：一水印天心，指月证三生之果；下联是：“六根无我相，饮泉清万劫之尘”。三清殿有台门，横额书“众妙之门”。右联书“指迷特辟髻山路”，左联书“寿世长留桔井香”。时在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一年）阴历二月谷旦，王钦顺（楚门镇人）献。

“二战”时期的公元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十月，特辟为革命根据地。约在公元一九二九年初春，红十三军坞根二团（师）领导人叶景泰、叶勉秀、赵裕平、程顺昌、应保寿等当视察到楚门区最高的丫髻山时，发现该殿既是风景优美，旅游胜地，又可作为革命党人活动，隐蔽的“泽基”，前有东海退路，后有龙王避舍。于是经召集楚门农民协会党支部、楚门游击中队、芳杜游击中队、莆田游击中队、芦岙独立分队、田岙独立分队、外塘游击分队领导人，讨论研究如何选派得力助手，打入吕祖殿内，作为地下交通站等事宜，事有巧合。在会上，楚门农民协会党支部书记任高明提议：可选派原田岙“共产”以黄酒、炒面奉敬，密谈革命。一片诚意真心。在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员曾家四兄弟和颜洪福等都在此活动。大帝庙缴枪，他们在丫髻山顶作瞭望。在天灯塔前作监视。不幸，以

十年浩劫时期，吕祖殿全部被拆。

吕祖殿坐落在丫髻山头中间的平坡之上，位于玉环岛漩港北岸，面积约十平方公里。鸟瞰全貌，确以宏伟壮丽著称，水牛山、龟头山纵横于东，漩港汹涌澎湃，波涛起伏。涨潮小漩，平湖中漩，退潮大漩的漩门港直贯西北，闻名全国的文旦初植地的山外张村倚伏在丫髻山之南麓，展翅欲啼的金鸡岭耸立在丫髻山之东北，被称誉为玉环“红色堡垒”的东方小学，现扩建为东方中学的教学大楼矗立在丫髻山之东方。革命明灯与红色堡垒遥遥相望，熠熠生辉，政治之花，愈开愈盛。吕祖殿周围群山起伏，峰峦迭翠。青松红梅，馨迎丹阳，尤其丫髻山顶在春秋之晨，往往平原晴空万里，一望无垠。而顶颠云缠雾绕，宛若仙境。春夏游人如织，仙泉沁人肺腑。陆游诗云：从戎昔在山南日，强半春光醉里销。任春琴既是道学家，又是名诗人，更是冯良的爱妻，她先后赋过不少诗词，有写景的，有咏革命者的。诗意清新，词义激进，可惜早已失传。抗日战争前夕及初期玉环县著名学者林任望先生陪同英美来的牧师，登上了丫髻山，远眺漩门港，休憩松阴下，朝拜吕祖殿，惊为奇迹，叹为观止。

伟大祖国的四化建设日新月异。丫髻名山古迹再现光明。一九八二年八月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林昇辉、池崇德、陈诚兰、梁信芳、李修煜、郑诚芳、郭崇宝等热心扶持下，已重建吕祖殿大殿三间，两厢楼房各两间。三清殿修葺一新。屋上塑有两龙抢珠。灿烂夺目，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吕祖殿塑有吕祖大仙。三清殿塑有灵宝天尊，元始天尊，道德天尊，观音阁塑有大慈延寿天尊，福生无量天尊神象。接着，玉环县道教协会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成立，推选林昇辉为会长，该会附设在三清殿东首，在成立的一天，中共玉环县委统战部、中共楚门区委、龙岩乡人民政府、渡头村党支部等各级党政代表到会作重要讲话和指示，黄岩县县府宗教科、黄岩县道教协会都派代表前往祝贺。这是本县党政落实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宗教界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执行政策方针和路线的伟大胜利！

协会成立伊始，在三清殿东首，新辟有会客室，室内设备较全，布置新颖。中堂悬挂着台州地区宗教干部全体同志书赠的“白沙留月影，绿竹助秋声”的对联和柏洲书的“朋来相契深谈道，客去收心净养神”的对联各一副，古玩文物，摄影图片、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尤为珍贵的，早经订购到《道藏》一部，共三十六本，系上海新华书局发行，这部《道藏》，是东方最珍贵最值得学习的一大宝藏，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著，其中有哲学、医学。特别对养生学方面阐述得透彻详尽。所以，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指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长生不死的概念，而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这种不死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这种不死思想，如若把它转化为革命精神，是会名垂千古，永远不朽的。因此李约瑟博士的这个观点是十分精辟的，故而道教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养生的产生、发展，都同中国古代这种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联系，中国古代养生是不能发展到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新水平？确切地说，养生之道，除道教遵守外，其涉及范围甚广。如修身养性，锻炼体质等，总的目的是延年益寿，强民强国。

我国从明代正统年间刻印的《道藏》和万历年间刻印的《续道藏》，共收入图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不但集中地收到了道家哲学思想的名著。而且在探究我国传统文化上具有广泛用途，其涉及面有哲学、论理、政治、社会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道藏》中所蕴藏的与道教有密切联系的，乃是惊人之举的祖国科学技术文献。在这个以往很少开掘的宝藏中，储存了大量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重要著作，已引起国内外科学文化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和重

视。这些珍贵文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决定，由文物出版社重行影印，这是我们的福音。

为进一步把吕祖殿、三清殿建设成为我县一个有名胜古迹，又清静幽美的风景区和道教圣地，计划在三清殿后面，新建一座玉皇殿，藏经楼。在适当处所新造凉亭、新辟花园。广栽树木花草，绿化山区，美化环境。在吕祖殿前面设置生活区。有小卖部、素食店，原有担水坑为起点的石板路一条。须重新整修，两旁新栽树木。这条石板路前系任高明独资创建。花费不少人力和财力，应为后人所崇敬纪念，另计划以龙王村岙里为起点，新建石块路一条。采取民办助方针，约需建筑费十万元。如能实现，则可提供香客、旅游者在生活上的种种方便，更其重要的，在大路旁竖立宣传牌，在山门前设置宣传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教育广大群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高度树立国防观念和两个文明建设思想。

阳春二月，老战友促我登上丫髻山，饱览新建设的大好风光，使我富有凝重浑茂，豪迈清新之感觉，旧貌换新颜，今朝更好看，嘱我撰文，实一憾事，门徒琢玉成美器，拙笔写成瑰丽文章，难乎其难！但是弩马十驾，功在不舍，这就是恳切要求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虚心听取知情者反映，使我这篇资料初稿渐臻符合史实。庶飨后人，但愿阅稿指正者笔砚永朝朝，幸福真岁岁，更愿党风年年好，祖国代代红！革命先驱建勋，后起继承发扬”。寄兴抒怀，内容复杂，心驰万里，笃度晚春。

大坦里散记

☆ 陈遂雄

从楚门车站出南塘头路，沿塘头山山坡蜿蜒而上，至山嘴向西弯，只见一条黄龙般的小道卧在郁郁葱葱、挺拔参天的松柏中。踏看这条小道穿过亭亭玉立的梨树林，山坳里一块空旷的大坦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楚门镇大坦里老年活动场地。

大坦里位于塘头山山腰，离楚门街区一里多。附近有楚门古时八景之一的“离峰红照”；有传说离奇的“仙人脚桶”；有终年不涸、清澈见底的“担水坑”；有道教圣地“吕祖殿”；有高耸入云的“电视差转台”。它是一处游览、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大坦里活动场北斜侧倚山建有一座全是白石结构的三间亭，面对如美人立云端的丫髻山。亭公亭座和亭身。亭座底平台左右各有一条相背通向亭的十一级石阶。石阶沿岸有雅致的栏杆，四条栏杆顶端各蹲着一只神态各异的石狮。

登上亭座，一座长7米，宽3米，高5.6米的三间亭伫立在上。亭的中间前额石匾刻有“健身亭”三个大字。匾左右各有一方“祥云腾龙”相对的浮雕。廊柱上刻着一副“绿水青山钟秀气，苍松翠柏沃阳和”的阴文对联。亭顶雕栋翘角，檐爪四舞。亭中置有一张独足圆形石桌，四只如鼓石凳。亭周围建有舒适靠背椅。楣内周有栩栩如生的“龙凤呈祥”、“鹤鹿同春”、“松鹤延龄”、“丹凤竞艳”等七方象征吉祥、长寿的浮雕。天花板中部线雕一朵“一尘不染”的大荷花。“健身亭”造型古朴典型，是楚门继曲桥和水上凉亭后又一座目前全县独特的石建筑。

此亭由楚门镇人民政府筹资，楚门雕刻厂承建，于1991年8月竣工，共花资两万元，为老年人办了一件实事。

在旧社会，大坦里是楚门穷人葬身之地，满目荒冢，凄凉冷落，使人毛骨悚然。50年代后期，大坦里植树造林，栽培果木，披上了绿装。现苍松翠柏蔽日，芳菲四溢，老年人爱上了这个幽雅静谧的地方。

80年代，由于进一步重视老年事业，初仅有几个老人于拂晓上大坦里进行健身活动，舒展筋骨。一年复一年，至此活动的人渐增，高低不平的山坡已不适应。1990年，集资砌坎平整了一块宽广的老年锻炼场地。

如今，每日东方发白，黎光欢送着一批批老年、壮年男女健步来到大坦里树荫下、大坦上和亭内外，各凭自己的兴趣，有舞剑，有打太极拳、有跳老年迪斯科、有练气功、有做自由体操……五花八门。林木低头俯视，情不自禁地也扭动身姿，手舞足蹈，“嘻沙！嘻沙”尽情地歌唱起来。山岗张开双臂，昂首高呼：“祝大家健康长寿！”

漩门亭记

◎ 谢良福



“石楹对峙，铁索横空。兜门天然，锁钥瀛东。”古之漩门，是一条宽144米、深44米、潮差7米的山峡。潮涨汐落，激流飞湍，回旋成涡，险恶万状。摄人魂魄的涛声，数里外不绝于耳。漩门隔断玉环为南北两截，往来行人，苦于交通不便。

20世纪70年代，乡里围海健儿巧用杠杆原理，发明“蛤蟆车”驮数吨巨石，日夜苦战。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下，几经堵塌，于漩门峡中填出一条宽阔大坝来，从此天堑变通途。90年代玉环经济腾飞，交通拓宽加直，隧道贯穿南面二岭直达玉环，大道如砥。交通局着眼美化玉环门户，想行人所想，于坝之南侧营造花坛数个，设一攒尖顶翘檐六角奎石亭，名曰“漩门亭”，供人小憩、纳凉、避雨、赏景。亭为石质，六柱二门四轩，圭顶凤禽石刻，四石椅靠轩雅座，颇俱匠心。东首亭柱有一对联，为“绕眼葱茏谢公岭，隔栏碧绿琛浦渡。”西面亭柱也有一对联，为“天籁静中听水动，尘心息后候潮来。”

相传南朝宋谢灵运曾避难玉环，故在漩门南山留有谢公岭，此处百姓谢姓居多。谢公之《游名山记》中有玉环古名“木榴山”、“地肺山”记载。山水诗鼻祖到过此地，漩门风景自然渲染灵气了。

今于亭中观漩门两岸青山，葱茏叠翠，道观寺庙，错落于奇峰异石之间。大坝两侧，各成渔港，白鸥往来翻飞。有桅樯林立，布满东湾渔市码头；有油库盛景垒叠南岸峡嘴；有渔屋网箱泊满西侧泱泱碧水；有崭新渔轮修于北岸琛浦渡船闸。涨潮时，东港波浪涌接，西港丝波微澜，一海两制，风光独特。退潮时，东港西港静静

向南，勾画出两岸蛭、蚶养殖滩田，连绵成片，一望无际，生长着漩门湾两岸耕海人的希望。更有台风季节，港台日澳诸轮，避风漩门西港，入夜灯语缤纷，摇曳水中，现代音乐，流溢风弦，慰藉水手，令人劳顿尽消，梦境甜蜜，情系安宁。静待明日风歇潮生，万船齐发，重上征途。

盛世修亭，特遵交通局领导徐旭华所嘱，作此亭记。时年甲戌冬至。

话说龙潭寺

◎ 唐小友

龙潭寺，位于我县城关龙潭坑、凤凰山麓，那里松海掩映，景色迷人。寺院拥有前、中、后



三殿建筑，灰瓦黄墙，殿宇雄伟。寺院屹立在整個山丘之上，更显得挺拔峻秀，终年香火旺盛，善男信女和游客络绎不绝，成了我县的一处风景名胜。

坎坷的历程

龙潭寺始建于明末清初，初时只有五间一字形平屋建筑，名“集贤庐”。殿堂内供奉地藏菩萨、六祖惠能大师等佛像，为当地居士、信众聚会念经之处。到了宣统三年（即1911年），改名为观音堂，供奉观音大士等像。1937年间，林钦梵等居士来堂常住，将殿堂扩建，居中三间为佛殿，东西两边各建三间厢房，接纳四方善信前来顶礼朝拜，挂单膳宿，香火渐盛，龙潭寺初具规模。

1953年间，寺庙被当地乡、村拆除西厢房，香火开始冷落，殿堂亦显得破旧不堪，但仍有前来烧香拜佛的善信。

1963年后，陆续有人前来居住管理，堂内香火有所复盛。1969年，天台山国清寺僧人华池等法师相继来寺常住。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法器被缴，佛事被禁，佛门再度冷落，状似家庙，但香火却未断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路线逐步得以纠正。1978年，华池等法师感怀党的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落实，出于对佛教的虔诚，群策群力复兴龙潭寺。此事得到坎门等邻近各地善男信女的积极乐助，重新组建东西两边厢房。破损的佛门得到整修，信仰上的创伤亦得康复。

1984年4月间，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僧人和一班居士依靠坎门、城关、陈屿等地的善男信女主动配合和支持，又重新拆、扩建五间正屋，居中三间为佛殿，东西两间楼屋分别充作斋堂、库房和寮舍等，改名为“西方寺”。佛殿内塑有“西方三圣”等佛像。两边厢房为寮舍，寺貌焕然一新。寺内僧人也由原来的两名增加到五名，护法居士纷纷前来，华池法师被推选为“当家”（监院），主持寺院的全面工作。1985年，县佛教协会成立时被推选为理事。1986年，又将原来的佛殿改建成“大雄宝殿”。中奉释迦牟尼佛，阿难、迦叶两尊者，后面左右为文殊、普贤两菩萨。两旁供奉着仿造江苏东山紫金庵唐塑十八罗汉，姿态各异，形象逼真（已于今年“五一”节被盗待查）。此时，又将“西方寺”改名为“龙潭寺”，因取玉环名胜龙潭坑的“龙潭”两字为寺名，更为名正言顺。次年，全寺僧众、居士同心协力，在广大信众的自愿乐助下，于大雄宝殿后面的一块平坦的山丘上，又新盖了一幢殿堂，因中间楼上供奉“西方三圣”像，故名“三圣阁”，楼下供奉达摩祖师，左右二间为寮舍客房。

1988年中秋，又在大雄宝殿前面，新盖了一座天王殿及其附属房。建筑小巧精致，四重挑檐，饰挂铜铃，正面端坐弥勒佛，后面塑雕护法韦驮立像，两边四大天王庄严威武，显示了佛门的雄伟庄严。

1994年，从缅甸国运来一尊释迦牟尼玉佛侧身卧像，长4.6米，高1.5米，重量一万余斤，西边厢房被拆建成“玉佛宝殿”于戊寅年（1997）冬季落成，给龙潭寺增添佛日新辉。

随着龙潭寺的不断更新发展，佛教活动越来越趋向知识化、佛理化方向发展，原来年老的僧人，不适宜指挥组织新时代的佛教活动，一班护法居士专程去天台山国清寺，迎请福严法师。2000年四月初八，福严法师来寺，同年十月初三进堂任当家（监院）至今。

龙潭寺在福严法师的带领下，去年被县佛教协会评为五好寺院，跨进了先进的行列。现在正在玉佛宝殿西边，一片溪滩山坡上，征用土地7000平方米，先后分别依次重新扩建大雄宝殿、金刚殿、玉佛殿、藏经楼、三圣殿、地藏殿、伽兰殿、念佛堂、厢房寮舍、厨房斋堂、库房、西净、放生池等殿堂与附属房。现在准备首建的是大雄宝殿，占地面积440平方米，其余殿堂、附属房相继陆续建造，过不了多少年代，一所比现今规模大两三倍还多的新型中等寺院展现在龙潭风景区中，将给风景名胜增添更加辉煌色彩。

近年来，龙潭寺旁的“环山缘湖”上，游艇码头，加上公路修筑到百丈岩下，直通龙潭寺，吸引了游客、香客往来穿梭，热闹非凡，整个龙潭山川沸腾了。

珍贵的文物

龙潭寺的殿宇，随山势高低错落，寺院布局和屋宇结构为古今结合，体现了我国佛教传统，代代相传，步步改革创新。

珍贵的释迦牟尼玉佛卧像，采用缅甸国晶亮、剔透的巨块宝玉，以传统雕刻工艺精雕而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金刚殿边，生长着明朝年间栽植的罗汉松、桂花树等古树，树大枝粗，至今已有四百多年之久，秋日桂花满树怒放，千枝万葩，香满潭谷。大雄宝殿前后院落仍生长着明末清初年间栽植的黄杨树、紫薇花和茶花树，这些珍贵的花木，伴随着殿宇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和时代的创伤。

藏经室内，保存着清代乾隆、咸丰、光绪年间印造的《禅门日诵诸经》、《地藏菩萨本愿力经》、《比丘尼戒本》以及宁波功德房印

造的《大乘妙法莲华经》等佛教经典，对研究近代佛教在玉环的传播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幽美的胜迹

龙潭寺四周，溪流纵横，林幽水秀，峰峦叠嶂。流云在林间曲径中飞逝，香烟缭绕于巍峨的殿宇间，使金碧辉煌的梵宇时隐时现，山门两边的对联更为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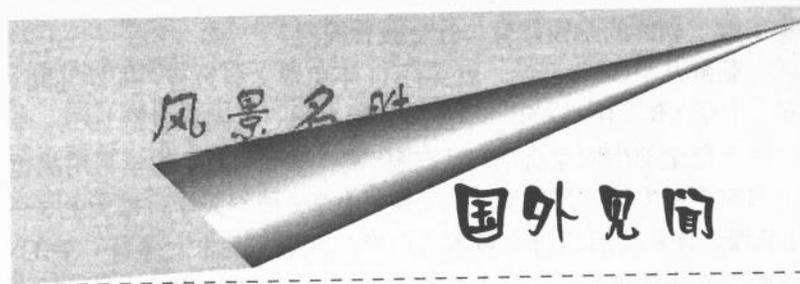
龙游玉峰山势秀，
潭流环海水源长。

联句中巧妙地藏着“玉环”、“龙潭”两个地名的“山峰势长水海秀”，道出了龙潭寺的优美环境和许多美好的传说。

玉环著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合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和“西周村落遗址”就在龙潭寺南面。沿溪拾级而上，景点一一展现。这十大胜景为：

龙潭深谷、双涧迴澜、环山缘湖、五峰拱寺、三门如城、罗松迎客、古茶集人、紫薇引笑、黄松令惊、桥畔空气鲜。

幽美的龙潭寺，除接待本县信众、佛事和游客之外，还吸引了美国、菲律宾、荷兰等国归国探亲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前来寺院朝拜顶礼；接待了来自福建、广东、江苏、上海与本省市僧人的挂单和居士、游客的食宿。真是：寺誉全县，流芳千里。



赴朝鲜考察教育观感

● 舒长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家，他们重视教育事业，素有“教育之国”美称。在教育经费的使用、校舍建设、学生道德教育，以及在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等方面都有特色。最近，国家教委、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组织了我国各省市、县部分教育学会负责人及有关实验中小学校负责人、教师代表赴朝教育考察。这次代表团共45人，是今年暑假第二批赴朝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成员由我省教育界人士组成，团长是台州市教委副主任、教育学会会长陈及人老师。

朝鲜素称教育之国，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全免费的教育国家之一。这次考察了两所中、小学。一所是平壤市庄德中学，原金日成将军母校，现有40个班级，1000名学生，100名老师，毕业生100%上大学（其它一般中学是60%上大学）；另一所是平壤市第四小学，原是金正日的母校，现有31个班级，学生1200人，教职工53人。通过这两所学校的教长介绍，以及导游补充讲解，我们初

步了解了朝鲜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简况。

朝鲜从1954年开始，就实行11年免费义务教育，即幼儿园1年、小学4年、中学6年，学生入学率100%，巩固率也是100%。学生学杂费全部由国家负担，且衣服、鞋、书包、基本的学习用品也由国家免费发给。每星期上6天课。小学6周岁入学，每天上3—4节课，课程设有语言、算术、自然、音乐、美术、体育、手工、共产主义道德课等。一、二年级共9门，三、四年级共11门。一个班主任除体育、手工课外，其它课程往往一人承担。小学教师全部大专4年制师范毕业生，月工资在120—180朝元（1朝元等于人民币4元）。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小学教师与大学教师的工资档次同等。我们在平壤市第四小学看到，学校绿草如茵，干净整洁，各种配套设施齐全，配有自然馆教室三个，里面摆满了种种动物、植物标本，特别是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学校有电脑室、美术室、排练厅、会堂、游泳池、乒乓室（摆有20张乒乓球桌）。上午上课，下午第一节课后，学生按自己的意愿参加学校各种活动，每所学校都有少年团辅导员，组织下午的课外活动，这些教师也是学校的教育编制。除了学校的少年团活动外，学生可去市内各体育馆、青少年宫、图书馆等活动。这些社会的文化设施，对学生都是免费开放的，并且有专人负责指导。

朝鲜各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约20万朝币，除教师的工资外，公用经费约占55%。如遇基建投资，则另外拨款。教师的退休年龄与我国相同。

朝鲜的高等教育，也基本上由国家全包，学生享受奖学金、校服，对农村来的学生，还更加优待。所以在朝鲜人称三大不用愁：一是读书不用愁；二是住房不用愁（城镇居民按女子算，凡到法定结婚年龄，国家免费分给她一套120—180平方米的套房；农村也一样）。三是吃饭不用愁（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定量是20公斤大米，每公斤0.09元人民币，肉每天0.4斤）。农民基本自给自足，但也

有穷困的地方。金日成临世前，提出的口号是：让全国人民人人都吃上大米加肉汤。

朝鲜除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其它的社会教育设施众多。如每个城市都有少年儿童夏令营营所、青少年宫、图书馆室、体育场、游乐中心等。7月26日上午，我们参观了位于平壤市东郊200公里的元山市松涛园国际少年儿童夏令营营所。该所建于1964年，1985年又扩建，现占地3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全部电梯上落。建有宿舍、食堂（能容纳1200人就餐），会议室、游泳池（从海底80米深处抽取的无污染海水），游乐场（有划船、滑梯等）、卡拉OK活动中心、乒乓室等。又如平壤市的人民大学习堂，藏书3000万册，有15个阅览室，共有5000余个座位，不管是学生，还是居民可以自由借阅。又如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建筑面积10.3万多平方米，内有科学、艺术、体育等各种业余小组活动室，还有个2000座位的剧场、体育馆等，每天免费接待1.2万多名学生，少年到这里来参加课外活动。

朝鲜劳动党认为：这些社会教育设施，都是为培养学生具有德、智、体兼优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所必需的学习条件，故都是免费开放的。

通过这次考察，有这样几点感受较深刻：

一是朝鲜是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崇拜领袖，走共同富裕道路，一切为了人民，国家对商品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并且于1974年4月依法完全废除了租税制度，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税国。

二是朝鲜对教育事业的如此注重，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朝鲜自解放后，百废待兴，她们所最先兴办的是教育，并且实行全免费教育，确实体现了“一切主体为人民，最穷不穷教育，最苦不苦孩子”的远大战略思想。并且在这40余年时间里，逐步加以完善，且加大了投资力度之一。

三是朝鲜的强烈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不是说在口上,写在纸上,而是切切实实落在行动上,全国上下一致努力,43年如一日。

(本文作者教育局招生办负责人)



旅法、德琐记

○ 林冬善

根据“中国——欧洲共同体大陈岛互补能源系统示范项目”协议的规定,我率四人出访组于1988年1月去法国巴黎、联邦德国汉堡的有关公司,接受为时一个月的技术培训。首次出洋,感触良多,分几个小题记述于下:

(一) 升旗与广告

88年1月初,我们一行到法国巴黎郊区的汤姆逊公司的一个工厂培训。这是个生产电视差转和电视卫生接收设备的工厂。由于他们的技术先进,设备可靠,产品优质,世界不少国家都使用其产品。1月4日到工厂报到,只见两层建筑的厂房,座落在宽广的碧绿草地中央,厂门前,立着5支旗杆,其中3支杆上飘扬着中、法国旗和汤姆逊公司的旗帜,十分醒目。远在万里的异国他乡,见到祖国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感到分外亲切、温暖。我们问了主人,得知原来这个公司有规定,凡是外国重要客人来访,都要升起该国的国旗,以示欢迎。

其实,我们四人是来此培训的,从规格来说是低层次的“学徒”,谈不上“重要客人”,如此礼遇,令人感动。

在以后的十多天培训日子中,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可见到5支旗杆上不断地有其他国家的国旗升起。仔细一想,此种升旗办法颇有妙处,一是可使来访者感到十分亲切,觉得该公司重视自己,可以联络感情,增强友好气氛;二是对周围的厂家和行人可以显示该公司宾客如云,生意兴隆。岂不是一举两得的有效广告宣传。

西欧国家商品经济发达,广告无处不在,而且想方设法出奇制

胜，汤姆逊公司此举，可谓用心良苦，给人以启示。

(二) 西装革履与信息

出国之前，听人说到国外去，特别是到世界时装之城的巴黎去，一定要注意衣着穿戴，千万不要出洋相。我们行前定做了一套深色西装，订购了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把自己打扮得西装革履。

来到巴黎一看，那里人们的衣着五花八门，而且十分随便，更多的人冬季都穿滑雪衫之类的便装。象我这一身打扮的，寥寥可数。有见到的往往也是我国大陆的出访人员。这套西装革履在巴黎大街上反而显得有点不自然。后来一打听，原来现在国外的人们除了正式场合外，不大愿意西装革履，正正规规，而是喜欢随便、合身的衣着。显然，我们在国内得到的信息已经过时了。不过，这种过时的信息尽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但毕竟还是生活小事。可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如果我们不熟悉国外市场行情，信息不灵，那就可要吃大亏了。例如，现在我国行销的皮鞋，不管男式女式，一律趋向高跟，女的还有越高越时髦之势态。可你如在巴黎街头走一趟，将会发现，情况刚好相反，绝大部分人穿的是那种舒适爽脚的牛筋平底或坡底鞋。高跟鞋不仅男士们不穿，就是小姐太太们也甚少见到。在一个超级市场的削价货架上，我倒是见到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高跟鞋，但柜前可罗雀。如果我们以国内的行情想当然，生产大批的高跟鞋以求外销，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三) 工业化与环境保护

法、德两国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很高。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三废”污染愈来愈严重，废水似乌龙，烟尘如低云，河水发臭，鱼虾绝迹，大气中烟雾弥漫，人们还要买新鲜空气的罐头备用。记得报上登载过：英国伦敦城一度被化学光雾笼罩，致使四千余人丧生。

这次出访法、德，情况已今非昔比，无论在闹市中心还是郊外村野，市容整洁，空气清新，绿树草坪，在车水马龙的巴黎市区很少听到汽车喇叭鸣声。在巴黎市区徒步一整天，皮鞋面上尘埃很少，鼻孔里挖不出乌烟灰尘。流经巴黎市区的塞纳河，其水质虽不似我们乡下的山间小溪那般清澈碧蓝，却也远非上海苏洲河那样乌黑发臭，而且岸边有人垂钓，海鸥等飞禽也不时在河面上盘旋、栖息。经问主人，据说在五、六十年代，这里的环境确曾类似报纸上描述的那样。从七十年代开始，环境保护工作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且作为历届总统竞选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十几年代价高昂的综合治理，才有今天的局面。

我国现在已公布了环境保护法，建立了环境保护监测管理机构，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工作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无庸讳言，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仍有许多环境质量下降的情况出现，环保工作亟需与工业发展同步前进。在我们台州，化工、食品行业已星罗棋布，人为的污染源不断增多，进一步做好环保更显必要。此乃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切勿等闲视之。

(四) 电子计算机化与初级算术

法国的微型计算机使用已十分普及。到银行取款有电子信用卡；火车、地铁有电子自动售票机；工厂上下班有电子签到卡；车间门口设有电子自动售货机出售饮料和点心；连平常的小旅馆，住宿结帐都离不开它。

我们在汤姆逊工厂学习时，午餐都在厂办的自动餐厅吃，用餐者自拿餐具，自点菜肴、主食、饮料，然后到计帐员处结算，她只瞧上一眼，七八样食物的价格就嗒嗒嗒打入了计算机，用餐者将事先存好钱的用膳磁卡交计帐员在计算机扁孔处一划，帐目就结好了。同时，还得到一张小纸片，上面标有年月日时；每样食物的价格和共计总售价；用膳卡上尚余的款项，一清二楚。全过程不超过

十秒钟，快捷异常，方便顾客，显示了电子计算机的高效率和记帐员敏捷的手法。

但是，电子计算机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初级算术的心算能力大为衰退。我在自动餐厅就遇到过这样的趣事：学习结束离厂那天，我的用膳卡还余有十九法郎三十五生丁可退还，这下可难为了女记帐员，她大概是想图个方便，凑个齐头整数法郎给我，见我手中有一些“生丁”（硬币）（相类似于我国的角、分币），就一把要了过去，可是数来数去，不知所以，皱眉瞪眼，苦思冥想。我又不知自己手中硬币的确切数目，无从帮助。最后她只好一个一个的数完硬币，拿出笔来加加减减的做起初级算术题，好一会才算出个结果。她耸耸肩膀，笑着表示歉意。比起我们国内的生意人，秤落帐出，一手收钱，一口答找数的利索劲来，显得笨拙多了。类似情况还碰到过几次。据说这种在发达国家心算能力的下降现象，已引起科学家的关注。近年来，美、日等国主张小学生一律不准用电子计算器做算术题，而且新增加了中国的珠算课程，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提高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心算本领。

（五）友好与保密

我们在法、德接受培训的工厂，都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敏感企业”。他们在处理友好合作与技术保密的分寸上，掌握得较好。

厂方的有关接待人员对我们热情、友好，指导老师更是耐心、细致。凡协议规定范围内的有关技术问题，上课有资料、图纸，实习有实物并可自行动手，对我们的疑难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但是，热情友好并非说主人们忘了保密。事实上，厂方在他们认为需要保密的范畴，制度十分严格。在参观有关车间时，我们希望拍摄室内照片，被主人彬彬有礼地谢绝了。在联邦德国的“AEG”公司，参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太阳能光电池自动化生产车间时，车间里生产工人没有几个，厂方的陪同人员不断地特别关照我们要结集同

行，不要分散。说话人态度很友好，但是，其含意也十分清楚。就是这两家公司的门卫也是规矩严格，警卫人员尽职尽责。在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身穿警服的门卫们，在我们每次进门时总是和蔼而认真的查看我们的出入证。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已和他们混得相当熟悉了，进出门口总是互相微笑、点头致意。但一次我们同行的一位把出入证忘在旅馆里了，到门口就被门卫笑容可掬地阻在门外，尽管我们说明了情况，他们还是客气而认真地说：“先生，对不起，请回去把出入证带在身上。”其语气使人感到并非故意刁难，却又毫无商量余地。

（六）中国餐馆与劳务输出

我国的出国人员对西餐一般都不很习惯。就是西餐中的佼佼者法国菜，尝几次味道还不错，日子一久，总是感觉不合胃口，嘴巴老是淡汪汪的难受。起初，我们以为是自己在国外日子不长，未习惯之故，后来碰到几位到国外已多年的华人，说起此事，都是异口同声。在巴黎我们遇到一位在英、法已住了十二年的上海吴女士，她说自己家里就是一天两餐仍是中国餐，久而久之，连她的英籍丈夫和孩子们也都喜爱上了。她热情地邀我们去她家里品尝了她亲手烧的炒年糕。

在国外，中国餐馆无人不晓，巴黎就有近2千家中国餐馆。这些中餐馆招牌一律用中文书写，店内雕龙画凤，挂中国书画，摆中式屏风，配上红绸纱灯，中式桌椅碗筷，一派道地的中国气派，加上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肴，在异国他乡，不仅使炎黄子孙有宾至如归之感，就是国外顾客也十分青睐。我们在巴黎、汉堡都上过中国餐馆，无论大店小店，生意十分兴隆，黄、白、黑各色人种都有。可见具有5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菜根底深厚，确有其独到长处。与店主交谈，才知众多的中国餐馆中，却有不少是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的黄皮肤所开，据说巴黎就有三分之一的中国餐馆其实不是

中国人开的。他们虽不是中国人，却都以“中国餐馆”的招牌招揽顾客。但这些餐馆里缺少正宗道地的中国厨师，并且他们为自己店中没有正宗的中国厨师而遗憾。我想，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我国的劳务输出正日益发展，如果我们能多办几家烹饪学校，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厨师，派送到海外去，是会受欢迎的。

(七) 劝酒敬烟与主随客便

在我国有个风行各地的习俗，叫做“劝酒敬烟”。为表示对客人的敬重，主人一定要盛宴款待，席间又是劝酒又是敬烟，而客人总是再三推辞，主人则再四拉劝，直至酒醉饭饱不算，还得要有剩菜残羹在桌，方显主人盛情。因此，一些精于此道的客人，开始总是一再声称自己酒量“有限，有限”，留下余量，以便周旋。而主人则又总是怕客人未饱说饱，自己“受骗上当”，怠慢了贵客，于是千方百计加酒递烟，连称“海量、海量”。

在法国，我们曾应邀出席过几次宴请。他们是“主随客便”。若到餐馆用餐，主人拿来菜单，请客人自行挑选，而且主人陪餐者一般仅一二人。菜肴各自分盘、分餐，卫生方便。席间也不劝酒不敬烟，要喝何种酒，喝多喝少，悉听自便。座上如有女士，要吞云吐雾还须征得她们同意，更不（互）递香烟。一般上菜道数不多，最多也不过五、六道。当然，你如食兴未尽，则不必客气，可以再添。如果我们把国内的那套“谦虚”、“客气”带到那里，如法炮制，那非饿饭不可。

我觉得尽管西餐的滋味远不如中餐，中西风俗也各有所长，但是这种“主随客便”的风俗，在待人接物的交往中，似乎要比我们的“劝酒敬烟”实惠受用。

（本文作者系原科委退休）

我在中国驻斐济大使馆 的日子里

★ 王岩柳

我，玉环坎门人，但在外渡过了近40年的生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总时时刻刻眷恋着生我、养我、给我启蒙教育的故乡——美丽的玉环。

我原是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93年随丈夫借调到驻斐济大使馆。身于异国，心更系着故乡。但有幸领略到南太平洋岛国的自然风光和有趣的风土人情，现择取部分奉献给乡亲们共赏。

斐济是西南太平洋的岛国，在世界地图上呈蚕豆大小。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75.8万人，由332个岛屿组成，其中维提岛和瓦努阿岛为主岛。总人口中，斐济族人只占48%，而印度族人却占45%。近几年来华侨、华裔发展到5000多人。在南太平洋岛国中，斐济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主要种植甘蔗和椰子。它是有名的旅游岛国，旅游业亦是主要的国民经济收入之一。

苏瓦是斐济的主要城市，亦是首都。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四面环海。整个城市如一个大公园，又怀抱着无数个姹紫嫣红的小公园，根本分不出哪里是公园，因为处处似公园，美不胜收。

苏瓦又如宁静、清幽的村落。一片片旷野长满葱葱的大草坪，市区、近郊几乎没有露土的田地。这里的空间由各类热带阔叶林木和各色花草占据，五彩缤纷，树影婆娑。低矮的庭园式别墅洋房和各式建筑分散点缀在一方方绿丛中，令人陶醉。

椰子树是斐济的主要树种，也是主要经济作物，几乎找不出一块没有椰子树的地方。公路两旁也是椰树成行，井然有序。椰子树挺拔高大，居高临下特显神气，具有迷人的魅力。树杆笔直，树叶在顶部高空张开，很像一把巨伞。伞下一年到头聚结着密密麻麻沉甸甸的椰子，让人享受着时时有丰收果实的满足。

斐济苏瓦总是那么明媚，那样宜人。年均气温在24—30℃之间，一般只分夏季和凉季。5—9月凉季最低气温在15℃以上。盛夏时，房内温度也没超过30℃。室外虽然太阳红照，但风大树木多，也觉得不大炎热。苏瓦市人口少，空旷地多，没有什么工矿企业污染源，空气特别清新洁净。中国人来到这里，几乎不会得感冒，犯有慢性咽喉炎的人也会不治自愈。听说斐济没有任何有毒的动植物，连蛇都没有。这里的市政府主要职责是管理整个城市的环境，绿化、美化和卫生工作，都有明确分工专人负责。因此在满目青翠不露土的环境中，到处没有尘土，穿的皮鞋可以一个季度不擦还能发光。更有趣的是这里的天气变化莫测，除了台风雨季外，日常天气预报没有多大意义。往往一天内变化多端，早晨是红日高照，而到下午或傍晚都会突然来几阵细雨。有时行车百里，一路红日一路雨，难怪斐济人是不怕太阳晒和雨淋的，一身衣裤干干湿湿不当一回事，因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提着雨具呵！洗好的衣服晾在室外，也不必时收时晾了，淋、晒都无所谓，因为阵雨过后就是骄阳出来会给晒干。

中国大使馆的馆址设在苏瓦市的一方海滨，一出大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听说前方再前方就是南极了，海洋和沙滩就是这旅游岛国的特景，很多度假村就设在金色的沙滩上。在大海里驾着游艇遨游或拍浪畅游，躺在沙滩上沐日光浴，都是度假的特定内容。度假村里的旅馆可不是钢筋水泥的洋房，大都是木结构用椰子叶编的茅草屋，黑呼呼。正因为是古色古香，才吸引西方那些住洋房别墅的阔老来换换情调，尝尝新鲜。我想，要是玉环的海岛也能开发几

处度假村，再加海鲜馆，那么可能也会吸引不少内地阔老到此一游的。

斐济族人，皮肤呈棕黑色，身上散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头发短而卷曲，大都体态粗壮，很难找出身材苗条的少妇少女。斐济人的传统服装，男士穿的很像西装裙的“苏罗”，听说以前穿的是草裙。斐济人，民风朴实，待人友好客气，路上如果陌生人相遇，总是抢先打招呼，“布拉”一声向你问好。开车行路，也互相礼让，从不抢道。如果遇到有什么特殊情况，迎面车辆会好心地打着灯语向你提醒。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轧、推、吵、闹、殴斗情景，都是那么安安分分不惹事生非（除了少数喝醉酒的人）。有人说斐济人懒、笨，大概他们“懒”得吵闹打架，“笨”得不会勾心斗角。他们极易满足，没有奋斗和竞争发财的精神，因此斐济上层人士和富人，大都是印度族人，一些重要的经济市场也都被印度人占据。近十多年来，中斐贸易正在不断发展，市场上到处有中国货（包括台湾）。菜市场里中国菜农也占有一定的市面（大都是广东来的移民），市内的中餐馆就有十多家。自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斐后，中国向斐济提供了援款，浙江省的经济技术互利合作项目是最先进入斐济的。为了援助建设小水电站，我丈夫作为技术专家曾几次来斐。

斐济人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潇洒舒坦。工资是每星期发一次，到了周末拿到工资后即进超级市场买好一周的吃用（我们基本上在星期六上午去，因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放假），然后就去俱乐部、夜总会等文化娱乐场所，把它花个精光才痛快，似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习性。他们能歌善舞，很欢喜聚集一起又唱又跳。这里的各种节假日，所有商店市场统统门户紧闭。斐济法律规定，节假日不能营业，否则要犯法罚款处理。因此街道上行人很少，像夜深似的冷冷清清，人们安安静静休息度假。不像我们国内越是节假日越是人来人往闹哄哄。星期日，人们换上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衣服，全家人手捧圣经上教堂。这里教堂之多远远超过家乡的寺庙佛堂。平日里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身旁放上一箱啤酒一台收录机席地而坐，不聊天瞎侃，而是弹弹唱唱自得其乐。他们唱起来可真是优美动听，好象经过声乐训练，这大概是经常在教堂做礼拜诵咏圣经练就的。节假日大多数年轻人拥向体育场、球场。打橄榄球是他们的强项运动，即使不是正式比赛，凑热闹观看的人也会不少。斐济的女人要比男人辛苦，她们烧饭、编织、带孩子，还下海捕捉鱼虾贝类，并上市场出卖。

由于在大使馆工作的特定条件，外交官和夫人们经常能参加一些官方和民间的有趣活动，领略到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现列举一二。

一、喝羊羔纳。喝羊羔纳是斐济人较为独特的风俗。逢年过节、红白大事、亲朋好友请客等都少不了请喝羊羔纳。羊羔纳是从多年生的灌木树根中挤炼出来的汁水，呈乳白色，有点涩腻感，倒没有怪味。民间的挤炼方法就是将树根（须根状）洗净，放在专用的木制羊羔纳盆内（像铁锅状），加入清水用手搓、擦、拧、挤，使其汁水溶于水中，即便能喝。听说有清凉解毒有益健康的作用。有一些盛大庄重的礼仪活动中，敬献羊羔纳更有一番神圣感。献纳者由有威望有影响的长者担任。他身穿草衣裙，在羊羔纳盆前盘腿席地而坐，口中念念有词，手势一招一式都有一定规矩。清水还得从山间小溪中运来，一次挤炼出来的汁水只有二、三碗，再继续加水搓拧。我们看着那双黑手像洗抹布那样拧出来的混浊汁水，不免有点恶心，但是对于他们那种虔诚盛情，双手捧杯举至头顶，双膝跪地敬献上来的羊羔纳，不管怎么难喝也是盛情难却，会一饮而下的。

二、日常饮食习惯。斐济人都象个孩子，很喜欢嬉闹玩乐。论吃，他们就简单多了，中午一顿都可以不吃，或一点点小点心便行了。他们的主食是木薯，棕色的皮白心肉，形状有点象藕节，又

象家乡的白心番薯，但不甜又较生硬，一般他们是煮着或蒸着淡吃。还有一种叫 Dalu（大罗）的大芋头和芋头叶，也经常吃。这种芋头很大，一个总有一、二斤重而不长芋头子。其他还有面包果、芭蕉、香蕉等地也都能当饭吃。而大米、面粉都算是外来品了，他们不当主食。至于小菜，那也是很简单。他们吃鱼、肉也大都是清水煮或蒸后再蘸各种调料吃。因此他们不必用筷子或刀叉，是用手抓着吃。在过年过节或红白日子时，那要丰盛多了。我俩曾在圣诞节去过一官员家作客，他家请我们吃传统的斐济节晏，叫做 Lovu（洛伏）。就是在地下挖出一个一米左右见方的大坑，坑底铺上大卵石，然后用柴火将石头烧红，把新鲜的大块牛肉、猪肉、羊肉、整鸡和大芋头等用锡纸包起来放入坑内，上面盖上几层香蕉叶，再复上泥土严严实实地封住，大约二个半小时后即能煨熟。掀开后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吃时再一块块切开，蘸着各种调料。这一天他家来了父母兄弟等亲属，象国内过年那样热闹。地上铺上草席（椰树叶偏的），大家席地围坐，先是主人念诵祷告，其他人会低头默念。所有盘碗菜肴都摆在地上，喜欢吃什么随意抓抓吃吃。听说一年大概也这样搞一、二次，红白大事也要吃这样的 Lovu 饭。

在这里，我们也尝过印度饭和西餐，都无法和中国餐相比。中国人吃喝在世界上有名的，很肯花精力，舍得花钱，肯下功夫，请客吃饭简直成了“国风”。外国人是很少请客吃饭的，政府机构根本没有这笔开支，因此斐济官员说中国使馆最客气，宴请规格高，食品丰盛，中国菜好吃。他们难得有次把官方请客实际上比起国内的一般请客还差得远呢！

三、传统庆典仪式。斐济人搞起庆典活动来非常认真，会组织得井井有条，十分隆重热闹。即使是规模较大的民间集会活动，参加者和参观者都秩序井然。该坐在那里或站在何处都很守规矩，不会乱动乱挤，那怕烈日晒、暴雨淋也雷打不动，很有功夫。

我为国斐方在北岛萨伍镇援建了一所技术学校，由我们浙江省承建。1994年元月某天，举行技校竣工移交仪式，由斐济教育部委托镇民来组织，我们参加这次庆典仪式。在两国领导人互签移交书前，按该国风俗进行各项仪式。先是敬献羊羔纳，炼纳者还身穿草裙，画起脸谱，旁边还有几个呐喊助威的，多么的庄重。一般为着代表某种意义而献喝几次羊羔纳才休，象我国的“为了××而干杯”的样子。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大喜欢喝就少盛一点意思一下。在这种场合只有大使才能喝得上呢！接着是斐方送礼物。他们的传统礼品是：椰子叶编的草席，树皮做的图案布，还有象征着与鬼神搏斗的蒲扇、木槌，及鲸鱼牙齿和羊羔纳等。民间礼品最为流行的是席子，无论亲朋好友之间，或政府社团之间，都少不了互送席子。这种席是用椰子叶编的，大小都有，可以折叠卷曲，他们是铺在地上用的。听说过去每家从孩子落地，就要开始编席子了，作为今后陪嫁物，越多表示越富。仪式的最后是文娱节目了。斐济人擅长是能歌善舞，此时大家尽情一展风姿。跳的是民间舞，男女都穿着用树枝树叶扎的草裙，戴着花环，赤着脚，脚踝上套上草环，男的还画上脸谱。虽然不是专业队伍，但个个唱得动听，跳得整齐协调很有节奏感。

我在斐济的日子虽不长，但可聊的内容确实不少，以后有机会再汇报。

附：王岩柳简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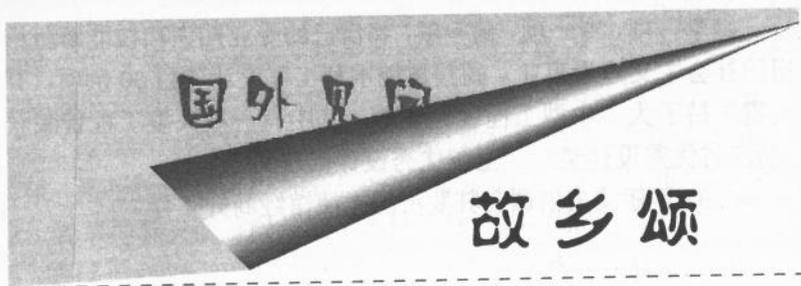
王岩柳，系本县坎门镇钓舸人，1942年出生。

1962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同年分配在浙江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工作。一直至今从事水电工程设计工作近30年，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她学一项，专一项，精一项，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奉献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她共参加水利工程设计项目30余项，并负责主持了大、中型工程设计多项。其中有一项大型工程曾荣获“浙江省优秀设计奖”、“全国优秀设计银质奖”。

1993年随丈夫借调在驻斐济国大使馆经商处工作。





我县城市化建设走笔

☆ 郑志平 方贵川

独具潜质的山魂海魄和水韵渔情铸就了玉环儿女豪迈的开放意识和雄强的开拓精神。改革开放以来，闯海踏浪的玉环人民，高扬“自强不息，勇当源头，创一流”的精神旗帜，假良港优势，创海岛特色，闯出了一条敢为人先的经济发展之路；以实施全岛股份化战略为标志，奏响了玉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昂扬旋律，连续两届迈入了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并荣膺浙江省首批“小康县”、“全国农民收入先进县”称号，2001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87.3亿元，财政收入7.5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6207元，社会发展综合指数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名列全国各市县第36位、86位，先后被评为（列入）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县；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全国农村电气化县；全国生态示范建设试点县和新农村县；浙江教育强县，已健步跨入全国沿海发达区行列。并已列入浙江省2005年率先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县市区之一。

经济的高速发展，注进了玉环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强大活力，掀起了玉环城市化建设的崭新篇章——最近又被《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列为中等城市发展目标。欣喜雀跃的玉环人民，十分珍惜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展际遇，万众一心显身手，脚踏实地描宏图。

规划是灵魂，规划是财富，规划更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只有龙头昂扬，才能使龙姿矫健、龙尾起舞、巨龙腾飞。深通城市建设个中三昧的人们看中了规划的导向功能，把文章做在制定高起点规划的努力上。

1994年，县委、县政府在不断探索、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要发挥大麦屿深水良港优势，把玉环建成以城关为中心，以坎门、陈屿为两翼的“三位一体”组合型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建设思路。1995年，县政府委托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了《玉环港口城市总体规划》。1997年，在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县第十二届人代会上又提出了一“城乡一体化”战略，明确了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城市建设道路。按照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着力强化县城中心功能，使县城拓展框架，丰满区间。交叉延伸的“丫”型道路臂膀，挽起了“三位一体”的港口新城，编织成颇具张力的城区辐射网络，形成优势互补、设施共建、维护生态、改善环境的良好态势。加速了人口的产业集聚，促进了玉环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根据“城乡一体化”战略，我县在1998年委托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了《玉环县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规划》，并以每年30万元的重金聘请城市规划大师、设计大师、高级园林设计师、高级建筑大师当顾问。请他们与我县的建设者一起，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驾驭玉环城市化进程，做好总体规划、村镇体系规划、城镇和村庄规划的衔接工作。编制了

《县城景观风貌规划》、《城市绿化体系规划》、《县城亮化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和完善了交通、水利、电力、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金融、旅游、科技、文化、卫生、教育等各项社会发展规划。

2000年6月玉环实施了“三镇合一”的区划调整，形成以城关——坎门涵盖陈屿大麦屿港区的中心区；楚门清港片的副中心区；以及环漩门区、沙门区和海域区在内的城市复合体，人口规模达58—63万。城市化水平从1998年的38%上升到2000年的42%，城镇人口已达24万，集聚外来人口11万，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资源共享，功能互补，降低成本，避免重复建设”等标准，把全县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分四个层级梯次推进。第一个层级是县城建设，完善并严格实施《玉环港口城市总体规划》，以“三位一体”组合型港口城市为建设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坎门、城关、陈屿三个区域之间的迅速崛起，加快本岛城市化步伐；二个层级是重点镇建设，把楚门、清港两大镇作为港北城镇重点发展区域，加大建设力度，拉大城区骨架，发展特色经济，使其形成强镇组群，构建玉环港口城市的北大门形象；第三个层级是一般集镇建设，以服务区域经济为重点，努力改善服务功能，提高经济实力；第四个层级是中心村建设，在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加大村级结构调整；建设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集镇化中心村，积极引导山区村和经济薄弱村向中心村迁并，把全县309个行政村合并为55个中心村，使农村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城乡一体化”战略规划，是对我县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后形成的共识与决策。它的实施，为玉环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构建高效率、多元化的城市空间格局，建成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合理、市场体系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生态环境优美、城乡融为一体、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协调发展、具有海岛风貌特色的、高度文明的综合性、外向型、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奠定了基础。

城市是一本史书，建设是砖石垒成的史实。它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桥梁、每一次隆重的揭幕、每一回庄严的奠基，都记载着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昭示着城市的奔赴和抱负……

1995年以来，我县加大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统筹安排形象工程项目，陆续建成了一批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命脉工程。先后完成了全县重点水库二期、三期联网，从根本上缓解了我县海岛淡水资源缺乏的制约矛盾；投资3.88亿元的漩门二期蓄淡围垦工程。被列入浙江省“九五”重点项目，工程进展顺利。浙江省“五自”水库试点的里墩水库工程，已建成蓄水。一条40公里长的标准海塘巍然屹立，成为玉环人民固若金汤的生命线，使备受海潮、台风侵袭的玉环人民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安全感。近年来，为了改变我县境内山环水复，交通闭塞的落后境况，先后开通了西青岭隧道、漩门隧道、黄泥坎隧道、赵三王隧道、桐玲隧道，并投入资金6000多万元贯通了全省最长的路隧道陈屿岭公路隧道，实现了“海岛没有岭，汽车穿山行”的千年企盼。拓宽改建了高等级的榴岛大道、泽坎线楚门段省道；建成了楚栈公路、环岛西路、玉陈公路和大麦屿3000吨级客运码头和坎门客运码头；投资1.1亿元的大麦屿3万吨级码头、国家投资上亿元的大麦屿中央直属粮库和引进外资4000多万元的坎门新渔港建设均已陆续画上了句号。建成后的坎门渔港，可供3000艘渔船锚泊、补给和避风，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群众性渔港。大麦屿至乐清的滚装轮渡工程可望年底投入使用，乐清湾跨海大桥已在规划之中。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在让玉环变“末端”为“源头”的历史跨越中勇立头功。为了摆脱用电困境，我县建成了220KV和110KV变电所各1座、35KV变电所2座，动工兴

建了风力发电一期工程。电网全面改造的全县城乡，供电能力供电质量大为提高，我县是浙江省首个电话县市话普及率达57.29%。移动通信、无线寻呼迅猛发展，邮电通讯十分便捷。1994年至今，我县致力于县城建设，先后组织实施了“四五八”、“三五八”、“四五六”和“六个一”工程，建成区面积比1994年的1.43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14.2平方公里。建成了玉兴东路、广陵路、城中路、珠城路、三潭路、南三路、东城东路、车站路和榴岛大道，使县城道路形成了四纵七横的网格状市区框架；城区道路全部硬化，城区排水排污工程已实施雨污分流；总投资2.18亿元的玉坎河治理及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全面启动，玉坎河的疏浚、清淤、驳坎、河床硬化和两岸绿化工作有序延伸。玉环大酒店、琉泰大厦、华发大厦、邮政大厦、电力大厦、财政大厦等一批高层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体育馆、标准田径场、青少年宫、图书馆、公园等设施相继竣工，坎门、陈屿两翼的城区面貌日新月异，三区并峙的港口城市已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城市建设好戏连台：一是装机容量420万千瓦国内最大的港口火力发电厂落户下青塘；二是围垦面积68万亩的漩门三期工程经省发展计划厅批准立项；三是占地1000多亩的华东地区最大的家具园区及会展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四是日处理6万吨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年底将建成投运。加快了科技、机电、汽摩、阀门、眼镜、医药包装六大特色工业园区建设。

为了改善生产和生活环境，我县结合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把住宅小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加快城市建设的突破口，实行梯度推进，综合开发。在开发建设中，强化精品意识，求精不求大，求美不求洋，做到设计风格多样，建筑布局合理。工程施工时瞄准质量目标，强化质量管理、现场标准化管理和工程质量管理，使住宅小区上档次、上水平。近几年，我县先后建成了湖畔花园、石井小区、东风小区、夕阳红山庄等一批高品质的住宅小区，为居民提供了优

美、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我县的工业园区建设，着眼于产业集聚，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实施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做到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档次。有力地推进了市场发育和产业集聚，促进企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强化了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为我县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追求的是品位和格调。营造城市的亮丽、洁美，靠的是城管工作的匠心独运和社会化多声部合奏。良好的城市管理使我城乡气度不凡，格高韵美。

肩负着我县城市化建设重任的人们，熟谙城市美学，他们知道一座城市“净化不够格是丑城；绿化不精美是枯城，亮化没品位是睡城。”1995年，我县成立了城管工作专门机构，以实施“榴岛花园”系列活动为载体，实施了一净化、二绿化、三美化、四亮化等滚动式景观工作。采取管治并举的办法，对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的“脏乱差”等问题，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对一些全局性、长期性的城市管理顽症，通过“榴岛花园”系列活动，每年突出一个主题，一年解决一两个问题。几年来，我县积极推进了垃圾袋装化，完善了“门前三包”环卫责任。拍卖环卫经营权、垃圾处理权，让企业、个人参与城市保洁；对城区各路段的广告杆、灯箱、招牌经常进行地毯式轮番清理；依法拆掉了街道两旁乱建乱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搬迁了大批影响市容市貌和污染环境的小店小铺等商业场所。使乱摆摊点、乱贴广告、乱抛垃圾、乱丢瓜果屑等不文明现象成为过去。开展街容达标路建设，使城区街道整洁美观。城区内规定了行车路线，禁止拖拉机进城，禁止机动车鸣放喇叭，制止车辆乱停放和逆向行驶，对城区主要街道实行人车分流，做到车辆停放归线、运行按章，保持城区交通井然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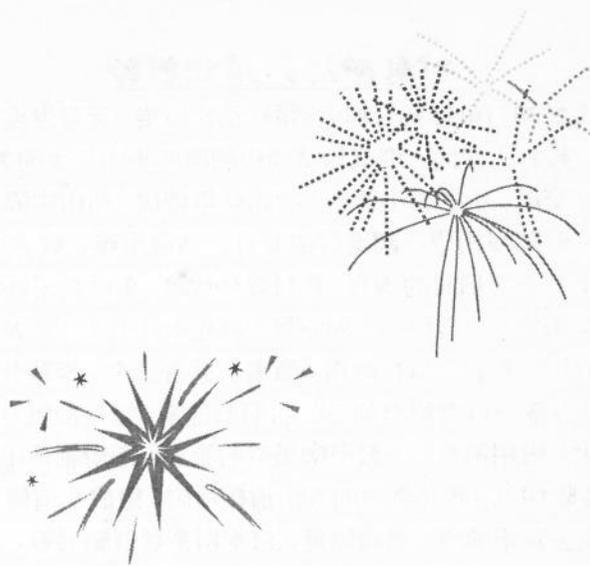
我县提出了“小体量、大绿化、创特色、重环境”的环境绿化

思路。合理组织各类绿化用地和绿地景观建设，着力营造文明祥和、整洁有序、环境优美、生机盎然的城市生态空间。动员全民种花植树栽草，坚持“乔、灌、花、草一齐上”的绿化方针，重点抓城市道路、城区街道、居住小区、机关单位、公共场所的绿化建设。采取道路植绿、街头栽绿、河岸种绿、山体育绿、庭院造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等方式，把森林造进城市，把园林引向街道，把绿化带入家庭。推行单位共建共管，共同营构绿化家园，为了让城市一年四季花常开、草常绿、树常青，玉环在评选县树县花的基础上，不惜重金引种古树名木，还专门建立了花木基地，建立了市政园林部门及镇乡两级绿化管理护养队伍，实行专业绿化服务。去年用于绿化的资金达2000万元，广泛引种了潇洒飘逸的亚热带棕榈植物。同时，十分重视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玉环公园的亭台楼阁处处是名家墨宝，石榴园榴花照眼，别具风流。目前，县城的绿地率已达26.8%，绿地覆盖率达到30%以上。放眼城区街巷，但见棕榈挺拔，榕树吐翠，文旦飘香，椰子开屏，香樟婆娑，住宅小区绿意荡漾，街心小品百花争艳，玉环公园垂柳压堤、翠竹迎风……满城春色，与四围山色、一湾春水濡润成一幅朴茂苍润的泼墨山水，让人进入玉环大地，就有如进入了“绿的世界、花的海洋、鸟的天地、人的乐园”般的感受。

从1996年以来，每年投入资金500万元，布置城区景观照明。每当夜幕降临，城区街道霓虹闪烁，高层商厦礼花缤纷，喷泉水柱在星空下流光溢彩，多光束探照灯把对港口新城厚爱的柔情摇曳成朦胧的七彩光谱赠送给城市的每一座建筑、每一块草坪。流线型灯光隧道纵横交叉，闪烁成“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辉煌景观，直把港口新城渲染得风情万种，光彩迷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继往开来堪称时代强者。45万玉环儿女迎着二十一世纪的一轮朝日，正在认真定位新的发展坐标，研究探寻二次腾飞的世纪之路。琢玉成器的玉环人，必将把“东海碧

玉”建成山、海、城、岛天趣自然，滨海生态和园林风格融合一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珠联璧合的现代化港口中等城市。“碧玉辉光耀眼明”的绮丽景观，必将凸现在涛走云飞的东海之滨。



沧海桑田 苔山村

○ 谢良福

蛇龟神山，风光独特

传说蛇神与龟神乘天神们酒醉，溜出玩耍，无意发现天庭后宫的秘密，被打入凡间，变成乐清湾中的两座小山。大的为大苔山，形如二蛇交尾；小的为小苔山，状如巨龟蛰伏。两山中隔着海涂浦沟，潮涨时隔海相望，潮退时中间有一马道相连，成为一村。

山上有一座旧时的炮台，昔日登台远眺，东面是玉环海拔最高的大雷头山，去缭绕，山列苍翠。目光南移泗头山、龙王山，顶尖烽火台历历在目，似有战讯、海事从远古远来。南观分水山，涨讯刚起，有潮汐自温州湾朝应公门汨汨进来，远处渔帆点点，鸥影从小到大，银翅拍水，一派海阔天空的景象。西望雁荡山，日照奇峰，秀姿隐约，与西北奇丽的方山遥相呼应，组成一道倚天的黛绿屏障。潮去观乐清湾，黑涂绵延，白水根系状似辐展着，满眼宁静致远。

苔山早年南有百丈岩仙人洞，状如西北窑洞，可纳十余人，是讨小海人下海前候潮休憩的去处。北有水桶岩，巨石如水桶悬立于海滩，颇有气势。东有老鹰洞，栖息老鹰数十只，惊飞时叫声四起，黑翼拍声，疑若风暴，胆小者毛骨悚然。如今，环山的异洞奇石皆被围涂开采，不留痕迹。唯有庭宅翠竹掩映，巨樟醒目点缀村间；展示农家美好环境；唯有春天开不败的野百合花，双艳并蒂，给恋人增添情思；唯有秋天黄菊花满坡盛开，芳香袭人，渲染秋高气爽之色。今日登台远眺，自北至东南，3000多亩文旦园春秋花果香，夏冬葱绿照眼。自西南至西北，风光依旧，只是退潮之后，海涂上蚶塘蛭田，俨然格画，井然不序。

曾有风水先生自东南方向远眺苔山，说是出贵人的地方，登山一看，只见蛇龟二山系脉不辍，风从隙过，水从沟起，长叹一声欲搭渡回程，村人挽袖再三请问，云云“蛇龟相连，植木掩之，或有贵人出世未知矣。”

贵贱同宗，好恶备至

明代，郑成功部将阮乐，率部在山上筑城设寨，抗击倭寇骚扰，山上留有城址及营盘、校场、马道，为历史、为民间传说留下艳亮的一笔。传说阮乐之女，光采照人，知书达理，功夫了得，每早一个飞身，跳到东面数里远的元宝山梳头，遗金头梳一枚，化为泗头山。此女不恋当朝宰相之子，却下嫁苔山一忠厚讨海人，生活十分美满。

讨海人怕做光棍，却又讨不起老婆，自然产生许多美丽的传说。

当然，也有与传说一样美丽的历史故事。相传康熙末年，太平一沈姓青年，与一女暗恋，携女逃婚，仅带一斧一锅，背女跋涉十里滩涂，来到苔山。其时环山长满丝苔，步履维艰，故取名苔山。山上柴草丰茂，泥土湿润肥沃。沈氏遂于山前向阳处斫薪搭屋，掘井汲水，生火安家。至今尚留小井一口，居说有两三百年历史，井水不枯。沈氏退潮拾鲜，涨潮砍柴，隔日赶集换粮，度日虽艰，因是世外桃源有美满的爱情，倒也生活自在。雍正5年，展复玉环，有谢姓、徐姓、张姓、王姓、高姓、金姓诸家渐次上山安家，围绕小井居住，人丁增至百余，沈家被尊为苔山开山始祖，居于当中。

“苔山癞头船加船”，苔山人的生老病死，听天由命。那时世道昏暗，加上苔山交通不便，鱼价低贱，粮食金贵，一旦天旱，山上居民，度日自然艰难，谈不上文化生活。村谣说“三年未听锣鼓响，十年未见戏上棚”，可想而知。至于受教育更不用说，开山二百余年，至民国仅有一个初通文墨之人。文化落后，给人起绰号的风气

很盛。苔山人人有绰号，尤其是男儿，年至十来岁，村民便不知其名，只知绰号。绰号有根据残疾特征起的，如“癞头度爷”、“长舌阿四”、“摆脚老五”

、“麻脸阿六”；有根据形象特点取的，如“长脚根”、“大头佬”、“乌烟鬼”、“摸乱度”，有根据智商高下叫的，如“呆大”、“野蛟”、“火乱”、“十三”。各种绰号形象生动，恰如其份。有父子以斤两取名的，父为“斤三”子为“六斤半”；有兄弟为缀字尾的，长为“老硬”、次为“硬乱”、三为“乱钻”，不管有无根据，不管同意不同意，反正那绰号一叫百年，甚至传世。

百姓渴望好日子，寄希望于神佛，早年山上有城隍庙、关帝庙、土地庙，香火极盛。讨海人下船，都要搞“拜老爷”、“做水头”迷信活动，即将猪头、雄鸡、果蔬供奉庙堂，然后祭船，再后在船上吃一顿，最乐的是男孩子，有看有玩有吃，女孩和妇女是没有口福的，据说女人祭老爷或上船会冲掉打鱼人的运气。“做水头”碰到女人，要大叫一声“拍即新丧”，会赶掉晦气。女人分娩后，打鱼人不能进房，房里有晦气。女人更不能下海涂捉海鲜，只能种地，男人讨海。苔山女人“忙了山上忙家里，男人讨海回来庙墙角落吹牛皮”，可谓历史悠久。

文化落后，苔山男人一方面渴望有个女人作伴，一方面又重男轻女，将女人看作低贱一等。

值得称颂的是，苔山人对老师很尊重。那个初通文墨的人，在二战时期，曾被称作先生至今怀念。民国十七年，玉环台风淫雨，十八年水旱风虫四灾并发，苔山人在生活几乎绝望。民国十九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苔山人在那位先生的带动下，积极参与，为红十三军二团在苔山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作过贡献。当年7月8日，红军楚门游击大队主力200人，自苔山村出发，奇袭清港芳杜茶头国民党保卫团，打得敌人仓皇逃窜。同月13日，国民党县基干队合省水警队围攻苔山，红军游击队伏兵于进港株网船，里应外合，

打败敌人。苔山人民，积极支前，为红十三军二团的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青山有幸埋忠骨”，至今山上埋着红十三军领导人的忠骨，耸立着二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纪念碑。

记得有位老师姓张，苔山人对他十分尊敬，每逢过节，总要去请他，送东西给他。张老师恋在苔山执教近30年，写信、修理收音机，助人为乐，与苔山人结下深厚友谊。苔山人有祖孙三代是张老师学生的。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办厂能人，养殖能手。也有不成器者如影响很大的沈某。1979年3月23日，沈某因赌博输钱，妻子劝说，竟持斧杀其妻和妻舅，作案后畏罪潜逃，被海水淹死。也有村人引为骄傲的，1986年，沈家弟子考上清华大学，5年后，与一大学教授之女恋爱，双双留学法国，成为苔山村开山三百年的第一对“状元”。

不知道是否应了风水先生的话，1991年，大苔山与小苔山北边连接的海塘上木麻黄树长成风墙，塘外文旦林开发成片，前景无限。

沃土储金，盛世贵人

苔山土地肥沃，古有“海山千亩田，不值苔山八百地”之说。农业作物，以麦子、蕃薯、花生为主。尤其花生远近闻名，个大且香，每当来客或过年，炒花生的香味盈户袅袅，十分诱人。环山乐清湾，潮流缓慢，涂面平坦，涂质肥沃，为鱼虾贝类藻栖息繁殖的场所，曾是全国大黄鱼重要产卵繁殖区域之一。其自然对虾，个大无比，传说大如婴孩手臂，食之开胃，口生余香。苔山人世代讨海，传统作业插株网，从苧麻到尼龙织网，历时百余年。此网系于竹竿，扦插于海涂，潮来潮去，鱼虾沿网相靠，捡拾十分方便。扞网船曰卷底船，海涂上的运网桶曰卷底桶，也有用弹涂艇的，同样卷底。卷底者，系锯成两头翘的木板拼成，在海涂上可推动、可滑翔，是滩涂上行动快捷的工具。

可是海涂上的交通工具不能载人，从苔山村到陆上或客人到苔山，交通极不方便，碰到退潮竟要等渡船大半天，遇到刮风下雨更是苦不堪言。苔山人多么渴望有一条为生活和工作提供方便的康庄大道呀。

乐清湾是全国最大的蛭苗繁殖基地，培育蛭苗种，苔山村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涂优势。1959年11月，县人民政府在苔山村建立全国首家国营海涂苗种繁殖场，有来自各地的职工463人，开辟蛭苗种培育基地1300亩，生产种苗3.5吨，养殖缢蛭115亩，泥蚶10亩，牡蛎5亩，围塘200余亩纳潮港养鲻鱼、鲈鱼、青蟹、白虾等，虽因经营不善于次年亏损解体，但开了苔山村海涂养殖的先河，为1967年苔山村门前涂的围垦打下了基础。

1966年，水利部门准备围垦苔山塘，在苔山村的蛇尾开采13孔闸岩基，1973年建成全县仅有的中型水闸，受益面积1.3万亩。雨季13闸开启排水，水声隆隆，有如排山倒海之势。1977年苔山塘工程再次上马，由国家投资145万元，地方投资22万元，6个公社的1000多人投入艰苦劳动，3年投工163万工，完成土方85万方，筑成3138米长的长堤，终于在79年12月10日堵口合龙，次年12月30日闭气竣工，围垦海涂6100余亩。

从此，苔山村结束了海岛的历史，13孔闸大桥、门前桥和一条长10里的宽敞的乡道，构成苔山人民的幸福大道。村民走在桥上听桥下潺潺流水，看游鱼打涡，穿过木麻黄林听唧唧鸟鸣，闻文旦花香，自是精神百倍，志气昂扬，走向精采的世界，走向崭新的生活。

交通的开发启动了苔山村经济。80年代，苔山村民以五金机械加工起步，开始了作坊式企业，至1994年，全村企业发展到20余家，产值超2000万元。工业经济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村民们在门前塘种植桔子、红柿，在山上种文旦，每到秋天橙黄橘绿，柿红柚黄，一派丰收的景象。

80年代初，苔山村分海涂到户，开始发展海涂养殖业。1994年依靠科技海涂养殖2000余亩，收入最好的是泥蚶商品苗种的培育，凡此项投资万元的农户，93年收入8—10万元，94年收入4—5万元，投资10万元的收入更为可观。全村海涂养殖收入1000多万元，人均收入2000元以上。

如今，苔山群楼林立，办厂养殖能人辈出，科教兴村，蔚为壮观，真是“沃土储黄金，盛世出贵人”啊！

编者按：本文作于90年代中期，虽缺少近期的内容，未免明日黄花。但对苔山历史剖析的叙述，备极周详，尤为可取，因不知作者近址无法补充，只作鉴古，不能知今，是其不足，希望作者见到本文，告以近址，以便寄奉稿费。

水乡恋

● 黄玉生

水乡——徐都塘——她是我生长的地方，水，比乳还甜，她给我饮大。土地，盛产大米比苹果还香，她给我喂大。人们将苏杭比之天堂，可是，我独爱我的故乡徐都塘。

徐都塘，素有“玉环谷仓”之美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每年要贡献给国家六、七十万斤粮食，比陈屿全区还多，农民们都引以为荣。

徐都塘得天独厚，水向西流，东南有高山，北临清港（同善塘），塘基高，排洪快，湖面宽阔，源远流长。两岸土地肥沃，雨水调匀，四季无荒旱，年年有丰收。稻谷早晚两熟，为粒壮实饱满，各塘与之无比。物产荸荠，产量高，质量好，甜多味美，渣少爽口，畅销各地，名闻沪粤。

在情朗的春天，当你来到徐都塘，就可看见一塘春水，青山倒映，微风吹皱，波光粼粼，分外耀目。两岸的土地上，披着一层层绿得发翠的黄花草，相间着一片片金黄的油菜，天工锦绣，绚丽多彩。

清明节，我们年年荡舟扫墓，大人们摇着桨，我坐在舟上，慢慢前进，近看湖边绿树婆娑；远看山上杜鹃烂漫，更加使人流连忘返。

暮春，深野垂林，处处有浓郁的柑花吐芳，沁人心脾。蜂蝶飞舞枝头，鸟儿传声叶里。秋后，家家的庭前屋后，金果累累，大有“柑乡”风貌。

夏天，徐都塘又另有一番光景，岸边和港湾的水面上，铺满

了水浮莲。农民们用元宝花或革命草围成一圈一圈，养护水浮莲，使她变成一条绿色的湖塘。水浮莲由外地引殖，可以作饲料，繁殖率很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农家爱之为宝。横港，人称“发财港”，年年有人育苗，供应各地，多少人前来订购，多少人靠她致富。

徐都塘，水深港湾多，鱼虾满塘。银鱼，俗称“面鱼”，是徐都塘的特有产品，其鲜美不亚于太湖产。太湖银鱼大，徐都塘银鱼小。尝过的人都知道，芳杜塘银鱼硬刺，徐都塘银鱼软刺，特有风味。

清早起来，岸上便有人垂钓，要吃鲫鱼，到街上买，不如向湖边钓方便。鱼钓上水，活跳活蹦，吃鱼还是钓鱼味道好。

每年关田季节，雨水多，田水向河里放，人们在放水处按上一个竹筒，河边挨了一个泥缸，上盖薄薄水草，鲫鱼便会来斗水，跃入泥缸，钻到水草下，一次就可获好几斤。田水自由放，鲫鱼也会斗水上田，满田都是，大家在田里摸，兴趣更浓。

春、夏间，雨夜，小港水满鲤鱼就来水草边产卵，人们拿“撩盆”（网结的）去掏，十几斤重的鲤鱼也会捕获。因此，有些人常在深更半夜在那里等待鱼来。

徐都塘的石螺特别好吃，没有泥浆，水满用螺搯掏；水浅在河边摸，到处都有，家家当菜，不乏其力。

还有掏虾、钓田蟹、钓黄鳝，小时，我在家乡的田陌上，河岸边穿来穿去，猎取这些野味，丰富我的生活内容，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津津有味。

1967年12月，我从北京回乡，徐都塘已经养上白鲢、草鱼，一网捕获十几船（三万多斤），岸上的人们手舞足蹈，我也喜悦颜开，不禁脱口而出：“水乡啊！你更加发挥作用了！”

1980年的冬天，我出差杭州，顺便返乡探亲，一见徐都塘，又变新颜。河塘中央，密密麻麻竖起了竹椿，养殖珍珠，家乡的人们，

又向水中探宝。家乡的水，牵着游子的心，难怪我在梦中也要寻找您啊！

作者简介：黄玉生，男，徐都人，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央冶金部科学院工作至今，职称为高级工程师。



耕耘文史十七年

朱仁巴

我于1985年受聘县政协助编玉环文史资料。当时文史办公室有陈书钊、余必煜、黄云鹤和我共4人。玉环文史资料于1984年由首届政协主席黄从青创建的，于兹已18个年头了。十八年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统战特色，共征集各类文史稿件950篇、约250万字。已出版玉环文史资料1—19辑，《选辑》和《玉环籍在外人士通讯录》各一辑。共用各类稿件850多篇，约230万字，总印数37700册。其中第14辑《烽火年华》（董南才回忆）出版以后，深受各界好评。当时经费有限印数少，不能满足广大读者需求，读者自发筹资二次再版，1999年荣获省政协优秀文史图书三等奖，2002年又获上海市《金秋文学社》创作奖，这是玉环文史资料出版以来，首次获此殊荣。

玉环文史资料以翔实生动的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生动活泼的教材，起到拾史之余、补史之缺的作用，对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我县史学

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玉环文史资料被玉环籍著名女作家叶文玲誉为是玉环一枝独秀的奇葩。

这些巨大成绩的获得，首先是领导重视，首届县政协主席黄从青，他创建玉环文史资料，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号召各界撰写文史资料，亲自审阅修改稿件，副主席陈贻焯、秘书长邢义兴分管文史，担任编审成绩显著，四、五届政协常务副主席、主席颜志复，亲自分管文史，担任编审，时间最长对文史资料倾注了不少心血。由于政协领导重视，文史经费有保证，县财政对文史经费开绿灯，用多少报多少，实报实销，后来编列常年预算，保证文史经费有足够开支。这在台州市各县并不多见。

其次是有一系列相应的组织机构和通联队伍，政协设文史资料委员会，有委员7—9人，特邀委员5—7人，常驻聘用人员最多有4人，现在是2人，还聘请了县内外知名人士40多人为通讯员和特约撰稿人，有了这一整套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和通联队伍，保证了文史资料有充裕的稿源，按期顺利出版。

再次是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通力协作，档案馆、党史办、科协等单位的负责人都是特邀文史委员，都得到这些单位的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及时提供相关资料，使我们有坚强的后盾。使文史工作如鱼得水。

1990年，全国政协文史会议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强调要把文史资料推向社会，为社会服务。

根据这个要求，我们认为文史资料的出版，不是替文史资料画上句号，而是用文史资料服务社会的开始，这就要不失时机地抓住各种机遇，发挥文史资料的独特作用，与时俱进、为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和统战服务，使文史资料的利用价值不断深化，不断升华，玉环文史资料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95年，是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县各界隆重召开纪念大会，为了配合这个纪念活动，玉环文史资

料推出有关抗战史料10余篇，供当地报纸、电视、广播，以及台州日报连续报道，揭露日寇在我县犯下的滔天罪行，借以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同仇敌忾意识，还根据资料所载楚门人，被日寇连戳十八刀而未死的王洪芳，请到大会上来现身说法，当众展示身上十八个刀疤，使与会人员更加痛恨日寇暴行，这种直观教育，胜过任何文字宣传，起到其他宣传不能替代的作用。

同年台州市政协出版抗战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不能忘却的历史》一书，转载了玉环文史资料11篇抗战史料，丰富了该书的内容，扩大了宣传教育面。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玉环文史资料及时推出玉环籍抗英名将林正阳的史料，林正阳是我县城关西青街人，行伍出身，1841年鸦片战争时期，在定海总兵葛云飞麾下任定海营守备。英军来犯，林正阳建议筑土城堵御，英军屡攻不逞，死伤惨重。后调重兵反扑，林正阳浴血奋战，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林战功卓著，多次受到皇恩封赏，后被擢拔为黄岩镇总兵，敕封为正二品，玉环文史资料推出林正阳抗英史料，配合香港回归祖国，玉环报、电视台、广播台竞相采用，高频率宣传，台州日报还以头版头条刊出，省联谊报再次披露这一史料。我县广大军民莫不以我县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抗英名将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自此，多年被冷落的林正阳墓，清明日去祭扫和瞻仰的人也特别增多，有识之士还建议把林正阳墓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文史资料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也开创了一条探索性的路子。

玉环文史资料9、11两辑，征编（在外地玉环人）专辑，共辑录101位学有造诣的高知人士的传略，介绍他们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著作，他们在国内外都有崇高的信誉。发行以后，深受各界欢迎，尤其是企业家、不少工厂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向有关科技人员咨询业务，或翻译国外产品，有的还被聘为技术员或顾问，大大提高

了自身的业务素质,最为突出的是玉环洛克啤酒厂,诚聘玉环籍在宁波的啤酒专家董新篁为技术顾问,在短短二年内,培养了自己的技术人才,并培育出优良的啤酒菌种,使产品提高了档次,扩大了销售,业务番翻,税利倍增,成为县里的纳税大户。目前有十多位在外退休科技人员回乡为桑梓服务。玉环县科委,根据玉环文史资料提供的信息,聘请了十多位玉环籍在外高科技人士,担任玉环县科技信息员,为玉环科技开发招贤纳士。

1984年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玉环籍在外人士通讯录,共收录了1000多位在外玉环人的通讯地址、电话及邮政编码,不仅为我县提供人才信息,也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玉环人拉在一起,使散居在天南地北的玉环人能互通信息,不少人来信说自己失散多年音讯杳绝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得以恢复通讯,赞扬我们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通讯录的编发,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共印2000本,半数被当地企业、工厂老板购去,作为外出随身手册。

为统战工作服务,也是玉环文史资料的一大特色,1989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个《选辑》,把历年出版的文史资料中,乡情较浓的35篇文章,汇编成册,发往港台和海外。1992年台北玉环同乡会成立20周年,出版纪念特刊,转载了《选辑》中的18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地地道道的玉环人、玉环事,对久经背离乡土的台胞来说,无疑都是倍感亲切,十分欣赏。原国大代表毛光熙,读后来信说书中这些人和事,他大半知晓,并补充和纠正了一些传闻轶事。

玉环文史资料还先后刊载了五位在台知名度较高人士的传略,从而消除了他们对大陆的顾虑,台湾太极名师干肃洲的小传刊出后,他消除了顾虑,毅然返乡探亲,并带礼品会见了编辑部人员,刊出花莲教区神甫钱志纯的小传后,他来信表示十分感谢。

玉环文史资料还开辟港台专栏,特约在台人士撰写文章,先后有毛礼文、张民正、王世尧等人撰文,诗人王逸之、周子鹏、胡载

阳等人的诗作,分别在专栏上刊出,交流了两岸文化,联络了感情,增进了友谊,密切了关系。胡载阳老先生,特爱玉环文史资料,从第一辑起,每辑都加收藏,视为至宝。

文史资料推向社会,为社会所用,还须社会各界通力协作,方始有成。

编者按:文史编辑部撰写的《文史资料与时俱进为社会服务》一文,2002年在全省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作书面介绍。

我在编辑玉环文史资料过程中,结识了不少玉环籍和非玉环籍著名人士,与他们颇有通信来往,事务接触,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被他(她)们那种不平凡的业绩所感动,先后在省、市、县媒体发表80多位玉环籍高知人士的传略,宣传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无私奉献的拼搏精神。并将70多位符合条件的推荐入《浙江古今名人大辞典》,以弘扬他们的丰功伟绩。

我在文坛上结识、在文坛上结谊的也有不少非玉环籍著名人士,运用他们的声望为社会所用,如请书法泰斗沙孟海为《玉环地名志》写书名,为《台湾同胞接待站》写牌名,为楚门《海外海宾馆》写店名,都是通过非玉环籍著名人士于冠西(当时他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转请约写来的,不仅提高了这些单位的知名度,也为地方增光添彩。类似这此些好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我和台湾的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上层人物,通过鱼雁往还,诗词酬唱,结为金兰之好,通讯最多的是原“国大代表”毛光熙,1999年已出版《毛光熙百信集》传世。毛光熙今年已96高龄,还继续和我通讯,手头已有50多封,相约再出一个《百信集》。

十余年来,我在编务之余,勤于笔耕,撰写了各类散文,散见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媒体,县外文史资料,楚门《曲桥》等报刊,计100多篇,约25万字,从而多次被当地媒体评为优秀,积

极通讯员，1996年还被省政协评为优秀文史工作者。

2001年我自费出版了《无名集》，容纳了这部份作品，也算是我人生价值的总展示，我常以生平心血无虚掷而自慰。

我在文史工作的十七年中，政协领导，文史委员，他们为文史资料呕心沥血，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令人敬仰。最令人难忘的是文史委主任、文史资料总编戴汉节老师，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界老前辈，桃李满天下，他任文史委主任，文史资料总编，任期最长，时间最久，每辑文史资料都有四、五十篇文章、十多万字，他总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逐字逐句、细细推敲、斟字酌句，力求精炼准确，在他的老花眼镜下，那些语法不通，用词不当，史实有疑虑的，以及极不易发觉的错别字，都一一得到了纠正。给他的审稿时限，他从不误时，总是提前交卷，本可付给若干审稿费。他分文不收，戴老师今年已78高龄，仍一如既往，孜孜不倦，为玉环文史资料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对玉环文史资料付出不少，贡献很大，一向鲜为人知，我要为戴老师那种孺子牛精神大唱赞歌，评功摆好。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信然，我在文史工作中，也有不少不如意难称心的事。

首先，文史工作，也是文字工作，这里有许多禁区，我不敢面对，总是绕着走，民兵专辑出版以后，领导上提出要继续征集土改、镇反、整风反右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史资料，我借口外县文史无此先例，目前崇尚出版“专辑”而未执行。但内心的愧疚、总难抚平。

其次，我千方百计约来的稿件，作者也在百忙中为我写出、却因种种原因不能用。但又不好言明，只好暗暗叫苦。

第三是校对质量差，每辑错别字超标，读者不断来信指出，更难容忍的是张冠李戴，15辑乡企专辑，把凯凌集团的厂貌照片误植在南洋电机上的文章上，作为该厂厂貌，招致凯凌集团十分不满，17辑水果专辑中，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现场挥毫的照

片植反了，成为左笔书写。在水果专辑中，县供销社对前期文旦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征稿时疏误，只字未提，抹杀了他们的成绩，招致他们意见纷纷，这些都在我的心灵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内疚。

玉环文史资料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从总体上讲，玉环文史资料的水平不高，与时代赋予的要求，与先进的兄弟县相比较，和领导要求出精品等，还有一定差距。这不能不归结到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经历不足，又没有及时充电，通过“三个代表”学习以后，新时期对文史资料赋予了新的使命，新的要求，文史工作要“要散开网，广征集，选好题，精梳理，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精选慎编，以达到补史之缺，修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见省政协主席刘枫在全省文史工作会议上讲话）我今年已82高龄，面对重任，心余力拙，恳求准予辞退，回家颐养，临别赋诗一首，以抒心怀。

五島風雲捲九州，嘔心瀝血苦探求。
方家慨賜“三親”史，志士同襄一代猷。
願效董狐法萬世，難追司馬炳千秋。
存史資政功堪記，為獻涓埃樂未休。

题记：林作民同志所作的《台州倭患概述》一文阐述台州倭患颇详，现节录《台州倭患》一节以飨读者：文内有引号处均引自有关资料。

台州倭患概述

□ 林作民

“台州倭患，始于元末，终于嘉靖41年，此后至明亡，虽仍有小股倭寇侵扰，但已不至为患”。

元末，倭犯宁海，杀人掳掠，官兵不能制，民苦其害，水车（地名）陈性中组织乡团，设计歼倭。至正10年九月，倭船数艘，侵白岙，犯三门湾要塞之水车，陈性中“设宴迎接”，暗在酒中投毒，唯倭首酒中无毒。命其子率乡团埋伏。倭首酒醒被擒，余徒尽被歼灭。此后，方国珍起义军占据宁、台、温三郡。“保境安民”浙东免遭倭患。明洪武2年三月，元末群豪残部亡命海岛。与倭寇潜相勾结，劫掠明州、玉环茅岙等处，朝廷震动。遣行人杨载诏谕日本，责以入寇之故，日本国王良怀拒不奉命。次年，又南扰浙江，转掠明台温三府，三月，又遣使赴日，经据理力争。第二年，送还明台二郡被掠男女七十余人。洪武十七年，倭寇流劫乐清歧头等处。是年，信国公汤和巡视沿海，并于二十年筑台州滨海卫所。二十四年八月，黄岩海贼引倭入寇。遭卫所官军捕杀，南去广东。三十一年二月，倭二千余众侵扰海澳寨。楚门所等处，千户王斌、镇抚袁润等皆战死，朝廷下诏追杀。明惠帝建文三年十月，倭寇浙东，明成祖永乐二年五月，再寇浙东，九年五月，复寇浙东。十五年正月，倭寇劫掠松门、金乡、平阳等处，往来数月不绝。五月五日，倭突至松门，登岸焚劫，自寅至午未退，一城受害无算。翌年春正月，

倭复陷松门卫。永乐二十年壬寅。倭寇象山，复寇桃渚。徐忠击破之，自后在宣德年间无倭患达十余年。

元末明初至宣德年间为台州倭患的第一个阶段，同全国同时期的沿海倭乱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次数多，仅半个多世纪竟罹患十几次；二是范围广，自台郡北界的宁海迄至南境的玉环诸处。重要集镇和聚居区均遭劫掠。这在全国其他州郡是极为少数的；三是官军御倭努力，为患尚浅。破坏性也不大，这跟明初国力强盛，戮力海防有关。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宠信宦官王振，政治开始腐败。海防亦告松弛，国势渐趋衰落。自英宗初年至嘉靖年间，台州倭患至为惨烈。史称“东南半壁，几无宁土，岁无宁日”。英宗正统4年，倭船四十艘，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满载而东，遇官兵诈云入贡。我无备则肆杀掠。守臣所幸无事，俯顺倭情，备御渐疏。是年五月，倭破桃渚、大嵩二千户所。劫仓库，焚室庐，驱掠蒸庶，积骸如陵，流血成谷，婴儿缚之竿柱，沃以沸汤，视其啼号为笑乐。捕得孕妇，与其侪忖度男女，剔视之，以中否为胜负，负者饮酒，荒淫秽恶至不可言，民之少壮与粟帛，席卷归巢，城野萧条，过者陨涕。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台州人民的累累尸骨，浙东海防的废弛，再次引起朝廷的关注。同年八月，诏令备倭。正统七年，又命户部侍郎焦宏整饬浙江。焦宏“亲历卫所”，“惩戢奸顽，严益武备”，亲临台州，再筑桃渚城。寇盗稍戢。代宗景泰六年，倭寇健跳所。武宗正德九年，倭寇宁海，漳人又引之转犯奉化。嘉靖二年，因“争贡之役”，明廷罢市舶，闭关绝贡。十三年春，漳船假倭名劫掠玉环茅岙。松门。十八年，倭寇宁海，犯石所庄十日，沿海居民尽逃。次年，福建李光头、歙人许栋自福建越狱入海，引倭结巢于霏霭之双屿港，出没海上，濒海告警，倭势渐炽，为患益甚。浙东沿海岛屿。亦大部被倭寇与海盗所占据，嘉靖二十五年。泊宁波、台州诸近岛的倭寇，“攻掠诸郡邑无称，官民厅舍焚毁至数百千区。”次年十二

月“倭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三十年，诏宽海禁，自是舶主土豪益自喜，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倭势益烈。这些倭寇，以“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日向、摄摩、津州、纪伊、种岛，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亦间有之，乃因商于萨摩而附行者也。他们勾结沿海走私集团，乘坐“八幡船”。对浙江东部沿海进行惨无人道的大肆劫掠，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四日，漳倭七十余人，焚掠江馆；另有进犯隘顽、松门；四月六日，有自沙角歧头至山前过亭岭及锦屏者焚烧民居，恶少附之，寇益肆虐。同月，倭犯海门。“杀人如割草”、“沿途杀掠殊惨”。五月二十八日，福清贼首邓文俊率倭二千直入黄岩。焚县治，据县治七日而出，民舍官厅。被毁殆尽，同月，自松门登陆之倭，直抵太平南门。吹螺蚁附，纵火焚近郊室庐，城几破。同月，另有股倭侵掠仙居。次年，倭攻松门卫，败逃舟山，依王直为窝，旋复猖獗。五月，攻新河，余倭寇江馆。七月，倭攻宁海城，凡七日而解。十月，又犯太平。同年，有由永嘉登陆之倭寇，侵掠仙居安仁、板桥、厚仁等村，另有“中岛倭”自黄岩、栅浦登陆。经郡城，窜入仙居，沿途“杀戮无算”。称其时“两浙之贼，充斥郊野，所过残破，村落为墟，而乍浦以东，达于直隶之柘林二百里之地，皆为贼巢。”三十三年，倭突入松门卫，又贼二百余人于海门登陆直趋台州、仙居、过新昌、嵊县、屯于绍兴柯桥。十月，又有自霓奥登陆者，走乐清，越盘石岭趋台州、黄岩，自仙居至东阳。次年四月，松浦贼自钱仓白沙湾抄掠宁海。八月，倭舟三艘出没台州外海。九月，有贼数百由海门登岸。劫仙居、黄岩，“所过焚戮，官兵莫能御”十月，另有倭寇由黄岩沙埠。经茅畚、流劫仙居、天台，欲与绍兴贼汇合，至嵊县清风岭落败。十二月，松浦贼自福宁州来。越平阳仙居宁海至奉化，与钱仓贼合，凡七百人，入绍兴，被官兵击败后，复退临海，奔太平蒲歧港。另有自平阳至仙居、天台之倭，焚天台县西二里街，“天寒风烈，民居殆尽”。三十五年二月，倭自临海入黄岩西

乡，六月陷仙居，民众迟逃者俱遭杀戮。聚四十余天，烟火烛天。“仙居全城被焚，仅留学宫及二三民房”。同年，辛五郎余党陆甯宁海，“焚掠一空”。走温州至福建逃遁入海。三十六年四月，倭攻海门，流劫松门，又有继至之贼合攻郡城。另有倭寇进攻太平、宁海等处。翌年四月，倭以栅浦为侵略据点，分掠长浦、路桥、泽库、沙角各镇，后以数万众进逼郡城，被知府谭纶用计却退。其后，倭掠临海三石镇为胡过宪所败。另有倭船数十艘。泊石马、林港、分攻象山、宁海、仙居。三十八年三月，贼犯桃渚所，又有千余人自泥湖礁攻楚门，再寇松门卫，由夏公忬入犯太平城。三十九年，隘顽所千户焦涇追倭没于海。嘉靖四十年四、五月间，倭寇一、二万人进犯桃渚、圻头、郡城、新河、坑、长沙等数十处，寻机与戚家军决战，一时间“人情汹汹，檄书人马交错于道”。至此，台州倭患达到顶点，戚继光挥师进剿，九战九捷。全歼而还，台州倭患终告平息。

明英宗正统初年至嘉靖四十年为台州倭患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台州倭患至为惨烈的阶段。这一阶段，倭寇、海盗集团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直接合流或遥相呼应，力量骤长。他们原以沿海之大陈、霓忬、南麂凤凰山、玉环山、披山、大鹿等海岛为据点，至第二阶段后，进一步发展到在大陆之栅浦、桃渚、海游、葭芷等滨海地带建立海陆两用侵略据点，以台州及近邻郡县为掠夺目标，与明军及沿海抗倭义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其侵扰次数之多，居同期沿海倭患之首。此外，这一阶段的倭患还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危害范围广，进扰台州倭船动则数十艘，甚至上百艘，蔽海而至，人数亦骤至千余人或上万人，海陆配合，前呼后应。不仅劫掠沿海，而且远涉天台、仙居，并向内陆郡县进犯，受害范围极广；二是危害程度深。倭寇进犯台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攻毁城池，焚燔庐舍，掳掠女子财物以巨万计，吏民将佐死锋镝填沟壑者亦以数万计。胡宗宪称：“两浙三吴之地，自用兵以来，连岁荒旱，民多艰食，……

劳师费财，贼势益盛，流突之处，荡然一空，强壮散之四方，老稚转乎沟壑，蓄积煨尽，生理萧条。”“东南罢敝极点”严重破坏了台州及滨海郡邑的农、渔、盐生产，妨碍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影响深远。台州是倭寇重点掠劫的地区，也是倭寇与御倭官兵决战的主战场，台州倭患不仅引起朝廷的直接关注，而且影响到朝廷御倭的决策。朝廷遣使日本，与其骚扰台州沿海有关；汤和筑沿海卫所，与倭寇为患海滨及方明谦献策有关；戚继光由宁绍台参将易名分部台州，其直接关系就不言而喻了。再如嘉靖以后的开禁，与嘉靖时期厉行海禁，加剧倭患。开禁可以弭患直接有关。此外，台州倭患之惨烈严重地摧残了台州经济的基础，延缓了台州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使明朝后期的台州呈现停滞落后的态势，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纪效新书》成书在台州初探

▲ 陈一芳

如今，有些著作把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写作年代，说是明万历十二年（1584）——〔见《中华武术》1984年第二期第36页《纪效新书》篇〕。

据《戚少保年谱考编》记载，戚继光着手编纂《纪效新书》，是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当时编成的十四卷，可能还是手抄本在军中传抄流行。

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正式付印了《纪效新书》。此时，他又补充了四卷，全书以十八卷的面目，初步成为定本。

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再次由此调南，这个时候，朝纲不振，戚继光的政敌烽起，流言四布，在忧患重重之中，他又重新整理编辑了《纪效新书》，这个本子又恢复到十四卷。故，明万历十二年的版本，可能就是戚继光晚年时的修订本。

戚继光是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从山东调来浙江抗倭。三十八年首战台州，三战三捷，给饱受倭患的台州人民以莫大的鼓舞。而戚继光在战陈之中，锤炼益精，博采众长，独创一格地训练了“戚家军”，使敌寇闻风丧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参将。台州是金华、严州两府的大门，用戚继光自己的话来说：“篱藩既固，则堂奥自安”。故，他一直驻守在台州。就台州来说，海门卫和松门卫又是台州的海防前哨。海门卫的新河（古属太平县）千户所，恰当海门、松门两卫之中，是海门和松门两卫的联络枢纽。戚继光就常驻在新河，并把家眷也安在这里。这里的老

百姓更是和戚继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出身于将门的戚夫人，与新河一些妇女亲如姐妹。平时，常教妇女们击剑，妇女们则教她刺绣；战时，戚夫人和妇女们一道，给将士做饭、制作干粮等，同御倭寇。

这一段时间，倭寇在连受重创，一时无力再攻。战斗的胜利，给台州人民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太平，戚继光就是抓紧这戎马倥偬的间隙，一面训练新军，一面总结自己在东南沿海平倭的练兵与作战经验，整理成文，编纂成书，取名《纪效新书》。他认为这些都是“阅历有验之言”，意即平时练兵和作战的经验总结，故曰《纪效》。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南调福建之前，《纪效新书》已在新河流行于世。这，有清朝太平县学者戚学标，以满怀激情地追记戚公功德而写的《题戚武毅公祠》诗为证：

一听军门喇叭吹，萨摩麻海尽横尸！
重欣海有安澜日，真见功成唾手时。
隘献山川喷炽火，长沙芜树隐旌旗。
新书纪效征兵略，事事台南上口碑！

封面题字：郭仲选
篆 刻：谢保平
封面设计：韩 泰
特约校对：张公定